

中國經濟論文

第 2 卷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上海法華書局發行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二集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Institute of Chinese Economic Information)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

中國經濟論文集

第二集

每冊實價柒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中國經濟情報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再版

目次

總論

1. 中日經濟可能提攜嗎？……………1
2. 美國經濟考察團來華以後……………9
3. 列強壓迫下的華僑…………… 16
4. 中國的毒物問題…………… 26

貿易

1. 怎樣從對外貿易上去觀察中國的國民經濟………… 45
2. 列強對華貿易的新趨勢…………… 54
3. 中國國內市場底分割…………… 66

工業

1. 殖民地化過程中的中國工業…………… 75
2. 救濟棉紡業危機諸方案的檢討…………… 88
3. 衰落道上的中國火柴業底掙扎…………… 98
4. 中國手工業底分析……………107

農 業

1. 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117
2. 中國農村中底高利貸……………138
3. 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146
4. 徵工與工賑……………168

金 融

1. 英美在華的貨幣戰……………175
2. 最近資本逃亡的兩條去路……………187
3. 從金融公債說到工商業放款……………195
4. 通貨收縮與中國經濟恐慌……………201
5. 中國典當業的沒落過程……………208

財 政

1. 現階段各省財政的檢討……………217
2. 中國關稅底兩重性……………230
3. 目下的食鹽問題與新鹽稅法……………237
4. 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247

交 通

1. 列強在華航空爭霸戰……………261
2. 最近中國鐵道的整理問題……………276
3. 公路建設與中國農民……………284

經濟爭議

1.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工潮 297
2. 目下勞工生活會談 307
3. 死亡線上的的中國煤礦工人 318

東北經濟

1. 日人獨占東北礦業的邁進 327
2. 日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東北農村經濟 336

序

時間過得真快，我們覺得一切要做的工作還正在動手一般，那裏曉得離開我們編印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一集的時候已是漫長的一年了！

在這一年間，我們當然還是朝着“集合多數人的力量，用科學的方法，來忠實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預定目標邁進。固然，在我們之前，各種的障礙物還頑強地存在着，牠們確使我們底工作不能暢達地進行，然而我們畢竟是艱苦地前進了，雖然我們離開預定的目標還很遠很遠。

在這一年間，我們曾經編撰了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三四年），我們底第一集曾告再版，這主要自然是由於純潔的讀者們之至誠的愛好。同時我們覺得很遺憾的，那些流行於市面上的“歪曲了事實的報告和敘述”還是不少；因此牠們倒使我們那本不很完整的第一集，更能得到不願倒在“失望之中窒息”，不願在“甜蜜的幻想之中憧憬”的讀者們底關心，因此我們底精神也就加倍奮發起來，同時我們更勇敢地從事中國經濟論

文集第二集的編印。在這裏，我們要感謝生活書店，中華日報館和許多朋友底協助，使我們這小小的第二集能迅速地與讀者見面。

收集在這第二集裏面的論文，多半是發表在本社所主編的中國經濟情報（中華日報副刊）上面，還有是本社同人爲申報月刊，中國農村，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等刊物所特撰的稿件。此外還有三篇是章乃器先生發表在各雜誌上面的論文；因爲它們對於目下中國經濟的解剖非常重要，我們就事前商得章先生底同意，一併收集在內。

當我們編印第一集的時候，我們曾經指明編印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爭取更多的機會來校正和推進我們底工作”。現在我們面對着這同樣不能稱爲完整的第二集，自然也迫切地盼望熱誠的讀者們，給我們以多多的批判和指示！

中國經濟情報社。1935, 12, 3.

總 論

1. 中日經濟可能提攜嗎？
2. 美國經濟考察團來華以後
3. 列強壓迫下的華僑
4. 中國的毒物問題

貿易

1. 怎樣從對外貿易上去觀察中國的國民經濟
2. 列強對華貿易的新趨勢
3. 中國國內市場底分割

工 業

1. 殖民地化過程中的中國工業
2. 救濟棉紡業危機諸方案的檢討
3. 衰落道上的中國火柴業的掙扎
4. 中國手工業底分析

中日經濟可能提攜嗎？

章 乃 器

東北失地未復，淞滬，華北血跡未乾，察東砲聲在耳，日本帝國主義忽然高唱中日經濟提攜，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

在日本帝國主義底心目中，大概四萬萬中國人民個個都是冷血動物。日本帝國主義底見地，自然以為中國民族底革命運動，是不應該有的；而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先烈，在日本帝國主義看起來，自然只是少數的不馴分子。

一個小孩子受了委屈，大人可以用一顆飴糖哄騙他一下，這時候，旁邊的人自然也應該教訓這個小孩子不要存着仇恨的心理，而很和順的接受這一顆飴糖。

但是，幾十年來的中國，沒有福氣做一個受委屈的小孩子，而却做了一個被虐待的奴隸；他在被虐待的過程中，至少一隻手臂已經折斷了。他目下所要求的，是解放，是生命底保全；而不是少爺，小姐們底嬌嗔。在這種情形之下，倘使他的

農 業

1. 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
2. 中國農村中底高利貸
3. 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
4. 徵工與工賑

金 融

1. 英美在華的貨幣戰
2. 最近資本逃亡的兩條去路
3. 從金融公債說到工商業放款
4. 通貨收縮與中國經濟恐慌
5. 中國典當業的沒落過程

殘忍的主人忽然給他一顆飴糖，他不能不認為是被處死以前的一杯酒；而他也絕對不能因為一顆飴糖而放棄了他的解放要求的。

但是，我們且把這民族解放這個前提放在一旁，而來平心靜氣的分析這一顆飴糖底內容。

* * * * *

所謂中日經濟提攜方案，從報紙上可以見到的，有下列的幾個消息：

“日外務省召集重要協議會，聞其第一步所討論者，為：(一)鎮定排日運動；(二)制止排日後之中日貿易正軌，應當對於中國的復興運動，給與技術上及資本之援助，其中如農產品之棉花，羊毛，更當大量購受；(三)對於剿匪及白銀流出之防止而發生借款問題時，倘中國有所要求或希望，當予以考慮。”(二月十四日日聯社東京電)。

“關於日方對華經濟計劃，東京日日新聞及報知新聞等，揭露其具體內容如下：(一)對華經濟提攜，以援助中國自主的建設為原則；(二)實行對華經濟，技術，商務，貿易及金融援助，確立全面的東亞經濟集團；(三)由日本供給工業品，由中國供給原料品，實行物物交換制度，增進貿易關係；(四)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圓之信用借款，救濟中國金融，由正金，台灣，三井，朝鮮，三菱五銀行共同出資；(五)整理舊債，由日方債權提

財 政

1. 現階段各省財政的檢討
2. 中國關稅的二重性
3. 目下食鹽問題與新鹽法
4. 減輕田賦與廢除苛雜

交 通

1. 列強在華的航空爭霸戰
2. 最近中國鐵道的整理問題
3. 公路建設與中國農民

經濟爭議

1.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工潮
2. 目下勞工生活會談
3. 死亡線上的中國煤礦工人

供資金，開辦各項建設事業，實行生利償債辦法；（六）實現經濟提攜之時，日方即將自動放棄治外法權，並實行公使昇格，增高中國之國際地位。”（同日大晚報）。

從上述的記載加以分析，中日經濟提攜底目標，是在鎮壓反日運動；而牠的內容，主要的是使中國和日本以農業國和工業國的分野，實現國際分工。此外所謂政治，金融借款底通融，在目下可說是一種誘惑，而在將來却必然要控制中國底貨幣權和金融權。

* * * * *

一個國家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本來是歷史上一定的過程——不管在資本主義下面也好，在社會主義下面也好。中國民族倘使不放棄牠的歷史的使命，不開倒車回到半開化的階段裏去，工業化底要求是不能放棄的。

“地廣人稀”是農業發展底主要條件；反之，“人口稠密”是工業國底必然因素。中國本部人口底密度，僅次於日本帝國，而與德國相彷彿；其中江蘇省人口底密度，且較世界人口最稠之比利時而過之，中國人口稀疏的地方，是東北和西北；而東北土壤肥沃，實在是一個最宜發展農業的所在，日本帝國主義一面強佔了東北四省，而一面教中國人去開發農業，這是指給中國人一條死路。東北倘使在另一政權之下，東北底農產物無疑的可以壓倒中國本部底農產物，而使中國本部農業進一步的

東北經濟

1. 日本獨占東北礦業的邁進
2. 日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東北農村

陷於破產。

以工業品掉換農產品，本來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交易；因為在一般的情形之下，代表較短的勞動時間的工業品，可以掉換代表較長勞動時間的農產品。就是爲了這個原因，農村要變成都市發展的犧牲者，而殖民地成爲帝國主義發展的營養料。以原料掉換工業品的損失，中國已經受得夠了，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思，是要中國放棄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退回去做一個單純的原料生產者——要使中國更固定的，更嚴重的，受這種不公平交換的損失。

對於中國棉花的大量購買，更是我們不敢傾情的一件事。去年在華的日本紗廠和日本棉商對於中國棉花的收買，已經使華商紗廠受着致命的打擊；——因爲日本紗廠的成本輕，能用較高的價格收買棉花。這在外交官僚底立場，或者不妨責備華商紗廠不爭氣，不能改良技術；而我們本諸良心的批評，却覺不能抹煞任何國家的工業都需要初期保護的事實。好唱高調的人們，也許認爲抬高棉價是農民底利益；然而，我們覺得爭取農民利益，不能從鼓勵外國資本打倒民族資本的方向去發展。本國所需原料底保護，是任何獨立國家所不能或缺的政策；鼓勵原料輸出以消滅民族主要工業，這分明是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的一劑毒藥。然而，在牠逼令中國退回到農業國地位而實行牠理想中的中日國際分工的條件之下，消滅中國紡

織業這一劑毒藥，的確是不可少的。

所謂二萬萬元的信用放款，是日本帝國主義一箭雙鵰的妙計——一面消滅了中國底工業資本，而另一面同時消滅了中國的金融資本，日本不能運出牠僅有的日金四萬九千萬圓的黃金到中國來，也不能馬上把牠的紙幣運到中國來，牠更沒有足以投資中國的白銀；牠所有的，只是過剩的工業品。所以，這二萬萬元的信用借款，大抵逃不出是價值二萬萬元的工業品，經由日本在華金融業的媒介，直接貸與販賣日貨的日本商人和中國買辦。這種大量工業品底輸入，打倒中國民族工業，自然是沒有問題；然而，不僅如此，連這逗留在商業資本階段中的中國金融資本，平時以放資與買辦經紀為主要業務，在這日貨直接貸放的情形之下，也要無業可營了！

* * * * *

日本帝國主義底發展，是比較的畸形的；牠在軍事方面，已經發展到很高的形態，而在生產方面，却是比較的落後。我並不是否定生產力底發展，是帝國主義發展底因素；而是說，在生產部門底支配上，日本因為天然條件底限制，還不可能像別的帝國主義一樣，能和殖民地取得可能的分工。申言之，日本底生產，依然還停留在農業，手工業和輕工業底生產過程當中；這和半殖民地的中國，利害是無可調和的。

我們且分析日本底主要輸出入品，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

一月間的狀況是這樣：(單位日金千圓)

輸入品		輸出品	
棉花	639,843	棉織品	445,205
羊毛	169,304	生絲	260,958
石油	111,279	人造絲織品	101,122
機械	89,623	絲織品	70,212
藥品	62,865	機械及零件	51,757
鋼鐵	62,597	鐵	48,808
人工肥料	58,954	罐頭食物	46,823
廢鐵舊鐵	55,854	針織品	42,774
橡膠	53,291	瓷器	37,578
豆類	44,198	車輛及其零件	32,986
煤	41,504	鐵器	32,147
紙漿	39,329		
小麥	35,531		

而同時期中中國底主要輸出入品是這樣：(單位國幣千元)

輸入品		輸出品	
棉花	85,621	茶葉	34,239
鋼及鐵	74,437	棉紗	29,585
米	62,132	蛋類	28,560
金屬製品		桐油	25,136
機器工具	55,310	皮貨	21,885
車輛汽艇	34,490	生絲	21,099
其他	50,296	金屬及其製品	18,849

紙	39,767	花邊	17,788
石油		豬鬃	13,866
煤油	37,997	棉花	13,691
柴油	19,638	靛藍	13,543
汽油	17,405		
化學品(人工肥料及藥品)	38,801		
顏料染料	35,942		
小麥	31,316		

在這兩個表中間，我們可以看出來：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十分之八九也是我們所需要的。而日本底主要輸出品，一部分就是中國底主要輸出品，而別一部分是中國底主要工業品。比方，日本輸入占第一位的棉花，中國也占輸入第一位；而占日本輸出第二位的生絲，中國在一九三二——三兩年中，本來占輸出第一位；是近來海外市場被日絲侵奪了，才落到第六位的。占日本輸出第一位的棉織品和第三位底人造絲織品，目下都又經在中國市場給中國機織業以致命的打擊。我們把兩個表的内容加以分析。就會明白：在國民經濟的本質上，中日間的利害是無可調和的。要呢，除非中國國民經濟在短時期中完全破滅。

* * * * *

這樣，這一顆飴糖分析下的内容，是請中國民族自殺的毒藥！

中國倘使接受了這樣的經濟提攜方案，不是一個單純的殖民地化，而是加速破產下的殖民地化！

中日經濟可能提攜嗎？

這要在日本帝國主義消滅了之後！在目下的狀態之下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所謂“援助中國復興”和“援助中國自主的建設”，只是“早點送中國到墳墓裏去”底飾辭！

此外，“中日‘滿’經濟同盟”底具體化和“日本統制中國棉花”底表面化，自然都是這方案中的主要成分；而日本製造戰爭底急進，更是這個方案底骨子。但是，這些都是政治問題，我們且不去深究。

美國經濟考察團到華以後

徐 雪 寒

美國遠東經濟考察團於三月下旬自舊金山起程，四月初旬抵達日本，勾留半月，十九日離橫濱，於四月廿二日抵滬，同行共十一人。指導者團長福勃斯，大資本家，曾任菲律賓總督（1909——1913），菲島問題調查員（1921），海地調查團主席（1931），及駐日大使（1931——1932）各職。據說他前後曾來華四次，久旅斯土。在履歷上已經給了一種印象，——他是美國遠東殖民地舞台上活躍的代表人物。福勃斯自己宣稱，考察團內並無政府代表，當局亦無財政上的幫助，全體團員均屬美國銀行業，食品業，煙草業，紡織業，航空與輪船交通業等界之最有關係者。但這是並不能掩飾了該團對金元帝國所演的任務。福勃斯自信“美國商業界對此大國（即中國呀——筆者），作最週密之考察者，從未有如此之組織”；這一點倒切實而不過火。現在，考察團正在這個“大國”作“週密之考察”，南達廣州，北循青島天津北平而達綏遠；中部由漢口入重慶成都；然後將折

返上海，作總的研究和報告，大約於六月中旬離華赴菲律賓。這一羣金圓資本的勇士足跡所到的地方，皆有就地的官長，大商人，大實業家以及學者名人在迎送趨承。並有專家分組在向他們提供資料和意見；可是誰也不會站在中國國民大眾立場上，來探詢一下：

這些僕僕於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上的貴客們究竟爲的什麼？

固然，說是說過的，美國人和高等華人！他們還並不是“聲辯和矇蔽”呢，祇是希望人家不要誤解！紅了眼的日本人曾“誤解地”這樣說：“此次美國考察團之來華，實因日華接近空氣之抬頭，英國爲挽回頹勢，力圖全面的活動，致美國大感狼狽，遽然派遣此次之使節團來華”（每日新聞，4,24）。這種話自然使美國人不安，他們那裏會和日本英國排在一起呢？誰都明白中日接近或中日經濟提攜的意義，不過是進一步來攘奪中國的經濟權的手段；英國呢，他蹂躪和榨取中國大眾已經幾十年了，十年前的現在（五月卅日），曾經把中國人的鮮血腦漿塗滿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至於美國那裏會這樣呢？福勃斯不是說過：“本團此次來華，未負有行政使命，僅從事考察經濟狀況，將報告於美國政府，俾中美兩國之商務關係，日益增進，”這類和善可親的話嗎？美國人說他們自己祇要做買賣，祇要中國多多購買美貨；然而這種動機是冠冕的？牠是散發着同樣的血腥氣！半殖

民地的中國，本來是列強虎視眈眈的急待再分割的最大市場。各國都用自足經濟，關稅壁壘，貨幣集團等等手段，把貿易的大門關閉起來，祇有中國是大度地和任何人做買賣；他會讓外國製品自由傾銷以征服本國工業，他會每年進貢四億元以上的入超來維持各國的繁榮。美國因為藍鷹運動解救不了他本身的存貨山積，比較有效的藥方還是使窮透了的中國人拿出最後一文錢來銷清存貨，因而考察團遠道而來了！這是和平的，冠冕的，因而也是大可公開宣佈的。美國人這樣區別着自己！

中國的大商人是頂明白此中奧妙的，他們也真願中國做外國貨的消納市場！上海招待處的主席張公權在這次的歡送席上，曾經這樣說過：

“一旦匪患肅清，災害減少，中國人之購買力必頓見增加。今日十萬萬元之進口，增加一倍或數倍，豈是難事？爾時中國或可為世界消納貨物之一大市場”（中華日報4月27日）。

你看，他們不是以中國將成“世界消納貨物之一大市場”而自誇自耀嗎！所幸中國正是帝國主義者所欽定的和互相爭奪的一大市場！目前“匪患”之所以要“肅清”，據主席所說，也是為了使這樣的市場再大“一倍或數倍”，中國人真勇敢，真會替自己門第增光！

有了這種勇敢的熱忱，歡迎“和平的”主人，自是不可或缺的序幕。半殖民地的貧困，造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繁榮；然而

人們却在告訴我們說，這是中國大眾的義務！請看罷，當考察團到南京那一天，中國中央政府的報紙在“歡迎美國經濟考察團”的標題下，說了這樣的話：

“歐戰以後，美國對各國的貿易，厄於關稅壁壘，國內生產過剩，失業增加，雖以羅斯福之復興運動，曾無補於經濟之衰落。其惟一之法，則為另覓廣大而持久之市場，而尤屬目於蓋藏未啓之中國，此世人週知之事實，吾國亦樂於為助，以盡協力繁榮之義務也”。（4, 24, 中央日報社論）

然而中國大眾是否“樂於為助”，以及有否能力來盡這個義務，這却是一個大大的疑問。不過美國考察團至少有一點是業已成功了，就是夾道的歡迎，證實中國確有一部分人願意曲“盡協助其繁榮”的義務！

誰都知道，“九一八”以後，美國代替日本的地位，取得列強對華貿易的首位。可是，中國本身購買力的衰頹，進出口貿易都萎縮了，這使“和平的”美國，不得不更努力跟日英來競爭中國市場。這種列強利益的互相競爭，對於中國無疑地是一種禍患，然而却有人和衷共濟地在勸說美國對於競爭不要心灰意冷：

“不幸中國之力不足以自保，故遠東問題每勞美國憂慮。然此乃一時現象，中國既不因是而自綏，美國亦不可因是而失望。美國之繁榮，中國存在為一大要素。中國之自立，

美國援助亦爲一大助力”(北平晨報4月25日社評)。

然而所謂美國的援助實際上又是一些什麼呢！是不是和中國協助其繁榮那樣的貨真價實呢？世人的確有不少吃了巴掌而不叫痛，反說這是一陣六月風涼的人們，不過他們也有失言的時候。譬如此次天津益世報也抱怨起美國的援助——白銀政策來。該報一方面竭力表達出中國是肯犧牲的，“若二次棉麥借款，雖非普通貿易，實與美國經濟甚有關係。美所出借之棉麥，乃國內過剩之貨物，若無大用，棄之可惜，我國慨然爲之承受，直接救濟(!!!)本國之棉粉業，亦無異救濟美國之農業”以後，另一面便向調查團聲訴：

“……始作俑者，非羅氏之白銀政策乎？……爲美國計，應另謀兩全之道，一面固須繁榮本國，一面又須顧全中國；促進中國之榮繁，以期推廣美貨之市場”(5月6日天津益世報社評，題爲歡迎美經濟考察團到津)。

說棉麥借款是“直接救濟本國棉粉業”的人，怎麼又會非難白銀政策不是“兩全之道”呢！其實，在承認半殖民地和宗主國間的隸屬關係之下，本來是講不到兩全的呀！用收買白銀，來壓低中美匯價，以便增進美國貨物對華的輸出，自然只是爲“美國計”的，他實無停止之必要，賣弄風騷式的訴怨有什麼用！和平的美國人很明白自己不必來跟中國人討論自己的問題；所以他們在南開大學和天津各界的座談會裏，對於中國專家

之“考察團可否於回國後，建議政府改善”的提議，就避開政治方面發揮意見。而且他們更進一步反問：“（一）美國商人對華投資，華方有無切實保障辦法？（二）美國對華貿易，由1933年以後，跌落原因何在？”（見7月10日申報天津電）。“和平的”美國人在這兒所要探求的是貿易跌落的原因，和切實保障投資的辦法呀！

增進輸出和保障投資，是美國對華的唯一要求。爲了達到這個要求，一時可以和主要的競爭者妥協，而最後則非和他們火併不可，至於中國的意見怎樣，只有讓中國人自己去津津有味地打算了。美國人是明白的，東北市場已經完全給封閉了，他更是迫切需要保持和擴大中國關內的市場了。日益擴大的日本的壓力，成爲他的障礙，他不能再怪中國本身不能盡“協助繁榮”的義務了，他頂明白的，解決問題得自己親自出場的。不過却用不到中國人的勸說，美國人不曾“失望”（假使中國人可惜這種失望的話），而是在忍耐，在準備，白銀政策就是完成準備的先行階段，此次調查團來華，將使美國在爭取市場的準備上，能夠懂得更週密一些罷！

中國的各式各樣的買辦勇士，在閉着眼睛滿口瞎說窩心話，可是，日本人爲着他本身的利益，却是不甘緘默的，當調查團離日來華的那天，日本人便告訴我們說：

“考察團在日與政府通商機關及實業界代表迭次會談，然

各方最爲注目之美國資本與貨物輸入中國市場問題，兩方均未成立諒解，不得要領而終。考察團之使命，在於調查以美國資本建設中國航空鐵路等事業，對華輸出汽車，航空機，船舶，電汽機械，綿製品之可能性。美國此種計劃，對於中日經濟關係，不無影響。試從來以中國主要市場的日本綿製品貿易言，必大受打擊，日本要求考察團考慮妥協辦法；然考察團僅僅表示意見，力避日美商品之在中國市場競爭。日美經濟在中國市場提攜問題未能解決”（日聯社4月18日東京電）。

在對華的利害關係上，美國和日本原也可以成立“諒解”的呀！

現在考察團尚在繼續活動中，被考察的我們，委實無從知道他們活動的具體成果。但是，向調查團寄與一種天真的希望或要求，自然是欺人的笑話。從提高銀價，匯兌戰爭，奪取貨幣權戰爭，以至於太平洋上五月三日起，美國一百五十艘戰艦，四艘航空母艦，四百架飛機的混合演習，都是指着奪取中國市場的一定發展階段。考察團的一個團員向上海一位專家表示：“阿留申羣島的空軍根據地已在迅速完成，美國對於決定遠東市場的能力便當迅速增大”，在遠東在中國，發展貿易和武裝戰爭是這樣嚴密地相結合了。

可是，在另外方面，考察團却備受中國人的熱烈歡迎！

1935. 5. 26.

列強壓迫下的華僑

應 墨 如

一 華僑的曙光期和黃金時代

英國人常以“英國國旗無日落”自豪，中國人亦常以“海波到處有華僑”而“沾沾自喜”。

自從十六世紀商業資本主義的前鋒達於東半球以後，數千年封鎖着的中國民族對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形成亦開始盡了部分的任務。例如爲了南洋荒土的開發，美洲金銀礦的採掘，以及南美，巴西，秘魯和澳大利亞洲的開闢，商業資本主義的英雄武士們，就把中國人民攜帶到世界各地去。出國僑胞被招雇，被販賣（這種方式現時也還存在，去年十一月美國紐傑西州華僑三十八人被販賣作奴隸就是例證。）被捕虜，總之經過一切的方式被攜帶到世界各地去。那時候，商業資本主義的英雄武士們怎樣獵取我們中國的人民，我們可以從一封具有歷史價值的，一六二三年荷屬東印度總督古恩氏(Coen)給其後

任總督的信內看出，他說：

“巴達維亞摩鹿加安班瀾萬達，需人工甚多。……世界上無如華工更適應者，……貿易既不能以友誼獲得，現在風候正好，可即遣戰船往中國口岸，盡量捕其男女幼童以歸……特須多捕華人”。

古恩總督是明白：熱帶的南洋土著民族是不及“支那豬仔”的能夠耐勞吃苦，而且“久居鄉土”的“豬仔”是不慣離鄉別井的。爲了新領土的開拓，上帝是能夠寬恕這一種捕擄行爲的。可是仰賴他們的睿智，華僑總算由此而傳播開去了。

於是華僑廣布着，發展着，在南洋，在亞洲的其餘地帶，在美洲，在澳洲，在歐洲和非洲，以至於在全世界各地都散佈着。（因爲地理上的近便，南洋的華僑人口當然是比其餘各地來得多。美洲和澳洲，因爲最初開闢時候人工缺乏的緣故，招致華僑人數也不少；歐洲和非洲的華僑人數比較起來是不多的。）而且他們經過千辛萬苦的奮鬥之後，少數人是慢慢地踏着其餘許多人的脊骨，肩和頭，爬上去了。雖然其餘許多人仍是彎着背，屈着腰，低着頭，流着血汗，繼續在過着非人的牛馬生活，他們却的的確確爬上去了。他們趁着資本主義走上興旺道途的時候，也幸運地蚤緣上昇了。以後又利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互相廝殺無暇東顧的時候，更獲得了意外的躍升機會，在南洋，橡樹園中的花朵盛開，地土下的錫礦閃着光亮。於是橡皮大

王和萬金油老闆喊着：

“呵！南洋！樂園！”

歐戰前後的華僑們真是交了鴻運似的！那時候橡膠和錫塊的價格飛漲；糧米業是興旺非凡；小本商人也獲利加倍；華工們也到處受着歡迎，雖然是被歡迎去做牛馬的。於是在國內飽嘗天災人禍的人們眼熟了，他們自怨着爲什麼他們的祖父和父親不被“豬仔”樣地捕擄去呢？他們也知道在海外並不是每一個同胞都像某大王等一樣地發財，但他們因爲對於國內生活的厭棄，使他們對海外生活發生一種熱戀了。“去呵！海外去呵！”他們情願到海外去做“豬仔”，不願在國內做待死的羔羊！

老闆們到國內來設立分公司和推銷處了，小本經營者儲蓄了一部份利益匯進國內來，華工們也節省下一點汗血餘資寄回到家鄉來贍養妻母。於是華南有幾個城市也就靠華僑匯款而繁榮（如汕頭），中國的國際收支也賴此以平衡了。

“海波到處有華僑！”人們“沾沾自喜”着。

二 經濟恐慌與政治迫害

可是這光景，現在却已到達另一階段了！

一九二九年後的世界經濟，滿天瀰漫着黑雲，經濟恐慌的風浪打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頭上，同時也波及到華僑們的頭上。

商店停歇，關閉，勞動失業，成爲華僑們的命運。此種形勢至最近而更烈。橡膠和錫塊的價格悲慘地狂跌。國際產錫協定並沒有回生了已死的錫礦業，反使一息尚存的掙扎受了一重限制。有資本二千萬元的陳嘉庚也不得不被迫停業。暹羅三聘地方的紗布店，因爲日本紗布的傾銷，六十餘家幾關去半數，農業恐慌更使在美國羅安琪一帶的農場由一百五十家只剩下五十餘家，安南華僑農民因感糧價不敷收割之費而把禾稻燒去。各地的華僑失業人數也成千成萬的被拋棄在街頭（據外交僑務各機關的調查，除日本的長崎，清津等地的大批失業華工未加詳查以外，據各地領館的報告，總計僑居美，日，英，法，坎拿大，印度，越南各國之失業華工達二萬九千一百一十一人，約佔華工總數百分之二以上。事實上華僑失業人數決不止此，據一月十九日香港工商日報載，單就加拿大溫哥華一處華僑七千多人內，就有華工七百多人失業，恰佔十分之一。又五月十四日廣州七十二行商報載：古巴灣城一隅，有華僑七萬人，有工做者寥寥無幾。而且即使有工作做，也祇有飯食，並無工資。其他各地華僑失業可以想見）。一聯串的禍難都來到華僑們的身上，華僑們的黃金迷夢已被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打得粉碎無遺了。

假使華僑們只受這許多經濟災難的話，那末他們也許還可苟延殘喘於一時。可是因爲我們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化的國

家，所以在海外的僑民的額角上也深深地刻着“殖民地化”的烙印。他們除掉上述的經濟災難以外，還必須忍受一切政治上的迫害，那就是各國政府虐待華僑多至一百十三種的苛例。帝國主義者因為自身不可解的矛盾，造成了對於整個世界的瘋狂樣地破爛。但在他到呼吸最後一刻的氣息之前，他的最後的掙扎，企圖對於一切禍患向別處移轉的慾望也更加強烈。於是他們的兇惡目光也就注視到“可憎惡的”華僑身上來了。

帝國主義者對華僑實行排斥所開的第一刀是：取締華僑入境，尤其是對勞動者的入境加以禁止，並且加重入境稅。關於這一點，日本於去年九月在朝鮮首先實行了。他規定：“凡華僑入境者須繳納入境稅日金一百元；以勞動為目的者禁入境”。現在暹羅又照例做行。那就是入境稅由六銖五十丁增至二十銖。此外，實際上奉行美政府命令的巴拿馬也加重入境稅至美金七十五元之高。其次一刀是加重居留稅，就是使已經在國內或殖民地居留的華僑加重了負擔，使他們自動的退出，否則也可有理由驅逐他們出境。“呵！並不是我們要你出境呵，而是你自己無力繳納居留稅的緣故。”譬如安南在兩次以上不能完稅者就要驅逐出境，漏稅者拘禁。在暹羅居留稅增至一百銖。再次是取締營業條例，就是你即使目前能夠繳納種種稅款了，但却把你的工作機會剝奪，或者把所有的經濟權力慢慢的奪取過去。例如巴拿馬的華僑經商者須引用巴國土工三分之二；

菲列賓零售業只有美菲人經營之權，合股公司美菲人股東須佔百分之七十五等等。復次如限制華僑置產呵！婚媾呵！教育權利呵！……等等的苛例不一而足。華僑們簡直是一切都被剝奪淨盡了。

可是這樣就算完了嗎？沒有完的。帝國主義者除掉用明文規定來束縛限制之外，他還採用各色各樣的手段來對華僑加以殘虐。所謂法律的條文還不是權力的執行！這是任何人都明白的。帝國主義者或者是通過他的殖民地政府的毒手，或者是他自己親自動手來開刀那都是一樣的。鞭打，驅逐，監禁，鎗殺，以至一切慘無人道的殘暴行爲，簡直都是他們所要採用的手段。我們已經看見日本驅逐華僑至今日爲止已經有五十七批了，我們也同樣聽見由日被逐的華僑所口述的，日本是怎樣對待我們的華僑的。在實行驅逐以前，把華僑們的財產沒收了，把華僑們的身體監禁起來，船開之日，用刺刀與鞭子把華僑趕到船上去，可是臨走的時候，却連一點川資都要把你搜刮乾淨。這就是他們對待華僑的辦法。暹羅現在實際上已是掛着“日”字號的旗幟了，所以他最近排斥華僑的運動也在一天天的高漲起來。前年十月國內革命時捕殺華僑一百人以上的“血漬未乾”，最近却又封閉華校至六十餘所之多。學校被封之不足，且將華僑大批的捕去，至於捕去後的死活如何，那就沒有人知道了（見五月十七日中華日報）。此外，在墨西哥。去年四

月得當地市政當局的協助而組織成功的排華黨，一面限期令所有在墨的華僑離境，一面又以武裝封閉華僑商店，鞭打華僑店夥；在同年十二月，安南失業華工因無力繳納居留稅者達三分之一以上，因而被拘者有七百名；在菲列賓，因帝國主義者的煽動而發生的華菲大衝突，華僑被打傷者有三十餘人。

恐慌，迫害，死亡，華僑們究竟怎樣才好呢？

三 華僑回國及其出路

在受經濟恐慌的打擊和帝國主義政府的驅逐和虐殺之後，大批的華僑只好回國。“回去呵！也許在我們的祖國，比較上容易得着安身之地的！”於是一種人潮的逆流發生了。在一九二九年，出國的人數比較回國的人數還是超過很多的，但自一九三〇年起却不同了。回國的人潮洶洶湧進，出國的人數簡直只是一個單薄的堤壩，越堤而過的（回國比出國多的）人數一年多似一年。最先一九三〇年是三萬四千餘人，其後一九三一年即一躍而為近十八萬三千人，一九三二年為十七萬六千餘人，一九三三年為十四萬六千餘人，至去年，單自一月至十一月這個期間已超過二十一萬四千餘人。大批華僑回國的結果，擴大本國內地失業軍的人數自是意中事。但最直接而且馬上發生的是：從前每年有大批款項匯進的，現在却一年減少一年了。由一九三〇年的三萬萬一千餘萬元減為一九三一年的二

萬萬三千餘萬元，再減至一九三三年僅有二萬萬元了。因為美國的禁止現金出口，因為墨西哥荷蘭和德國等的相繼效尤，去年匯款的更形減少是無疑的。華僑們帶着滿身的創痕和空肚子回來，家鄉的妻母抱着一個空肚子迎接她們的夫和子。然而眼光遠大的人們却只擔憂着：國際收支將用什麼法子來平衡呢？華南幾個專靠匯款繁榮的都市恐怕不要荒涼下去麼？

在這人潮的逆流湧進的當兒，在國內，我們看到了代僑胞們開着的兩扇大門。一扇是寫着“歡迎投資國內”！另一扇是寫着“請到僑樂邨去”！在後一扇又附註着一行小字：“在三月一日前，或給資五元，遣送回籍”關於前者，西北隴南和綏遠的牧畜事業，閩南十縣的玻璃礦砂和糖業產銷，廣西邕龍一帶的荒地墾殖和錫礦採開，貴州的實業和交通，以及“猛進中”的浙江生產建設等等，都似乎開着大門在歡迎他們一顯身手。大腹便便的僑胞真可不必擔憂海外無處容身（其實他們是仍歸可以容身的）。國內正是左右逢源。尤其是在去年春間，實業部當局簡直是屈駕躬迎了。可是他們却如摩挲一件古董似的，盡是調查着，考察着，疑慮着：在國內的環境下面究竟有幾分安全保障可以得到呢？所以至今他們仍是在門前徘徊而不敢貿然進門。關於後者，僑樂邨的容積似乎太嫌小了一點（至於進邨手續上的麻煩以及進邨後是否能造成天堂，都暫時不必說。最近僑樂邨墾民因為與附近居民爭奪墾地已經被搗毀

了。)因爲據說至目前爲止，僑樂卹的墾殖名額只限二百個人。那末照目前的情形看來，假使要救濟這許多華僑的話。每年起碼應該有一千個以上的僑樂卹建設起來才行。所以這一扇大門看起來是朱漆堂皇，實際上則可容納的人數却很有限。并且僑胞們未“樂”而先得“憂”了。

最後，我們要補說的是，在帝國主義國家及其殖民地內，即使受盡了刺刀，鞭子，槍桿等等痛苦的華僑，並不是統統回國的。而且他們對這種壓迫已經幹下了不少英勇的反抗鬥爭，關於這許多，在帝國主義霸持下的通訊社，自然不願把牠傳進國內來。可是究竟因爲這種反抗鬥爭的奔騰澎湃的結果，使得帝國主義者的出版物也無法掩蓋。據去年六月廿五日東南日報載華聯社盤谷通訊，暹羅華僑鐵路工人曾經舉行過一次大罷工，繼鐵路工人罷工之後，火礮工人亦實行罷工。那時候工潮幾瀾漫全暹，暹羅政府亦大爲震驚而至於手足無措。在朝鮮，華僑爲了反對日本取締華僑的苛例，也同樣曾經於去年九月間一致實行罷市和罷工。(見去年九月廿五日南甯民國日報)在星加坡峇株巴轄日人錫鑛場華工爲了要求加薪，亦曾於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罷工，結果而且是華工們得到勝利了。(見一月十六日大晚報)至於本年一月卅日，馬尼刺華僑木工因罷工一星期之久，警察槍傷工人的結果所引起的暴動，更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見一月卅一日申報)在荷屬東印度，華僑和

土著人民反抗荷蘭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也已相當強固（見四月十五日中華日報）。所有這許多事實是表示着：當華工們眼見着祖國愛莫能助的時候，他們已明白究竟應該怎樣苦幹，以求他們的出路了。

中國的毒物問題

何 引 流

1. 毒物與帝國主義
2. 毒物與內地軍人
3. 毒物與農民負擔
4. 最近的除毒運動

一 毒物與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者輸入毒物於中國，在經濟的作用上，我們可以把他分作二個時期來看：第一，鴉片戰爭的前後，帝國主義者輸入鴉片，完全是在抵補它對華貿易的入超。關於這點，馬扎亞爾在其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上曾說：

“因為十八世紀的中國對外貿易，是出超的，中國不需要歐洲的商品，中國在他成為茶的市場之壟斷者，及輸出絲的主要國家時，他是很少去買英國商品，就是去買，其價格也是很低的。東印度公司在輸入這些商品，損失了1.5

%至33%。……那時東印度公司便敏捷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怎樣和中國通商，能換得絲與茶呢？東印度公司便決定從印度輸入鴉片於中國。”(P.49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往後，隨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政治上統治的加強，帝國主義者的商品，掃蕩了整個農村經濟結構；中國已經沒有像馬扎亞爾所說的大量出超的光榮了。在這一時期，跟着中國農村的崩潰，帝國主義者的毒物輸入，是加速了超經濟的榨取程度。中國內地的苦力和農民，其中一部分因為農村經濟的激劇衰落，生活的過分低劣，產生了一種精神頹廢的現象。他們爲了加強衰弱的體軀底勞作能力，就是說要設法獻出他所有的精力，換得他們底生活必需品，就去尋求一種具有強烈刺激性的興奮劑，來使自己勉強興奮，這和一般工人酗酒習慣之養成實相一致；同時，海洛英嗎啡高根等毒物因為價格比鴉片低廉，尤其適合他們的口胃。帝國主義者在其一貫的榨取原則上，利用他在半殖民地政治經濟上的特權，適應着這一客觀事實，毒物就暢銷於中國了。還有，說到暢銷的原因，一般有閒的士紳階級，霍金如揮土的官僚軍人，更是不容我們忽視。他們爲了生活的單調枯燥，以及所謂上流社會的應酬，都需要點起煙燈，備着烟榻。此外，內地的軍人爲了維持士兵之一時的戰鬥能力，也使他們養成吸食紅丸的習慣。

帝國主義者毒物輸入的總數，是很難統計。“文明”的帝國

主義者決沒有這樣的道理，將這種與“正義人道”相違背的毒物貿易底祕密，向衆宣佈的。不過，我們從零碎的報紙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毒物貿易的大致情形。在去年六月二日中華日報的評論上說：

“一九三〇年世界毒藥廠最多者爲波蘭及奧國，計各有二十三處，次爲日本，計十三處，瑞士亦有十處，英國九處，意大利二處，祕魯一處，法國七處，美國六處，意大利二處，其他各國未及調查，而已調查未列上者尙不在少數，且皆規模宏大。至於運入我國之鴉片嗎啡海洛英高根，年達一百四十三萬三千六百兩。超過我國醫藥界用途七百十六倍有奇，至於私運和偷運不能調查者猶不知幾何，惟確實之數雖難知，而吾人敢作推論者，即各國運入之總數，在實際上必超過國聯今日所云總產額一萬二千噸，可斷言也。”

據拒毒會計算，年由印度波斯朝鮮等國輸入的毒物，在一九二七年爲六二五，〇〇〇兩，在一九二九年爲七一，七九〇，〇〇〇兩。

這種毒物輸入增進的速率，的確是可驚的。若以毒物流通最廣的華北來看，形勢則更嚴重，簡直可說已經到了使我們不敢相信的程度。去年八月三十日河南民報有一節詳記天津毒物貿易情形的消息：

“津日租界向爲某國浪人涸跡之淵藪，專以販賣毒品爲業，據查六月份只海洛英一項銷數，天津爲六十餘萬兩，收入三千餘萬元，其他運往魯豫晉綏察陝者爲數更多，統計六月份收價，共爲一萬萬餘元。”

北平市長袁良，對於白麵(海洛英)流毒平市的情形，亦說“平市吸食白麵毒品者，查有七萬餘，日耗十萬以上。”(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時事新報)。

毒物流通之廣，在華北又以山西爲最。山西省吸食白麵金丹等毒物人數，約佔全省人口十分之七，八。流毒之盛，真堪驚人。

再說東北，自被日本侵佔以後，即積極實施鴉片，娼妓和賭博三毒政策，而前者的行銷，爲三毒政策中最毒的一種。九一八以前，毒品的傳佈，僅集中於租借地和鐵路用地以內，事變後，鴉片槍就跟着步槍而發展，不到三年，凡日本佔有的地域，沒有一處不“黑化”。現在東北各省市縣都有鴉片零買所，日本人和高麗人還大規模地製造海洛英及紅白丸，據去年僑民政部調查，最近東北吸食毒物成癮者，已達九百萬人。其中十五歲以上吸煙者，佔百分之十，十九歲以上吸煙者，佔百分之十三，二十五歲以上吸煙者，佔百分之二十三，三十歲以上吸煙者，佔百分之三十三，總計東北三千萬同胞中，已經有三分之一的人染上毒癮。以每人吸煙四錢計，全年共吸煙土約一

千二百九十六貫(每貫合七斤半);每錢以四角計,則共耗五億一千八百四十餘萬元!(數字均見去年十月六日香港工商日報長春通訊)

英國著名旅行家倫敦泰晤士報記者佛勒敏(Peter Fleming),在他旅行中國東四省以後,曾經寫有長篇通訊刊載於本年三月四日至八日的倫敦泰晤士報,對於日本人在東北實行鴉片專賣,作有具體的描寫,茲根據四月一日大公報譯文節錄如下:

“滿洲國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日宣布鴉片專賣,設立專賣局,統制鴉片之種植和販賣,辦法多模仿台灣的鴉片專賣制。專賣局設於長春,共用人員約九百人,其中約有四百人爲日人。計設分局10處,購買局20處,管理局80處。購買局收買各縣鴉片,官定價格每兩爲一元七角。現所買鴉片都送往瀋陽鴉片工廠,由該廠分成等級,打成包裹,再由瀋陽重新分配於專賣分局,依烟之等級,以官價二元二角至二元五角一兩,售賣於領有執照之零賣者,零賣者之執照,每家須年納費五百元。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種煙面積規定爲六十八萬五千畝,每畝可產煙11磅又10盎司,價值約35元。種煙區域皆在熱河及吉林東北部。吉林煙名爲“西土”。遼甯雖名義上不許種煙,但仍遍地罌粟。去年邊遠地方產煙,官價雖

定爲一元七角一兩。惟可憐的農民每兩煙只能買到九角錢。”

上面的數字，大致可靠，所述六十八萬五千畝之種煙面積，根據去年十月三十日大公報的“關外情報”，分佈狀態如下：

熱河	14縣	335,000畝
興安西分省	2縣	10,000畝
奉天	2縣	25,000畝
吉林	13縣	315,000畝
合計	31縣	685,000畝

我們從佛勒敏氏的記載，可以看到“官價雖定爲一元七角一兩，惟可憐的農民每兩煙只能買得九角錢。”瀋陽鴉片工“分配於各專賣分局，依煙之等級，以官價二元二角至二元五角一兩。”政府方面之買價與賣價，相差至一倍半！這種好買賣除掉鴉片之外，實在很難找到了。因爲根據佛勒敏每畝可產 35 元計，六十八萬餘畝產值約二千四百萬元，若買價和賣價相差至一倍半，僞政府大概每年可在鴉片上得到三千萬元的收入。至於僞政府自己，當然不會這樣如實地招供，所以佛勒敏氏說：

欲知日人在僞滿鴉片專賣之收入，頗爲困難，不過一千四百萬元之數目，却仍爲一種保守之估計。”

以上所說還是去年爲止的情形：今年日本又令僞組織擴充鴉片零賣制，由都市擴及邊塞，增設零賣處二千處，合舊有

者共三千二百二十處。一方面實行烟土減價傾銷，同時另一方面零售處的保證金也由五百元減至一百元，其目的當然都是使烟毒更普遍，更深入於大眾。

我們知道，日本並不以攫取了東四省爲已足，它還企圖將整個的中國都成爲滿洲國第二，現在的華北，也已和東四省相差不遠，毒化政策的相繼完成，就是很好的實證。我們且從唐山說起罷。唐山的毒禍，在報紙上是鬧得很熱烈的。根據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申報天津電，“唐山日洋行林立，毒禍蔓延。”同日另一電報上面又說：“唐山各公安局呈報，本年一月至九月，死於毒品者：死於公安局境內：倒斃283人，內因毒發身死者170人，礦區內倒斃者410人，內因毒發身死者330人，公安局因死者過多，決擴大禁毒功能。”又據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申報所載：“唐山因日鮮浪人毒品機關林立，致十數齡童子亦均染有吸白面嗜好。日方前雖允許取締日鮮人，但目下並未照辦，洋行反增增至二百七十餘家，每家每日賣二三百元不等。”

此外，帝國主義者對華的毒物貿易上，還有二點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帝國主義者的毒物貿易，除掉在經濟上藉以攫取厚利外，還有麻醉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要求，使他們在精神上文化上日趨頹廢和墮落的道路上去，譬如日本在熱河承德一帶，竟公開奉送烟槍烟燈來引誘人們吸烟，就是爲了更迅速地

來完成此種麻醉政策(請參看69卷第8期密勒氏評論報)。

第二,在毒物貿易的進程中,帝國主義者必須通過一切封建勢力,中國各地的販毒商,統統都是當地的軍人以及地痞流氓。例如毒化最盛的山西,毒物原料的運入和製造,大部分操於軍人之手;而一般毒販,爲了避免遭受意外的敲榨,皆寄附於當地軍隊護翼之下,掛上某軍某師某某處副官等頭銜。在晉省,毒物之所以能夠如此暢銷,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感謝這一種特殊惡勢力的効忠。

二 毒物與內地軍人

帝國主義者輸入大量毒物的結果,一方面是賺得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使中國農村加速崩潰。前者使內地軍人眼紅,後者使他們憂慮,因爲一般大衆將因農村加速崩潰而很快地就要喪盡納稅的能力。因此,他們也放縱甚至獎勵內地農民種植鴉片,這樣不但可以收很多的烟稅,而且還可因轉賣敲榨而填滿自己的荷包。所以近年來有些省份,鴉片的種植已經成爲維繫統治者的命脈了。

目前中國產烟區域,幾已普遍全國各省,所不同的只是量的多少罷了!中國產烟的總數,很難得有正確的統計,據烟禍年鑑所載,全國共有烟田5,000,000畝,產烟200,000,000兩。今年六月間,國聯鴉片顧問委員會議席間,美國代表富勒指摘

我國禁烟不力的時候，說我國每年鴉片產量達一萬二千噸，與其他各國之一千四百噸產額相較，幾成八與一之比。

在這裏，我們再來看看各省對於鴉片稅收的依賴情形。爲方便計，我們可從二方面來觀察：

一，出產的省份——主要爲雲南，貴州，四川，甘肅，綏遠等地。牠們是完全靠大量的鴉片出產和輸出來維持省縣財政。在雲南貴州，此種關係尤其重要。牠們對於外貨大量的入超，皆以鴉片輸出爲抵補。

據烟禍年鑑的記載，雲南年產烟土5,000,000兩，平均價格在一萬五千萬元左右。我們在拒毒月刊上，更可看出雲南政府與鴉片的關係之深：

“鴉片種別，國內可分數種，一爲雲南之滇土，二爲貴州之黔土，其中尤以雲土產量爲最大，而雲南上自省政，下至縣長無一不以販土種土爲職志。黔滇川三省且有總機關之組織，公司名曰南生，資本計滇幣二千餘萬，股東均爲三省巨頭，該公司總店設昆明，內分五部：總務部，採集部，製造部，販賣部，運輸部，各部主任均爲三省有名人物主持，其中販賣部之推銷鴉片分四線：長江販賣局，京滬販賣局，湘黔桂販賣局，香港販賣局，各局均設正副局長一，局長中有曾任部長者，有失意軍人和政客，有現任要職者。”

雲南省金融總機關富滇銀行在香港上海等各處分支行，其最大營業，完全是經理鴉片的貿易。雲南全部烟土稅及官營烟土公司的利潤，共計約五千萬元，(烟禍年鑑)，而民國二十二年度雲南省財政新預算為一千六百萬(據申報年鑑)，這就是說，烟土方面的稅捐和利潤，超過省府的正常收入三倍多。

貴州原是中國貧苦的省份，民國以來內亂不已，軍隊日益擴充，財政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據申報年鑑所載：民國二十一年度新預算，歲入為二，九〇八，三九七元，歲出為六，〇〇三，一一九元，收支不敷達三，〇九四，七二二元，較歲入總額不敷一倍有餘，這種驚人的赤字，除掉種烟的農民所貢奉的烟稅外，還有什麼辦法來彌補呢？！

綏遠每年烟畝罰款收入，為一百五十萬元，甘肅自民國九年以後，所有軍費多由各縣烟畝項下征稅開支；每年烟土產量達一千五百萬元；四川各軍混戰的餉源，大部皆從烟稅得來，例如在劉文輝未退出成都以前，在他底防區內所征收的種烟稅年有三百萬元，販烟稅(即運銷印花)二百萬元。劉湘防區內，每年收入則更在千萬以上。

二，運銷的省份——如廣東廣西湖北四川湖南等省，都是主要而最大的鴉片運銷區域，牠們的烟稅收入，亦甚可觀。例如廣西的烟土稅收，在往年全盛時期，收入達一千八百五十餘萬元，現時亦可收一千數百萬元。假如與該省財政收入比較，

烟稅竟超過省收入半數以上。廣西如此，其他主要運銷省份，亦無例外。四川在去年春間，官方有川鄂聯運之組織，每月稅收約七八百萬元。（此中因課稅過重，烟商還有裹足及漏稅情形），今年一月四日大公報所載重慶航信（二十一軍新舊戍區一年來禁煙概況報告）中，有一段文字說明煙稅與聯運的情形，頗值得引來參考：

“查特商因連年虧折，相率停貿，滇黔特商之入川者，幾乎絕跡，在此公商交困之時，乃謀挽救衰敝之法，以卹商裕稅為主，以重罰杜私為輔，蒙鈞座核准，與鄂方協定，川折鄂征，更進行川鄂聯運。互相稽考，並成立重慶諸業信託公司，以為特稅之週轉，於是私少而正商無賤貨充斥之虞，稅輕而商人得有無化居之益，羣情興奮，輸運踴躍，去年九月份至十一月份三個月折征期間，僅以川土一項而論，外運者達一萬五千餘擔，收入稅款約三百八十餘萬元，金融之活動，市場之繁榮，間接之間與有關係，本軍去歲定川之役，以之挹注軍需，亦不無土壤細流之助，而從前特商之歇業停貿者，今乃相繼開莊也。”

湘省煙稅情形，據七十八期拒毒月刊所載如下：

“湘省久經變亂，幾無一片乾淨土，兼以省主席何健，以槍桿階級之身份養兵甚夥，湘民不堪供應，已成敲骨吮髓，竭澤而漁之象。考湘省正稅收入為數有限，以全數充

一省軍費尙嫌不足，乃不得不取給於特種捐稅。然湘非產煙之地，民間種煙絕少，何健雖有獎勵種煙之心，終不如皖省合肥之一片煙花映日紅也。然雲貴出產煙土，運往內地，以地理關係，湖南之長沙寶慶等處，爲必經之道，何氏特設稅收機關，綜計每月收入至少在百萬以上。”

此外，如湖北特稅處，每年收入爲二千餘萬元。同時我們從南昌行營不許特貨通過地方擅徵附稅的訓令中，更能看出特稅用途的廣大：

“行營訓令各屬遵照：特稅收入，凡湖北每月政費及堤工費暨三省豫鄂皖剿匪之一切臨時用款，均特爲挹注。”

從上述二方面觀察的結果，我們已可完全明白，在農村破產內亂頻起以及稅收減少的這一環境中，各地當局自然非藉鴉片稅收及販賣來維持他們一部或全部的財政不可了。

三 毒物與農民負擔

四川雲南各省當局在鴉片種植的獎勵上，是用種種威逼利誘的方法來進行的。在四川，農民不種煙田，要抽懶捐，或用其他名義增加稅額。另外許多地方，開頭總以減賦來引誘農民，使他們拋棄正當農耕，而改種鴉片。農民在多種因素之下，將大批良田種植罌粟。可是，鴉片種植的結果，農民是得到些什麼呢？！

去年七月四日北平京報農村雜話載有一段陝西武功煙稅情形：

“陝西的武功，人口不到二十萬，煙款派到四十萬，按人口來計算，每人每年該負擔二塊錢，這還只是上頭派下來的數目，其實在加派賄賂敲榨和層層剝削之下，老百姓到底流了多少汗血，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因為鴉片種的多，糧食的種植自然要隨着減少，至於好年成也不夠吃了，所以結果農民們不但用自己的良田替軍閥官僚作了義務的收穫，反而大賠其本，而且煙款的征派，每年有增無減，不種煙也得出煙款，這是命令。”

綏遠的情形亦很相似。該省豐鎮縣民衆代表李延瑛等的禁煙建議中，曾經這樣說：

“現在煙苗成熟時期，大批查煙委員，出發查勘，初查復查再查，煙畝愈廣，煙款愈多，明之捐款，故諱其名曰罰款。查去年僅豐鎮一縣，勒派罰款十四五萬元，而漏報漏罰者尤不在少數，盡爲縣委及土劣蒙蔽而侵吞。今年派款又在去年之上，當道以收款之多寡，課各縣長委員之優劣。”

綏遠的煙畝罰款，按縣攤派，而各縣又將從省方所攤得數額，以同一形式分攤給各鄉鎮，由各鄉鎮長認額包征。這樣各鄉土劣就得乘機加捐，甚至有超過正稅的。我們從去年三月十

六日的綏遠民國日報中可以證明。

鄉鎮的豪紳爲了要維持他們永遠剝削所統屬的農民，對於上司是特別殷勤。包頭今年有四十幾個村莊，烟稅包征的銀款，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這種效忠的反面，就是一幅壓榨農民的猙獰面目。可是農民決不僅受上述的幾種剝削。他們還得忍受土匪皂隸委員們的勒索。而且在這種種封建剝削之下，弄得焦頭爛額的植煙農民，年來還要備嘗煙價慘跌的苦辣滋味。因爲年來農業恐慌深化，一般農產價格慘跌，使鴉片的種植增多。但是大批良田改種罌粟的結果，回轉來也使烟產過剩，造成同樣的跌價悲劇。例如：“剝下綏遠全境烟毒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民國六七年間，每兩烟土之價值貴在數十元以上，現在烟土之價值賤在四五角一兩。”（綏遠民國日報八月二十三日）。

在這層層壓榨之下竭力掙扎的農民，每當風水旱潦各種天災侵襲的時候，只有棄土逃亡。去年九月一日綏遠民國日報說：

“和林縣第三區永樂村農民，以去年種烟每畝罰款二十四元，烟戶深以爲苦，今年種烟六十畝，僅准減去罰款五百元之數，其餘一千一百餘元之烟款，仍勒令種此六十畝之烟戶分攤。今秋不幸，霪雨成災，此六十畝之烟地，又被水淹沒三十餘畝，故現時每畝須攤派烟款三十六元之

多，稍有身家者，出售牛馬農具，尙能交納幾元，其窮無立錐租地種烟者，皆逃避遠方。”

四 最近的禁烟運動

去年七月間，南昌行營通令各省，切實遵照六年禁毒計劃，辦理禁毒，並實施統銷統運政策。從此禁煙之聲，就更風起雲湧，江蘇省更參照六年禁毒計劃而規定一個四年禁煙計劃。同時在邊遠省份如陝西甘肅四川等地，每日也以大量剷烟相宣傳，在武漢方面，更封閉了烟館數百家。在這民窮財盡，無論軍餉政費皆依靠烟稅爲挹注的時候，而有了這樣一個禁毒運動，的確是很動聽的。

在江蘇最近嚴厲舉辦烟民登記，登記後准公開吸食，限期戒絕。煙民的戒煙執照費計分三等，甲等八元，乙等六元，丙等四元。同時按照各縣煙民的多寡，酌量設立供給煙土的土膏行店，招商承辦，他們都需領取營業牌照。牌照費在土膏行，爲每年五千元，在土膏店則又有四等，計甲等年繳二千四百元，乙等一千四百元，丙等八百元，丁等四百元。該省對於未經登記的煙民煙商，取締是十分嚴厲；然而只要登記以後，問題也就很容易解決了。

江蘇的禁煙運動，究竟有些什麼成績呢？讓我們看看禁煙過程中發生的二種現象：無錫自去年十月中旬起至今年二月

底止，四個半月內，照章程應該銷煙土十九萬三千餘兩，但是實際僅銷去十五萬一千餘兩。其它縣份也普遍發生這種現象。據當局的表示，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私土充斥。理由是官土價格較貴，所以煙民皆偷吸私土。

我們問官土為什麼要貴呢？理由是很簡單的，江蘇每年百餘萬元的禁煙費用，以及經手者的中飽等等，除開煙土，還有什麼來源呢？！

好像當局者早已有先見之明，他們預料到煙土的滯銷（或許是使他們收入上的打擊太大的原故吧），所以在禁煙章程的第八條上規定：“煙民倘逾期不購所需土膏者，應處以等於應購量價值罰金。”假使說有個登記的煙民，在某幾天不吸煙，或者是已戒去大半，可是他沒有停止購煙土的義務，這是什麼意思呢？

抬高煙價和強迫煙民購煙的動機，除了錢的聚斂，尋不到別的解釋，這就是江蘇省的禁煙實況。

去年七月十八日重慶商務日報有段文字，就是直接說明這種關係的：

“自中央宣佈禁煙後，全國各地也曾緊張一時，無如近來又趨沉寂，盛傳財政當局又為金錢所動搖，已將漢口全市進口煙稅及紅燈捐，包於熊某承辦，每年金額三千萬元”。

禁煙運動的動因，各省稍有不同。關於四川方面，法文上海日報所記述的亦頗值注意：

“據劉湘禁煙之佈告以觀，則劉將軍禁煙之目的，端在減少生產，以提高煙價也。蓋其佈告中有云：近年以來，煙土產量過剩，不惟大有影響於煙價，抑且擴大四川全省不景氣之恐慌，故惟有減低煙苗之產量，方足以救濟四川經濟之危機。”

總之，不論是禁止種煙，販煙，或者吸煙，一般說來，總不免有為財政收入打算的。如此則趁機敲詐勒索，自然是難免的副產。

這在禁煙嚴厲施行之中，在皖省合肥巢縣一帶，爲了剷煙還發生過流血慘劇。

“江北剷除煙苗，風波迭起，鄉民因距收穫期不及二月，羣起抗拒，泗陽縣政府張祕書，因督飭各區長剷煙爲第二區鄉民槍傷要害，鄉民表示煙存與存，煙亡與亡，當局甚震怒，決派大兵以武力澈底解決，雖流血亦所不惜。”（去年四月十九日大晚報）

“巢縣合肥一帶鄉民組織紅槍會白旗會與剷煙官兵抗戰，有數處村莊悉被官兵縱火焚燬，農民死傷數十人。”（同日申報蕪湖通訊）。

說起來一定是農民頑惡，他們妨礙政府推行禁煙；但是他

們爲什麼要栽種毒物？他們是如何開始栽種起來的？這只有天知道！他們爲了稅，爲了高利，爲了準備種受種種剝削，不得已而種植他們所不願種植的鴉片；但是，在他方面，他們現在所得到的是叛徒的責難，甚至無情的殺戮！

1935, 7, 28 改作。

怎樣從對外貿易上去觀察 中國的國民經濟

蔡正廷

一 觀察國民經濟的一般指標

一般說來，要知道一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否，主要可以從下列三方面去觀察：

第一是產業的興衰，這從一般生產指數的增減上可以看到。不過，這裏我們所應注意的，即除一般生產指數外，尤須將產業部門，分成生產手段的生產與消費手段的生產兩方面去看，因為前者生產指數的增減才是產業發展與否的根本表現。

第二是國內外貿易尤其是國外貿易的增進或衰退，這從對外貿易數額的增減和物價指數的漲落上都可以看到。不過，關於物價指數的上漲是必須在各種物價指數一般上漲的場合，才可以作為國民經濟之正常發展的反映。

第三是勞動者生活的佳良或惡化以及失業人數的增多或減少。這裏，關於前者，我們可以從勞動者所獲實際工資或實

際收入的增減上去觀察，關於後者，我們除開普通失業人數的增減而外，尤須注意於半失業人數的增減（即工作時間減少，工資也正比例地隨着減少的勞工，以及由工廠中被迫而回到家庭裏去的勞動婦女）。

上面所說的三點，我們在用作觀察國民經濟的一般指標的時候，必須把它們有機地聯繫起來整個地全般地去觀察，而不應把它們分開來單純地個別地去分析。譬如說，單祇是產業的發展是不能就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反映的。例如德國的經濟，它從轉入了特種蕭條的階段以來，生產指數（甚至一小部分的生產手段的生產指數）的確是在增高，可是它的國內外貿易却在日益萎縮，它的勞工生活却在愈趨惡化。在這種場合，難道我們就能說，它的國民經濟是在發展嗎？又如日本，它的生產指數是在增高，它的對外貿易是在擴張，但是它的勞工生活無疑的愈加惡化了，工資的減低便是其最明顯的例證。

關於觀察國民經濟的一般指標，以及如何運用這種指標的觀察方式，其最重要的原則大概已如上述。

那末中國的國民經濟目前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它是在發展還是在衰落呢？關於這，依理我們也應該同樣按照上面所說的三方面去觀察，不過，因為中國經濟的落後，且已陷於列強侵略下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化的過程之中，所以，不論學術上或技術上，中國如與歐美列強比較，甚至與戰後歐洲的新興

國家比較，也都來得落後，例如在產業方面，生產指數的編製，不消說是一種都沒有，即連比較容易的關於勞工生活的統計，也都沒有比較完善的報告。至於失業人數的統計，那更談不上，因為關於全國人口的統計，根本就沒有一個標準的數字，可以作為一般研究的根據。

因此，在統計數字這樣貧乏的中國，歷史比較長久而比較可以作為研究根據的，祇有在外人控制下的海關所編製的關於中國對外貿易的統計報告。一般人之所以常用這統計來作為分析中國對外貿易的時候，更應特別注意而特別慎重。

二 分析中國對外貿易最應注意的幾點

在分析中國的對外貿易而把它作為觀察中國國民經濟的指標的時候，首先我們應注意的，即是上述三方面的全般觀察的原則，我們仍然應予遵守。這就是說，我們在產業和勞工生活及失業人數方面，雖然沒有齊整的統計數字足資參考，它們的一般趨勢，我們仍應顧到。舉例來說，假如棉花進口是在增加，棉紗棉布出口也在增加。這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就是中國棉紡織業生產增高的反映，事實究屬怎樣，那就非將棉紡織業的實際情形同時加以參照比較不可。同時假如棉布或其它機製品的進口是在減少，那末我們更不應該單純地認為，這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結果。反之，國內農工生活的是否改善或惡

化，即國內大多數民衆購買力的是否增強或減低倒是其最重要的關鍵。

其次我們應注意的，即列強在華的工業投資關係，這是在承接上述首先注意的一點之後，更進一步的觀察。譬如某種原料或機器進口額的增加，某種機製品或是機器出口額增加，無疑的它是中國某種產業發展的證據，但是這裏我們應該注意，所謂某種產業的發展，必須分別其是否民族工業，抑是外資所經營的工業。因為這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前者可以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的表現，後者適足以表現中國經濟殖民地化的加強而已。

再次我們應該注意，除開華僑匯款而外，中國在沒有其它較大的國際收入的條件底下，對外貿易的巨額入超，的確是中國國民經濟上的巨大損失。因此入超價額愈益增大，中國經濟的危機也越發加重，這是不錯的，例如民20與民21年的情形就是如此，但從民22年起，入超價額大為減少，到了去年，減少更多，於是一般人便以為，入超價額既已減少，那就不失為中國經濟危機漸次減輕的徵象了。其實這是錯的，前去兩年來和最近的事實已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不但是在日趨深陷，且已開始總崩潰了。同樣，中國工農大衆生活的愈益惡化，我們在城市商店營業的極度蕭條。農村破產的愈益尖銳中間，隨處可以看到。所以入超價額的減少（本來是由

於進口價額的激減，而並不是由於出口價額的增加）絲毫沒有反映出中國經濟危機的好轉。進口價額的激減，不是由於在華外資工業的發展，就是由於中國民衆購買力的低落，或是由於這兩種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的結果。入超價額的減少好比久病垂死的病人，他的體溫已由高熱度而驟然降至死亡前反常的低溫度罷了。

最後我們還須注意的，即海關貿易統計報告本身就具有不少缺陷。第一，真如何炳賢氏所說（中國的對外貿易問題，時事新報本年1月30日），對於秘密貿易如鴉片軍火等，我國海關報告缺乏記載。第二，海關報告不僅對於那些秘密商品的貿易缺乏記載，即對漏稅私運進口的日常用品也是同樣毫無記載。反之，在普通的報章上這些貨品的私運進口，倒是早就成爲公開的秘密了。例如民23年申報（5月27日）所載，青島附近秘密輸入的貨值竟達一億五千萬之數之多，如就山東全省而言，總有三億元以上，因此，我們在分析貿易入超減退的時候，這種巨額的秘密輸入是絕對不應忽視的。此外，中國海關貿易報告在國別和埠別報告方面以及在商品分類上的缺點，這裏因爲篇幅關係只能暫時不談，將來當可另外提出來詳細討論。

三 從對外貿易上觀察中國國民經濟的指標

我們在知道了觀察國民經濟的一般指標之後，並在關於

中國對外貿易的觀察同時已具有上述諸注意點的條件底下，那末我們要從對外貿易上來觀察中國的國民經濟，也就不會犯着估量過高或過低的毛病了。但是我們知道，單從中國對外貿易額或入超額的增減。固然無由窺知中國國民經濟的全豹；同時，如就海關冊中現有的分類編製結果去分析研究，則中國國民經濟的真正內容，也是同樣無從探悉的，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的整個動向，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具體內容，爲要相對地從中國的對外貿易上去獲取相當的認識起見，若干重要點的指出，作爲我們觀察的指標，便覺異常必要了。

這樣的指標，我們暫時可以舉出下列六點來：

第1是工業化：在謀中國國民經濟的充暢發展上，工業化的前途無論如何是必要的。要知道中國工業化的現勢及其前途如何，在對外貿易上我們可以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要看工業上所需要的原料其進口數額是否在增加，同時，因爲中國的工業直到如今主要仍仍是輕工業，所以機器工具的進口額是否在增加，也足以反映出中國工業的是否在發展。另一方面，要看全製品的出口額是否有增加。這裏我們更須注意到，在出口的全製品中，手工業製品和機製品所佔的成分是怎樣的在消長。同時一般說來，機製品的進口額尤其是與中國工業所產同類的機製品的進口額是否在減少，也可以相當地表現出中國工業的是否在發展。不過，在這兩方面的觀察中間，中

國一般購買力的衰落，特別是外人在華開設工廠的問題，我們是更應予以十分的注意。因為原料和機器進口額的增加，機製品進口額的減少和出口額的增加，都可以作為外資工廠發展的反證，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及的了。

第2是農業恐慌：在世界農業恐慌的展開和延續中，素來以“地大物博”和“以農立國”自負的中國，其農業恐慌之愈趨深化乃是無可諱言的。關於這，我們固然要看糧食及一部分原料出口之絕對數額的增減，但是更重要的。却須注意於這些產品的進出口總額中，其進出口額所佔成分的增減。這就是說，這些農產品的出口額是遠不及其進口額的巨大的。這個差額的存在和增大無疑的是中國農業恐慌的具體表現之一。同時，在另一方面。農業上所用機器工具進口額的增減，不但可以反映中國農業的是否在發展，也適足以證明中國農業恐慌之有無解救的前途。

第3是中國經濟的畸形發展：近年來在表面上足以表現中國經濟的發展的，祇有關於交通事業的建設，特別是對於公路航空建築的猛進。交通事業的進步原是產業發展的前題，它直接可以推進商品流通的速度，間接可與產業發展以便利。但是，試問幾年來公路建築巨大進展的效果，究竟是在那裏呢？關於這，恐怕不待我們主觀的解釋，認為那是具有經濟外的作用，客觀的事實已明顯地告訴我們，這種建設，對於商品的流

通速度和產業發展的推進，可以說是一點效果都沒有，或者至多祇起了很微弱的附屬的作用。因此，我們可以說，它祇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一種畸形發展。這種畸形發展的事實，我們在交通工具（海關貿易冊中所列車輛，船艇一項，以及雜類金屬製品項中之電話，無線電用具等）進口額的日益增加中便可看到。

第4是中國對於列強在原料供給上所負的任務：中國的對外貿易，在世界國際貿易中所負的主要任務本來是在特產原料和半製品的提供，但在列強對於自身經濟危機的掙扎中，其厲行鎖國經濟政策的過程中，首先受其巨大影響的，便是中國特產原料和半製品出口額的激減，因為它是最無傾銷競爭能力的國家，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才行，列強在其厲行鎖國政策的時候，必然地又會發生種種矛盾。其中最重要者，即列強在其獎勵生產若干進口原料的代用品時一定就會感到得不償失的負擔。這種負擔增大到某種程度的時候，原來需要仰求於進口的貨物，特別是爲了準備戰爭所必要的軍需原料，就會照常地更多的輸入列強。近年來中國若干原料品如，鎢，錫，錫，桐油等出口額的增加，就是端賴於列強此種矛盾的恩賜。因此，在中國出口貿易一般衰落的情勢中，假如祇有這些軍需原料出口可以增加的話，那祇足以表現中國經濟殖民地化的加強，對於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還是沒有多大益處的。

第5是國際收支問題：這在對外貿易上所能看到的當然祇

是一部分，例如金銀貨進出口額的增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金銀貨的入超或出超問題，就會給與國際收支上以順調或逆調的影響。

最後第6是關於國內文化的一般趨勢；這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關於書籍文具等進口額的增減上也可以看到。同時在這種國內文化傾向發展或衰落的一般趨勢中，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否，也可以間接地反映出來。

1935, 3, 11。

列強對華貿易的新趨勢

蔡正廷

—

人們在研究1933年的中國對外貿易，比較1932年的頓呈減退現象之時，以為這是由於東北各海關的貿易數字，在1933年的海關貿易統計內已完全除去的緣故，換句話說，如將1932年上半年的東北各海關的數字也除去，則1933年的中國對外貿易並未減退，特別是出口貿易，反而還在增加。這種解釋便引起了人們這樣的幻想，以為東北四省雖已淪陷，中國本部的對外貿易似乎有其增進的前途。

但是1934年八個月來中國對外貿易的萎縮終於使這種幻想完全打破，且已再無引起同樣幻想的可能。1933年為首八月的中國進出口貿易總值為1,384,958,455元，1934年同期減為1,075,148,366元，即減23.4%之多。

中國對外貿易的萎縮，一方面是由於出口貿易的江河日

下，另一方面是由於進口貿易更爲激急的減退，世界市場的特殊萎縮，列強鎖國政策的厲行，尤其是列強過剩商品的積極傾銷，關稅壁壘的愈築愈高，以及銀價高漲等：那些都是使中國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場上愈加不易立足的重要原因。同時，帝國主義在華企業的積極擴張，以及多半爲增加稅收，很少爲國民經濟着想而相當提高了的關稅，這是中國進口貿易激減的一方面的原因。中國的農業恐慌，在世界恐慌的影響之下，由慢性而日益加深。農民大眾，對於帝國主義過剩商品，——縱使是極度貶價了的商品——其購買力因此也終必陷於愈趨飽和的狀態，這是中國進口貿易所以激減的更重要的一面，也就是有人認爲頗堪樂觀的入超減少的主要原因。

兩年來爲首八月中國對外貿易比較(單位國幣元)

	進	口
	1933	1934
1月	101,627,917	105,460,157
2月	113,436,411	82,757,641
3月	147,043,719	99,428,015
4月	147,168,507	100,960,369
5月	151,732,445	94,984,242
6月	110,093,836	86,259,413
7月	103,249,207	73,529,043
8月	100,227,337	74,252,903

總計	974,584,629	717,631,782
出		口
	1933	1934
1月	62,008,189	50,775,783
2月	50,296,289	38,035,733
3月	45,296,289	40,115,421
4月	37,180,999	41,123,563
5月	51,906,653	49,321,478
6月	50,253,390	49,172,796
7月	62,552,883	44,914,141
8月	51,354,424	44,057,729
總計	410,373,826	357,516,584
入		超
	1933	1934
1月	39,726,636	54,634,374
2月	63,145,623	44,721,908
3月	101,747,420	59,312,594
4月	109,987,508	59,836,806
5月	100,225,792	45,662,824
6月	59,895,496	37,086,617
7月	40,696,321	28,614,902
8月	48,872,913	30,195,174
總計	594,210,803	360,115,198

上表告訴我們，第一在進口方面：去年從一月到五月進口

額的逐漸增加，主要的是季節性的表現：從六月份起，進口額的激減，多半是由於1933年五月頒佈了國定稅則的關係。今年的情形，却就不同。普遍全國的水旱災荒已使五月以前，季節性的表現，幾乎完全消逝，至於八月份進口額的略見增加，那就與七月份起實行的新稅則不無關係。第二在出口方面：1933年春季自美國放棄金本位，開始實施復興政策以後華絲對美的輸出，因藉美國物價頓呈高漲的機會，也頓形增加，這是同年從五月以後出口比較增加的主要原因。今年因為美國的復興運動，所有成效甚少，同時它所厲行的提高銀價政策，和日絲的實行獨佔美國市場，已使中國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市場愈益狹窄。加以英法相率增加我國蛋品進口稅率；越南因為中法越南商約遲遲迄未續訂，對於華貨進口屢徵重稅；中國與波斯素無商約，致受波斯對華茶進口，征稅持重的影響；所有這些都是使中國的特產品出口貿易呈示每况愈下的原因。

最後我們還可以看到，不論在進口出口方面，1933年七八月的數字還能維持它1, 2, 月的原狀。1934年同時期內却已存了顯著的跌落，因比所謂入超的減少，也祇是中國的經濟危機，日趨深重的一種表現而已。

二

中國對外貿易的衰落，並未妨礙或減弱了帝國主義對華

貿易戰的程度。反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它們需要的原料，特別是爲了準備未來的世界大戰所需要的原料，它們還爭相吸收。本年八個月來，比較去年同時期內增加的中國出口品如下：綿羊毛由7,204,970元增至10,643,955元，約增47.7%；鐵由1,218,355元增至2,107,017元，約增72.9%；錫由1,076,202元增至4,129,644元，約增283.7%。同時更重要的，帝國主義國家一面爲了迫切地找尋它過剩生產品的銷售市場，一面鑒於門戶開放的半殖民地的中國正是它唯一的競爭場所，所以它們不惜採用種種爭取國外市場的武器來在中國市場上大演其貿易戰爭。

本年八月來列強對華貿易的新趨勢正是帝國主義國家在華貿易戰愈趨激化的反映。

在列強對華貿易的陣容中，日本在1910年起的二十年間，總是佔着中國對外貿易的首位。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它就失去了中國進口貿易的第一位，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它更失却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首位。就從這時候起，對華貿易逐年增進的美國，便繼日本而躍居首位了。英國也乘機進展，先從1931年的第四位升居1932年的第三位，繼由1932年的第三位升爲1933年的第二位。因此1933年列強對華貿易的陣容還具有九一八事變後所起變化的餘波，即美國對華貿易的突飛猛晉，英國對華貿易跟着上進，日本對華出口貿易則益見衰

落(這裏應注意到日本對東北出口貿易的激增)。

兩年來主要國對華貿易的趨勢(所佔總值的%)

	進				口			
	1933				1934			
	第一季	上半年	1—8月	全年	第一季	上半年	1—8月	
美	21.60	20.29	20.62	21.86	31.68	28.21	27.60	
英	10.55	10.71	11.18	11.33	10.42	10.46	11.02	
日	10.10	9.28	8.89	9.71	9.32	10.29	10.85	
德	7.60	7.16	7.65	7.95	8.03	8.37	8.72	
	出				口			
	1933				1934			
	第一季	上半年	1—8月	全年	第一季	上半年	1—8月	
美	17.17	18.51	19.92	18.48	22.83	19.69	18.72	
英	5.20	6.90	8.24	7.96	6.67	8.31	9.84	
日	9.32	15.11	14.17	15.65	14.17	15.65	15.13	
德	3.76	3.62	3.42	3.40	3.64	3.80	3.59	

但是列強的對華貿易最近却又顯然起着新的變化。

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佔的比重，在從1933年第一季起到1934年同時期的一年中間，不論出口或進口方面，都已有長足的增加。尤其在進口方面，它所佔的百分比竟超過了英，日，德三國所佔百分數的總計。它不僅雄居首位，且大有獨佔中國對外貿易之概。但是，到了1934年上半年和八月為止，它雖仍然佔着首位，它的比重却已現出逐漸低落之勢。例如在

出口方面減少4.11%。進口方面減少4.08%。在不到半年的時期中間，美國對華貿易的激減，就採着這樣迅速的行程。假如目前的條件沒有多大的變更，則它所佔比重的日益低落，再回復到1933年第一季的比重，或將更為低落，乃是意料中事。

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佔第二和第三位的英國，它在1933年各時期中，進出口雙方所佔的比重都在逐漸增加。同樣，在1934年各時期中它在進出口雙方所佔的百分數，也在一天天地增大，特別在出口方面，它的增加速度比較更加顯著。不過，在進口方面，1934年各個時期比較，雖也表現出它逐漸增加的趨勢，若與1933年同期比較，却還都在減退之中。因此，全般看來，英國的對華貿易，並沒有多大的進展，至多祇能維持原狀罷了。

說到日本的對華貿易，它與英國不同。它與美國更加兩樣，甚至可以說恰恰相反。在出口方面，它所佔百分數的增加，步驟並不整齊，這在1933和1934年各時期的比較都是一樣。不過，假如將1934年與年同期比較，那是都有增加的。在進口方面，它在1933年各時期中所佔的百分數是在一天減少一天，直到1933年年底方纔稍稍抬頭，不過總還不及1933年第一季所佔地位的優越。到了1934年第一季時，它的百分數雖仍比較1933年同期為低，却已與1933年全年相差不多。從此以後，它的地位便在蒸蒸日上，不但一反1933年日益低落的情勢，且已

超過了1933年春季最優越的地位，將與英國的地位並駕齊驅了。

至於德國在列強對華貿易中所佔的地位，近年來正在日益增高，特別在進口方面，它所佔的百分數已同英日兩國相去不遠。它在兩年中的進展情形，則與日本相彷彿。

三

兩年來主要國對華貿易的變化，大概已如上述。這裏，我們再把它這種變化的主要契機加以一般的分析。

第一是美國通貨膨脹政策的厲行——特別是白銀政策的堅決施行。美國由放棄金本位而減少美元的金成分，由減少美元金成分而將黃金收歸國有，收買國內外黃金，由收買黃金而再進至收歸白銀為國有——這種再接再厲的通貨膨脹政策，它在世界經濟上的主要作用即在增強其爭取世界市場的武器。半殖民地的中國，對於外貨的積極傾銷，除開稅率的相當增高，尤其是購買力的低落足以消極地抵制外，簡直是無從加以限制的。這是兩年來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以能夠大量進展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是東北淪陷和上海事變後，中國民衆對於日貨的抵制。日本對東北貿易的暫為低落，就是這個緣故。迨後日本對華貿易漸次恢復，英國，尤其美國對華貿易漸次減退之時了。

英國對華貿易，本年各期比較去年同期都呈低落，美國本年各期對華貿易的一天天地減退，就是顯著的例證。

第三是中國海關進口稅率的變更，大家知道，中國目前的關稅制度，名義上雖已自主，實際上仍未變更其協定稅則的本質。可是，近年來進口稅率的修訂，效力如何，作用何在，以及它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如何，姑不具論，它對於增減稅率商品的進口額，會給與相當的影響，這是事實。因此，這些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家也就跟着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兩年來和各國對華貿易陣容的變化最有關係的，就是1933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頒布的國定稅則，和1934年七月一日所施行的新稅則。在1933年的國定稅則裏面，稅率的變動增減很多，尤其是增稅的貨物佔着主要部分。其中，因為中日互惠協定滿期的關係，日本所受到的打擊便特別巨大。1933年日本對華貿易的依然表現衰退，這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至於這次新稅則的內容，它在給與對華貿易主要國的影響，可以從最近一年來(1933年6月至1934年5月)增減稅率進口各貨所佔總值的百分比來觀察。

新稅則中增減稅率進口各貨的百分比。

	國別總計	日	英	美
主要減稅物品	4.5	13.11	12.85	5.4
主要增稅物品	46.28	35.49	47.29	60.00

其他物品	49.22	51.40	39.86	39.46
進口總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中行月刊九卷二期十六頁)

據上表所示：第一在主要減稅物品進口額中，三國所佔的百分比，日本最大，英次之，美國最小；第二，在主要增稅物品的進口額中三國所佔的百分比，美國最大，英國次之，日本最小。

不過上面所說，還祇是以最近過去一年中的進口貿易額為根據，對各國行將受到的影響所作的一種預測。現在我們再看看新稅則實施後事實究竟怎樣。

1934年6——8月若干進口貨額比較(金單位)

佔高位的國別	主要減稅貨名	6 月	7 月	8 月
日	印花棉布及雜質棉布	200,313	177,443	270,030
英	毛及毛製品	689,465	1,564,742	2,377,437
日	魚介海產品	414,837	496,886	597,647
	主要增稅貨名			
美	雜類金屬製品	2,219,334	1,946,575	2,103,206
美	煤油	885,330	242,411	352,388
英	機器及工具	2,000,221	2,721,546	2,223,165

從這表中，可知在主要減稅物中，以日英貨佔首位的各類物品，從本年6月到8月都在增加。反之在主要增稅貨中，以美英貨佔首位的各類物品都在減少。

綜結上面所述，假使美國的通貨膨脹不能更進一步地增強其傾銷的力量，那末，它的對華貿易勢將江河日下了。

而日本對華貿易的巨大進展，便有可能首先超過英國而升居第二位，乃至壓倒美國而恢復它九一八以前的第一把交椅。同時，英國所受的實惠雖較日本為次，但較諸美國卻大得多。英美對華貿易戰的激化，因此也就無可避免了。

1934, 10, 20.

上文是1934年10月中旬寫就的，那時正是1934年頒布的進口新稅則施行不久，而已稍稍見效的時候。在上文中關於列強對華貿易的陣容我們曾經指出如下的傾向，即：“在列強對華貿易的進出口總額中，美國所佔的比重將日益低落，而有可能回復到1933年第一季的比重，或將更為低落；同時，日本所佔比重之大却有蒸蒸日上之勢，且將與英國所佔地有位並駕齊驅之概；最後德國所佔的比重已跟英日，特別是跟英國相去不遠。”這種傾向，直到現在如以1935年上半期的中國對外貿易統計數字為根據，那真所謂“不幸”而為我們“言中”了。例如下表所列1934和1935年上半期的比較。

兩年來上半期內列強對華貿易的陣容(%)

	進	口	出	口
	1934	1935	1934	1935
美	23.21	19.54	19.69	25.03

日	10.29	14.22	15.65	11.54
英	10.35	9.44	8.31	7.58
德	8.37	9.81	3.80	5.70

上表告訴我們主要的有三點：(1) 美國對華的進口貿易真有所謂“江河日下”之勢了，它所佔的百分比，不但已和1934年同期相去太遠，即和1933年同期比較，也還反形減退。至於它在出口方面所佔百分比的激急增加，那主要是因為日本由華輸出的貨物已是激減的緣故。(2) 日本對華的進口貿易，它的飛躍似的進展正和美國相反。它所佔的百分比，不但已打破了近兩年來上半期的記錄，且已超過了英國而躍居第二位。至於中國對日出口貿易的減退，主要是由於日本原來必須仰求於中國的原料，現在是可向僞國更有利的“予取予求”了。(3) 德國的對華貿易，不論在進口或出口方面，它所佔的百分比，都比過去兩年同時期內有了迅速的增加。這與英國對華貿易的情勢恰正相反。不但如此，就進口方面所佔的百分比說，德國且已超過了英國而升居第三位。這也不失為列強對華貿易中的一種新趨勢了。

1935年7月29日補記於申

中國國內市場底分割

徐 雪 寒

一 中國國內市場的特質

國內市場的存在和完成，是資本主義生產相當發展後的產物，當商品隨着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掃蕩了前時代的自然經濟及其上層建築的政治障礙，對市場愈加獲得了決定的作用的時候，這個市場底民族的或國家的界限便被要求而至於實現。這個問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事實上却是有種種錯雜的歪曲的形態。第一，各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在國內市場形成上所演的推進和阻礙的功能。不過，嚴格說來，這裏與其說它在掃蕩舊的經濟機構的時候，完成了助進的作用，倒不如說它和特定勢力相結托相扶持，部份地使市場趨於分割，更來得適切；至少在帝國主義階段，後一過程比前一過程更來得積極。第二，固有的商業資本金底開拓功能，受了本身法則的支配，並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半封建的農業生產繼續維持，提供了分

割市場的真實基礎。日漸萎縮的民族工業，也不能負起完成國內市場的責任。第三，寄託在這樣關係上的各種上層機構，如地方軍人或多或少的政治割據，名目繁多的重疊稅捐，幣制紊亂和國內匯兌行市的巨大差異，度量衡制度的不統一等等，都使國內市場的澈底形成，受了種種限制。有人曾說整個的中國已經嚴密地隸屬於國際市場，這是不錯的；不過它自己却不能建立起統一的國內市場。因而一般國民大眾正在熬受着比加拿大甚至連印度還不如的苦難。

這些內在的主要因素，規定了中國國內市場的特質。鬆懈的市場紐帶，隨時可因上述某一因素所起作用之加強，而有一定被破壞的可能。政治名義上的短期統一，一切上層改革，爲了種種關係所制限，不易有何成果。譬如普遍國內市場的厘金裁撤以後，立刻爲各種各樣的營業稅和產銷稅所替代，在廣東甚至變成村稅鄉稅。再如政府竭力推行度量衡新制，然而一方遭遇到基爾特式的各地商人底頑強反抗，同時在推行者手中往往變成藉以漁利的工具，以致難有結果。特別自世界經濟大恐慌以來，內在的各種矛盾勢力却達到了總爆發的飽和點。首先是各帝國主義在華資本戰爭的激化，愈加要求特定勢力範圍底劃分，東北已開其端。其次，適應上述要求，軍事集團的分立傾向，愈益明顯，他們爲了準備內戰就從事一切活動，以謀收入之增加。最後是國民經濟的一般衰落，現銀向通商口岸的

畸形集中，造成了都市與農村間，內地諸省與沿海諸省間商品流通線的縮小。這種種橫在社會底裏的矛盾因素，提供了目下國內市場被分割的根據。

二 國內市場的開始分割

在不遠的過去，前述的市場分割便以比較簡單的形態開始。譬如去年湖南軍事首領，用維持省立第一紗廠的名義，採取封鎖市場的辦法，設置棉花管理所於長沙，分所於常德，衡陽，岳州等處，限制滬漢各地紗廠所生產的棉紗輸入省境，該省主席答覆財部的電文中說：“棉紗為人民必需之品，湖南地廣人稠，每年需用，為數甚巨，本省紗廠所產之紗，既感不敷分配，則推銷國內各紗廠出品，實為必要之圖……惟年來本省市場，棉紗充斥，銷路疲滯……近以競賣關係，竟不惜貶價傾銷……而本省紗廠成本較滬漢各廠為重，更屬不能維持”（二月十九日大公報）。當然，將如後文所述，湖南省當局限制“外紗”入口是更有別種居心，不過這段話也如實地表明：脆弱的中國國內市場，是如何容易為各地的自衛要求所擊碎。（當時長沙市棉紗同業公會首先反對，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也繼起抗議）。此外如山西省，自閻錫山擴大地盤戰爭失敗，二次回晉之後，為了鞏固割據，準備再戰，便力求山西省經濟門羅主義，草擬十年建設計劃，實行“食鹽督銷”，“企業公營”，“貿易統制”等

分割市場的辦法。但前者(湖南)僅以加徵每包棉紗管理費大洋二角就算了事；而後者(山西)一時也不曾有真正建設的積極動作，不過變成橫征暴斂的另一手段。所以晉民竟稱“十年計劃”為“十年饑餓”，稱閻氏執行該計劃的金融機關“墾業銀號”為“坑人銀號”。

直到最近，經濟割據使用最露骨的形態爆發起來，首先是上述的山西省，其次是西南的廣東。據九月二日天津大公報載稱：“晉當局擬提倡土貨，抵制外貨，已規定統制貿易辦法。凡晉人出省購貨，及外商來晉售貨，並外貨經過晉境者，須事前經省政府核准，始能購買；否則決予嚴厲之處分。並特函正太路車站，檢查所及公安局，自一日起實行檢查，並令各商號一律遵照”。此外尚頒佈了八條規則，關於日用品如火柴毛織品磁器等皆用省產替代外來產品（該條文請參看九月六日上海江南正報）。又據九月廿二日大公報北平通訊，說明山西省所以急於斷然實行市場分割，其原因為：“該省自經十九年戰事，經濟基礎因現金大量流出而動搖，故閻錫山氏返晉後，苦心孤詣，謀挽頹勢”。現在綏靖公署參事張至心氏所主持的經濟統制委員會，就是為了完成此種目的，和上述的規定。

在廣東這種運動，就更大規模地有計劃地推進。四月間西南當局通過了三年實業建設計劃，實施糖，水泥，鎢等產品的專賣。該省建設廳草擬了保護實業辦法十六條，（詳文見九

月二十二日申報)；同時根據條約第七條“省內完全華資之民營實業，遇有受外貨傾銷之壓迫時，得呈請施行保護稅，傾銷稅或其他有效之方法，以維國貨之市場”的規定，又頒布了征收省外輸入貨品保護稅則十三條（詳文參看九月二十七日上海商報）。主要徵稅物為各色棉紡織品，肥皂，酒精，磁器等，其徵稅率竟達百分之五十。據九月十九日中華日報駐廣州特派員通訊說：“廣東財政廳長區芳浦，為增加本省財政收入起見，特決定徵收省外輸入貨物保護稅……現決定尅日施行，開始征收施行此項特稅，由本月十五日開征。並為節省經費，及劃一稅收機關行政起見，不再另行設處征收”。此外如命令省內各種建築用水泥在一萬元以上者，須用省立西村第一水泥廠出品（五羊牌），對於啓新龍潭等廠水泥入口，必須領得該省政府許可證及繳納大學捐等一元三角。用這種種方法，來完成阻止外貨入省的目的。

在前述廣東省所採取的步驟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同具的各種要求，現在且分兩點來說：

（一）企圖平衡一省的入超，同時也是想消除日益擴大的財政危機。前者是由於國民經濟所受的半殖民地式的宰割的結果，後者主要的為了準備戰爭而輸入戰器。（二）農村的極度破產，促使地方官場以及土著工商團體，發生以分割市場來保護自己的幻想。譬如廣東皆以官場資本經營工廠，抵制外省貨

物輸入，以攫取本省市場上的獨占利益；再如廣東的一部份商人和廠家擁護開征“保護稅則”（請看九月二十七日時事新報），就是想使此種幻想趨於實現。他們爲了完成這種要求，且已風行現今各國的統制經濟政策爲烟幕：而其結果不過使國民經濟的全機構更落後更衰退而已。

三 走上徹底的殖民地化之路

國內市場分割或經濟割據，這是軍閥混戰的一個變形。自從1930年大混戰結束後，共同展開了決死的討赤戰爭，所以露骨的內戰便緩和下來。但是，在這和平的表面下愈益滋長起來的，是地方軍閥由政治割據而加強了經濟割據；國民經濟這種離心的分化，同時由於上層階級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各自形成了以某一帝國主義爲主的經濟布洛克（Bloc），作爲中國由幾個列強共同統制的半殖民地，分裂爲幾個殖民地的前奏曲！

我們現在更分下列三點，來檢討上述市場分割運動所必然引起的各種影響：

第一，這種市場分割，促成了國內工商業更進一步的破產。稚弱的民族工業當東北市場被陷的時候，所受的打擊是多麼大！廣東的高額保護稅，所最先影響到的也必然是這種羽毛未丰的民族工業。假使這裏再考慮到市場縮小而引起在華外廠的競爭，以及考慮到華南華北對於民族工業的中堅如紡

織等部門，是一個怎樣重要的國內市場，那末這種市場底分割，必定成爲推進民族工業陷入最後滅絕之境的一個契機。中國的工業恐慌將更因國內市場這樣絕對的縮小而加重。在這種趨勢之下，自然，基爾特式的地方工商業單獨繁榮的迷夢，必然爲事實所擊破而同歸於盡！

第二，促進分割市場的因素之一是帝國主義者，但市場分割之後，反使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化。這就是說，特定區域的市場割據，實際上往往是適應某一帝國主義者底要求的；因此，所謂保護稅則只是杜絕民族工業商品的銷路，絕對不能阻遏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不論從資本構成高低所決定的傾銷力來說；或是從保護稅所課的貨物對象來說；或是從地方軍事集團不敢毀棄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關稅權壟斷上來說，都是如此）。而且事實上還是用更直接的方式，來貫徹帝國主義底間接傾銷。譬如廣東專賣制度經營機關——國貨推銷處，其主要推銷物的糖，並不是替當地著名的土糖努力找出路，而只是用軍艦成千成萬包地載運香港洋糖來推銷。七月七日重慶商務日報汕頭通訊說：“現潮汕商人已停止運糖入口，由廣州方面用艦運二千包來汕應市，以前商人所辦入者，一概封存。此後商人非領照不得販糖，民間雖有其蔗，而不得私有其糖矣”。當地桔水商人，反對桔水統制法專以訂購分銷香江桔水公司爲務，“請以土貨爲重”（見九月二十日廣州七十二行商報），這些

事實，更說明了推銷國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同時，在這裏，市場分割運動必須與帝國主義對華資本輸出，即最近地方政府狂潮地吸引外資這事，相關地加以觀察。廣東政府為完成上述三年實業計劃，向英，美，瑞典等國已借了一千萬元以上，借款總額達三千萬元。最近煤油借款二百萬元又告成立，以及粵省秘密派人向香港某銀行接洽，請在粵投資創立工商銀行，援助省辦各種事業的經營（見八月三十一日香港工商日報）。向帝國主義借款，並不是絕對要不得的事，但以中國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來說，以國內軍閥惟私利是圖來說，借款必然以出賣國家政治經濟的利益為交換條件，這祇是替帝國主義多造成束縛民族經濟的吸血管罷了！此外如山西省的西北實業公司（閻氏實行經濟割據的大本營之一）所屬的鍊鋼廠，乃是和司可達公司合作投資的成果。這樣帝國主義者透過了或是助進市場分割，來更進一步的加速中國的殖民地化的過程。

第三，市場割據更完成了政治割據。通過了鉅額的保護稅收，或是因壟斷市場而攫得巨大利潤，暫時彌補了作為準備戰爭的結果的財政危機。因而對於內戰的繼續醞釀，當然又成一種興奮劑。同時這與帝國主義者在半殖民準備大戰的慾求，也不無關係。市場分割將必透過政治分割而更直接地打擊整個國民經濟底前途。

總之，從國內市場一般的鬆懈，而至於顯然的分割，這是

一個重大變故，這替中國經濟恐慌更加一重繁複的因素，而日益陷入殖民地的階段。落後的經濟機構提供了分割的可能性；帝國主義者主持甚至是扶植了這種運動；而封建的軍事集團就全面地執行起來。不論粵省全部履行保護新稅則還待明年一月一日，但這都不能改變問題的嚴重性。上海商人派遣代表赴粵，請求撤消保護稅率，或是南京政府明令取消徵稅法令，都不能改變某種形態下的分割。客觀的社會存在，十足地可以解釋中國國內市場的特質及其公然分割，並不是偶然的事，因此也不是像有些學者所希望的那樣，它將自動地消除！反之，帝國主義的，以及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各種統治勢力，爲了自身的存在而掙扎，必然地要促使或明或暗的市場分割日趨尖銳。

1934, 10, 19, 上海。

殖民地化過程中的中國工業

徐 雪 寒

一 中國的工業化

一八四〇年以後，特別是一九〇〇年以後，在“野蠻”而且“落後”的中國沿海的草原上，開始出現了汽船和火車；開始轉動了探礦機和採掘機；開始矗立了高出雲表的煙囪。歐洲大戰期間及戰後的恐慌時代，中國的買辦、官僚、商人和地主，更傾囊地運用他們那些血腥氣的原始蓄積，來增進工業投資的利潤蕃殖；他們雖然都在這個稀有的黃金時代塞滿了一己的荷包，可是他們從未想到如何利用這個良機來積極確立民族資本的根基。在世界經濟大恐慌爆發之後，即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因為金貴銀賤的結果，物價奇漲，造成假態的繁榮。富商大賈把歐美名貴的商品和賣淫的Jass舞蹈都大批介紹到通商巨埠，列強的財閥把濫濺如泥的白銀，當作資本狂潮地輸入中國，來建立工廠，來大發“洋財”！所以中國這種由“野蠻”

過渡到“文明”的行程，依舊像龜兔競走似的紆進着，雖然，她的客觀的意義是萬分可憐。到了最近，內地幾千百萬方里的水盪旱暴，幾千幾萬人的淹死餓死縊死，和賣男女地掙扎而死，就更襯顯出口岸都市的繁盛富麗，興隆太平。因此指示中國已在工業化或是已經工業化，或者指示中國已經能夠工業建國的人們就煩不寥寥了。他們之間更有人將中國每年每人對於煤鐵，電力紡織品的消費量，去和英美德法日諸國作等量的比較。提出了專家或是權威家的意見，主張中國工業化的程序應該“自輕工業入手，而漸及於重工業”，（請看看中國經濟學家的權威作家，南開大學教授何廉先生在交易所週報上面的妙文大著！）但是誰有權利可以將中國的工業化當作一個民族的統一的範疇來觀察？試問中國的工業化是由誰來強制促動，更是向怎樣一個被決定的目標前進？事實最為雄辯，牠告訴我們的是：中國的工業，特別是一切工業之基礎的重工業的存在和開發，並不足以代表中國工業化的指標，而祇是測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半殖民地性，即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到了怎樣的深度。

第一，中國的工業乃至所謂工業化，主要的只是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成果，是爲了完成他們統治並榨取中國的經濟基礎。中國的鐵工業，其儲藏量的三分之二，已被日帝國主義所武裝掠奪；鐵礦開採權，有82%是握在它的鐵掌之中。每年百萬噸的以新式方法生產出來的鐵礦砂，有90%以上是和日本

資本有關；四十萬噸的生鐵中，和日資有關的鐵廠佔百分之95以上。煤礦業每年二千六百至二千八百萬噸的產量中，英國資本佔25%，日本資本佔40%（東北淪陷以後，日英之間的這種比重在名義上自然起了變化）。新興動力工業——電力工業，外資產量佔年產量60%以上。中國最大的發電組織——上海電力公司，便是在美國資本獨占之下。外資在這些重工業部門之中的雄姿，便是說明中國工業化的最主要的本質。而且就是在輕工業之中，譬如棉紡織業，英日資本也佔全國紗錠總量42.23%，布機總量51.15%；紗錠總量67.53%（1934年底止）。在捲煙工業中，英國資本和中國資本成二十與一之比；在火柴水泥方面，日英資本也有同樣的牢不可拔的勢力。這樣，中國的工業化，在世界資本的體系中很明顯地只是代表着半殖民地化的過程。

第二，在發展過程中，外國資本的速度也遠勝過中國土著的工業資本。因此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乃是外資統制力累積地加強增大。中國煤產總額中外資所佔比重，由一九一八年的47.6%增加到一九二八年的56.2%。其中日資的比重，據李紫翔先生的材料，一九一八年不過20%，而一九二八年則已達33%，一九三二年更增至40%。外資所佔百分數的增加，反面自然就是華資的降低。這在輕工業方面也無不同。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的黃金時代，棉紗業中華資錠數增加了四倍，在

華日資却增加了七倍。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十年中間，華廠紗錠增加了三分之一，日廠却增加了三分之二。又如同期布機台數，華廠只增加了二分之一以上，而日廠的增加率則超過二倍。外資這種發展不但是憑藉着金融獨占資本龐大勢力，而且是透過了列強在華的政治勢力，（如1895年中日馬關，和1897年中德膠澳諸條約），和國內半封建性的政治經濟機構來達到目的。譬如早已收回自主的井陘礦務局在1922年被迫再與德國合辦；1931年南京政府因“某種關係”令河南中原公司和福公司合辦，使歸英資統制，灤州礦務局迄今也仍未收回，雖然所訂條約的有效期間已經終止等等，不過是幾個顯而易見的實例而已！目下因為在華外資的增強，結果掃盪了農村中的手工業，開拓了國內市場，並造成列強控制下的獨占的輸出（最好的例子莫過於鐵礦砂和生鐵的強制輸入），乃是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第二個現象。

第三，中國民族資本不會爭取得重工業的霸權，來確立整個工業的基礎，這就已經決定他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充當外資附庸的任務。輕工業中抱殘守缺的地位，一方面因為國外市場的缺如，現行關稅制度下列強商品的得以自由傾銷，另一方面因為龐大而雄偉的外資工廠的競爭，沒有統一完整的國內市場，以及半封建性的捐稅的負擔，就絕對不能探求解脫的前途。而且這種不幸的命運必將隨着帝國主義愈益逼臨着沒落

期而愈益被確定，列強分割中國的運動，已在着着實施，目前恐慌的狂風暴雨正是籠罩着全世界，列強拚命在那兒將禍患轉嫁，中國民族資本的輾轉衰微，就愈益顯出列強資本寶座下的中國工業化的命運，是怎樣一幅淒慘的圖景。

所有這些都是規定了中國工業或工業化的特質，惟有了解這種特質，我們才能把握住中國工業的應有前途，不然我們就會被這些有意或無意的囁語所迷惑！

二 戰慄在恐慌中的民族工業

恐慌是促進資本集中的有力槓桿，每經恐慌一次，所謂“兩極化”過程就推進一次。目前的中國正在恐慌之下呻吟，勞苦大眾和一般小有產者都相繼破產，死亡，民族工業亦同樣沒落，不過外資的勢力却更形累積了：中國經濟是更進一步地踏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一般說來，中國經濟恐慌並不和世界經濟恐慌同步調進行着。1928年起，物價以世界的規模開始迅捷下跌，1932年為最低點，到1933年開始作部份的畸形的好轉。在中國則頗有不同：天津上海等地物價指數，在1928年到1932年間，反是逐步上漲，而尤以洋貨上漲為奇速；到1932年底起，列強各國物價跌勢稍止，而中國從這個年頭起反陷入物價狂跌大潮中，一直繼續到現在，日益加深。對於這種不同，中國一大批的買辦式

的經濟專家的意見，以為1920—1932年是中國的繁榮期，造成這個奇跡的寶貝是中國的銀本位貨幣。殊不知金貴銀賤所促成的假態的繁榮，祇是帝國主義者白銀傾銷所造成的南柯一夢，而勞苦大眾們在高物價下却已絞盡他們的血汗。但反之，1932年起，帝國主義通貨膨脹的全面厲行，造成金賤銀貴的尷尬局面，却又是中國從“假態繁榮”，到“現實恐慌”的主要契機。英日美三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爲了轉嫁恐慌，此後一定要強化其通貨膨脹政策，務使半殖民中國曲盡了造成帝國主義景氣好轉的犧牲任務。所有半殖民地國家經濟命運便被這種基本要求所決定，因之也同是決定中國工業恐慌前途如何最主要的第一個前提。

將這種轉嫁作用特別加強推進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所掀起的掠奪戰爭。東北煤礦產量佔全國產量40%以上。東北的鐵礦，僅遼甯一省，即佔全國儲藏量的75%。全國主要煤鐵產區被人掠奪，愈益搖動了中國工業的基礎。同時東北又是棉紡麵粉捲煙火柴水泥以及橡膠等全部民族輕工業的最豐富的市場；東北市場被獨占乃至被封鎖，就更迫使民族工業危臨絕境。可是再分割殖民地戰爭祇是帝國主義轉嫁恐慌苦難的另一種形態；而東北陷落又祇是轉嫁禍患的戰爭之開始。這就規定了在當前恐慌中民族工業的前途之第二個課題。

在這樣的特徵和條件之下，中國工業恐慌乃至經濟恐慌

在1932年下半年起便暗雲低迷，山雨欲來；1933年就大規模的展開；1934年更作立體的深化，而特別添加了新的因素。

重工業中民族資本底微弱的地位，在恐慌中採取着破產，倒閉，最主要的還是被外資吞併的形式。安徽烈山煤礦去年秋積欠工資半年，礦內水深三尺；水東煤礦積欠工資半年。河南小寺灣煤礦千餘工人被迫停工；焦作中福公司虧蝕三百餘萬元。晉北礦務局休止工作達75%，保晉公司煤窰五座，已停其三；萍鄉煤礦，衰敗已極，產量自百餘萬噸減至四五十萬噸。湖南醴陵煤礦積欠工資多月，今春發生索逋工潮，這些祇是極零星的消息。中國自辦的煤礦便逐漸受到外資控制河北省臨城的怡立，正豐，長城等公司，和日資發生曖昧關係；柳江公司產銷上實受關灤的控制；浙江長興煤礦有受英資福公司二百萬借款的消息。至於鐵工業自東北被佔後，簡直已無足述。今年海關報告上生鐵及鐵砂輸出之增大，並非此基本工業的好轉，只是證明了對日債務關係壓榨下不得不提供此半製原料品，以補充日本軍需品的不足。這正像鎢銻等輸出突飛地增加，只盡了強大宗主國武裝勢力的義務。在恐慌中重工業基礎特別危殆的當兒，實業部年來所籌劃的機器鋼鐵諸廠除掉吸引外資或是聊資高調以外，就更少其他意義了。

回頭再看輕工業：民族資本有完整地盤的蠶絲業，在世界經濟恐慌下，在日本世界市場獨占強化下，已經完全停滯，完

全壓碎了。去年生絲輸出祇值1929年的15%；上海絲廠開工者在七月為33家，不旋踵就減至十二月的十三家，僅及往昔盛時十分之一。麵粉業營業額指數如以1930年為100，則1931年為120，1932年為85，1933年為50。去年因災荒景氣的促動，麵粉市價曾一度騰漲，但十一月起又跌落到二元二角左右，據日本商務參贊署估計，該部門的生產力在轉動的僅25%。驕氣橫溢的火柴業，自從1933年十一月增加統稅以後，便存貨山積，減工倒閉疊出不窮。去年春青島火柴廠均相率停業，失業工人萬餘。嗣後因工人要求而復工的廠家僅三家，山東其他各地火柴廠亦有六家停業。天津榮昌公司裁工十分之四，停業者一家。北平丹華公司也裁員減工。鎮江大中華分廠在去年秋後亦實行緊縮。浙江最大的火柴廠杭州光華公司去年起即縮減工作十分之二，今年預備再減工十分之二。具有托拉斯規模的大中華火柴公司去年的景況也不見好。統計全國火柴工業生產力使用者僅50%。然而在另一方面，日柴漏私空前地增加，在華日廠又積極擴大，捲煙業隨着統稅稅制自七級改為新二級，上海華資煙廠也由一百五六十家減至五六十家。去年年底崑崙等小廠相繼倒閉，煙業巨擘南洋公司也糾紛疊出，淹淹無生氣。水泥工業雖因提高關稅而稍獲舒氣，但因市場日狹（如廣東限制外省水泥入口，橫加苛稅負擔），貨價仍跌，生產力廢棄者至少有30%。至於新興的橡膠工業，自東北淪陷滬戰爆發

以後，衰頹得特別悽其，以上海一埠而論，原有橡膠四十餘家，去年僅存十三四家。

民族工業的寵兒——棉紡業，在當前恐慌中特別值得注意。外資特別是日本在華紗廠的龐大勢力，是恐慌中華資紗廠陷於絕境的最大原因之一，它一方面壟斷高級紗的生產，壟斷高級原棉，（日本更控制了中國最大的棉產區——華北），封鎖東北市場，一方面竭力壓低紗價，來侵佔海外及國內市場，來打擊資本薄弱的華廠。以本年一月中旬為例，市上四十二支日紗水月牌較華紗金城牌抑價32元；二十支豐年較人鐘低3.25元；十六支日光較同級人鐘紗亦低3.25元，後者的銷路就全為前者所侵佔。再加上國內人民購買力的大大減少，銷路更無，市價就狂跌不已。華紗紗銷日蹙，以上海交易所內各幫現紗成交額計算起來，1930年為690,384包，1933年僅有237,191包，跌落了三分之二；1934年稍稍回復到319,923包，尚不及1930年銷數二分之一。其中尤以華北銷路減退得最為悽涼，1933年銷數僅及1930年的五分之一，1934年亦不到三分之一，日本透過政治勢力增強對華北市場的控制，和東北市場的全部吞沒，自然是主要的原因。同時紗價也大大跌落，42支紗1931年最高市價544.75元，1934年僅287.50元；20支紗1931年高價達265.75元，1934年僅188.50；10支紗1931年最高價220.62元，1934年僅163.00元（均為一年中最高價之比較），大

都跌落了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銷路減少和紗價跌落，便將這門民族工業打落到恐慌的深淵。1933年4月22日起華商紗廠決議全國減工23%，一個月期滿後又繼續減工，減工之不足，便紛紛停業；天津恆源，武昌民生自該年五月起停工六個月；天津恆豐和鄭州豫豐先後在八九月間停工。總計當年上半年全國停工錠數共達2,696,022錠之空前高額，下半年亦達1,119,334錠之多。到了去年，情勢依然一樣，上半期停工錠數又增至1,224,267錠，總錠數停工週數竟超過以前三個半年的數字，計達3·89週之多！自六月一日起，全國華商紗廠又決定減工。七月間，恐慌竟至搖動華商紗廠的寶座——申新紗廠，牠被迫改組，並向美日銀行籲求援助。到了年底。上海溝益天津元裕諸廠又先後被迫停工，假使人們根據了紗廠老闆的統計數字，將死挺在廠中的新舊錠數，和日廠飛滾着從不停歇的紗錠綫錘，乃至布機，都一視同仁，以為三年來華商錠數增加了277,450錠，在全國總數比例中由56.65%躍進到57.97%，以為是一個可驚的勝利，那才是一個深刻的自我諷刺！

恐慌中民族工業停滯乃至雪崩一般地解體，實是在華外廠保持着穩固地位和加速擴大的前提。民族工業無論相對上或絕對上愈趨式微，因而更減低了控制整個市場的能力；或是採取更簡單的形式：被併合，被控制，以及投奔外資而充作附

庸。這種畸形的累積或膨脹過程，只是朝着唯一目的走：即外國資本逐漸全面的控制中國工業生產的能力，而成爲澈底半殖民地化或殖民地化之橋樑。

三 走向殖民地化的幾個主要因素

我們假使看落了現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所展開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乃至戰爭及革命危機，對於半殖民地經濟所發生的影響，而將牠們當作各別的截然不同的體制，那末我們就無從了解，半殖民地國家爲什麼必將充任提供經濟恐慌的犧牲品的那種悲慘命運。經濟，政治，乃至戰爭等等危機，在現階段祇是資本主義沒落期的一切內在矛盾的爆發。在這裏只是他們運用不同的形式來達到轉嫁極度恐慌中的禍患，而中國的工業恐慌或是民族工業的殖民地化，便在這種契機之上，必然地開展：

第一，列強在華經濟利益的衝突，經濟壓力的增強，在1934年都有新的展開。國聯技術合作和日本“四一七”聲明書的對立；歐美資本之建設銀公司和日本要求恢復中華匯業銀行之間的對立，就是反映前一過程。廣東以電力公司等向英美抵押借款；四川以開發全川富源要求英國投資等等，就是表示民族資本如何不能自謀掙扎，而外資則如何可以自由地擴大牠

們在華的經濟壟斷權。

第二，帝國主義的貨幣政策愈益極度推行。譬如美國之於白銀政策，他一方面爲了增進對華傾銷力，使中國成爲他的過剩商品的犧牲對象，一方面想吸盡中國的本位貨，使中國在幣制上完全變爲他的附庸。中國的金融界因爲美國這樣厲行白銀政策，以致市面現銀日缺，信用更趨收縮，對於工業投資就更審慎不前，而且貸款利息增高，使工業的成本愈重，因而就促使牠們愈陷於恐慌的深淵。

第三，遠東反蘇聯戰爭愈迫切，日本占取中國的決意愈堅明，這是中國民族工業流落到殖民地化的前途之最主要的促進力。中國工業產品已經徹底從東北市場上被排擠出來，日貨在華北市場的控制力也顯著的提高。更不幸的是作爲中國工業之資源，生產大量鐵石油和棉花等原料的華北，現在正繼續東北之後而迫近再度的掠奪戰爭之前，使中國將更喪失建立自立的工業之可能。“四一七”聲明和“一二九”中日南京會商暗示給中國工業前途的實在不是和平的繁榮。中國的民族工業或將成爲日本侵略戰爭的主要工具。

中國工業的前途，便在這樣國內外的實踐條件之下被決定。中國工業的險狀，已經不是用數字和圖表所能全部表示。忽視中國工業現實的社會關係，而計劃着在原有基礎之上的工業建設，是對於事實的逃避或掩飾。中國工業危機的解救，

它將要被大眾和一切中國政治經濟問題一起來處理。

1935, 2, 13 上海。

救濟棉紡業危機諸方案的檢討

徐 雪 寒

一 救濟聲中棉紡業的沉淪

自從國民黨五中全會通過棉紡業危機的救濟方案以來，日子過得真快，又快半年了。方案的內容共計五項：（一）由政府聯絡金融界，使全國紗業互相提攜，並實行低利貸款，以濟其資本之不足。（二）於可能範圍內，酌量提高入口關稅，並減低對內稅則。（三）由政府實行統制，為有組織之生產與推銷。（四）全國紗廠設置地點，須分配適當。管理及生產方面，須實行科學化與合理化。（五）全國公務人員，黨務工作人員，各學校教職員及學生，須一律服用國貨。但是直到現在，我們還看不見什麼實際上的效果；我們所看到的祇是棉紡業危機愈加展開，華商紗廠的掙扎，愈加顯出世紀末的前途。三月底申新七廠被匯豐銀行強制拍賣，直到現在還沒有正當的救濟辦法。天津碩果僅存的裕元紗廠，因為積欠中外債務五百餘萬元，其

中頂大債權人日本資本準備進行管理該廠，以求坐收債務，所以被迫清理了。現在經委會正在派人調查，準備標價拍賣，這是打開日本債權人合法地兼併民族工業之門罷。事實上這還不是頂嚴重的，更緊要的是日本東洋拓殖公司在中日經濟提攜的熱浪中，打算接辦裕元，華新，北洋，恆源，寶成等五家華廠，假使真的成功了，華北的中國人，就要買不到中國人工廠紡的紗布了。到了最近，停工關廠的形勢，又嚴重起來。上海民生紗廠繼申新二五各廠而停閉，南通大生，常熟利泰，湖北武昌第一諸紗廠都在最近被迫停歇。上海申新永安恆豐諸廠都或明或暗地實行減工，無錫最近通過減工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很顯然的，在救濟的聲浪中，華商紗廠的困難，是絲毫不曾得到實際的裨益。

在另一方面，棉紡業危機愈深刻，新設的救濟方案也愈多；假使這種方案毫無實踐性，而且即使部分的實行了，也絲毫沒有根本的意義，那末，顯然的，這種方案的提出，在客觀上只是阻止大眾瞭解棉紡業危機的最基本的因素，阻止大眾爲了排除這種基本因素而努力奮鬥罷了。

二 紗花價格剪刀差問題

紗花價格剪刀差這個問題，並不包括在上述政府的重要救濟方案裏面。但在華商紗廠方面，認爲這顯然是使自己陷於

恐慌中的原因之一。

假使都以1932年爲100，那末，1934年的紗價大約祇有78，而棉價却和1932年不相上下。表面上看來，紗價是跌落了，它的速度幾乎是直線的，而棉價却幾乎仍能維持原有水準，這自然使華商紗廠在成本上加重，而無利可圖。可是，像華商紗廠所說，去年全年營業額五萬萬元中，原棉價格占三萬七千五百萬元，所以得出一個結論，以爲棉花價格不能跟棉紗價格同比例降落，因此所受的損失，乃是促成華商棉紡業恐慌的基本原因，那就不免是一個方便的結論。

從這個方便的結論引開來，華商紗廠便以爲祇要能夠壓低花價，壓低到除了原料成本之外，民族資本家唾手而可獲得利潤爲止，這樣便可以無所謂恐慌，民族工業萬世基業便得確立。所以在本年一月間，上海28家華商紗廠便要求南京政府取締當地紗布交易所關於棉花的投機，以爲：“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則不然，花紗兩種，同時開拍；棉花一項，專以國棉爲標準，致令投機家得逞其壟斷操縱之手法，花價愈抬愈高，紗價則墜乎在後……是全國紗廠之生命，盡操諸此少數有組織投機家之手……”，補救辦法是：“一面令飭華商紗布交易所，對於花紗兩價之開拍，務須設法保持平衡，如以標準棉花市秤430斤換算20支標準紗價，其製造各項費用（統稅在外），不足45元時，應即停止拍板”（均見6月13日申報）。假使問題的確是

這樣簡單，紗廠生命，的確是操諸少數投機者之手，那末解決的辦法，委實是不難的。可是，假使我們想到，同受棉貴壓迫的日廠，它的營業在恐慌中却正相對地日趨發達，那末，問題就顯然有些尷尬。無錫紗廠呈請取締棉花投機一文中也說：“國產棉花，因此居奇；日商復故抬其價，百般操縱，在原料已屬如此；外商更鉅量拋賣棉紗，使國商紗廠，常受虧折”（1月9日申報）。這就是說，外紗拋賣，使紗價跌落；日商壓迫，人為維持花價，這成爲增大剪刀差嚴重性的重要力量。假使不能制止外貨以及在華外廠產品的傾銷，那末，縱使棉價日賤，日商用競賣來壓低紗價的能力也會愈大；剪刀差的消除還是無望的。很明白的，剪刀差存在固然苦了華商紗廠，剪刀差消除也是解救不了它。民族資本家想避免和帝國主義正面衝突，企圖在投機市場上來解決基本矛盾，那是很少希望的。

近來因金融停滯，銀行或大棉商把所壟斷的大批棉花賤價拋賣，花價日低，使剪刀差度，有縮少的趨勢，可是，這祇是一大批植棉農民更無把握進行其再生產，少數投機棉商受了損失罷了，華商棉廠依舊不能大量購買廉價棉花。反之近來美棉跌落，日廠僅從原料市場上合算起來16支紗能盈餘5元，20支8元，32支25元，42支32——3元（3月23日每日新聞），紗支愈高，獲利愈多；成本愈輕，競爭力愈大。本年日紗內地市場愈形恢復，那是有目共見的。

最後，我們希望指出，半殖民地的民族工業，對於原料問題，更重要的倒是如何保持其能為自己利用。東京朝日新聞竭力鼓吹日本借款給中國，去栽培棉花，因為改良後廉價的中國花，不但能便宜地供給在華日廠，並且可以適應日本各廠的需要，保證其每年五、六億圓棉花輸入的安全。大家知道，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棉產，集中在華北；中國最優良的美種脫脂棉，幾乎全部是華北各省所生產，而現在華北已和平地拱手讓人家“開發”了。民族資本家爲了保持這種原料產地的鬭爭，顯然應該比空嚷着剪刀差來得重要了。

三 華廠遷移內地問題

五全會的救濟方案第四項，要求把全國紗廠的設置地點，分配適當，就是針對着本問題的決議。最近，在濟南所開的紡織學年會，也有同樣的要求。此外，如本年5月6日122期申報經濟專刊上有“棉業網之新設計”一文，把問題說得更詳細；該文作者是申新二廠的主持人，很足以代表民族資本家在社會經濟不景氣中掙扎的目標。加之，年來內地籌設紗廠的消息，紛至沓來；於是，遷廠內地，好似一個重要的出路了。

遷廠論者固然承認“在華外廠之傾軋，外貨之傾銷”，是造成華商棉業困難（祇是困難！）的原因，可是他們以爲“受縛於國際不平等條約，欲解免而不可能”；他們是毫無勇氣打破中

國對帝國主義的隸屬關係的。其次，他們也承認“農村購買力薄弱”之影響，可是他們以為“農村迭經災侵匪患，難返繁榮舊觀”；他們却不願思考到，帝國主義不等價交換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剝削，是使農村購買力萎縮的基本原因；假使不能剷除這種基本原因以恢復農村購買力，那末，遷廠內地，還是貨售無地的。此外，解除華商紗廠技術組織機構的薄弱，也以為是“屬於整個金融及教育問題，非急切所能改善”，他們是這樣不願意直面着這些非“急切所能改善”的社會原因。於是也就只好以為“錠數過於(?)集中，華商同業，不免自相排擠”是華商紗業“困難”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這是“欲解免之，可行之而有效的”，而辦法便是遷廠內地。從問題提出的方式來看，可知道他們是如何規避危機的基本原因之解除，在客觀上，正像陳翰笙先生所說：“這完全是被外國資本壓倒而著著躲避的現象”(交易所週報10期)。

其次，遷廠的具體辦法是：“黃河流域棉產，較長江流域多240餘萬擔；而長江流域之紗錠，則較黃河流域多276餘萬枚，因之，黃河流域必運棉南下，長江流域必製紗北輸，成反射供求，徒增運輸之勞，耗無益之費，衡之經濟原理，自有更張必要。其道在先遷集中機錠於疏落之產棉區，進而按全國衣被數量，就棉區添設新廠，以期紡織工業，能平均發展”(見122期申報經濟專刊)。這是把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均衡性，當作是半殖

民地民族工業危機的原因，希望從純技術的見地來糾正這種傾向，以求民族工業得安圖危局。至於大家巴望政府來主持這個“平衡”，能夠做到，固是實行了一種理想；可是以買辦金融資本和地主為中心的政治機構，就是純從技術上說，也已很難期望它有力量來“統制生產，使之平衡”的了。

遷廠內地的好處，是接近消費區，接近產區，因之市場有保證，成本可減輕。可是這祇是簿記上的利益，而忽略了華商紗廠的沒落，是有其全國性和半殖民地性。無錫漢口廣州天津南通等接近產銷區域的內地紗廠，他們大批倒閉的慘境，是不能忽視其基本原因的。而且，縱使在更僻遠的內地，華商紗廠一時能保持小範圍市場，怎能禁止外商紗廠同樣遷廠來競爭？不見嗎，青島日廠紗錠，今年將達60萬錠了！

遷廠祇是華商紗廠從競爭激烈的通商口岸，內地退却；而客觀的結果，祇是替日本紗廠先肅清深入內地的道路罷了。

四 改良稅則問題

改良稅則，對外是關稅，對內是統稅。前者是爲了保護國內市場，後者是減輕民族工業的負擔。

就保護國內市場說，禁止外資在華開設紗廠，遠較提高關稅禁止外貨傾銷爲更重要。假使兩者不能同時并進，那末，即使關稅能夠允許提高，外國資本反能變本加厲地輸入資本，擴

大在華紗廠，以打擊華商紗廠；1931年提高火柴關稅後，日本資本大批地輸入，開設火柴廠，是個明白的例子。可是，我們退一步說，假使能夠提高關稅，阻止外貨傾銷，於疲憊中的華商紗廠，自然大有幫助。可是，政府收入主要靠海關進口稅，假使把洋紗洋貨棉織品關稅提高，便要影響關稅收入。財政部答覆五中全會救濟方案第二條說：“在茲進口紗布貿易已呈衰落之時，而遽將紗布進口稅，再予提高，誠恐有引起糾紛之虞”（2月8日中央日報）。很明白的，財政部是害怕進口紗布貿易衰落的！其次，中國是沒有自由提高關稅權的。去年7月1日財政部減輕紗布類的關稅，大家都明白多少是受外力之壓迫。最近華商紗廠請求減稅的聲浪又高起來，市上也有重訂關稅的傳說，可是某國大使已在嚴重提出抗議了。我們財部是“誠恐有引起糾紛之虞”的，站在國家立場上來改訂關稅還有希望嗎？

最後，改訂統稅問題，據最近所開紗業救濟會議傳出消息，已交財部籌劃。本來，不公平的統稅制度，並不限於紗稅，全部民族工業之徵收統稅的，都受不平等稅則的毒害，其次，統稅的增加，在年來工業破產中愈益迅速，統稅收入對於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企求減低統稅稅率，是“危害民國”的，財部為五中全會救濟紗業案呈復行政院的文章中說：“至現行棉紗統稅稅率，照現時紗價計算，平均僅及百分之四強，不得謂之過高”。在財部看來，自然不得謂之過高，但在民

族工業者看來，或是在人民看來，自然又不同了！而且改變稅級恐怕在華外廠反對，又會因之“有引起糾紛之虞”，不見得能有實行可能的。

五 出路何處

我們本來還想討論到低利貸款問題，統制生產問題等；可是爲了篇幅，只能扼要地加以論述了。據華商紗廠聯合會本年年會報告書中說：“十年以還，迄未稍蘇；竭力支持，負債日多，每錠債款，多者幾及百元，少亦三十元左右。而利息高昂，尤感困苦，各廠債息高者，達百分之十二，最低者亦在百分之八，九。全國紗廠，平均紡紗所負利息，十支每包約六元，十六支約十元，廿支約十三元，三十二支達十八元，幾占製造成本總額三分之一”。又據棉業統制會計算，華廠較日廠負擔特重者爲利息，華廠每包十五元，日廠僅二元七角。我們試再以申新紗廠爲例，1934年紗布生產較1932年減少，各項費用亦隨着減少，可是利息支出，倒反增加四十餘萬元。紗業亟需金融上的救濟，而現在連高利也難借到款項。自然，華商銀行不是慈善家，他有幾千萬元錢去買賣公債，借款給地方政府，却是不願貸放205萬元來反抗英帝國主義拍賣申新七廠的。華商銀行資本的買辦性，決不是廠家的呈文和政府的命令所能改變的。

至於統制生產，真是談何容易，怎樣的政府來統制呢？多

少的國營事業如何了，政府接管紗業，會不看中福煤礦，招商局等樣嗎？棉業統制會的成績，不是彰人耳目嗎？半殖民國家要用統制工業生產來解救紗業，不會給在華日廠笑落牙嗎？

是的，我們贊成在根本辦法沒有以前，不妨暫就其次；可是我們更願意指出，用頭痛醫頭的辦法，終究是不能代替對症療法的功能的；何況就是治標的救急，還是空谷足音，美人來遲呢！

1935,6,17。上海。

衰落道上的中國火柴業底掙扎

石 西 民

一 火柴業的自救運動

去年十月二十日，中華全國火柴同業聯合會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火柴大王劉鴻生氏，曾經以主席資格說出這樣沉痛的開會辭：

“諸位代表，今天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又得歡聚一堂，實在覺得很欣幸；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火柴業困苦到這般地步，大家見面的時候，除了互敘闊別以外，少不得要有一種‘愁眉相對，如同病相憐’的情緒，兄弟是如此，想諸位的情緒一定也是一樣”。

同時爲了安慰那班苦難的朋友，他接着又這樣積極地說：

“我們在以前已看明白，要救濟中國火柴業，非由政府實施火柴業統制不可。不過火柴業統制雖經本會

迭次呈請政府早日實行，但因此事在中國係屬創舉，所以政府還在慎重考慮。好在政府對於我們的痛苦，已經十分明瞭；政府當局時常對兄弟說：‘既然火柴同業自己能夠開誠合作，政府那有不予扶助之理。’兄弟近來仍在努力進行，非達到目的不止。所以火柴業實施統制一事，據兄弟個人看來，決不至遙遙無期的。這是中國火柴業的一線曙光”。

這是去年十月間的事情，屈指計算，到今日已足足有四個多月了，但是作為火柴業的一線曙光的政府統制，却不能如劉鴻生氏所期望的那樣迅速實現，所以有許多廠家，因為近來營業更是每况愈下幾乎就要斷氣，於是不得不在政府統制這一方案之外另找生路了。今年二月十二日大晚報載：

“……爰經該業會同磋商後，決定請求政府限設新廠，限制產額，並限制銷售區域及價格等各項辦法。同時聯合蘇浙皖鄂四省同業，計通燧，正大，淮上，楚勝，華明，中國，大明，大華等八廠，合併組織大中國火柴公司……據記者探悉，組織該公司之八大廠，僉以總結束後，市面蕭條，設不早日促成八廠聯合之大中國火柴公司，則本年各廠本身，勢必更難維持。”

同月十四日申報又載有蘇浙皖贛鄂湘六省火柴公司聯合救濟辦法四條：一，六省火柴廠實行聯合產銷；二，依社會需要

情形，釐定各廠出產標準；三，劃定銷售區域，彼此不得跌價銷售；四，以經濟方法，減去一切過分消耗。此外各省皆有各自的統制計劃，譬如廣東建設廳曾擬有統制辦法，四條：一，凡開工製造各火柴業，限自佈告日起一個月內，從新登記；二，凡在籌備各廠，亦須於一個月內將購訂機器合約，及建築執照等件，呈繳核明，方准設立；三，自佈告後至民國二十七年底止，在此期內，不准設廠；四，自經此次登記之後，非得主管機關核准，不得任意增加機器。

以上所錄各地火柴業打破難關的活動，就是今年來火柴業危機再度深化的反映，其實去年蘇，浙，皖，湘，鄂，贛，閩七省火柴業也曾發起組織聯合營業所，同年五月間也有以提高市價為目的的火柴售價維持會的組織，現在不過把舊事重提罷了。本文的任務就在探討前述火柴業的種種掙扎，在目前是否能有美滿的前途。為了便於說明起見，我們需要插說一段中國火柴業年來所以日趨衰落的原因。

二 中國火柴業衰落的原因

中國火柴工業的發展，雖然只有幾十年的歷史，但是由於該業所固有的特質——資本有機構成之比較低下，有許多小廠紛紛在大批唯利是圖的小有產者底追逐之下成立。在現階段的經濟恐慌之下牠們盲目地生產着只能屯積而不易脫售的

大量火柴。據今年五月十一日每日新聞所載日人方面的推測，中國現有火柴工廠合計八十八廠，分布於十二省四十三縣。其中資本最大的要算大中華公司，計資金三百六十五萬元；其他一萬元以下約有七廠；一萬元至五六萬元約廿五廠；五萬元至十萬元五廠；十萬元至五十萬元約十二廠；五十萬元至百萬元一廠；所以一般說來，皆在五萬元以下，這些廠家現在都陷於全面的危機之中，這可從兩種現象來看出：第一，就是各廠生產力的降落和火柴價格的慘跌至血本以下。上年度全國各區火柴工廠生產量，僅及原有生產量的六成或七成：民國二十二年全國各統稅區域（除西南數省）合計火柴產量為三九五，七四二箱，銷量三八七，三六五箱，至二十三年產量減至三一七，四七五箱，銷量也減至三一九，五五七箱，至其價格低落的情形，就蘇浙皖一區來說，二十一年份火柴價格，已較二十年份降五元至十餘元不等，二十二年十二月加稅後，火柴價格復較前跌十元，所以現在各廠售價，均已低落到成本之下，虧蝕甚鉅（見二十八期火柴月刊一年來的國產火柴業）。火柴的生產雖然這樣收縮，價格雖然這樣慘跌，但是存貨依然山積，無人問津，因此許多廠家，皆因不堪賠累而宣告停工倒閉，構成火柴業危機底第二指標：一，蘇浙皖區全年停工者有常州上海廠一家；短期停工者有徐州江北廠等九家，最近上海明華，光華二廠已由停工而宣告倒閉；二，魯豫區有青島益豐廠

等十一家全年停工，其它分散各地之廠，計共十六家，幾無不有短期停工情形；三，冀晉察綏區全年停工者有陽曲雙福廠一家，短期停工者有汾陽崑崙廠等六家；四，湘鄂贛區短期停工者有長沙和豐廠一家。此外非統稅區域的廣東，全省有火柴廠十六家，因周轉不靈而倒閉者五家，其餘十一家亦於去臘停工至今尚無復工消息（見三月十五日南甯民國日報）。

上面二點就是今日中國火柴業危機的根本徵象，牠們底構成原因除掉國民經濟的一般衰落，火柴業本身組織的狹小和不健全以外，實在還包含著下列三個重要因素：

第一是帝國主義者的火柴傾銷：在遜清同光年間歐美火柴即已開始輸入中國，往後中國的火柴市場又完全為日本所獨佔，民國二十年一月，南京政府雖將火柴關稅從 7.5% 增加到 40% 使外國火柴的輸入受到相當的打擊；但是因此反更促進了另一禍患，即各國直接輸入資本，利用中國的低廉勞動力，紛紛在華設廠，據最近統計，除東北不計外，在上海有美光廠，青島有達豐燐寸會社，天津有三友燐寸會社等八家，除美光係美商經營外，其餘皆為日人資本，最近日商更積極活動，擬在上海設立十萬元日金的火柴廠。這些外廠因資本雄厚，機械精良，自然能夠征服華廠。二十二年統稅增高後，國產火柴成本更形加重，以致漏稅運華的火柴，有如泉湧，其威脅力量之大，可以從全國火柴聯合會底幾次呼籲之中看出，此

地不需多贅。

第二是國內的層層剝削和各種阻力：國內摧毀火柴業的惡勢力，真是不勝枚舉。今按最重要的來說：（一）捐稅的繁重——譬如廣東火柴統稅加重後，現在每笠火柴（一千二百盒）負擔稅捐四元八毫（原料稅約一元，統稅三元八毫），連同原料成本及工資計算，約須八元餘，而外洋火柴在港澳的價格，每笠不過港銀二元（約合粵幣二元八毫），因此就隨着圖利的奸商，而大量運入，置土貨於死地（見二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此外苛重的統稅也是國產火柴的致命傷，例如南通通燧火柴廠每箱火柴售價只四十元，其中統稅却佔去十八九元，而且還須現款，（四月二日蘇北日報）。（二）國內市場的分割和火柴統稅不統一——舉例來說，譬如去年第三屆中國火柴業代表大會，曾有呈請政府通令制止晉省限制販購外貨，以免妨害外省實業的提案，但是晉省當局爲其本身的利益，却不能任意放棄本省的統制經濟。再如今年五月，河北五家火柴廠聯合呈請中央，痛言二十年初，山東廠商請求減稅，稅署准之而不告鄰省。河北商廠援例呈請，迄未邀准，以國稅之稅率，聽各區自爲主宰，畸輕畸重。夫河北山東之商民，同是中國人民，於國何益，而必借魯以殺冀也，亦是表明地方割據性是如何妨害牠們。

第三是火柴原料的對外依懶：目前各地華商火柴廠所用

的原料，如白楊，椴木，椴木等等，大部皆得求於日本，中國雖然也出產這些原料，但因內地苛捐雜稅及其它阻梗，終不得與洋貨競爭；至於硫磺赤磷等化學原料，就更須仰求於外洋（主要來源也是日本）。這自然是加強外資對中國火柴業的控制，而使其不能發展。

火柴業危機的主要成因如上，中國火柴業危機的能否挽救，無疑地要看我們能否解決上面幾個難題。

三 火柴業能夠得救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按照火柴廠家自己的主張來逐條加以檢討。

第一，政府對於火柴產銷的統制；統制產銷當然是一個好辦法，不過所謂使生產與消費均衡的統制計劃，在原則上就與目下這種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格格不相入的。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年來統制經濟的呼聲，甚囂塵上，而所以未能收得效果者，原因就在生產制度本身是盲目的，無政府的，何況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呢？政府要統制生產，限制產量禁設新廠，但外商有馬關條約的依憑，他們依然可以自由行動，政府勢難干涉，例如廣東省某些貨物勵行統制，其結果反更造成了外商的優越地位。而且帝國主義者還可勾結漢奸，偷運大批火柴入口，以破壞中國的統制。再進一步就它的銷路統制來看，廣東

等省的閉門主義就給你一個極坦白的答覆。所以政府統制遲遲不能實行的原委，決計不能歸於“事屬創舉”四個字，而有它底一定社會關係的根據的。

第二，目下各地“廠商”正在進行的聯合運動：聯合也未始不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好辦法，因為聯合運動一旦完成，多少總能免除一些浪費的競爭，並能相當提高售價。但是這種聯合或合併的自救運動，在現實的殖民地性和封建割據的局面之下，是不易推進的。前面已經說過，中國國產火柴業前年就有七省營業所的醞釀，並且也主張提高售價，那末為什麼到今日還是唱着老調呢？這就是因為外商火柴的壓迫，國內捐稅的阻梗，使其不能如願以償。

總括說來，外商火柴的傾銷，國內市場的分割以及捐稅的繁重，是致中國火柴業於絕境的兩大威力，這兩大威力不能剷除，中國火柴業只有沒落一條道路，然而這對於一般企業家和商人却是不敢解決，不能解決的難題。

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切勿忽視：中國火柴廠商，爲了挽救自己，對於減低勞動者的工資，倒積極推進了。他們運用各種有效的方式，如增高勞動強度，拉長工作時間，來累積他們底利潤，廣州市火柴業同業公會，近向工人提出減資辦法，致勞資間發生糾紛（見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工商日報）。華北北洋等數公司爲停發獎金及積欠工資，先後皆發生罷工或糾紛因，

此我們可以見到：中國火柴企業家也和其他民族資本家同樣，在自救過程中爲保持他們的利潤，對勞動者的生活，是不會顧及的，這對於勞動者的摧殘，雖然是非常有力，可是對於中國火柴業的改進或發展還是無效。事實上目下中國的火柴業，正和其它民族工業舉着同一步伐，奔向沒落的無底的深淵，如何自救，乃我國今日的嚴重問題。

1935, 5, 18。

中國手工業底分析

莫 喬

直到現在，中國許多學者，對於手工業底性質的分析，仍然流行着種種粗率的庸俗見解：或則以為手工生產本身就是一個前資本主義的範疇，是同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相對立，或則承認手工作坊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把家庭手藝工業無差別地當做封建制的生產方式看待。其實手工業或家庭手藝工業“是一個絕對不能以科學解釋的概念，在這概念之中普通包含了所有各種的工業形態：從(自然經濟的)家庭工業與(單純商品生產的)手工業者起，最後至很大的手工作坊內的僱傭工人止”(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這話可以適用於革命以前的俄羅斯，同樣也可以適用於現階段的中國。

一 自然經濟和單純商品生產的手藝工業

一般而論，封建社會底生產方式，可以說是自然經濟，和農業與手工業底結合。但在封建社會底崩潰時期，也就是在資

本主義社會底萌芽時期，手工業一般總是比較農業更早踏入商品生產底階段，脫離當作封建經濟主要基礎的農業而獨立發展起來。在農作商品化已經佔有相當的優勢的中國，手工生產底商品化自然更無問題。所謂自然經濟的手工藝工業，僅僅保留於很狹小的範圍之內，而且是在日漸沒落之中。

這種手藝工業通常是有兩種形態：第一是自然經濟的家庭工業，可以紡織工業為例，民國初年，不論江南江北，農家婦女利用自己底或買來的棉花，用自己底勞力紡成土紗，織成土布，以供自己消費，這還是相當普遍的現象。近來紡紗工作已被大規模的機器生產所侵奪，留下來的織布工作也在轉向商品生產。第二是自然經濟底上門勞動，可以縫紉工業為例。這種僱傭工人同資本主義的僱傭工人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差別；因為前者所生產的仍是使用價值，而後者所生產的乃是交換價值，在中國底農村乃至都市中間，我們簡直沒有方法可以找到手工業者底較正確的統計；但就一般而論，第二種形態的手工業似乎比較第一種的形態遠為普遍，

單純的小商品生產在十九世紀後期的中國就已相當普遍。如在棉織工業之中，“農家從當地購入以副業形式製造成的土線，用家人的勞力以副業形式織成布疋；直接的，或轉入小販之手，銷售於當地或其隣近之市場”（五十年來商業資本在河北鄉村棉織工業中之發展進程中國農村，第一卷第三

期。這種生產方式在交通不便的僻遠鄉村中間至今仍還流行。例如廣西各縣農村中間，織布手工業者往往自己帶着棉布，送到鄰近的市集中去出售。桂林六塘績麻工人也常掛著一球球的麻布，幾百個人排在街道兩旁，等候買主——麻織手工業者。生產者同消費者底直接交換，就在中國鄉村中間也已不是普遍的現象，跟著生產底集中和市場底擴大，商人在交換過程之中逐漸佔有優越地位，結果，他們促成了手工業者底社會性質之本質上的轉變。

二 商業資本支配之下的家庭手藝工業

手工生產品底交換媒介，從零細交易的小販，過渡到大批收買大量運銷的商號，中間非但是有量的差異而且還有質的轉變：這就是手工生產者，失去獨立資格，通過了交換過程而隸屬於商業資本。更進一步家庭手工業者不以出賣生產品的形式，而以出賣勞動力的形式——商人供給原料，收回成品而給與工資——去替商人工作；這種商業資本實際已是變相的工業資本，是從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的一種最普遍的過渡方式。中國城市乃至鄉村中的手工生產，大多是在商業資本底支配之下徐徐發展；這種商業資本非但支配了手工生產品底交換過程，而且進而控制了手工生產品底生產過程。這一轉變過程一般說來是在五十年前就已開始——若干最先進的工業

區域開始於數百年前；但就全國範圍而論，就是海禁開始以後的事情——到大戰前後達到了繁榮的頂點。

關於商業資本控制手工生產的第一種方式，我們可用定縣底土布運銷來做代表。定縣是河北一個很有名的棉織區域，土布生產在民國初年就已非常發達。那裏土布底運銷，主要是由幾十家土布店所包辦。“在本縣無布店時，鄉民常集資合股，買許多布匹，打好包捆，用肩挑或用牲口馱到西北各處販賣；將布賣了，再販藥材皮貨羊毛等回定縣銷售”。城內布莊棉布市場創於前清乾隆三十一年，此後日漸發達。從此每逢大小集日，遠近賣布的農民都到這裏聚集。同時布店也派一二夥友到布莊買布，驗明貨色，講好價錢，就用黃筆將價錢畫在布上。等到交易結束，農民將布送到布店，領取款項。在前清，各業都有行頭專司其事，行頭還有若干經紀，行頭每六十年更換一次，是個可以世襲可以出賣的專業，經紀是由行頭委派，受布店之託去向農民收買布疋。民元以後廢除行頭，經紀也被布店自行僱用的夥友所代替（定縣土布的輸出。1934, 9, 27. 天津大公報）。

從第一種方式到第二種方式，往往經過若干過渡階段；而且彼此更迭，並不直線式地發展。試以高陽棉織工業為例：一般說來，商業資本控制高陽棉織手工業的全部過程，在光緒末年至民國初年之間就已大致完成，細分起來，1904——1906年

間，是“舊布商活動時期”，那時織戶還是各自獨立，原料商和收布商也沒有顯然合併，1907——1911年間，是“原料商活動時期”，那時除原料商底兼營收布之外，又產生了站在原料商人和織戶之間的散機商人。散機商人底身份大多是鄉村中間的地主富農等類，他們代替原料商人組織分散的織戶，利用工資或價格底差額而取得佣金，1912年後由原料商變成的布線莊得完全的支配地位；他們一面消滅舊收布商，一面又消滅比較取新式的散機商人而直接控制織戶（五十年來商業資本在河北鄉村棉織工業中之發展進程）。

此後商人對於手工業者的控制方式也曾幾度變化。民國四五年時盛行着一種“換布制”，即商人用較多的棉紗來換鄉民織成的棉布，但亦有在同量的棉紗之外再給若干現金者。民國五六年後又盛行着一種“織賣制”，商人不用棉紗而用現金來向織戶收買棉布。民國十年以後，“商人顧主制”獲得完全的勝利，商人不用商品交換底方式，而用工資支付底方式來支配織戶。最後一種方式可以說是商業資本發展中的最高階段，也是現階段的家庭手工業底最普遍的方式。如在高陽土布工業區域，民國十八年有布機一萬三千八百架，其中“商人顧主制”的布機占百分之八十弱；到去年春夏之交尚有布機一萬二千六百架，其中“商人顧主制”的布機占百分之九二，“織賣制”的布機只占百分之八而已（高陽土布工業的組織現狀和改革的

建議,1934,1,2天津大公報經濟週刊),

三 資本主義與手工作坊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手工作坊底生產,與其說是由於獨立小生產者底擴大再生產,甯可說是由於商業資本底轉化而為工業資本。根據上述一切,我們已可知道商業資本支配着的,(尤其是“商人雇主制”的)家庭手藝工業變為手工作坊,相差僅祇一步而已。在手工業底發展過程中間的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往往不能劃然分開;它們之間非但存在着各種過渡形態(例如“商人雇主制”)而且往往雜然並呈,把兩者包括在同一企業之中。許多手工作坊主人往往同時是個收貨商人,他們常把生產工作中的某一部份交給家庭手工業者,仍用交換底方式來使手工業者受其支配;並把另一部份生產工作交給手工作坊中的雇傭工人。

如在鬱林(廣西棉織手工業底中心),棉織手藝工業普通是有三種生產方式:1,開設作坊,僱用工人織布,按月或按日支給工資,這是最典型的手工作坊;2,開設機房的僱工,或是自己製造機頭,發給織工,使他們在自己家中織成棉布,交還機房,領取工資;這是工業資本同商業資本的混合;3,開設商店,不發機頭,也不僱用工人祇向零星機戶收買棉布,棉布價格或用貨幣支付或用棉紗支付;這還純粹是由商業資本支配

著的手工生產方式（廣西鬱林手工棉織高機業——中國農業第一卷第六期）。第二種方式非但流行於棉織手工業，同樣也能流行於其它手工生產部門。例如同縣的爆竹工業，捲紙一般是由家庭手工業者負擔，裝藥者為作坊中的僱傭勞動者底工作。又如同省的錫鑛錳鑛等類，礦業公司大都並不僱工採掘而向鄉民收買礦砂；然後僱工提鍊，運銷外岸，這也可以說是工業資本同商業資本底混合形態。

佛山（廣東棉織手工業的中心）比較鬱林更為進步；那裏已有規模很大的新式手工工廠僱傭幾百工人輪流工作，不過就在這裏，“商人雇主制”也仍佔有相當的優勢。每個手工作坊都有許多散機（家庭手工業者）在它們底周圍環繞着；同時也有許多散機除掉家工之外再雇工幾名，它們自身也是一個小規模的手工作坊。這種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業底結合，在更進步的企業中間也還可以看到。如在許多大規模的火柴工廠中間，雖已部份地採用機器，但是糊匣工作一般還是依靠家庭手工業者，強壯男工擔著切桿上藥等類機器工作，青年女工則用手工裝匣打包，老弱婦女留在家裏糊匣。家庭手藝工業所以能在這種資本主義企業中間苟延綫喘，主要的原因是在它能極度剝削工人。糊匣女工每天所得工資常常不夠個人一飽；如果她們晚間工作，工資收入往往不夠抵償火油的消費。然而她們還得格外努力地替廠主工作，因為她就不工作，也非吃飯點燈

不可！工資無論怎樣菲薄，但在她們看來已是分外的收入。

上述一切大多限於棉織工業，這是因為棉織工業在手工業中最佔重要地位；而且它底歷史悠久，最易用來說明手藝工業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生產方式。其它各種手藝工業雖然具體形態千差萬別，但仍可以按照同樣標準劃分階段。不過也有若干手藝工業至今大部還是停留在很幼稚的形態上面；例如縫紉工業，主要乃是自然，經濟的家庭工業或是上門勞動。還有若干手藝工業因從海外流入，一開始就在商業資本乃至工業資本支配之下發展起來；例如花邊工業和針織工業。前者由洋商領導，經過許多中間商人而達家庭手工業者；後者並存著手工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及其混合形態。

最後還要提到行會制的手藝工業（這種手工業者分為店主，工匠，學徒三個階層，依次遞升），這在中國也仍相當普遍，本來，典型的行會制度手工業者中間雖已發生僱傭關係，但仍沒有形成固定階級；所以他們同資本主義的雇主雇工仍有本質上的差別。但在現階段的中國，這種行會制度大多已經發生本質上的轉變；學徒很少能夠升為店主，他們只是一種最落後的僱傭工人。在手工作坊中間，甚至在若干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中間，我們仍然不難找到學徒制度的蹤跡。

* * * *

在商品經濟社會中間，手工生產由於內在的矛盾，不斷地

在向前發展。生產底集中，市場底擴大，這使商業資本逐漸起來控制手工生產，接着再由商業資本轉化而為工業資本，最後一種提供了機器生產底必要條件，於是手工生產遵循着自己運動底法則而跑上沒落的道路。在中國，手工生產還未走盡它底發展道路，機器生產就從海外移植過來。帝國主義廉價商品底侵入，以及國內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底競爭，都使手工生產未老先衰，或用最艱苦的鬥爭方式來苟延殘喘。勞動時間底延長，往往超過生理上的限度。譬如許多布莊（商人顧主）以及布廠（其實只是大規模的手工作坊）主人常用獎勵方法來叫青年女工每天做着十六小時以上的工作。至於勞動報酬底菲薄，有時竟會低到使人不敢相信。如在“換布制度”支配之下，商人往往能用同樣重量的棉紗去換織成的棉布；織工所得，只是靠着漿水底重量而留下來的少許棉紗而已。

這樣艱苦的掙扎仍然不能挽救手工業者沒落的命運。如在高陽棉織區域，1926——1932年間棉布產量驟然從三百萬疋降到一百萬疋；1929——1934年間，布機從33,800架降至12,600架。鬱林許多大規模的棉織手工作坊幾乎全在最近五年之內破產，到今殘存着的大多只是商業資本支配着的家庭手工業者，江蘇南通也是一個著名的棉織工業區域；可是最近三四年間，每年運銷土布竟從八百萬疋降至七十萬疋。向以盜業馳名全國的景德鎮，“近數年來，窯戶由四千而減至一千，工

人由念萬而減至四萬，營業總額由一千四五百萬元而縮至二三百萬元”，這種例子實在舉不勝舉，幾乎可以說是各地各業底普遍現象。待有機會，當再另文詳述。

信用合作事業與中國農村金融

駱耕漠

1. 引言
2. 信用合作社底興起
3. 信用合作社底量的考察
4. 放款與各農民層的關係
5. 利率高低底相對看法
6. 農民銀行基金底徵收與挪用
7. 結語

一 引言

在目前，關於中國農村金融方面，有二樁事實差不多是衆所周知的。第一是高利貸資本繼續加強對勞苦農民的盤剝；這是因爲事實本身太普遍太露骨，使那些意想蒙蔽這種盤剝的人們已經無法掩飾。第二是政府當局以及一般銀行家最近兩三年來，對於信用合作事業的推行；這種事業的推行，是構成他們“復興農村”“救濟農民”這類運動底重要的一環，是爲了

免除或者減輕貧苦農民所受的高利貸剝削，並使涸竭的農村金融復活起來。牠所以在一般人們底觀感之中留有相當影像，主要却是由於發動者底呼聲之過分高漲；因此使一般人們往往不能適如其份地認識牠底實際意義，以及這一事態底發展前途。然而這些問題之合理的解剖，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的改造却是十分必要。

當然，國內已有不少人們注意這些問題，而且也有不少報章雜誌登載闡述這些問題的文字，然而真能指示我們以瞭解事實底真像的實在還是很少。有些甚致還帶來不少事實的倒像，使我們率直的理解平添種種障礙。在現社會之下，一般的信實是不存在的，官場機關或者華洋義賑會，或者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等等機關所提供的關於投資農村，推行信用合作的調查或報告，是不會也不能怎樣觸及問題的癥結。不過現有的材料並不能蒙蔽我們的認識；而且我們也還能從材料的側面步登事實底堂奧。在本文，我們所採取的探討程序，是先說明信用合作社底興起原因，而後從量並從質的方面來觀察牠在農村金融中所佔的地位和所起的影響。

二 信用合作社底興起

在中國，調節（實際上是操縱壟斷）農村金融的一向是當地的商人，地主，富農，以及他們所開設的當押。他們扮演著卜

足露骨的高利貸的姿態，控制着農村金融的整個體系。1924年華洋義賑總會雖以其賑災餘款在河北香河縣創辦中國第一個信用合作社，同時又於次年成立農利股，專門担任此種合作事業的推行；但是第一資金甚少，第二推行範圍亦僅限於河北一省，所以當時信用合作社對於農村金融的調節作用是很有限的。1928年江蘇農民銀行成立，1929年浙省政府與中國農工銀行合作，創設杭州分行。牠們對於農村貸款的經營雖較一般銀行為注意（譬如截至1930年為止，前者已在江蘇完成605個信用合作社）；但是信用合作社這種組織在中國農村金融中起着比較顯著的作用，那還在1932年以後。1931年華洋義賑總會受南京政府之委託，前來皖贛湘三省組織賑災式的互助社與合作社，去年三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添設農村貸款部，同年四月四省農民銀行成立於漢口，這些可以作為信用合作社在中國農村金融中漸漸起着較強作用的指標。下表所列九省是合作事業比較發展的區域，合計合作社數（信用合作占其中70%以上）1933年比1932年激增4,181社，同時有合作社之縣份也增加119縣，就是證明這一事實。

最近二年來主要九省合作社統計表

省 別	合 作 社 數		有 合 作 社 縣 數	
	1932年	1933年	1932年	1933年
江 蘇	1,609	1,897	50	54
浙 江	689	832	32	29
安 徽	16	1,742	5	24
山 東	114	255	32	47
湖 南	8	31	3	7
湖 北	3	117	2	14
江 西	12	335	5	21
河 北	285	1,605	37	61
合 計	2,733	6,864	158	177

註：摘自1934年申報年鑑合作事業篇

合作社——特別是信用合作社這樣崛起，一半是由於政府當局提倡，一半是由於滬上銀行家底資助。然而他們對於合作事業爲什麼到最近一二年來才特別注意？這一問題當然要從同一時期的中國財政和金融兩方面所發生的種種事態之中來探求解答。據說今年四月初浙江財政廳長王激瑩在紀念週上報告浙江財政的山窮水盡，並徵求開發財源的良法的時候，曾經這樣說過：“在從前祇要加稅加捐，省庫還能隨之增多。但是現在却不行了：無論怎樣增名設目，捐稅總是收不起，因爲鄉下老百姓確已變成赤貧如洗”。真的，在浙江各縣常有不能還糧的農民拘押在牢房裏，他們甚至情願坐牢，因爲在外面就是終年勤勞，還是難圖一飽。浙江如此，江蘇如此，其他各

省更不用講。這裏給我們以問題的答案之最重要的提示。政府當局說，推行信用合作社是爲了調劑農村金融，使農民一方面可以避免高利貸的剝削，一方面還可購置農具種子，改進並擴大農耕。對的，這確是事實；但是所有這些都是爲了恢復農民的納稅能力，以挽救當前的財政危機乃至政治危機。此外，國內政治的不安以及農村社會的動盪，也是政府當局着力倡導信用合作社的重要契機。如短短一年之間，安徽增加一千七百多個，江西增加三百多個，湖北增加一百多個合作社，絕對不能說與阻遏赤禍的蔓延無關。再如豫皖鄂贛四省農民銀行的設立，也決不是偶然的湊合。

至於滬上銀行家獨力地或者附隨地投資農村，辦理信用合作社的動因，大體上亦與政府方面相同。同時，我們還得從年來金融動態之內部來理解銀行家投資農村的意義。年來資金大量地壅塞於城市，同時銀行家又瘋狂似地利用這些游資，作公債，標金，外國股票等等投機賣買之競賽，這使他們底另一重人格不得不顛慄起來。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在上海約翰大學演講“內地與上海”，力言投資農村之必要，就是因爲想起游資充斥與公債繁榮都是畸形的虛偽的，而中國農業恐慌之再度深化却是真實的，對於金融總恐慌的爆發具有莫可抗禦的決定力量。肥利固爲銀行家之大慾，但是更要緊的還是自身存在之維護與鞏固。

總結起來，信用合作社忽然蓬勃於最近一二年內，主要是由於財政危機和金融恐慌這兩重威脅，以及由這些威脅所產生出來的政府當局和銀行家底切身的自衛要求。說得更大或更周密一些，則與延續四五年的世界經濟恐慌以及這一恐慌所給與我國國民經濟的巨大打擊自有因果聯系。

三 信用合作社底量的考察

現在我們要繼續檢討：這樣興起的信用合作社在中國農村金融中起了多大作用。

如前所說，政府財政已陷窮境，現以自行撥付巨款推行信用合作事業，無疑地是絕對難能。政府非靠有錢的銀行家不可。銀行家手頭固然有大量的壅塞游資，但是他們也有種種顧忌：他們怕內戰，怕匪亂，怕農民無力償付本息。所以投資農村的事實，是遠落在投資農村的呼聲之後。譬如此種呼聲的主要先驅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今年為首七月中農村貸款總額，一共不過751,741元（見八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所載該行總經理陳光甫之談話）。同時銀行家林康侯也說年來銀行界對內地農村的貸款，一共不過四五百萬元，而內地流向上海來的現銀，每月的入超額差不多總有五六百萬甚至一千多萬。有人說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實是中肯之言。

記得七月四日國府公佈施行儲蓄銀行法的時候，因為該

法第八條規定儲蓄銀行或銀行之辦儲蓄者，應以其存款總額至少五分之一作為農村貸款，於是曾有許多近視者流以為從此以後，農村合作事業可以大大發展。其實，不說別的，單就該法事前招致銀行家底反對，後來遂將草案中的四分之一，並包括有價證券及不動產的押放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明白該法終於只是一紙具文，一定不會促進銀家底貸款農村，而當前的事實告訴我們的亦正如此。

前面所引用的合作社統計表，牠給我們的指示是江蘇等九省，在一年之間增加了四千多個合作社。就數字本身而言，固能說明信用合作社年來已有相當發展；但牠並沒有指出這些信用合作社在原有的農村金融機構中能有多大影響。去年十二月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在江浙陝甘等省舉行全國農民借款來源的調查，其結果有如下表：

全國農民借款來源分析表

種 類	合作社	親友	地主	富農	商家	錢局	其他	總計
現金貸款	1.3%	8.3%	9.0%	45.1%	17.3%	8.9%	10.1%	10 %
糧食借貸	—	10.9	13.6	46.6	11.3	—	17.6	100

註：據該所第二年第四期農情報告，報告縣數為850縣。

這表告訴我們：信用合作社在農村借貸中（且僅限於現金借貸）祇佔有1.3%的地位，農民依然深陷在地主富農和商人

的高利貸盤剝之中。當然，因為信用合作社在中國各省的分佈是有很大的數量上的差異（譬如據1934年份申報年鑑所載，江蘇佔全國合作社27.31%，而陝西僅佔.13%，山西僅佔.04%）前列百分比無疑地祇能代表一般的情勢。不過就是按諸江蘇浙江和河北三省，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中所演的角色也是極不足道，我們且引些現成的記載來說明這一事實：

“先就江蘇省來說：全省社員數為38,280人，全省人口數為34,000,000人，約合千分之一強。若以戶數比較，則江蘇戶口數為6,438,036，就中與合作社有關者佔千份之六弱，即江蘇有千份之六的人口是與合作社有關係的。

“次就浙江而論：浙江社員數為11,909人，人口數為20,643,000人，占萬分之5.7；但就戶數來說，全省共有戶數4,559,540戶，則占千分之2.6，即浙江人口中有千分之2.6與合作社有關。

“更就河北來說：該省社員為25,633人，人口為31,233,000人，和社員數比較，約佔全人口萬分之八；但全省戶數共4,928,695戶，是則合作社員所佔者為千分之五強，即河北全省中有千分之五的人口是與合作社發生關係的”。（見合作月刊五卷一，二期合刊11頁）

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的體系中佔着這樣微渺的地位，在一般人看來是由於合作運動歷史之短促，這當然是有關聯

的；不過我們更應明白：銀行家的裹足不前，實是此種結果之最主要的原因。在這裏還得補說一句的就是信用合作社在地理上的分佈關係。按全國而言，牠們是集中於江浙冀魯和皖贛；按省而言，浙江670個信用合作社，有90個在嘉興，88個在崇德，76個在杭縣，62個在德清（三卷九期中報月刊53頁）再如江蘇共有1897個合作社，丹陽占159，江北的高淳占143，蕭縣佔125，鎮江，江甯，如皋和松江所佔亦皆在80以上。這是表示什麼呢？很簡單，原因就在這些省（贛皖更有特殊情形）和這些縣，多能部份地或全面地具備着這些條件：商業比較發展，社會比較安定，離上海的金融勢力圈比較迫近，比較大量地生產十足商品化的絲或棉。當然，我們不是說前述那些省縣不需要用合理的辦法以謀農村金融之調節；事實上這些省縣的農民是和其他各地一樣，爲着經受不起高利貸者及其他種種剝削而亟待救濟。同時，我們承認在某種情形之下，辦理信用合作先從比較中心的區域入手，而後推及比較偏僻的地方，也是事實所必需的程序。但是銀行家的農村投資所以局限或者集中於前述那些省縣，主要却不是爲了這類關係。爲了明白起見，我們再介紹一段消息罷：不久以前，上海中國金城等六家銀行與經委會棉統會合作，投資陝西。他們對於“關中區之交通便利或水利興辦之各縣”，已相繼放款；但是對於“災情較重，農村破產尤甚之各縣”，倒寥無貸款（請參看九月二十七日

西北文化日報)。這自然因為交通便利，水利興築的地方，更能保證本利的收回。銀行家是矛盾的：他們一面要救濟農民，一面又要獲得利潤；權衡輕重，後者自然比較前者更為重要。這樣無怪信用合作社不會出現於破產特甚的農村中了。

四 放款與各農民層的關係

前節乃就數量來說明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中的作用是非常微小。我們假使再進一步將信用合作社底放款情形分析一下，那末此種微小的程度就更明顯。事實上就是信用合作社比較發展的幾個縣裏，一般貧苦農民的日常金融關係還是難以受到怎樣的影響；真能受到此種新的金融組織底便利的還祇是地主富農。因為一般說來，合作社放款給社員——特別是非社員，十九是要索取抵押品的。這樣沒有餘穀或者房屋田產的貧農和雇農自然借不到錢；僥倖借得到錢，也是少得可憐，而且就是有了一些抵押品，事實上還常常要受鄉村長的支配和操縱。例如綏遠平市官錢局辦理農村貸款，就明白規定：“農民具有相當抵押品而向本局貸款時，須由該村村長，出具保證書，以保證該抵押品之毫無糾葛及其用途之正當”（一月二十五日綏遠民國日報）。其它各省也是這樣。貧農是鄉村中最待救濟的人羣，但是銀行家為了本利全收，只好讓他們留在苦難中。關於這，江蘇農民銀行有一個很妙的統計報告，可以

給我們作較具體較普遍的說明材料。該項統計是說明1922年該行所指導的信用合作社貸款給社員的情形，詳細請看下表：

信用合作社社員向社借款統計表(1)

分 類(單位元)	人 數	百 分 比
未 借	1,822	5.37
20以下	19,945	58.80
25—50	5,203	15.34
51—100	4,710	13.89
101—150	956	2.82
151—200	859	2.53
201—250	299	0.88
251—300	100	0.30
301—350	22	0.06
351—400	3	0.01
合 計	33,919	100.00

驟然看來，這表好像告訴我們江蘇農民銀行所指導的信用合作社是和一般中農貧農大眾發生的關係比較普遍；因為20元以下至50元的小額借款的人數，佔全社員百分之74.14。這樣的論斷，假使單從人數的觀點來說，可以說是適當的。但是研究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中起有多大作用和何種作用。我們就更應注意農民層的不同，即貸給富農的有多少，貸給貧農的又有多少。我們假使根據前表，將所借得的款額推算出來，並求出其百分比與前表之人數百分比相比較，那麼所得結論

就很不同了。

信合作社社員向社借款統計表(2)

借款等級 (單位元)	人 數		借 得 款 額	
	絕對數	百分比	絕對數	百分比
未 借	1,822	5.37	—	—
10	19,945	58.80	199,450	18.20
33	5,204	15.34	171,699	15.60
75	4,710	13.89	353,250	32.20
125	956	2.82	119,500	10.90
175	859	2.53	150,325	13.70
225	299	0.88	67,275	6.14
275	100	0.30	27,500	2.51
325	22	0.06	7,150	0.65
375	3	0.01	1,125	0.10
合 計	33,919	100.00	1,094,274	100.00

註：此種借款等級乃前表首欄各組之中點值，當然祇能指出一個大概情勢。

從這表，我們不難看出：74%借款在50元以下的人只借得33%的貸款，而18%借款在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人却借得56%的貸款。這完全因為前者是中農貧農者羣，而後者大體上則為地主富農者羣(註一)。合作社在什麼人底手中，什麼人能順利地從合作社借得貸款，這些問題是用不着我們再來闡釋了。

說到這裏，我們覺得需要把陳家騏先生底一段話拿來討論一下。他在南開半月刊中國經濟專號所著的論文內，對於

前引江蘇農民銀行的統計，曾有這樣一段話：“信用合作社社員，向社借款，其所借金額，以25元以下者為最多，佔百分之六十六。其借款之在百元以下者，竟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八。其借款額超過二百元者，實微乎其微。可知需要合作社組織之農民，均係中小農人。彼等對於巨額借款，並無需要”。這裏有許多亟待商討的地方：第一問題不在需要與否而在需要能否實現，譬如巨額借款所以微乎其微，全因貧農大眾無法告借。第二若以前列借得款額之百分比來說，需要信用合作社而又能如願以償的還是地主富農。中小農民固然也是需要的，不過他們的失望已給借得款額的百分比證實了。

五 利率高低底相對看法

其實，就算信用合作社在數量上已相當普遍了，同時一般貧苦農民亦能比較順利地借得款額，可是因為此中還有利率關係，是否即是福利，尚待我們繼續討論。

自最近一二年信用合作社相當發展以來，銀行家常有一句自慰而又自豪的口頭禪，那就是他們對於農村中的細微不足道的貸款，其利率比農村中所通行的低了許多；而且他們底放款還間接壓低了農村中的利率，使農民得益不少。前面說過，信用合作社的放款祇佔農村現金借貸1.3%，那末，一般說來，“壓低”一層自是無邊的狂語。事實上就是“較低”一層也

還是見人不見己，見樹不見林的片面宣傳。銀行底農村貸款，其所取利息較低於鄉村中的高利貸，因而在某種情勢之下且能使農民多少得到一點實惠，人們是不會囫圇吞棗似地加以否認的。但是他們那樣擺統地大聲自詡，却不禁使人們想起英國的資本家，在他們的曙光的時代對於騷擾不安的勞動者所說的那些佳話，他們宣說現今勞動者所享受的物質生活，遠非中世紀的農奴所能夢想。他們忘記掉時間，忘記掉社會，他們更忘記掉自己的生活高過過去的封建領主千倍萬倍。和這同樣，中國的銀行家只看見他們的農村貸款所取的利率，比老牌的高利貸低了不少，而將高過於城市中所通行的利率這一點却偷偷地放過。他們自己心底當然明白：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利率上的顯著差異，是他們很好的賺錢機會；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曾用以獲取相當可觀的利益，比起很少一部份的農民所能得到的偶然的實惠來，真有天淵之別。銀行家對於利息的注意，實遠過於合作事業推行之本身。譬如從前上海，中國，金城三銀行與華洋義賑會對各合作社搭成放款的時候，該會所感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其中利率……定來太低，銀行不幹；定得太高，合作社不上算’（合作訊100期2頁），就是很好的明證。

有人或者要說，我們且不管銀行家底利率和城市的利率，銀行家底低利放款，對於農民總是救星，其實這還是有條件的，甚至帶着若干虛偽。銀行貸款給合作社，大概取息月利

一分左右，而合作社貸給農民，因種種手續及經費關係，取息總在月利一分五厘左右，押米放款高至一分六厘，而且還是在極“合理”極“公道”的情形之下方才如此，試問當這一般國民經濟極度衰落的恐慌年頭，月息一分五厘給與一般農民能有幾多好處？不說別的，我們就單以善於經營打算的商人為例吧。在過去開一升布莊或者南貨店，可得紅利三四分，現在就是一分也很難了（尤以內地為然）。那麼善良的農民，其不能藉借款以獲利就更無疑義（註二）何況利率在月息一分五厘以上還是一般常情。例如河南新鄉縣農民借貸處章程第五條明定借貸利率為月息一分五厘之後，其第八條又規定借貸處對農民抵押品應收5%的棧租。浙江於潛縣農民借貸所亦有此種規定。有許多地方更因銀行貸款給合作社，或者合作社貸款給農民所取利息較低於鄉間的高利，就發生一般豪紳包辦轉借的黑幕。誰都知道銀行家投資農村所最需要的是安全，因此在上他們要依傍黨政機關的政治勢力，在下他們要與當地的豪紳結託。這樣，合作社就變成豪紳控制勞苦農民的新武器；放款利息也因經過豪紳的手而間接提高。有位左其濬先生在八月二十二日的鎮江蘇報上，推崇丹陽合作社的優點說：“四鄉農民皆係聚族而居，大多數社員均屬同姓，一旦選舉職員，當選者皆係族中長輩，毫無競選情事。一切決議案件，各社員亦莫不歡然遵守”其實這差不多是普遍各地的情形；所謂長輩十九

就是豪紳。不過這與其說是優點，毋寧說是劣績。不用說，此種黑幕已經相當普遍，使得人們不得不加以注意。例如奉四省農民銀行之命而赴陝西興辦合作社的邱文清先生，曾對當地邊聞社的記者談及這事，他說：“辦理農村合作社亟應注意之事，即為組織問題，若組織不健全，則弊竇叢生。為農民謀利益之機關，可變為剝削農民之機關。故合作社之組織，絕不容土豪劣紳以及社會化的紳士等躡入其間”（七月九日西北文化日報）。杜岩雙先生在其所著浙江之農村金融中，且指出浙江已辦的合作事業底流弊之一，是“鄉之豪強，常假名組織合作社，乃向農民銀行借得低利之借款，用之轉借於鄉民，條件之酷，實罕其匹。此種合作社非特無益於農民，反造成剝削農民之新式工具”。（三卷九號申報月刊53頁）。他如對於合作事業比較嚴密辦理的華洋義賑會，事實上也相當普遍地發生這種流弊，這正說明在出發點上還勉強能夠算為低利的貸款，經過中間種種剝削，結局還是鄉村中的古舊高利。不過在另一方面，信用合作社的低利放款，假使真是低利而有益於農民，那實際得到利益的只是富農和豪紳而已。

六 農民銀行基金底徵收與挪用

我們假使要徹底認識年來信用合作運動對於農村金融之全面的意義，那麼農民銀行基金的徵收及其使用實況，就是一

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關於這點，我們且以江浙和四川三省爲說明範圍。

1932年12月南京政府爲了企圖復興農村經濟狀況，曾令財實交三部擬具設立農民借貸所的辦法，爲來日創辦農民銀行的基礎。不過推行比較有效的還是江浙兩省，而他們（尤其是江蘇）早在1932年以前且已籌辦或者推廣了一番。江蘇農民銀行的成立是在1928年7月，其基金與軍閥孫傳芳有關。因爲1926年，孫傳芳爲了抗禦當時的北伐軍，需款甚急，於是下令江蘇全省各縣徵收田畝附捐，每畝二角。可是軍事的迅速失敗，使他不及用去而且也不及帶去這筆民脂民膏，而這筆款子就做了後來江蘇農民銀行底基金。前述田畝附捐在各縣有徵收完全的，有未開徵的，國府奠都南京以後，江蘇仍令各縣征收，俾可遍設農民分行支行。浙江於十八年六月曾與中國農工銀行合作，成立該行杭州分行，但因調度不能順利，嗣又進行省縣農民銀行之籌辦，方法也是於田賦項下就地丁每兩抵補每石帶徵銀元二角至五角。在四川，軍人劉湘也說農村經濟破產，人民痛苦異常，亟需設立農民銀行以謀救濟，辦法更聰明，是變形地徵收田賦附加——發行農業有獎債券三百萬元，交各縣推銷。但是畢竟四川不及江浙富裕，劉湘底“頭獎引誘政策”終歸無效；因爲一般人民已因捐稅太重，無法爲生了。籌辦農民銀行或者其雛形的農民借貸所，說來是很動聽，是很光

榮，乃為農民着想。因為他們沒有購買種子耕具，因而受高利貸的無情榨取；假使有了農民銀行，他們就可擺脫古舊農村金融機構的桎梏。然而這樣為農民的機關，却要先伸手向農民討取附稅！這正和數月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為了改善人力車夫底牛馬生活，而向他們索取互助費一樣，是十分玄妙，十分離奇！有人或者要說，一般貧苦農民並不是重要的田賦附加的擔負者，但是他們應當記住：正和狡猾的商人會將種種捐稅轉嫁給消費者一樣，貪婪的地主也會將附加禮讓給貧苦農民。假使農民銀行籌辦完成以後，真的為貧苦農民謀福利，那麼擔負一下倒也罷了；然而按着以前各節的分析，這多半是夢想，多半是騙術！而且事實的不幸還不至這些，例如江蘇農民銀行在章程上是規定為農民求幸福；放款以農民所組織的合作社為限；但是放款之軌外發展，依然是無法掩飾。據該行1922年統計，省機關和縣機關的移用挪借，共計亦佔全放款額的23.65%。這種借款在移借的時候，或者也部份地聲言與鄉村建設有關，但其實際沒有不是用於填補省縣財庫的虧缺，所以往往不能按期還清。

江蘇農民銀行放款分析表

	合作社	借聯會	個人	省縣機關	儲押	其他	合計
1931年下期	53.88%	0.93%	12.06%	23.85%	8.21%	1.03%	100%
1932年上期	53.56	5.19	10.66	23.56	6.12	0.92	100

此外縣府官員以及地方豪紳，常常還要將這種血汗的基金擅自挪用，或竟加吞沒。例如“海甯前任縣長何鼎仁，竟將該縣徵存農行股本，擅自挪用”（見一月五日杭州民國日報所載民財建三廳之通令）；“平湖縣長將農行基金私自挪用，其數竟達萬元左右之鉅，而該縣及海鹽兩縣之農行基金徵起款額之賬目亦多不清”（五月二十九日同報）。浙建廳爲了防止此種流弊，曾頒發各縣帶徵農民銀行基金總報告表及月報告表，令各縣填報，但是迄未造送的縣份仍屬不少。在江蘇，尙未徵收或者尙未徵足二角田畝附捐的各縣，對於繼續征收的捐款，積壓挪用的弊竇亦同樣普遍；所以該省財實兩廳曾令各縣組織農行基金清理委員會，以事清理。在挪用公款，侵蝕農民的血汗這一點上，地方豪紳並不後於縣府的官員。譬如浙江浦江縣農民借貸所主持人曹某，竟將該所基金挪作私用；因爲他一方是該縣浦鍾公路的負責董事，而該路因爲營業虧蝕，正需大筆填款，這樣農民的血汗就變成汽車的火油！

七 結語

信用合作社（其他各種合作社也一樣）本身並不是一種社會體制，牠不過是某個階層達到某種目的的一種手段或者政策；因此在社會經濟的改造過程中牠起何種作用，主要全由主持的或者控制的階層來決定。譬如在農奴解放後的帝俄時代，

合作社主要是被新興資產階級用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幫助富農擴大農耕，使整個農村也全在資本這怪物底控制之下。牠絕不像當時的民粹派所說是扶翼貧農的，當然更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可是在1921年所實施的蘇聯新經濟政策之中的合作社，其意義已完全改過；牠是幫助中小農到達國家資本主義的槓桿，因而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橋樑。問題的關鍵就在統率這種合作事業的，在從前是與貧農大眾相對立的資本家地主和富農，而現在則為和貧農站在同一戰線上的無產階級。

中國的信用合作社究竟在什麼人的掌握裏面，我們不難從它所表現的各種事態之中看出，這在前面已經有過詳細的分析。現在我們要補說的，是這種合作事業給與農村金融之綜合的影響。年來滬上銀行家對於內地信用合作社的（此外還有運銷生產等等合作社的）投資，多少是以復與農村為目標的，因而多少也帶有一些資本主義化的趨向。他們希望農村金融相當鬆動之後，一般農產可以恢復前進。他們而且企圖用運銷合作社來統制這些農產品，並透過這樣的統制而直接統制生產過程（註三）。不過中國農村長滿荊棘，銀行家實難邁步前進。社會秩序固甚不安，農業恐慌也太可怕，他們怎樣能大量投資呢？結果資本主義式的改良成份很少很少；他們細微不足道的貸款，往往反而加強了農村高利貸的活躍。不用說，這當然也是銀行資本對於農村統御力加強的另一形式。而且就是在

這些僅有的作用中，我們還要注意帝國主義者底癡惡面目。前述銀行家底希望多少也是帝國主義者底希望。不論是稍稍改良也罷，或是繼續擴大原有古舊的高利貸剝削也罷，牠決計不會讓中國銀行資本獨自發展。除掉美麥借款之一部用以辦理江西的合作事業以外，我們固然還少看見帝國主義者參預此種合作事業的直接表現；但是華商銀行底各種活動，實際上是很難擺脫列強資本的觸手作用。帝國主義者底金融資本常常聯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著銀行資本乃至高利貸資本，使他們受制於自己，而對農民大眾實施普遍的榨取。說到這裏，那末還有誰能高喊年來的信用合作事業是中國農民底福音？

註一：此種劃分當然不能說絕對正確，只能說是大體無誤。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借款，即在一般的農村金融關係中，至多只能部份地隸屬於中農範疇。若就主要還在試辦中的新興信用合作社而言，則此種可能程度當更減少。所以與其如陳家驥先生那樣，將百元至五十元的借款作為中農範疇看待，倒不如歸入富農範圍之更為切合事實。

註二：其實一般貧窮大眾向信用合作社借款根本就不是為了生產，那裏更談得到生利之多寡。他們借錢，總是為了還債和納賦；譬如京市股卷和湯山兩處的借戶，為了還債納賦的佔全借戶百分之四五十。江蘇農民銀行指導下的信用合作社，其放款以還債為原因的竟佔全放款百分之七十二。

註三：假使要說明年來政府當局和銀行家對於投資農村的全運動和全意義，以及帝國主義者如何透過他們的手而加強對中國農村的統制作用，那麼除掉信用合作社檢討外，我們務須同時解剖運銷合作社（尤其是關於棉花方面）的興起和動向；然而只好留待以後的機會了。

中國農村中底高利貸

徐 雪 寒

一般說來，小農生產的落後性和必然伴隨着的貧困，使農民經常地渴望高利貸的救濟；也就是說，非受高利貸底“合理”的榨取不可。在中國，因為半封建生產關係的拗強統治，和經濟上的半殖民地的特質，使高利貸的活動，特別接近於所謂“東方式”。前者是指社會間平均利潤的底缺如，借貸資本利息率的規定，以其超經濟的絕對剝削的限度為限度，而形成所謂高利借貸；後者指金融市場對於帝國主義的倚存性乃至全受壟斷，銀行資本的全部活動領域，始終不曾脫去借貸資本的領域；因之不僅沒有和高利貸資本在本質上的對立，反之，只是方式上有所差異而已。這裏高度的地租使農民不能蓄積，缺乏資本，甚至是經常的飢餓“苛稅勒索軍役兵災的負擔，人禍所造成的天災的經常爆發等等，都造成了農村中高利貸跋扈的前提。

農民的負債，在一方面正是表現農民的貧困，但另一方

面，負債又體現着高利貸資本侵入農民的一定成果。中央農業實驗所曾有調查報告，1933年各區負債的農家，佔農家戶數的百分數，平均達62%，其分區情形如下表：

區域	所包括之省份	有報告之縣數	負債農家佔農家總數之百分數
西北區	察,綏,晉,甘,陝五省	84	68
北方區	晉,冀,魯,豫四省	305	57
中部區	鄂,湘,贛三省	89	62
東部區	蘇,浙,皖三省	107	66
西南區	川,雲,貴三省	90	59
東南區	閩,粵二省	71	60
平均		737	62

西北區負債百分數的特高，顯然和更露骨的軍事勒索，軍閥內戰，以及大旱災的連綿有關；東部區和中部區所謂富裕之鄉，農民負債也達到可驚的高度。以全國平均而論，62%的農戶，它們已成爲高利貸的俘虜。在這裏我們苦於沒有較爲精密的統計，來知道農民中各個不同的階層的負債關係，因爲富農或是地主的負債，在某種場合，反是增強他們經營高利貸事業的機能。佃農以及半自耕農，固然一方面貧困限制了他們的借貸信用，可是正惟他們才是真正高利貸的負債者。這僅以江蘇北部一帶，便可概見。據十月十六日大晚報所載蘇北農村烏瞰一文中說：“在分租制與穀租制中之田租租率，低者達百分之三四十，而高者往往超過百分之七八十，致佃農耕稼所得之報

酬除付租外，所餘無幾，日常生活，即須視借債為生涯。至半自耕農亦以租重，不能未雨綢繆，以事積蓄。偶有意外，如補償天災訴訟及租稅等等損失，或嫁娶死喪等之消費，亦非向地主豪紳作短期之高利貸借款不可”。換句話說，中農尤其是貧農等農民階層，實是農村高利貸的固定的基礎。

從借款利息率上，我們能測定高利貸榨取的高度。中央農業實驗所最近發表了全國二十二省 871 縣借款利率的報告調查，農村借款利率年利二分到三分的占 36.2%，三分至四分的也占 30.3%；四分至五分的占 11.2%，而五分以上反占 12.9%，二分以下一分以上的僅占 9.4%。全年平均利率二分至四分的合起來要占 66.5%。其中甯夏省五分以上年利的，占 57.3%，陝西占 51.0%，中部的河南也占 16%，東部的安徽也有 17.3%。平均數顯然會使高利貸變得較為溫和的。同時上述利率的百分率，據原報告所稱，係僅就調查表中普通利率項下的數字計算而得，實際上農民所能貸得的借貸利率，並不能受普通利率的限制，而這種為社會所公認的普通利率，其高度已是如此，反正是以說明高利貸在農村是如何普遍罷了。

上述全國一般的利率，實際上祇是代表現金借款的利率。能夠借得現金的，多半尚是較能獲取信用的農民，愈是貧苦的農民，他們愈不得不滿足於短期的小額糧食借貸。這種借貸主要是富農或商人的拿手好戲，它的利率的高度，又遠過於現金

借款。這種差異正表示高利貸的特色。而農民又是這種差異的主要犧牲者：

中國六大區二十二省農村兩種主要借貸利率表

區 域	報告 縣數	現 金 借 貸		糧 食 借 貸	
		借 債 家 數	年 利	借 債 家 數	月 利
西北區	96	60.5%	3.9%	48.0%	9.1%
北方區	325	49.7	3.6	38.0	5.0
中部區	86	52.0	2.9	50.7	8.6
東部區	124	64.0	3.2	51.3	7.2
西南區	106	49.0	3.6	47.3	6.8
東南區	113	55.0	2.7	53.0	7.1
平 均	850	56.0	3.4	48.0	7.1

註：根據1934,4,1, 農情報告，原表加以併縮；平均數從原表。各區包括省分同前表，西北區加青海省，東南區加廣西省。

表中各區的數字，已經經過了一度的平均。譬如糧食借貸，在陝西省竟達月利14.9%。甯夏省達11.7%，廣西省達10.9%，而安徽省也有10%。這種驚人的月利率，簡直到處農村都存在。就是從全國的平均數看來，現金借貸年利已達3.4%，糧食借貸月利竟至7.1%，其相差在二倍以上。農民的極度貧困，決定糧食借貸利率的漸趨飛漲，而青黃兩季糧食價格的差度愈大，使高利貸者更有利於採用這種借貸形式。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湖北荆沙日報載稱，荆沙高利貸者不願放貸每元月利一角的現金借款，而盡量採取“拿谷錢”的形式。這種農村破產

中高利貸愈走向更野蠻的剝削形態的趨勢，并非一地的現象。

借貸利率的奇高，和農民負債底普及，這就是全面地顯現着農村中高利貸的雄姿。我們已經簡略地指出高利貸存在的社會根據，是農村中封建生產關係的統治，決不是人的問題。同時這種關係又決定農村中高利貸驕子的社會階層。農民銀行，合作社的貸款，在內容上和舊的高利貸並沒有本質的不同，在比重上又少得可憐，這從下表便可知：

中國六區二十二省農村借款來源表

區 域	報告 縣數	銀行	合作社	典當	錢莊	商店	私 人		
							地主	富農	商人
西北區	89	1.1%	1.5%	3.9%	4.1%	12.8%	20.0%	18.8%	34.0%
北方區	226	4.0	4.4	8.4	11.6	14.1	13.0	17.3	22.1
中部區	88	1.5	3.2	7.4	3.4	12.9	31.2	22.2	18.9
東部區	126	3.2	6.2	13.9	5.6	10.8	25.3	15.6	18.4
西南區	122	1.7	.6	10.3	2.3	8.4	30.9	19.8	25.9
東南區	120	2.6	.1	14.8	4.5	12.8	26.2	16.2	23.8
平 均	—	2.4	2.6	8.8	5.5	13.1	24.2	18.4	25.0

註：1934.11.1，農情報告，加以併縮，平均數從原表，各區包括省份同前表。

從上表看來，商人地主富農乃是農村中的高利貸的經營者。商人所作的比重尤多，這裏可見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糧食賒貸或是預買制等，都是這兩種資本所採取的交互剝削的形態。這在農產物比較高度商品化，技術作物較為佔優

勢的區域，尤爲盛行。通過高利貸形式而造成商業資本不等價交換的超額利得，實際上是雙重的腐蝕。在多種場合，地主和商人是不能分離的一體，但一般說來，商業資本較爲發達的區域，地主對於高利貸的作用較少，反之，則地主每每藉高利貸而逐漸造成土地面積的增大。至於富農，它的經濟地位自然不及上述兩者，在目前農村破產中又有特別的動搖和不安，可是他在農民間優越的經濟地位，正無妨借出耕畜或糧食以高利榨取中農和貧農大眾。在江蘇北部一帶，如贛榆縣盛行放穀制，以雜糧貸給貧農，農忙時以工作抵還；無錫崑山一帶盛行“活買田面”“過耕作息”等典押制度，都是富農經營高利貸的拿手好戲。富農在農村高利借貸中的比重，在甯夏省甚至佔28.6%，僅次於商人；在湖南佔22.7%，江西佔22.4%，湖北佔21.6%僅次於地主，浙江則與商人同佔15.8%。富農在高利貸事業中的作用，實不可忽視。

高利借貸除了利率奇高之外，借款時期的短促和借貸手續的苛刻，兩者同是必然的現象。中國農村中借款時期，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材料，六月至一年者佔64.7%，六月以下佔12.6%，不定期佔11.3%，一年至三年者僅9.3%，三年以上只有2.1%以丹麥專農業合作社借貸時間如45——60年相比，特別顯出中國農村借款的短期性。中國農村借貸的目的，主要是爲了生活的急需。據實業部中央農業倉庫在南京市郊殷巷湯山兩

辦事處對農民貸款用途的統計，般巷有50%之農戶是爲了還債和納糧，名義上購買農具的僅33%，婚喪等不明者佔17%；湯山有43%是還債納糧，19%才算購買農具。可是農民借貸底這種需要，只是一定經濟環境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以農業資本回轉迂緩說，一年以下的貸款，顯然限制他們將借款轉化爲農業資本。也惟有借款主要是短期性的，才能使農戶愈無償付能力，而經常輾轉於高利借貸的掌握之中。至於借款手段即信用方法，有46.3%是抵押信用，33.9%是保證信用，19.8%是個人信用。個人信用實際並非以最需貸款的貧苦農民爲對象，保證信用，也是以有一定財產能充作保證爲前提，而抵押借款中農民便會藉此失去一切。“至地主豪紳高利貸之最終目的，往往在不動產之抵押，可以複利計算方式，使農民初則無力還本，繼則無力償息，三則不能不拱手送抵押品於債主。故農民在初，雖只借得二三十元，而二三年後，則失却值價二三百元之田”（1934年10月17日大晚報）。這是通行在蘇北一帶的情形，也是全國農村中高利貸重重支配下，農民普遍的歸結。

高利貸的存在，是封建生產關係榨取下農民所必需的，同時也由商人地主和富農來滿足這個必需，這在實踐意義上，不是二個問題，而是由一點出發交互促進的二種成果。目下農村加速度破產中，一方面高利貸利率更驚人提高，其榨取愈形露骨；但另一方面農村金融的停滯，農民償付能力的低下，土地價

格的狂跌，使農村中借貸信用緊縮，形成農民高利無處可貸的矛盾現象。於是羣相詬病，舊的高利貸者是促進農村破產的主力，希望銀行資本用較為溫和形式來解救農民；縱然這個過程能勝利地完成，但較低的利息，依然不能改變高利貸的超經濟剝削的本質。

1934, 12, 19。上海

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

駱 耕 漠

一 新趨勢底構成

自從資本主義的商品砲彈粉碎了中國閉關自守的萬里長城以後，中國的農民大眾早已不是自給自足的社會成員了。他們不但要將自己的農產品獻現於市場，以換取生產和生活所必需的工業品，而且自己日常所必需的，同時也是自己所唯一生產的米麥之類，有時也要仰給於市場了。他們一天密切一天地聯結於國內的乃至海外的交換過程，構成無可脫離的世界經濟底一個環節。固然，從某種意義說來，這也是代表着一種前進的過程；但是第一因為這種過程是在資本主義各國推銷其過剩商品，同時又以不等價的交換法則吸收中國的農產品這類條件之下進行，第二國內又有許多封建桎梏使這種商品化的過程不能暢達地推移，中國農民大眾在這蛻變之間所受的痛苦真是萬分深重。他們不但要受社會向前發達的苦，而

且還要經受社會不能邁步前進的苦。

第一，中國的農村經濟還是半封建性的小農經營，僅就數量而言，他們底生產成果是很有限的，對於市場絕對不能採取壟售的形式，這當然替代中間商人安排好了自由盤剝的大好機會。

第二，中國的國民經濟，一般說來，是非常落後，交通組織以及度量衡制皆極不完備，同時上層的政治機構亦極鬆散割裂。所有這些因子，沒有一個不是使農民更隸屬於商人，而一任其操縱壟斷。

第三，中國的農民是世上有名的貧窮，他們往往等不到農產收穫就需將農產預押或預售。就算能夠勉強掙扎而不預押預售，若要多存數月以待善價，那還是絕對難能的事實。貧窮使商人更多榨取農民的機緣。

以上乃是顯而易見且與本文有關的幾點，中國農民在農產運銷過程中陷於如何的絕境，我們已經不難藉之推見一斑了。最近幾年以來，即世界經濟總恐慌給與中國的破壞影響開始表現得特別顯著的那一九三二年以來，中國農民在這方面所遭遇的苦難，不用說更是日深一日。列強底過剩農產品的傾銷，使他們備嘗“豐收成災”的辛酸；而地主商人底禍患轉嫁，則更使他們多受一重“光顧”。真的，他們底“無以為生”。就是那些“賴以為生”的人羣也覺得非加以深切的注意不可了！

最近兩三年來，政府當局救濟農村，銀行鉅子投資農村的呼聲非常高漲。主要可從兩方面來看，一是推行信用合作事業，調節農村金融，一是辦理運銷合作以及農業倉庫，提高農產價格，說來就是爲了解除農民所身受的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底殘酷榨取。關於前者，我們已在前面著文剖解過了；關於後者，因與前述問題直接相關，我們現在就周密地加以檢討。在論述信用合作事業那篇文字中，我們曾經如實地指出信用合作事業特別興盛於最近兩三年內的原因是：

1. 政府當局想藉之復興農村。恢復農村社會秩序和農民底納稅能力，因爲年來農村激急破產，財源已告涸竭，甚至於影響到政權的維護。
2. 銀行鉅子除掉這種安全問題以外，還想透過信用合作事業，襲取着舊式高利貸資本的機能，以博得相當的餘利。

不用說，這兩種原因我們當然也可用來答復運銷合作以及農業倉庫爲什麼蓬勃於最近一二年內。如前所述中國農民在農產運銷過程中是受着中間商人底種種盤剝，日趨赤貧，而年來因農產價格狂跌，進行就更迅速。所以使農產運銷合理化，實是政府當局和銀行鉅子的共同要求。固然，在這種改進農產運銷的事業中，銀行家的確不能獲得像經營公債或者外國股票那樣的肥利。但是原來爲各地中間商人所賺取的餘

益，却部份地竄進了他們底荷包，也是我們不應忘去的。

在這裏，有兩位銀行家底談話值得我們加以徵引，因為牠們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問題之更特殊的部份。一位是中國銀行包頭分行行長鄭相臣先生，他說：

“余前年在包市二次設立辦事處，所抱宗旨專為輔助工商業，繁榮西北。因年來包市商業蕭條，農民破產，其原因雖多，而經濟壓迫，不能發展其事業，却要十居八九。加以本年農產價落，轉運困難，絕少問津。殊不知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余本此宗旨，採取有進無退之精神，凡工商業缺乏基金，不能進展者，余充分接濟之；凡皮毛貨物因無金融幫助，不能維持相當價格者，本行設有押貨棧，盡量調劑之；舊式金融業，一時週轉不靈，決抱同舟相濟之心。”（廿三年一月十三日包頭日報）

從這段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資本比較雄厚，組織比較完備的新式銀行，如何在這恐慌年頭傲然獨步，他們如何緊緊抓住“飢易食，渴易飲”的良機，來替代原有商人辦理皮毛抵押（即農業倉庫之一重要工作）。這與其說是為了“盡量調劑”，毋甯說是為了“趁機牟利”。年來銀行家對於運銷合作或者農業倉庫的感到興趣，這確是一種很好的自白。還有一位是交通銀行經理金國寶先生，他在今年上半年曾應桂省當局之邀約，親赴廣西一行，對於投資該省農村一節，返滬後曾發表如下談

話：

“滬市日來存銀激增，投資乏術。銀行界早有投資農村之心理，惟因缺乏倉庫，故對於抵押農穀，均懷戒心，不敢嘗試。蓋農民之財產，大部爲農產，銀行於放款前，可先將其收得之農產，納入倉庫，待其償還借款時撥出。偶有爲難之處，隨時可將存穀變賣。桂省對於設立倉庫，以作銀行界投資農村之先決條件，業已承認，正在積極計劃中。”
(見中華日報。)

銀行家對於貸款農村是如何審慎，精明，因而也是如何偏狹，在這談話中是畢露無遺了。然而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農業倉庫對於銀行家投資農村之先決條件”的作用，我們可以藉之了解年來農業倉庫，以及運銷合作之興起，是銀行家控制農村的第一步，以備將來再作進一步的控制。

二 新趨勢底現狀

我們在討論信用合作事業的時候，曾經指出牠不能普遍發展的原因，除掉時間短促這種次要的關係以外，主要是財政竭蹶，社會不安，以及銀行家爲着打算本利安全而起的種種顧忌和畏縮。和這完全一樣，年來興起的運銷合作以及農業倉庫也就是因爲這類關係而不能邁步前進。譬如八省市糧食運銷局籌備處雖在蔣委員長訓令之下成立，但因各省市籌款不易

以及其他阻梗，結果終成泡影。財部雖然接着以全國糧食運銷局名義規劃此種事業，並迭派人員赴漢口長沙等地調查糧產情形，但是“不久即將實現”總是我們累月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政治不安，基金無着，實是可以壓倒一切整天價響的呼聲。至於銀行家方面，除掉上海中國兩銀行，以及四省農民和江蘇農民兩個專業銀行，稍有相當資金投放於農業倉庫以及運銷合作事業以外，其他的幾乎就很少顧問。

對於中國農產運銷底這種新趨勢在目下究竟發展到了怎樣程度，我們如果需要一個真確的認識，自然須從農民所組織的運銷合作社和銀行家在重要各地所設立（有些和政府方面合作）的農業倉庫這兩個體系來觀察。有人說運銷合作社比信用合作社容易發展，因為牠不需很多的基金，只要農民將各自的農產收穫集合攏來就可成事，這當然是非常錯誤的說法。固然，從基金的觀點來說，運銷合作社底成立的確較易於信用合作社，但是牠必須取得市場的相當聯繫以及運輸上的各種方便，有時自己還需設有儲藏農產的倉庫，然而這些却不是一定區域內的農民所容易辦到的了。同時銀行家投資運銷合作社，其周轉略較信用合作社方面為遲緩，自然也是前者在發展過程中遠落在後者之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據統計信用與運銷以及其他合作事業，在中國農村中的發展有如下表：

中國合作社按種類分配表(民20——22年)

(見合作月刊六卷一期13——14頁)

類 別	民 20 年		民 21 年		民 22 年	
	社 數	%	社 數	%	社 數	%
信 用	1,379	87.5	2,213	80.1	5,720	82.3
運 銷	15	0.9	36	1.3	61	0.9
生 產	86	5.5	204	7.3	304	4.4
消 費	54	3.4	122	4.4	125	1.8
購 買	32	2.0	54	2.0	129	1.9
其 他	10	0.7	134	4.8	607	8.7
合 計	1,575	100.0	2,763	100.0	6,916	100.0

我們曉得：信用合作社在中國農村的現金借貸中僅占1.3%的地位，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現在從上表我們見到運銷合作社還不及信用合作社的八十分之一，那末拋開其他一切實質不講，牠對於將農民從商業資本的盤剝中解救出來這一工作所能盡的功能，也已很難使人想見其輪廓了。在交通比較方便，市場關係比較密切的江浙一帶，情形亦正如此：在江蘇信用與運銷之社數為1,159和12（廿一年六月統計），在浙江為988和37（廿三年四月統計）；其他內地各省，其情形當更可想像。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各地的信用合作社，因為放款十九皆需抵押，往往也直接地或間接地含有運銷作用，和銀行家所辦理的農業倉庫接受農產押款一樣。雖然，前述結論

還是不會受到若何影響。

其次，我們要說到銀行家所經營的農業倉庫，從前述運銷合作社特別不能發達的原因看來，我們曉得若欲明確估計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主要全賴這類近農業倉庫的測量。因為談得上將農產品用儲藏或抵押的形式集合攏來，越過內地商人和銀行的種種中介關係，而直接運銷於中心市場（姑不論其動因若何），除掉銀行家在各地所經營的農業倉庫以外，實在再無他屬。他們說，他們籌辦這類倉庫是爲了便於農民以及運銷合作社儲藏或抵押（實際十九都是抵押）農產品，以靜待來日的善價，同時也替代他們計劃運銷，免受商人榨取，實際究竟如何，我們且留待後面再說。我們現在要曉得的是農業倉庫底發展現狀。

1. 江蘇農民銀行方面——據該行本年上半載之報告（見一卷五期農行月刊），該行自辦及委託代辦之儲押倉庫計有九十七處，其中自辦者計三十九處，委託當地機關代辦者計三十四處，由合作社或農民教育館代辦者計二十四處，分佈於常州，無錫，蘇州，崑山，丹陽，江陰，常熟，吳江，嘉定，松江。天津，徐州，鹽城，如皋，金壇，溧陽，宜興等二十餘縣，所受儲押之農產品，按數量言之達三十萬石，按價值言之達 1,467,169 元。此外，該行又直接替代農民或合作社辦理農產運銷，在上海南市設重農產運銷總辦事處，並在無錫，鹽城，如皋，徐州，

清江等地分行之內酌設分處，經營此項業務，統計自本年一月至八月該行代理運銷之農產與數額有如下列：

農產種類	數量	金額
米 稻	1,87.石, 1,000斤	12,994.35元
小 麥	395袋, 603包	5,354.62元
豬 隻	197頭	1,302.62元
土 布	163疋	980.90元
除 虫 菊	10磅	8.96元
共 計	——	20,641.45元

2. 上海銀行方面——今年為首七個月內，該行對於各地農業倉庫的貸款，據陳光甫氏談話，可分三方面來看：“A. 江陰，青陽倉庫，儲押者以布匹米麥豆餅雜糧居多，計已貸款45,124元，所屬清江分庫，六月間開始，已貸款8,541元。B. 和橋倉庫，儲押者以食糧居多，計做抵押放款12,252元。C. 南京方面，湖熟抵押放款 114,210元；江甯縣所屬倉庫十處，貸款3,525元；農協會倉庫八處，貸款4,251元；湯山貸款3,442元。”以上貸放各款，共計約二十萬元，佔七月來該行總分行農村貸款全額（約七十餘萬元）27%。此外，八月廿三日報載該行與中國銀行合組湘省農村貸款團，先從八區之一的津市區開始設立倉庫，並謂“現已成立容量約五萬担之區倉庫於津市，容量約二萬担之分倉庫於澧城，新洲，安鄉，新安，容量約五千担之支倉庫於各鄉村。在今年夏季，已由銀團在津市區作生產貸

款22,584元。”

3.其他銀行方面——對於農業倉庫的經營，中國銀行也相當注意，牠在包頭濟南鄭州等地都有運銷農產的組織。該行與上海，交通，金城，浙江興業，四省農行等六家銀行，亦擬投資六十萬元，建築陝省倉庫。按其計劃，設立倉庫的地點，‘除於省府設立大規模之倉庫一所外，並擬於潼關，大荔，三原，乾源，鳳翔，洛川，虜施，綏德，榆林，商縣，安康，南鄭各地，亦多設立倉庫一處。其他如各縣重大之市鎮，分設鄉倉鎮倉以資聯絡。’（八月三十日中華日報）九月廿四日西北文化日報曾謂交通銀行西安分行，“除營業外並辦理運銷等事業，故該行積極在潼關籌設打包廠，浙江興業銀行鄭州堆棧，亦於七月間派員來陝，擬在西安，渭南，潼關等地籌設分棧，專辦棉花打包及運銷事宜。”此外，如皖北鳳陽的產菸的區域，安慶附近樅陽鎮的米市區域，以及浙江嘉興蘭谿等地，皆有農業倉庫之設，而且也都是就地銀行的投資之下成立。

在目下要全面地知道中國有多少銀行並用怎樣的資力來經營農業倉庫，這些農業倉庫又如何地分佈於各省各地，實是零星的材料和統計所難允許的。前列三項當然非常殘缺，譬如農業倉庫亦略具踪跡的魯豫皖鄂贛浙各省，根本就不會提到，不過我們所最希望認識的一點，即農業倉庫在中國農產運銷過程中佔據着怎樣的地位，在前列各項記述中已經表現得很

明白了。江蘇的農業倉庫，因為得到該省農民銀行以及上海銀行底比較積極的經營，同時不論在政治上或交通上所享受的機會也比他處為佳，然而六七個月內所承受的儲押放款不過一百六十餘萬。此外，江蘇農行替代農民或合作社運銷農產的數額（八個月中），一共也不過二萬餘元。其他各省的情形，不用說，自然更較江蘇為低劣。陝湘兩省方面的計劃固極堂皇，奈何政治不甯，社會經濟又日趨破產，實現真是茫茫。但是有一點也是我們應加注意的，就是農業倉庫雖然也和運銷合作社差不多，對於農村經濟所發生的關係或影響，更比信用合作社為鬆懈有限，但是就某一特定區域或特種農產說來，農業倉庫（以及在牠控制或扶翼之下的運銷合作社）在運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確是不容忽視的，這在年來各地棉花底產銷實況中特別表現得明白，本文下節就是要說明這點。

三 新趨勢底重心

棉花這種作物，從經濟的意義說來，是十足的工業原料品，因而也是十足商品化的農產，這是一面。第二，中國的黃河流域即冀魯豫陝各省，是天賦獨厚的棉產區域，蘇皖湘鄂亦宜於棉花的栽培；而且目下因為受着國內市場（中國稍稍夠得上稱為民族工業總要首推棉織業）的刺激，同時又受着日本帝國主義底收買和操縱，這些天然資源也相當地利用了一部份。

而這兩個條件就使棉花這種農產品成爲前述新趨勢的主要對象和重心。我們曉得：以農民所組織的運銷合作社，尤其是以銀行家所經營的農業倉庫爲基礎的中國農產運銷的新趨勢，其發展（拋開其他政治等等關係而不論）是和農產品對於市場的隸屬關係相聯繫；所以年來銀行家經營農業倉庫以及對於運銷合作社的注意，其範圍專局限於幾個棉產區域就是一個必然的成果了。他們對於這一方面的活動，往往還從運銷過程而伸展到生產過程，他們一方面將渙散的棉農變成產銷合作社底成員，以便接受播種他們所希求的美棉棉種，一面又以軋花機，打包廠，倉庫等等設備來加工並儲押這類棉產收穫，而集合地運銷於市場。他們互用着這類形式，綜合起來就可收到很大的成效。江蘇農民銀行爲了經營此種業務，本年爲首六月來曾派員投資嘉定，鹽城，阜甯，如皋等地創立棉花產銷合作社，貸放棉種和押款。在嘉定各鄉鎮內成立的產銷合作社計有十七所，社員達三百餘人，即將成立的還有五所。爲了發展產銷效能，牠們之上更有棉聯社的設置。鹽城和阜甯的棉產區域也有產銷社的籌備，同時爲了辦理儲押運銷等等業務，還計劃設立臨時倉庫。江陰常熟南通三縣接境的常陰沙一帶，是江蘇的主要棉產區域，該行將該區全境劃分爲三部份，各成立聯合社一所，現經正式承認的產銷合作社，計常熟縣境七社，共社員119人，棉田1,154畝；南通縣境五社，共社員124，棉田2,167

畝；江陰縣境五社，共社員114人，棉田1,160畝。（以上江蘇棉花產銷情形見前引農行月刊）

在山東，棉花產銷合作社的發展則更形迅速，譬如該省的著名棉產區域齊東，據九月九日中華日報所載，業已組織美棉產銷合作社聯合會辦事處一處，美棉產銷合作社153處，共計社員898人（此數或太小，待查明改正），棉田33,681畝（此數或太大，亦待查明改正）共向中國銀行借款62,440元。這些合作社都是本年二月後開始組織成立，據三卷一，二，三期合作月刊（山東合作學會刊行）所載，自二月廿一日至三月一日成立71社，至同月十四日又增為139社，真可謂飛躍的發展，再如該省鄒平縣的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亦在積極發展之中：

梁鄒美棉產銷合作社發展比較表

項 別	民 21 年	民 22 年	22 年 比 21 年 增 加	
			數 目	%
社 數	15	20	5	25
社員人數	219	306	87	40
包括村數	15	35	20	125
棉田面積	667畝	3,464畝	2,797畝	419
放款額數	3,583元	24,123元	20,545元	678
運銷額數	6,762斤	89,495斤	82,724斤	1224

註：本表見前引合作月刊18頁，運銷額之斤數僅指改良美棉之花衣而言。

濟南中國銀行分行對於該社業務亦是非常注意，譬如該行襄理陳雋人曾於去年九月十六日蒞鄒，和該社主席郭俊榮

氏締結借款合同，次日起即開始貸款，截至十月十日止，共計貸款九次，都24,178元。

在開發西北的呼聲之下，陝西的棉產差不多是政府當局以及一部份銀行家所最注意的目標之一了。上海中國金城等六家銀行和那兒的棉產改進所，對於各區的棉花產銷可謂非常關心。九月十日的河南民報，載稱陝省棉產改進所對於該所指導下的棉花產銷合作社力求改進，甫經數月，其棉田面積及社員人數即增十餘倍之多，今根據該報所載，列表於下：

陝省棉產改進所指導下棉花產銷合作社概況表

區 別	社 員 人 數	耕 地 畝 數	棉 田 畝 數
永樂區	3,059	135,600	62,516
斗門區	227	102,400	45,345
廣陽區	1,100	43,350	14,450
魯橋區	412	182,062	64,801
中西區	1,126	35,109	12,662
中東區	1,433	18,744	5,790
新市區	468	16,800	10,750
固市區	498	16,543	6,530
櫟陽區	644	37,100	11,320
下廟區	922	缺	6,830
高橋區	1,066	21,000	10,568
未央區	845	201,967	6,750
交雨區	372	22,043	9,679
合 計	12,132	792,718	267,991

至於銀行貸款情形，按照上半年陝省棉產改進所和前述六行銀團所許的合同看來，可截分爲三種：1. 生產貸款，專供種子肥料人工等生產用途，以五萬元爲限；2. 軋花打包等設備貸款，以二萬元爲限；3. 運銷貸款，以二十萬元爲限。九月廿二日上海各報載稱該項合同簽訂後，銀團即首先撥付棉苗借款三十萬元，則比所規定又大了許多。同時，各報又謂新花登場以後，銀團又撥款一百五十萬元，交與棉產改進所辦理新花運銷，並視運銷蓄押之需要，還可臨時增加。

此外，豫鄂湘各棉產區域底棉花產銷，也一樣在銀行資本的經營之下。譬如河南，在該省棉產改進所指導之下現已組織成立的棉花產銷合作社，計有太康縣四社，杞縣洛陽靈寶各一社，社員共達四千二百餘人；而該所爲了各社業務之推進，又向上海銀團接洽借款，截至十月底止已有108,500元。在洛陽鄭州等地，我們曉得中國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均有軋花機打包廠倉庫等等設備，對於該省乃至陝西的棉產運銷，無疑地都具有很大的作用。

以上不過將銀行家對於農業倉庫的經營以及運銷合作社的推進，在棉產方面才具有比較顯著的影響的情形，說得一個大概而已。這種活躍的現象，其意義是很複雜的，我們務須極錯綜地來下觀察。一般說來，調節農產的流通過程而使其合理化，甚至直接地或透過這類流通過程來改進農業的經營，原是

銀行資本企圖朝向金融資本的時候所必有的要求。關於這一點，中國的銀行家在目下棉花這種作物的產銷行程中，的確有了一些成就，是我們所不應看落的。但是我們更不要忘記，國內的政治不安，民族工業之本質的萎縮——這類使前述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根本不能長足進展的諸要素，總是使銀行家只願滯留在棉產的運銷階段上，而且還是迷戀着在落後的腐蝕的商業資本的形態。不錯，在某種場合，他們確是用比較好況的市價收買各地的棉花，這是他們所唯一宣說的給與農民的唯一恩惠。其實，他們是在利用他們底雄厚資力，囊括棉產以完成原料品的獨占，使獨占的超然肥利可以馴服地滾進他們的荷包。據說今年最近一二月來，銀行家已將登場的新花搜羅淨盡，他們在內地各分支行底堆棧或者農倉裏面已經塞滿了新花，津滬的紗廠因為架禦不過他們這種雄健的操縱，都只好準備閉廠收場。在過去，中國的銀行資本有十足的買辦機能，替代列強向內地收買他們所需要的農產原料品，到現在當然也不能全般兩樣。而且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打擊中國的民族的紡織業，不但用廉價傾銷其棉紗，而且用高價收買中國內地的棉花，使我國紡織業陷於不可超脫的原料與製成品的剪刀差的厄運中。這不是故作危言，在華北在天津在漢口，我們是看見日本公然地或喬粧地幹這種多頭買賣。他們也一樣需要棉花產銷合作社這類組織。所以從整個國民經濟的觀點看，

年來興起的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比較發展得深廣的一隅，實際上是一把利刃，至少也是一杯毒酒，對於農民不會是可羨的福音。

四 新趨勢底評價

我們對於棉花產銷底新趨勢的這種評價，大體上也可適用於年來中國農產運銷底新趨勢的全部。現在我們更一般地更具體地來評價這整個新趨勢，以了結本文的檢討工作：

第一，從新趨勢底構成來說，牠是絲毫不曾觸及問題的核心。中國農民大衆年來在農產運銷過程特別遭受農產價格狂跌以及中間商人底盤剝的慘苦，是和國內外的經濟機構以及恐慌深化相聯繫。因為決計不是離開生產基礎的改造所能挽救。譬如無錫各鄉代理農倉，因經營農產儲押而貸放出去的款額22年比21年反減少60,077.24元；即從121,366.10元減至61,288.81元。（見八卷三期中行月刊193頁）。

至於減少的原因則係：前年農民在新穀登場出貨見湧時，因市價低賤，樂與農倉做抵押，以希春季米價逐步高漲，回贖時盼望稍沾利益，如屬自家吃糧，亦可免“賣賤買貴”。但屆時適得其反，回贖時米價愈形見跌，農民大失所望。以致去年新穀登場，米價更賤，農民都不願做抵押款，均皆紛紛出售。農倉儲押是否是解救農民之道，我們姑置不論；在這里我們要

注意的是：離開生產制度的改善，大眾購買力的提高，單從流通過程來增進農產價格，使農民稍減痛苦，結果是怎樣渺茫的一回事。說到商人剝削的解除，情勢亦完全一樣，在交換經濟存在的一日，假使沒有很周密的很彈性的新的經濟體系來加以調劑，要想擊退商人盤剝之活躍是絕對不可能的。在目下中國這種半封建性的小農經營條件之下，侵蝕的商業資本正有其根深蒂固的地盤，掃除自非易事。就拿目前銀行資本經營農產運銷而論，本質上也正是代表着商業資本化的過程而已。形式的稍稍不同，是隱藏不了實質的一致。

第二，我們且退一步地將這種根本的實質問題以及第二節所述的新趨勢的停滯狀態攔開不論，而僅來討論這些有限的農業倉庫或者運銷合作社，在實際業務上所發生的機能。誰都知道，要能夠利用農業倉庫或者銀行堆棧的低利儲押放款，以及享受運銷合作社在集約運銷上的種種利便，首先要有剩餘的農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這些農產並不急乎待售。銀行家說，他們底低利的儲押放款以及代理運銷的種種設備如何有利於農民，如何使農民能夠不因眼前需款的孔亟而去接受當前的低落市價；但是他們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就是大部份的中國農民，都是受着繁重的債務和租稅底壓迫，往往在農產尚未收割以前就以青苗的形式抵賣出去了，有的甚至一無可賣。所以像秋收儲押後以待明春高價這類期望，除掉優

裕的富農和地主以外，就是連構想一下也是很困難的了。有一位浙江省地方自治專修學校的學生，在杭縣附近的一個名叫橫畝橋的區域裏工作，曾經提出這樣的疑問：“講到在這地方貸款嗎？前已言，這地方共有三十幾家，多數是無產者，所以要以不動產抵押貸款嗎？根本無產可抵，事實上是不可能；或曰農民所生產的米穀可行動產抵押放款，經營儲藏合作，設立農業倉庫嗎？但是所有米糧，至多祇能供給一年的糧食，還要繳租，所以也是行不通；或者行信用放款嗎？然自治組織的方式，以一戶來担保五家，那末三十五家只要七個人來保證就可以了，但是這地方是普遍的窮，不是一家二家的窮，質言之，被保人固窮，保人根本也沒有財產上的信用能力，故以信用放款嗎？誰也不敢保證可行而無危險。”（浙江合作半月刊第十二期5—（頁））這個例子固然比較極端，但是所謂兩極化日益尖銳的中國農村，實是非常迫近這個例子了。因此，譬如無錫，前述二十二年各鄉農倉之儲押放款比二十一年減少六萬餘元的第二個主要原因，就是該縣“蠶桑為農民之唯一副業，每屆繭市，多藉此款以換會錢。但連年絲業之失敗，繭價之不起，農民暗苦已深，去年收繭更失所望。故新穀登場，農民之押米觀念，於需用孔亟，眼前尚難顧及，不願儲待明春。”（見前引中行月刊）從這些現實的條件之中，我們可以見到真能得到農產運銷的新趨勢之區區利便的，只不過富農者羣罷了。而且銀行家對於農產

運銷的經營，差不多含有強制性質，譬如棉花，他們一面貸放棉種肥料等等給產銷合作社或農民，因而後者就必需將收穫起的棉花售與或押給前者，以清償其債務。接着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替代合作社或農民軋花打包，因而棉花的運銷市場就全權地落在他們手裏，以便他們從售價中扣出他們的貸款和佣錢。上海等六家銀行對於陝西方面的棉花貸款就是實踐着這樣的程序，不用說，從表面的形態看來，當然要比舊式的商業資本稍稍合理一點。

第三，最後我們要提一提參預農產運銷新趨勢之人的問題。根據第二項所分析的經濟關係，能夠參預樂於參預運銷合作社的主要只有富農，而且因為可憑合作社組織轉向銀行界接洽運銷借款，豪紳地主常常混雜其間，實行操縱之能事，各地商人也往往改頭換面利用此種組織。舉例言之，譬如“浙江蕭山縣之東鄉，有一蠶絲合作社，該社之社員頗為複雜，包括農工商學政各界人士，在少數人操縱之下，此社捨其本旨，起而廣收蠶繭，作絲繭投機事業。收買之區域，恆逾出該社應有之範圍。除向農民收購蠶繭外，並強迫農民入社，由繭價內扣去若干以為其股金。復以購得之繭，運至上海以投機之方式躉售。不幸投機失敗，損失竟達數十萬元，其中十萬元係農工銀行杭州分行之貸款。”（合作月刊三卷六期第一頁）此種比較極端的事實，祇要略加修改，自能適用於其他各地。在運銷合作

社裏面，地主豪紳以及富農直接或間接地支配其他社員的情形，決計不會限於浙江的蕭山。去年下半年上海銀行貸款部負責人鄒秉文親至豫鄂湘陝一帶視察，據說陝西永樂縣的棉花運銷合作社辦得極有成績，爲其生平所未見過。這自然和他所報告的該社主持者“李海峯部下有三名，一即社經理王鳳閣，一爲趙姓，一爲李姓，均係商人，趙姓現辦合作商店”直接有關。他們自然能夠極精明地極新穎地運用各種利誘方法，吸收棉農入社，以收把持漁利之實效。（鄒氏報告見五卷十一期海光）

說到這裏，年來農產運銷的新趨勢，其新的意義究竟怎樣，可說是完全明白了。有位趙國鴻先生，他在一卷四期的農行月刊上區別着江蘇農行所經營的倉庫和普通堆棧，是這樣的寫着：農行倉庫與普通商業銀行所辦堆棧之異點乃在“一則以農戶爲營業對象，一則以行商爲營業對象；一則於儲後穀價上漲，利益尙爲農戶所享，一則利益已入行商之手。”爲了救濟農民（實際上是爲了爭取商業利益），我們想普通商業銀行家一定會站起湊着說：“我們底堆棧現在變換營業方式，直接向農民或者合作社辦理農產儲押和運銷了”。但是我們所應注意的是：“倉庫以農戶爲營業對象，”是銀行家企圖排斥舊有的商業資本，更直接地來操縱農產的流通過程；“利益尙爲農戶所享”只有對很小一部份富農是稍稍現實的，而在其反面銀行

家是更肥了。在銀行資本作商業資本化的過程中，中國的農民大眾是得不到任何福利的！

徵工和工賑

羅 瓊

封建性的徭役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向佔重要的地位，如在唐代初年，政府強迫人民提供勞役，“用人之力，歲二十日”直到清代初年，“賦出於地，役出於丁”這種傳統的賦稅原則，還深深地保留在“地丁”這一名稱中間。至於兵役和興建巨大工程的臨時征工，在歷代的詩歌傳奇中更有淋漓盡致的描寫。例如長城和運河的建築和開鑿，所征民工動輒數十萬人。因此喪生者也常以萬計。民元以後，這種封建性的徭役制度在原則上已無存在餘地；但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半封建性不能消滅，因此徭役制度的殘跡——例如戰時的拉夫和平時的征工——依然存留下來。尤其是在最近兩年，這種古老陳舊的徭役制度又披上了一套新的外衣，從新大搖大擺地跑上中國舞台。

徭役制度所以能復活於今日的中國，除掉政治上經濟上的半封建性這一基本原因之外，最近又受兩方面的刺激：第一是由於軍事上政治上的迫切要求，如努力進行着的“交通建

設”乃至“水利建設”等等，主管機關無力支撥巨款，負擔此項建設工作，於是不得不在“國民服役”的名義之下，招募大批民衆，供給義務勞動。第二，去年暴發的水旱災荒，因為國庫空虛，一時難於另巨撥款來從事救濟，只得在“以工代賑”的口號之下，進行其一舉兩得的征工政策。

爲着明晰地揭開中國最近征工和工賑的真面目，我們分作三點來敘述：

一 徵工實況

近幾年來，在所謂新的建設之中，沒有一件不與徵工有關，特別顯著的是公路，水利，乃至飛機場和碉堡的建築。

A. 公路方面：試看目下全國公路建築中的三大系統（西北公路，七省公路和西南公路），那一個系統不是靠着徵工而完成其計劃。這裏雖然找不到精確的數字，以表示徵工的確實情形，不過看了各省陸續公佈的徵工辦法，已可窺見一斑。

首先，全國經委會所擬定的西北公路計劃，是以徵工趕築爲其通盤辦法，而且已由陝西省政府通令各縣遵照辦理；正在建築中的西蘭西漢兩路，就是由各縣的徵工在那兒興築（1934, 12, 3, 西北日報）。

其次，七省公路計劃也由全國經委會主持，與各省政府合作進行。去年各省政府如江西，浙江，湖北，江蘇等，均已先後

公佈徵工條例，完全採用徵工政策。

最後，西南公路，也是徵工修築。根據廣西道路局所公佈的征用民工的條例，廣西全省公路建築，完全交付在這些徵工們的肩上（1934，11，16 南甯日報）。

B. 水利方面：年來水利建設，雖然並沒有公路那樣普遍，但是徵工政策，却也同樣積極地推行。例如江西十縣疏濬撫河，徵調民工，多至七萬。作為南京政府水利建設之一大項目的導淮事業，躊躇幾年，現在也因採用徵工政策而得實行開工。按照水利專家所定“征工方案”，各縣應徵民夫，多至165,000人（23年1月至7月，疏濬六塘河的五萬工人也不算在內），淤塞已經33年的山東北運河，在去年四月呈准省府，開始浚修，先後徵工，竟達二十餘萬人，這些多是最顯著的例子。

除掉上述公路水利以外，其它如適應軍事需要的飛機場和碉堡的建築，也無不採用民工，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實。用不着再來舉例證明了。

二 民工生活

對這大批的被徵者，單就妨礙農事一點而論，已經很夠使他們的家庭經濟受到重大威脅，何況工作期間的生活情形，又是異常惡劣，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工作，甚至還得奔到十多里路以外去受驅使，而所得到的工資還是不夠一飽。試看西北公

路建築，“徵工工資，以土方計算，每公方自六分至一角”(1934, 12, 3西北日報)；“徵工導淮，原定不給工資，工伙每挑土一公方，津貼伙食八分”(1934, 12, 11申報)；“疏浚六河塘，所有工伙，由省府給與伙食津貼，每公方洋五分”(1934, 12, 9 大公報)；導淮“工程處給工資，每公方八分，每人每日挑土約一公方有零”(1934, 12, 9申報)。根據這些記載，一天勤苦地工作，至多亦只能得到工資一角右左。可是“調查工伙領食，每日非兩角不飽”(1934, 12, 29大晚報)。更有趣味的是贛省築路，不願做工者得繳款代工，每公方却以五角計算(1934, 11, 22大晚報)；這裏可以看到他們計算方法是如何巧妙！

這樣看來，即使工資能夠完全到手，還得枵腹從公，何況那些微不足道的工資，還不能全部用在充飢的食料上面。因為按照一般情形，“工作工具，能以日常農具充用者，應由工人自備，如需由工務處代購，其費用仍須於應領工資內扣除之”(1934, 12, 3西北日報)。如果缺乏工具而向人借用，又得負擔一筆租金；這租金自然帶着多量的勒索意味，往往構成工頭監工們的一筆額外收入。

民工如果跑到遠方去應征，那末領食之外，還要碰到住宿難題。短期的工作者，往往借破廟或簷下作安身之所；江陰的河工，就是一例。比較長期的工作，例如導淮的民工，根據全國經會規定：“被徵民工，如需往棚及炊具，得由本會先行發給，

惟仍須於應領工資內扣還”(1934, 12, 3, 西北日報) 這樣他們些微的工資, 又得多受一重剝削, 究竟還有多少餘剩, 那就不難想像的了。

而且實際上能夠得到這種不足飽腹的工資還是萬幸; 因為有許多地方, 往往因“籌款困難, 附加田賦, 礙於命令”, 而責令鄉長村長一面徵工, 一面派款; 派款不足, 就以工資抵銷, 或竟老老實實不發工資, 這在全國各處, 都已成為極平常的事情。

工伙們受到這樣的恩遇, 做這種胼手胝足的苦工, 不要說贍養家庭, 就是連自己的生活亦難維持, 這就是當前的“新建設”賜予他們的惟一的利益!

三 工賑

這種封建徭役式的徵工, 過去雖然次第推行, 而其推行的理由, 除掉節省經費以外, 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冠冕的招牌。所以安徽建築馬華堤, 而該省建設廳長因省庫支絀, 呈請省府, 內謂“祇有儘用民力担任一部份工程, 以代攤款, 舍此別無他法”(1934, 2, 19, 皖北日報) 的時候, 以及雲南建設廳長聲稱“徵工辦法, 實屬不得已而爲之舉”的時候, 他們還老老實實的告白他的困難和不便, 而沒有任何藉口。但自蔣委員長明令各省省府, “內稱訓政時期約法第二章第廿六條本已規定人民有依法服工義務, 各該省人民, 凡已屆成年者每年至少須服役三

日”，這樣，徵工就由前述“不得已”的窘狀之中，一躍而為最神聖的國民義務了。

去年普遍全國的災荒，更使徵工除掉上述法律保障之外，又戴上一副慈善的面具。成千成萬的災民，都是嗷嗷待哺，政府當局自然不能充耳不聞；但是救濟災民，又怕養成他們“懶惰”習慣，（實際上是恐怕錯過了剝削的機會）；因此就把救災工作和剛剛得到法律根據的徵工配合起來。這就是最近甚囂塵上的成為三大救災方式（行政院擬定各省賑災辦法，分農賑工賑急賑）之一的工賑。

最近江，浙，皖，鄂，魯等省，都先後公布工賑全部計劃，（其工作方向大都重於河道浚疏），但是在這經費支絀的現狀之下，這種計劃對於災民救濟究有如何效果，那就大可懷疑。這不難從該項計劃在起草或實行之際，就當即發生“縮小計劃”的事態之中見到。譬如湖北“工賑縣區，原定每月经費18,000元，因無鉅款，每縣撥5,000元，刻已開支告竭；如無法接濟勢將停頓”（1934, 12, 21益世報）浙江“工賑需款，因限於賑款問題，勢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現，其範圍縮小至三分之一”（1934, 11, 6東南日報），根據報紙所載，目下以工賑為目的河道的浚疏，祇能容納很少的災民。按照各省計劃，如果每工每日做土方一方，以三個月計，其所能容納之災民如下：皖省13,000人，江蘇100,000人，浙江350,000人；然而受災人民，單以浙

江一省而言，已不下千餘萬，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百不獲一的絕好機會，竟未能引起災民的欣羨，一般而論，受賑的民工，因為生活已經陷入絕境，自然除掉苟延殘喘之外，再不敢有其它奢望；因此倘與徵工比擬，他們一定不會得到更好的待遇。譬如單就工資一項來證明吧：“工賑工資係按方給資，每公方平均一角”（1934，12，23江蘇工賑計劃）“將來工賑工資每土方以一角為原則”（1934，10，12，浙江水利工賑計劃）；其他各省工資，亦不出一角左右，那末對於生活之不能維持，自然和前面所已分析過的一樣了。下面這一記事，更給我們以具體的證明：

湖北“實行以工代賑以來，將近三月，災民痛苦，宜能稍得解除，顧反有以受賑為累者。本年旱災奇重，人民無法株守，在政府未頒賑以前，老弱已填溝壑，壯者流離四方，迨工賑人員下縣，已成十室九空。工賑人員為完成任務，只得責成保區甲長，限令造具名冊，分配挑塘等工作，區保甲長，因壯丁已逃亡，乃妄造名冊以應，及至工期，竟有多數不能報到，如是到處拘工，殊在政府意料之外。（1934，11，7申報）

寫到這裏，我們的目前，早已呈現着歷史上的封建徭役的全景。這些賑工乃至工賑政策的社會性質，似乎亦無須再加說明的了。

英美在華的貨幣戰爭

章 乃 器

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形態的階段，金融資本不單是在國內支配了工商百業，在國外也負着奪取市場，伸展國家威力和穩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治權的重大任務。牠——金融資本——對外攻路的方策，一面要在國內樹立起來一個國際金融市場，而別一面，要在國外取得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底貨幣權，——甚至有許多後進的獨立國家底貨幣權，也可以相對的給牠一些控制，這樣，一個金融帝國就可以建立起來，而使帝國主義進一步的完成牠的發展。

因為帝國主義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所以，金融資本在國際上，矛盾也是十分尖銳的。倫敦和紐約爭取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帝國主義列強對於黃金的爭奪，和以後各自使貨幣貶值的貨幣戰爭，就是矛盾中很緊張的幾幕。而貨幣本位集團化底演進，也正和一般政治的經濟的集團化密切的連繫，而成爲縱橫交錯的鬥爭。在這樣的一個鬥爭中間，無疑的，半殖民地

的中國，是要成爲一個重要的對象了。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底貨幣，要使牠成爲自己的附庸，本來是殖民地經營中不可少的一個步驟。只有在殖民地貨幣同化於宗主國之後，然後主屬國間的貿易，以及政治、經濟上的投資，可能圓滿的開發。

同樣的，即使是一個半殖民地或者後進的獨立國，倘使一旦牠的貨幣加入某一個集團，那影響是很大的——尤其在管理通貨盛行的時代。比方，倘使中國底貨幣加入美金集團了，中國國幣一單位，規定下來等於美金底幾分之幾；那樣，中美間的匯兌，就變成十分穩定；即使有一些漲落，通常也不會超過現金輸送點，於是，中國底進出口商人，就會感覺到：向美國買賣商品，所負的危險比較的輕——只有物價漲落的危險而沒有匯價漲落的危險，美國對華貿易，自然就可以格外發達了。在投資方面，匯價底不穩定，往往是一個極大的障礙。在目下，假若中國人借美金，一旦金貴銀賤，便要吃虧——中國過去所受外債匯兌上的損失，是誰都不會忘記的。政治借款可能這樣的“飲鴆止渴”，商業借款便誰都不敢嘗試。反之，假若美國人把自己的美金兌成中國貨幣借給中國人，他就要負這種匯兌上的危險，債權人負了這樣大的危險借錢給別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倘使中國加入美金集團了，這種問題就都自然而然的解決了；美國底金融資本，就可以大量的輸入中國，以造

成牠在中國的優勢。

爲甚麼我說，貨幣集團底加入，是在目下管理通貨盛行的時候，意義尤其重大呢？這是因爲在各國未曾放棄金本位之前，中國改用金本位可以使所有金本位國家都得着貿易和投資的便宜；即使中國國幣可以和某一國底貨幣合成一個整數——假如中國國幣二圓等於美金一圓之類——所加於那一個國家的便宜，也只有計算上的便利；那個影響是並不十分嚴重的。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美國還必須再使中國把所有的海外準備存放在牠的國際金融市場紐約，然後牠對於中國才有較大的支配力。反之，像目下的情形，事態底發展就大大的兩樣，公開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如英美日本等，非公開放棄金本位的國家，如德意等，貨幣價值底漲落，完全操在政府手裏。比方，美金底純金含量，已經一度的減低百分之四〇・九四；現在又有人主張再減百分之三〇。只要國會通過了這個提議，大總統下一道命令執行，美金就要再度跌值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假若中國加入美金集團，美國底政治勢力，就可以通過貨幣而操縱中國底經濟政治；加入英鎊集團，英國底政治勢力也可以發揮同樣的權威，即使加入法郎集團，恐怕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要遭遇同等的命運。這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當中大戰前夕通貨膨脹所發展出來的新形態。這種質的變化，一味主張改用金本位的形式論者是不會了解的。

* * * *

世界上現在有三大貨幣集團，就是英鎊集團，美金集團和法郎集團——即金集團。這三個集團中，參加遠東方面的貨幣戰爭的，只有美金集團和英鎊集團——法國在遠東方面的企圖，大約只求安南殖民地底保持和雲南及廣西兩處底染指；歐陸問題底吃緊，使牠沒有餘力在遠東方面參加泛大的貨幣戰爭。

以中國貨幣權底掠取為目標的遠東貨幣戰爭，牠的開端已經很早。在一九三〇年凱末爾顧問團“遠涉重洋”替中國計劃改行金本位的時候，在他們所擬的金本位幣制幣條例草案裏，訂定中國預期採用的金本位幣“孫”，就等於美金四角。美國在那個時候的確是企圖在使中國改用金本位之後，大大的發展牠的貿易和投資，以完成“金圓帝國”在太平洋方面的統治的。不幸的很，在上述的幣制草案發表以後，接着就是一個金貴銀賤風潮，使這個計劃遭受頓挫，再接着，就是“九一八”事變，日美間的矛盾使這個計劃只好根本的“束之高閣”。我們也可以說，當時美國在遠東勢力底猛進，尤其在東三省投資的企圖，是促成日本武力攻襲中國的一個因素。

帝國主義在爭奪殖民地的時候，自然要運用牠們最便宜的威力。所以，在美國用資本勢力企圖征服中國的時候，日本就只好運用牠的武裝勢力。然而，在日本運用武裝勢力之後，

美國也必然要進一步的要運用牠的資本勢力。“羅斯福底遠東政策，依然是繼續胡佛底政策”；這是完全不錯的。因為羅斯福底白銀政策，就是美國廣續在遠東方面鬥爭的一種新資本勢力。

許多作家對於美國白銀政策的認識往往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夠深刻的。說羅斯福底白銀政策，是在取悅於代表銀礦主利益的“銀議員”，這是對的，然而是不夠的。銀議員在國會裏，固然占着相當的勢力，然而並沒有占着絕對的多數，所以，倘使一種政策只是偏袒的提高銀礦主底利益，是不可能得着多數的贊同的。還有，倘使只是爲着銀礦主底利益，美國白銀政策就沒有世界化底必要；牠只須止於以高價收買國內新產的礦銀，再進一步也只須止於白銀國有就夠了。現在牠要收買世界底白銀，無疑的是有向外攻略的意味的。

那末，是不是就所謂提高遠東和南美人民底購買力呢？不，這不過是向外攻略的白銀政策底一種掩飾，而並不是真實的內容。白銀政策底終極的目標，是在取得中國底貨幣權，甚至要控制南美和遠東方面採用虛金本位制各國底貨幣權。牠要爲牠的金融資本在南美及遠東開闢廣大的投資市場，要爲牠的產業資本，在南美及遠東開闢廣大的商品及原料市場，只有這樣一個爲牠的整個資產階級謀利益的白銀政策，然後可能在議會裏得着多數的同意。倘使真是爲着提高遠東及南

美人民底購買力，那末，在這白銀政策已經引起主要的用銀國——中國——底金融恐慌，白銀政策不單是不能提高中國底購買力，反而要毀滅中國僅有的購買力的時候，美國應該是要改變牠的白銀政策了。牠經過中國底再三籲請，而始終不肯改變白銀政策，就可以表示提高遠東及南美人民購買力的話，是欺人的。提高購買力的話也許是對的，然而只在取得各國底貨幣權以後，而且也只能提高對於美國商品的購買力；整個的購買力即使不在貨幣戰爭底過程中毀滅，但是決不會提高的。

“白銀政策底運用，何以能奪取中國底貨幣權呢？”這只須在美國收買白銀到了相當的數量；而且進一步穩定以美金表示的銀價的時候，白銀一盎司既然固定的等於美金若干，銀本位的中國貨幣，就必然的和美金取得固定的比價了。

美國冀望的標準銀價，恐怕是每盎司值美金一圓二角九分，適合一與十六之比——這是美國已經訂定的收買礦產新銀的價格，不過在目下，這價格中的一半，還是要歸給國庫的。現在美國底銀價，每盎司還只有五角四五分；距離一圓二角九分的標準價，還差七角五分之鉅。這表示“美國離開定銀價的日子還很遠”。美國的本意，原想很和緩的提高銀價，使中國不至受很大的犧牲，然而，不期中國竟會感受到空前的金融恐慌！這恐慌底因素，我們倘使完全歸咎於美國白銀政策，那是

錯誤的。因為，在事實上，這是英美在中國的貨幣戰爭底結果——就是一面有美國奪取中國貨幣權的攻略，而另一面有英國出而爭奪，才演成目下的金融恐慌。

* * * *

英國在應付美國的貨幣戰爭上是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英商匯豐銀行在美國宣布白銀國有之後，首先的由上海裝運大量白銀出口；這在營業的意義上，固然，可說是提防中國政府干涉白銀出口，甚至改革貨幣本位——如銀圓貶值或採行不兌現紙幣本位之類，同時也可以賺取一些運銀出口的利益，然而，在貨幣戰爭上，還有更重大的意義。牠一面是給美國一個警告，倘使英國金融勢力由中國退出，要毀滅中國市場，而使美國在取得貨幣權之後，不可能發展牠的投資和貿易。同時，還可以使中國人認定這是美國白銀政策底直接結果，而造成一種反美空氣，這便可以使美國奪取中國貨幣權的企圖，受到了重大的打擊。且看，中國不是已經有許多學者主張要反抗美國底白銀政策嗎？而中國白銀出口增稅之舉，不是一般的認為是反抗美國的一種行動嗎？另一面，牠更給中國一個警告，就是：中國不能用自己的紙本位去反抗美國白銀政策，中國也不能有控制匯兌以奪取外商銀行——尤其是英商銀行——底營業勢力的舉動；中國必須投入英鎊集團以反抗美國，更必須放棄憑藉平衡稅以自定匯兌行市的企圖。

這種面面具到的以退爲進的戰術，威嚇力量是很大的。美國已經表示，牠對於提高銀價，將取更緩的步驟——就是，牠已經不得不將奪取中國貨幣權的過程延長。中國呢，在目下的情形之下，減低幣值和不兌現紙幣本位都還談不到——因爲這樣的重大計劃，決不是手足失措中一朝一夕就能決定的；唯一穩妥的辦法，還是向英國求援。向英國磋商大借款的運動，無疑的是在進行之中。這種借款，假如一旦成功，帳簿上的金鎊借款，事實上是要用印度存銀交付的。這種存銀，經過印度或者中國底造幣廠鑄成一種銀質的中國金本位貨幣，就可以流通市面。再規定這種金本位幣，可以依一定的比率以英鎊爲最後的兌現。這樣，中國就已經加入英鎊集團了。

上海沙遜洋行底大班沙遜爵士，曾經提議請美國向印度政府購銀，事實上，要美國向印度政府購銀，是不可能的；因爲只有向市面購銀，才能達到提高銀價的目的。印度政府底存銀，在銀協定限制之下，是不能隨意出售的——協定的出售數量，每年不得超過三千五百萬盎斯。然而，倘使牠借與中國作爲貨幣用途，也許不單是不違背協定，而且是“名正言順”，這樣，也許沙遜爵士底提議，目的還是在預留這個地步，而並不是希望美國接受他的提議。

在英國參加中國貨幣戰爭的過程中，英國在華資本家底

態度，是並不十分一致的。比方，沙遜爵士是上海的大地主，他就反對英國資本勢力底突然退出，因為那樣要造成一個通貨收縮的恐慌，而使他的地產跌價，甚至地租無着。他在上述的提議當中，表示出來很着急的希望中國底貨幣問題，早點得着一個結束——投入英鎊集團。他最近借給中國一筆金鎊借款——合國幣四百萬圓，一面就所以補救匯豐銀行退出過急底缺憾，而一面在賣出金鎊之際，也可以使金鎊對中國國幣跌價，這在貨幣戰爭中，也是有相當的意義的。這樣，他們在戰術上即使稍有異趨，而在戰略上是“交相爲用”的。

* * * *

上述的種種，似乎是一種“索隱”了。然而，我敢說，至少這一種貨幣戰爭是存在着的。進展到何種地步和進展底方式是不是一切如我所說，那也許有問題。

英國通訊社在中國採用倫敦銀價爲平衡稅徵收標準的時候，曾經很樂觀的說：美國白銀政策運用底結果，徒使中國加入英鎊集團，這是很失算的。以倫敦銀價爲徵稅標準，就認爲是加入英鎊集團，這顯然是太誇張，然而英國夢想中國有這樣的一天，却已經“情見乎辭”了。近日報載：美國對於僞滿採用日金本位的消息，加以深切的注意，並預言其難以實現，這更可見美國不單是不忘情於中國本部底貨幣權，連東三省底貨幣權，也還是念念不忘。

在太平洋角逐的主角，是英日美三國；而日本更儼然以東亞主人自居。日本對於英美在中國的貨幣戰爭，能熟視無睹嗎？不，決不。事實上，英美在中國貨幣戰爭前途底演變，日本態度倒是一個決定的因素。日本底金融資本，勢力到底還是很幼稚，牠的幣制基礎，尤其是脆弱可憐，他既然還不能同化偽滿底貨幣，自然更不會有同化全中國貨幣的雄圖。中華匯業銀行復業底傳說，也許中間包含着復活一九一九年金券條例的使命，然而後來也終歸沉寂了。日本帝國主義可用的力量，還只有軍事勢力和商品傾銷勢力；但是牠在西太平洋的優勢軍事勢力，就可能阻止任何列強在中國經濟上的雄圖。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不能不推定：美國假如要取得而保持中國底貨幣權，必須要在造艦程序相當的告一段落和阿留申羣島海空軍根據地完成之後；而英國要取得中國底貨幣權，牠就不能不和日本妥協。在這種推定之下，我們又可以認定英國以退為進的策略，同時也是給日本一個警告——日本必須有英國金融資本底合作，然後可以維持中國市場底購買力。這樣，牠或者可以早些取得日本底合作，而造成一個日本底軍事勢力和英國底金融勢力“平分秋色”的中國本部。然而，日本肯不肯就範，倒是一個問題。

* * * *

我上文曾經指出：虛金本位目下已經變了質了。變了質的

虛金本位底採用，就等於貨幣底殖民地化，這已經是很可憐的一件事；然而，慘痛決不止此。在貨幣戰爭底過程中，中國已感受到的痛苦，是如何的嚴重？未來的過程還很長哩，中國又將何以應付？這是一個問題。其次，倘使貨幣戰爭底結果，中國被逼加入英美任何的一方；那末，武力的爭奪必然要繼之而起。那嚴重的情形，要比貨幣戰爭還高十倍！這又是一個問題。中國要確立一個自己的非金屬本位，而實行其所謂貨幣革命嗎？帝國主義勢力層層束縛的現狀之下，恐怕不能任聽你有這樣的企圖。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包底下的私運，已經使白銀出口增稅政策完全失敗，就是一個近例。

本來，長江下游底貨幣，經過民族金融資本家長時期的奮鬥，已經造成一個統一而且獨立的本位——這和過去的東三省和目下的兩廣，雲南，四川，山西各省的貨幣，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底控制之下，混亂的存在着，真是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時代激變了，這沒有完整的政權為保障的獨立貨幣本位，是當着空前的危機了，過去的奮鬥歷史，也許要“盡付東流”！

我們應該怎樣的拯救中國底貨幣權呢？這不是單獨的貨幣問題，而是整個的民族問題。整個民族底危機倘使無法拯救，單單拯救了一個貨幣又何用？

那末，我們應該怎樣的拯救整個民族底危機呢？

這在“一二八”三週年紀念日的今天，真不能不使我們回想到淞滬抗敵意義的偉大！

1935, 1, 28.

最近資本逃亡的兩條去路

章 乃 器

我曾經再三的說過：中國目下的中心問題，並不是白銀問題；即使解決了白銀問題，中國底問題依然是不解決的。

自從今年十月十五財政部增加白銀出口稅之後，白銀流向海外的趨勢，的確是和緩下去了；上海底金融界總算在那時喘了一口氣。誰知道過了一個多月，市拆忽然由一角左右升至四角——合年息一分四厘餘。近三年間的上海市拆，除“一二八”事變後曾一度升至四角以上外，這次要算是新紀錄了。

此次市拆之所以暴漲，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幣運往外埠，為數至巨——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九日止，達三千二百餘萬元；其運往地點列舉如下：

華北各埠	秦皇島	\$1,500,000	} 5,650,000
	天津	1,800,000	
	烟台	400,000	
	青島	1,000,000	

	濟南	500,000	
	北平	450,000	
華南各埠	溫州	50,000	7,900,000
	廈門	3,700,000	
	汕頭	830,000	
	廣州	3,260,000	
	瓊州	60,000	
長江各埠	南京	4,300,000	18,740,000
	蕪湖	100,000	
	九江	100,000	
	漢口	14,190,000	
	重慶	50,000	
其他		500,000	
總計			32,790,000

白銀出口增稅以後，運往國外的白銀，是比較地減少了——約在一個半月中間，只有一千一百零七萬元。國內各埠底白銀，幾年來一向是流向上海的。在白銀出口增稅白銀流向國外比較困難的時候，忽然起了這種反常的樣子，這個原因是很顯明的——無疑的，那中間包含着許多私運出口的成分。

華北一帶，目下藩籬盡失；沿長城各口——東起秦皇島西迄古北口——在某國人底控制之下，私運已經成了公開的祕密。華南各埠，某國人私運勢力底跋扈，也幾乎不下於華北。廈門方面，曾經發生某國浪人聚衆攜械向公安局強索私運人犯

和贓物的活劇；結果是人贓同時釋放！廣州方面，也曾發生某國汽船私運人造絲被獲；交涉的結果，也竟以誤入我國口岸的理由，輕輕的人贓同時釋放了。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私運勢力之下，裝向華北和華南各埠一千三百萬元的銀幣，什九是私運出口的變相，是毫無疑義的。就是裝向漢口，南京等處的銀幣，私運的成分也很大。漢口方面收買棉花的款項，自然也有一些；然而，根據本埠高爾庭洋行報告，自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廿五日止，由漢口裝到上海的棉花，不過六萬三千包；（每包五百磅，下同）去年約莫同時期中，則為五萬一千包左右。——相差僅一萬二千包左右。然而，去年十，十一兩月中，裝赴漢口的銀幣，僅一百五十萬元；而今年則達一千四百十九萬元——相差一千二百六十九萬元之鉅。倘使僅僅只有多裝出一萬二千包棉花的關係，那末，增加的數目，就只有一百數十萬元罷了。據說：漢口方面底銀幣，經由平漢路運向華北再行私運出口的，為數頗多；南京方面經由津浦路運往華北的，數亦不少。但是，私運的人，為甚麼要費許多財力，把銀幣由上海先裝到南京，漢口之後，再運往華北，而不由上海直接運往華北呢？這答案是很簡單的：他們只須在南京，漢口等處，向銀行兌取銀幣裝出去；當地銀行，在感到現銀缺乏的時候，自然會向上海去裝現。所以，由上海裝往南京，漢口等處的銀幣，儘可能是正當的調劑盈虛的用途，而這一筆運費，也用不着私運的人

負擔的。

很顯然的，目下中國資本逃亡的去路，是香港和大連；而私運的出發點，却在昆連香港和大連的各都市。這種私運，往往不是一氣呵成的，而要經過幾次的轉折。出發點各都市底銀幣因私運而減少了，當地銀根就要緊起來，當地銀行就需要由上海匯款過去——因為上海是全國金融底中心。這樣，由上海匯到私運出發點各都市的匯水就高漲了，而跟着，上海底銀幣也只好運過去了。

我們可以拿下列的內匯行市分析一下：（匯款一千元至目的地在上海應交數）

	十月十五日	十一月三十日
天津	1,002.50	1,013.00
漢口	1,007.50	1,011.50
廣州	842.50(滙付毫洋一千元)	890.00
	1,002.50(滙付大洋一千元)	1,003.00

顯然的，各地匯水，從白銀出口增稅以後，都在飛漲的過程中；廣州滙付“大洋”匯水，所以漲得很微，是因為根本上“大洋”不是廣州底通用貨幣，而銀行也往往拒匯“大洋”——事實上往往是“有行無市”的。

正和商品流向市價高的地方一樣，匯水高的地方，銀幣也自然會流過去。有些人帶中央銀行底鈔票，到天津，漢口等處

去兌現，有些人帶公債庫券的到期本息票，到天津，漢口等處向代理國庫的銀行收現。他們費了較小的運費，得可以賺到很大的匯水。然而，各銀行在付出鉅款之後，却不得不向上海裝運銀幣。這樣，銀幣就不期然的由上海流出了。這種種有意的，無意的，正常的，非法的行動，不期然的結合起來，而成爲一條白銀流向國外的路線。這路線底上半段，儘可能是合法的，而只有下半段不合法。合法和不合法之間，也儘可能“各不相謀”，而在自然的機構上却已經“交相爲用”。所以，要想在起運地點施行嚴厲的手續，以阻止私運，是沒有效果的。

以上還僅僅說明資本逃亡底一種方式——私運。除了私運以外，還有匯兌的方式。在私運的方式之下，銀行往往不過是不自覺的做了資本逃亡的媒介；而在匯兌的方式之下，銀行是自覺的做了資本逃亡的媒介。倘使有人把他存在上海的存款，匯到香港去，這自然是資本逃亡；即使把他存在上海的國幣存款，兌成港洋存款，也照樣是資本逃亡。因爲，在後一種情形之下，銀行就可以把牠的準備金移到香港去；存款人提款的時候，銀行只須付給他一張香港付款的港洋匯票。

十月十五日以後，上海方面底存款人，把存款移到香港或者兌成港洋的，一定是不少；因爲，港洋在最近一個半月中間由國幣一百元合港洋九十元半的匯率而低落到八十元半了。匯到大連去的，恐不見得多，因爲大連匯水沒有大變動。這大

概是因爲大連底流通銀幣，是朝鮮銀行底不兌現紙幣，即所謂 Silver yen，而一般人對於日本幣制底前途，是沒有信任的。所以，說到匯兌方式下的資本逃亡，只有香港是值得注意的。

說到香港匯兌，我們便不能不注意到匯豐銀行。匯豐銀行底英文名稱，是“香港上海銀行”。這就可以使我們明白，牠的營業重心是在香港和上海。事實上，牠是英帝國在遠東方面的一個頂有勢力的銀行。

在幾天以前，匯豐銀行上海方面的負責華人對我們說：中國官僚軍閥在匯豐銀行裏有巨額存款，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目下他們都已經提到他們自己的銀行裏去了。但是我們倘使一檢查匯豐銀行歷年營業的狀況，就覺得這話有疑義。現在，把牠的重要項目揭露如下：（單位港洋千元）

	定存	活存	發行鈔票
1927年底	386,835	170,851	52,640
1929年底	434,912	219,853	64,854
1931年底	558,624	215,456	129,235
1933年底	666,364	207,588	146,535

我們可以看見，牠的存款數和發行數底增加，是足以驚人的。倘使華人的巨額存款真個都出去了，我們便不能相信牠能在六年之間，得了三萬萬元的增加存款。而鈔票底發行，六年間由五千萬元增加到一萬四千萬元，更可以證明牠的鈔票，在

華北華中各處雖然似乎銷聲匿跡，而在華南方面的進展，却是“一日千里”。報載某軍閥夫人，某次曾因市上發現匯豐銀行底偽鈔，親自攜所存的鈔票去兌現，一次就有數十萬元。僅此一端，匯豐銀行依然是官僚軍閥存款的淵藪，就可想而知了。

依我個人的推想，匯豐銀行在上海方面存款的減少，是可能的。然而，這減少的存款，不過是移到香港去罷了。匯豐銀行要把牠的準備金，進一步的集中到香港去，是很顯明的。且看下面的數字：

	現金及生金銀總數 (單位港幣千元)	上海庫存 (單位國幣千元)
1929年底	123,063	49,137
1931年底	214,401	29,763
1933年底	384,559	83,921
1934五月底		66,938
六月底		46,632
十月底		28,504
十一月廿六日		12,150

牠在最近幾年間，現金和生金銀總額底增加，也是驚人的。而在上海方面的庫存，去年以前雖有增加，但是和總額的比例，相差甚遠；而從今年起，減少的趨勢更是厲害，據說：目下一千二百萬元的上海庫存數目，還是不可靠的。上海底庫存那裏去呢？自然是到香港去吧。

匯豐銀行準備金底集中香港，是有意義的。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大量的裝運，很明白地是怕中國政府干涉白銀出口，然而多少也有些對付遠東戰爭的意義。干涉白銀出口是終於“不出所料”了，戰爭又怎樣呢？大概在未來的戰爭中，英國對於香港是要有相當的防守的，飛機場聽說已經造好了。而對上海呢，牠也許覺得力有未逮，這就是準備金移轉的別一理由吧？

香港和大連，原來是漏稅的主要地點；目下成爲資本逃亡的去路，本來是不足奇的。一個國家底國境內，有了這種“特殊地帶”再加以“超不平等條約”的非法勢力，自然能使任何的政治手段失去效力。在這情形之下，我們將何以圖存呢？這不是白銀問題中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前途的問題了。

從金融公債說到工商業放款

秦 伯 瑞

曾經一度繁榮的中國銀錢業，近半年來因工商業和農村經濟愈趨衰落，以及上海地產的狂跌，真到危在旦夕的關頭了！不過他們也力圖自救，很想打破此種難關，現在我們只想說一說其中最重要的一萬萬元金融公債和工商業放款，因為它們是十足證實中國的金融恐慌是如何深刻，如何不可救藥。

二十四年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是四月一日正式發行的，在發行前後，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事實是愈到現在愈明白。據當時中政會和立法院所通過的公債條例而言，該項公債的用途是“充實銀行資金，撥還墊款，鞏固金融，便利救濟工商業，”其具體分配是：四千萬元償還中央銀行墊款，三千萬元撥歸中央銀行，二千五百萬（後改爲一千五百萬）撥歸中國銀行，一千萬元撥歸交通銀行，作為牠們的增添資本（所傳原定分配似有錯誤，因會計多出五百萬）。然而實際所盡的作用怎樣呢？爲了明白個中情節，我們務須指出兩種事實：（一）當時國府財庫主要

因剿共關係，已陷於極度空虛之中，對於中中交三行的透支（特別是中央銀行，據說當時一共有一萬三千萬元）已經累積到了驚人的程度，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已經打成一片。（二）浙江財閥系（張嘉璈為其主腦）的跋扈，他們與財部之間的或種背離，使財部或多或少地不能自由調撥軍政各費，因此相互間甚至常常發生暗鬥。因為此次新債的發行，實際上就是為了克服這兩大困難。孔部長說：“誠以工商界通融資金，向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為中心，博施濟衆，三行自難應付，故政府在此財政極困難之時，發行公債，以為三行充實資本”（三月二十二日申報），很明顯的這話只有一半是對的，因為使“三行自難應付”的，不是對於工商業的“博施濟衆”，而是財部的挪借無窮（到下面論工商業放款時就更可證實）。所謂償還舊欠，擴充資本，以安定金融的意思，不過使因財政透支而危險萬分的國府外庫能暫時安定下來，以便財部再行透支。過去二十年金融公債和二十三年國稅庫券，就是玩着這類把戲。千家駒先生說得好：‘近三年來之中央財政，即在‘銀行借款——發行債票償債——再借款——再發行公債還債’之一循環公式中渡過’。所謂“俾厚其實力以謀金融之安定者，實情當不過爾爾”（三月二十三日大公報）。法文上海日報更說得明白：“此次公債發交政府官辦之銀行，則可使各該銀行抽出鈔票發行之備金，如現金及有價證券等，以之流通市面，以助政府之軍費”。（見三

月二十三日外論通訊稿)。孔部長說，這次所發的公債決不流通市面；宋子文氏說，政府決不實施通貨膨脹；然而此次金融公債的發行，實質上已是膨脹通貨的有效方式之一，將來影響國民經濟決不淺鮮。

其次如汪院長所說：“金融公債之發行，其目的在增加中，中，交三行之資本，絕無縱橫捭闔之意存乎其間”。（見前引申報），這話也顯有問題。蔣委員在貴陽不是說三行官股之增加即統制經濟之實施嗎？此次宋子文氏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事前不是經過一番苦鬥嗎？張公權氏於抱病之餘，不是想重振旗鼓嗎？據銀行界消息，中，中，交三行更要借官股之力，征服其他中小銀行，對於小銀行甚至促其沒落，以完成其銀行統制和獨佔王國。中國銀行於舊曆端陽節前的六月一號成立儲蓄部，是具有很大的進取作用，據說節前一二日內甯波實業銀行和江南銀的倒閉，以及四明，上海等行的險惡風聲，除掉受着金融危機的一般規定而外，多少也含有前述統制暗鬥的影響和關聯。我們且不論這種內部的黨系之事，而來看看銀行統制究有何種功效。所謂將中，中，交三行合併起來或聯繫起來，以確立對抗外商銀行的中國金融權，這當然是種遼遠的希望，不過三行官股增加以後，財部調撥起軍政費來就可方便不少，所以對於中央政權的維護，以及剿共工作的進行，倒具有很大的力量。此次中國銀行奉命調運大批鈔票至重慶至貴陽，就是很

好的實例。

總起來說，一萬萬元金融公債是財政危機和金融危機交織出來的成果，在目前牠固能稍稍緩和此項危機的爆發，但其代價是未來更大的不可收拾的全面崩潰。

我們假使再將鬧了三個多月的工商業放款，仔細解剖一下，那末對於前面所說各點，就更可明白確信。

工商業五百萬元信用放款的提起，比一萬萬元金融公債的履行還要早一點，自從三月間由上海地方協會和市商會建議舉辦後，財部即允轉令中央銀行撥款二百五十萬，並令銀錢界負責籌集其餘的一半。上海銀錢業者爲了這事曾迭次開會討論，銀行公會方面且有信用小借款小組委員會之組織，專門負責此事的進行，但是直到現在，相延已有四月之久，真正實行的消息還是杳然無聞。錢業界對於此事的應付，比較銀行方面容易許多，因爲他們很冠冕地謝絕說：“上項借款，原則贊成，惟錢業向來以大小信用放款爲主體，本年早經分送往來摺承做，現在再由同業各莊，各自量力擴充，毋庸併入銀團”（三月十五日錢業同業公會會員大會決議）。其實，他們是懼恐工商業的倒閉，放款變成倒帳，他們本身的存因之發生動搖。事同此理，人同此心，銀行家當然也有這種顧慮，不過他們無辭可藉，只有硬着頭皮空喊一場。當錢業界表示拒絕參加的時候，他們甚至高唱由他們來攤分那五十萬的缺額。其實他們還

是再三要求錢業方面改轍易轍，藉以使整個問題長期拖延下去，本來，自以“安定金融，救濟工商業”為目的的金融公債發行以後，此事很可迅速完成，但是據四月八日大晚報所載中央銀行負責人之談話，則謂“現所談之工商業信用小借款五百萬，為數區區，恐不足救濟，故中央或有其他辦法”。而所謂其他辦法云者，四月十三日的大晚報告訴我們說，是財部指命中，中，交三行按章辦理，而三行條例中所規定之業務，均不能做信用放款，所以歸根說一句是宣告取消！固然近來三行又在擴大高調一千五百萬元抵押担保放款和五百萬元的信用保證放款，然而實際上是同樣的虛無飄渺。當然，對於銀錢業界這種“口惠而實不至”的假仁假義，我們是沒有抱怨的理由的；因為銀行錢莊不是慈善機關，而是以賺錢為目的。我們所想指出的只是此次信用借款的醞釀如何證實了中國的金融恐慌，以及信用收縮乃金融恐慌之結果或表現，要想人為他來改善信用機構，以解救恐慌本身的到來，是如何地顛倒事實，徒勞無功，鬧了二個多月的承兌匯票，迄今不能有效推進，中央銀行對於金貼現之擱而不行，亦正由於同樣的關係，證實了同樣的事實。

目下華南如福州，廈門，廣州，華北如青島，天津，北平，內地如漢口，長沙，重慶，皆因工商業的極度衰落，信用特別收縮，一般銀錢業者對於工商放款都畏縮不前。各地商會及工商

團體雖紛電政府及銀錢業界放款救濟；但是很明顯的，在根本的病因未除以前，一切都將無法解決。中國目下的金融危機不是要求我們掩飾，而是要求我們認識，並針對事實以謀解決，那末我們就不應忘記上述金融公債和工商放款所給與我們的教訓！

通貨收縮與中國經濟恐慌

周 文 彬

在資本主義的第三期內，本位貨的準備方面有一種特性，那就是黃金的集中過程進行得格外急劇，格外尖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終是帝國主義列強的俎上之肉，它們的現金很快地被吸收到列強的中央銀行和別的大銀行裏。它們的現金既然逐漸消失，所以銀行主要的準備，已經不是現金，而是外國匯票。所以凡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除開幾個例外如阿根廷，烏拉圭，委尼瑞拉和奧大利亞而外，其餘像南菲聯邦，埃及，玻利維亞，智利，哥倫比亞，赤道國，薩爾瓦多，英屬印度，荷屬印度，暹羅等國，都是因為黃金逐漸輸出，信用和貨幣的流通急激收縮，造成物價暴跌的現象。

目下中國的白銀正因為列強商品的傾銷，美國白銀政策的厲行，和國內外銀行家和“奸商”們空前的投機，在繼續流出。我們知道，中國從1917年到1931年白銀的進出口，經常地保持入超的地位。計從1901到1931年這三十年中間，進口白銀

淨數達十萬萬元。1928到1930年三年中間，每年平均進口淨數還有一萬四千萬元。1931年進口雖有減少，然而其入超額數還有六千八百萬元。到1932年情形便大起變化，那時因為華僑匯款急激減少，貿易入超格外尖銳，同時外人在華的新投資也有減少，因此白銀非但不見入超，倒反出超了一千一百萬元。這種趨勢到1933年仍然繼續，是年白銀出超增加到一千四百萬元。

白銀流出的趨勢在本年急激加甚。到本年四月份一月出口白銀淨數已較上年全年淨出口數為多：七月份起白銀流出份外加多。據海關登記數量七月份白銀出超為24,308,009元；八月份為79,094,748元；九月份為48,139,773元；十月份為56,332,138元。共計本年一月至十月白銀出超達二萬三千五百萬元，比去年全年多十六倍多。十一月中旬中國當局雖有白銀出口徵稅之率，而偷運之風，無法斷絕。計自十月半至十一月底一個半月中間，白銀正式出口只有一千一百多萬元，同時上海白銀流向華南和華北各埠的達一千三百萬元；這些運向本國的白銀，什九是變相的私運出口。我們在這裏不得不指明，所謂某國浪人在偷運白銀中的作用，我們在華北，甚至在華南各埠偷運勢力的跋扈，終使中國的法律沒有發生效力的可能。同時，就是裝向漢口和南京等處的銀幣，私運的成份也是很大。那些私運販子只須在南京，漢口等處，向銀行兌取銀

幣裝出去；當地銀行感到現銀缺乏，自向上海裝現；而大批白銀就在這種間接的過稅之中，紛向大連，香港等地“飛走”（詳見章乃器，最近資本逃亡的兩條去路）。

這樣大量流向國外的白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大家知道，直到最近為止，內地現銀的集中上海是近年經常的現象。試舉最近三年來上海中外各銀行存銀底爲證：

		存銀數(千元)
1932年	6月	369,337
	12月	438,339
1933年	6月	446,761
	12月	547,457
1934年	5月	594,056

本年五月的上海存銀數可算是近年最高的紀錄。自此以後，因爲銀行存銀（特別爲外商銀行存銀）大批流出，所以庫存隨之激減。中國內地存銀在1932和1933兩年以內，均減少二萬七千八百萬元。本年内地現銀流到上海的情形可用下列數字爲例：

上海銀元經由京滬，滬杭甬兩路運出運入的數目

	移入上海(元)	自上海移出(元)
1931	93,581,280	86,934,732
1932	43,772,614	4,468,565
1933	30,687,332	16,126,500

1934(1—10月) 23,521,050

10,366,600

本年從上述兩路移入的白銀還超過移出額數一千三百十五萬元。我們現在粗粗假定，本年內地存銀約減少一萬萬元；這樣加上1932和1933兩年的減少額數，三年來減少總額應為三萬七八千萬元。

這樣我們再來看中國貨幣流通的額數。中國通貨的額數究竟有多少，我們實在無從知曉。單就上海各家銀行發行的紙幣而論，近年發行的額數約如下表：

上海華商銀行發行總額(百萬元)

1930年12月	250
1931年12月	275
1932年12月	287
1933年12月	353
1934年10月	386

(1933年以前根據Sir Anthur Salter氏報告；1934年根據中行月刊)

按照規定，紙幣的準備額內現金應佔六成，保證準備應佔四成。如以上海存銀大部份作為發行紙幣準備之用，那末1932和1933兩年內上海各銀行可以增發紙幣四萬二千二百萬元(因存銀增加二萬五千多萬元)。但實際上兩年內增發紙幣僅為七千八百萬元。假如再算到今年，從1933年年到本年五月，上海存銀共增加四千七百萬元；可是五月份的發行紙幣額只有323,563,000元，反較上年底為少。可是最近幾月，白銀存底雖

在減少，紙幣却在增加。到十月份發行總額已增爲三萬八千六百萬元。

現在我們來統共合計，從1932到本年年底白銀輸出共爲三萬二千萬元（假定本年全年白銀淨出口數爲三萬萬元）。三年內紙幣增發額（最近增發紙幣主要原因是財政膨脹）約爲一萬萬元（本年十月底爲386百萬元，1931年底爲275百萬元）。那末近三年來通貨的數量至少減少了二萬萬元（這裏就連各省增發籌碼計算在內，減少之數也不會在二萬萬元以下）。這種通貨收縮的現象在各大都市，特別是在上海並不十分顯著，在內地各省却備感痛苦。根據上引數字，近三年來內地現銀減少總額應爲三萬七八千萬元；假定同期增發一萬萬元的紙幣都經流通內地，那末內地的通貨量共減少了二萬七八千萬元。這種通貨大量的減少自然會使金融枯竭，利率提高，物價益發低落起來。

現在我們不講別的，單說通貨收縮和物價的關係。一般經濟學者都認爲通貨收縮是中國經濟恐慌主要的原因。例如國民政府的經濟顧問 Sir Arthur Salter 氏以爲中國從一九三二年所以陷入經濟的恐慌，第一因爲通貨的收縮，第二是政局的不安，內憂外患的交迫。我們在這裏不想對於 Salter 氏的主張，詳加評論；我們只想指明，通貨收縮決不是中國經濟恐慌的基本原因。不錯，通貨收縮能使流通過程發行窒礙；能使

信用事業難於進行。凡此諸端都能使經濟恐慌的發展，格外急速，格外尖銳。然而中國經濟恐慌的基本原因，我們却不得不求之於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半封建關係的統治。恐慌的基本現象是各項物價的跌落。誠然，中國的物價從一九三二年起便如江河日下，急速下降。

上海和華北批發物價

	上海	華北
1929年	104.5	111.08
1931年	129.2	122.55
1932年	112.4	113.36
1933年 6月	104.5	103.09
12月	98.4	93.06
1934年 6月	95.7	89.19
10月	96.1	92.65

中國各個生產部門就在這種物價狂跌聲中破滅的破滅，停滯的停滯；失業人數急激增多，而羣衆的貧困也益發加甚，然而這種物價狂跌的基本原因不在通貨的收縮，而在大衆購買力的降底。自然通貨的收縮是促進大衆購買力降低的有力因素；更進一步來說，通貨收縮是列強和國內銀行家和一般投機家爲要增加其自身的利潤，遂至犧牲了大衆的結果；這種結果會使中國商品的價格，格外跌落，因而使中國的經濟恐慌格外加深。所以按照我們的意見，1932年來國內通貨數量的激減

其與一般物價的跌落，自然保持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它和通貨膨脹人爲地提高物價一樣，近於人爲的方法，更加減低了商品的價格。（至於一般通貨，特別是現銀的減少，因爲爲量過多，馴至引起信用和本位貨的恐慌，那倒是目下已經存在的事實；不過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們以爲：通貨的收縮是加深並促進中國經濟恐慌的一個重要因素，却不是造成這種恐慌的基本原因。不過，這個因素，既是“重要”，就萬萬不容我們忽視。目下造成恐慌的基本原因，正在透過這種因素，來加強它們的作用，和完成對於大衆的榨取，大衆對於商品的購買力量正因爲通貨的出多進少，越加薄弱。同時，現銀的滾滾流出，對於金融總恐慌的爆發，作成最有力的槓桿。這樣，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秩序，將因通貨的減少全部混亂，使一般人所巴望的“復興”，終於成爲泡影。近來迭傳政府擬行通貨膨脹（如本月十七日因此謠言，標金飛漲三十餘元），這種辦法當然會因國內金融組織太不穩固，外人破壞力量，太不容易減除，不能公然實行。可是政府方面，因爲要挽救財政的困難，來暗底厲行濫發紙幣，却也未嘗不可能呢！

1934, 12, 15.

中國典當業的殞落過程

梁 心 沐

一 高利貸業中主要的一環——典當業

隨着“商品”這一範疇出現於人類歷史，又出現了“貨幣”這個範疇。商品流通發展到某種程度，當作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常常被人們作為儲藏手段儲藏起來；等到商品生產更高度地發展，貨幣又發生了一種新的機能：它不但能作為流通手段，儲藏手段，還作為支付的手段；高利貸就在這當作支付手段看的貨幣裏面產生出來。

高利貸資本和產業資本是大異其趣的。它不但不直接參加生產活動，並且從外部壓迫生產力，對生產力起着一種腐蝕的作用，它帶有濃厚的保守性和破壞性，它破壞價值法則，實行超經濟的剝削。所以，高利貸資本雖然在脫離生產活動這一點上和商業資本相同，然而它不能如商業資本一樣，對生產的發展起着某種推動扶掖的作用。

同時，高利貸資本和金融資本也完全不同。二者同樣的經營着一種寄生生活，然而寄生的對象不同，寄生的方式也兩樣。高利貸資本主要寄生於自有生產工具的小生產者身上，直接地，露骨地，實行剝削；金融資本却主要通過了產業資本家或履行產業資本家的機能，而寄生於勞動者身上。高利貸資本對於債主是資本，對於債戶一般講來只是單純的貨幣；而金融資本則不然，它在債主和債戶兩方看來，同樣都是資本，（在債戶手裏是產業資本的增大）。

總之，使高利貸資本別於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特徵，在於它的封建性和破壞性。

因此，高利貸業和一般工商業，銀行業全然兩樣，它的繁榮是建築在一般人民的貧窮上的。高利貸業的盛衰，常是和人民購買力的高下成反比例。我們不妨這樣說：人民購買力愈低，高利貸業就愈是有發展的可能。

不過，我們說高利貸的繁榮，建築在一般人民的貧窮上，這句話是有限度的。誰都知道，經營高利貸的人並不是“樂好善施”的慈善家，他們的目的是出貸的貨幣，加上由破壞價值法則剝削得來的一定量的貨幣，再回到他們手裏來的不斷循環。所以人民貧窮的程度，到連抵押品也羅掘俱窮的時候；同時又失去了償付息金，甚至償付本金的力量時候，高利貸者失却了剝削的對手，失却了財富增殖的保障和源泉，也就不得

不致落了。

所以，高利貸業是寄生於社會一般的貧困，和生產力極度的落後及黑暗上面的。古代社會中高利貸促成獨立自由民向奴隸及游民階級之沒落。而封建剝削極度展開下的印度農村，乃成爲東方高利貸之王國。而高利貸的沒落也以生產階級澈底破產爲條件，可是這個沒落並不表示着一定新的社會之到來。

高利貸業中最普遍的一環，在中國不用說是典當業。典當是鄉村中農民們所靠以通緩急的唯一的方，也是都市小生產者和無產者被殘酷剝削的“方便之門”。李景漢先生調查北平掛甲村100家農戶中，行典當借貸者計百分之31，廣州中山大學經濟調查處調查廣州311個工人家庭，行借貸者176家，平均每家佔24.7元之鉅，其用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日常消費。可見典當業和貧窮大眾的密切關聯。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中國典當業近來之沒落情形。

二 我國典當業之沒落及其掙扎

我國典當業，近來可說已無例外的陷入不景氣的深淵，並且大批大批地倒閉。現在且舉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下面：

江蘇 江蘇全省從前共有典當600餘家，今則僅存297家。

如僅就無錫一縣而言，從前有典當40餘家，今則先後閉歇，僅存了34家（詳見去年十月十五日無錫人報）上海華租界典當業，去年度停業者達30家（本年二月十一日大晚報）。就上海市特區典當業而論，在他們去年發表的報告中，謂二十二年十月至二十三年九月一年來當出款僅及去年之七成，即是說減去了百分之三十。特區典當業，21年度為39家，22年為35家，23年僅存31家。

浙江 杭州典當業在民國十七年統計，有二十二家，截至二十三年止，已次第倒閉達五家。去歲大結束中同康當又停歇，現存者僅十六家。二十三度均虧負頗鉅，總數達八萬元以上，咸有不可維持之勢（詳見二月二十六日東南日報）。

廣東 廣東省典當業，全省本有1200餘家，年來歇業者約三分之一。（詳見二月十八日大晚報）

蘇，浙，粵如此，其他省份亦不難想像了。

我們該還沒有忘記去年十月間北平當業巨擘黃耀庭以六十歲之老年服毒自殺這回事。黃耀庭綽號“當黃家”，在有清之季擁有當舖十餘處，“享樂過於萬都之君”，他的自殺，誠如“北平通訊”記者所說：“此真舊的封建社會資產份子將近衰落之哀耗”。

事實都在證明，中國典當業是在衰落了。

典當業的衰落雖然是不可挽救的趨勢，然而他們也以向

窮苦大眾加緊榨壓的方式掙扎着。採取縮短期限，增高利率。減低當值等等方法，企圖獲得補償。

因此江蘇各地典業紛紛要求省廳准予增加五厘利息，“俾垂危之典當業得一線生機”。江都，高郵兩縣典業，增加二厘五保管費，且已得省方批准。（詳見去年十二月四日新聞報）

北平社會局，前為取締北平當商重利盤剝，曾令北平當業實行減利，其限制辦法計四項：（1）當業應遵照中央法令，利息不得超過月利二分。（2）當本不足一元之零數均須一律按大洋照市價改收銅元，不得用零角或輔幣找零。（3）當商舊例計息，過五日即按整月計算，今後應改為未過十五日者按半月計息，過十六日者始按整個月付息。（4）當舖所發當票，應一律改用較厚堅韌之紙，印刷清楚，並將章則大概擇要載明。北平典當業公會奉令後，覆呈社會局：第二，第三，第四三項均可接受，惟最重要的第一項他們認為不能同意，反請准將當期縮短為十個月，將利息改為二分，附收棧租費一分。（詳見二月二十一日益世報）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只有要求增高利息和縮短當期，在“俾垂危之典業得一線生計”的口號下加強對“垂危”的貧苦大眾底盤剝。

三 更殘酷的剝削方式之代興

典當業雖然破壞等價法則實行封建性的剝削，但我們也不可忽視它下面這一點作用：即是它在剝削貧窮大眾中含有強心針式的救命作用。它剝削貧窮大眾，同時又使垂斃的剝削對象不絕如縷的延續着生命。由於典當業之紛紛倒閉，使貧窮大眾少被剝削的機會，似乎是好的現象，然而事實上這却是立刻宣布了貧窮大眾的死刑。於是有許多趁火打劫的人們在他們告貸無門的當兒設立了許多“代典”，“私押”，“小當”，以更殘酷，更毒辣的高利貸者的身份出現。同時，重利盤剝者，放印子錢者也大形活躍。

如福州典業紛紛倒閉及縮小範圍，“十成貨物只當一成”後，台民開設之私押，小當就乘機而起，“竟達三十餘家之多”，“期限四個月，利息五分”（詳見二月二日福建民報）。江蘇徐州，自民十七年後典當受戰禍影響，宣告停業，一般貧民因此大受打擊，於是投機取巧之份子，即經營押當放款。鄉間更有一種“搖當地畝”“借青麥”等等二重利剝削。南關謹豐典停業後，有本城某姓以款二百元，分向城廂內外茶店，浴室接洽放印子，計分十千，二十千，五十千，百千各項，每日抽回百分之十，百二十日抽完，這即是說債戶在四個月內所償還之本息，超過了十二倍！復有專營押當放賬者，利息以每月四分，五分，十分計算，凡持衣物首飾值十元者，僅押一元至二元，一百日為止期，逾期即沒收。（見去年十月九日申報徐州通訊）

這種例子雖然有點極端，但這都在本質地證明：一定社會機構允許乃至要求高利貸的存在，那末它不會自動的絕滅，反而採取百轉千迴的掙扎形態，以延長其生命。假使說更露骨的高利榨取形式，是舊式典當業殞落的一個必然結果；那末，銀行資本（中國銀行資本本質上是一種借貸資本）之典當化，又不得不說是安定農村秩序，實行新式的剝削，以解決過剩游資的另一種高利貸業之興起了。

四 銀行業之典當化及官營典當

高利貸業的經營，是最痛快的生財之道。在銀行業大量游資無出路，人民納稅能力疲憊不堪，財政十分困窮的現在，銀行家和各地當道便相率在救濟農村，復興農村等口號掩護之下，深入民間，經營着一種變相的高利貸業。他們“實利的動因”銀行家是希望將其游資追求着厚利，當道者是希望提高稅收。

銀行界經營着摩登典當（倉庫或儲押合作社），和小農放款等等，各地當局經營着農民借貸所，小本貸款處等等；山東，廣西，江西，甚至露骨地開辦着官當，公典。凡此種種，都成爲高利貸業的生力軍，同時因其放款利率較低，又替舊有典當業之殞落盡了速成的任務。

去年上海中國，交通，上海，浙江興業，金城等銀行直接投

資於農村者計：

中國	200萬元左右
交通	200萬元左右
上海	250——300萬元左右
浙江興業	200萬元左右
金城	150萬元左右

總數不下一千萬元。至於運輸，打包上各種間接放款，達五千萬元以上(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時事新報)。在中國廣大貧農羣看來，這數目不能謂大，但在銀行界自身看來，却不能謂小了。

這種所謂救濟農村和復興農村，對於“無以取信於人，亦無長物抵押”(引東南日報時評語)的貧窮大眾，當然是毫不相干。對於農村生產力，會引起什麼推進的作用，當然也屬疑問；這些資金，也許除一小部分借與中農貧農用於消費之外，大部分通過豪紳地主之荷包作為他們的剝削手段，和典當業同樣對生產力盡着破壞的任務。

銀行資本之侵入農村，已成為威脅舊式典當業的一個有力因素了。這個過程雖然也是形成鬥爭和掙扎，但一方面由於中國銀行資本本身的性質，和其充任外資觸手的任務；另一方面由於農村封建剝削關係之繼續維持，便在在透露着這樣真理：銀行資本之代替舊式典當業，並非帶來了典型的資本主義

的光明，而祇是舊式典當業機能的代替或融合罷了！

1935, 3, 15.

現階段各省財政的檢討

石 西 民

引 言

中國一向可以說是個“有財無政”的國家；有清一代是不消說，就是民國成立以來，情形依然未變。

就拿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各省財政說，隨着二十餘年來封建式的割據，以及連年繼續不斷的混戰，收支系統既弄得紊亂不堪，而人民的負擔也繁重萬分。政令不出都門的北京政府，雖然也曾幾次的想法整頓各省地方與中央的財政，並且陸續地頒佈過許多劃分中央地方收支系統的法規，但這都是紙上空談，毫無效果。事實上當時各地的封建軍閥，都抱着“有槍即有土，有土即有財”主義，他們千方百計設法在自己統轄着的地盤內，盡量聚斂和搜刮；中央的政令，對他們是不生一毫一微的力量的。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無論從那方面說來，總使整個的中國社會呈現一些新的氣象！民國十七年南京召開

了第一次財政會議，就是一例。該會將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支系統，重新作一劃分。在那次大會上決定了將土地稅，契稅等劃為地方收入，同時為了抵補當時實行的裁厘損失，又將營業稅劃歸地方。這從多年來遷延未決的收支劃分上說，可說是新的變動帶來了一大成功。到了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公佈預算收支分類標準以後，中央和地方收支制度上的劃分，才算正式確立。關於這一預算收支分類標準，就是根據十七年第一次財政會議劃分系統作藍本的。

中央和地方收支的系統，雖然已具相當的規模，可是我們回顧一下，近二三年來各省財政的收支概況，那末事實依然是畸形和紊亂！像甘肅至今尚流行著撥款制度，青海四川以及其它邊遠省份。根本不會實行過預算制度；就是內地各行省每年由財政當局所擬定的概算。也只是一紙空文；概算所規定的款額與事實上的收支額數，常常是相差很遠。比方，廣東二十二年度歲出概算中原來對債務費支出是列為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但實際支出只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不及預算的三分之一；所謂預算的正確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為上面所說的紊亂和欠缺“精確”的統計材料，使得一般人害怕來談地方財政，但這是錯誤的。我們絲毫不能忽視地方財政的重要。

中國各省財政的紊亂，畸形和病態，十足就是中國半殖民

地特質的反映，事實上我們要理解各省財政的病態及其前途，也應該從半殖民地這一特質出發，下面打算從收入，支出，赤字現狀，以及赤字救濟四方面，來加以檢討。

一 從收入方面來看各省財政

我們從民國二十年度與二十一年度各省財政收入看來，佔收入最多數的要算田賦，次之是營業稅，第三要算契稅了。二十年度平均各省田賦收入，佔總收入的二八，三七%，二十一年度更高，佔三三，五三%，營業稅的收入，各省平均於二十年度佔13.14%，二十一年度佔15.65%，契稅二十年度各省平均是3.85%，二十一年度為5.46%。此外列入省稅以內的船捐，房捐等收入，其數目非常微少。

二十二年度和二十三年度各省的經常稅收，重要各部門依然與二十年度和二十一年度一致，比方拿田賦一項來說，山西省二十三年度田賦收入為六百五十餘萬元，佔統收入的40%，江蘇也佔37%光景，此外不必細舉。

除了上述幾種重要稅收外，佔各省財政收入大宗的，還有幾種是極不合理的，那就是債款收入，特稅和禁煙罰款，以及各種籌餉收入。各省當局因近年稅收短絀，支出膨脹，大量財政赤字往往是藉借債來平衡的，富庶的江浙，也是如此。¹二十三年度江蘇省預算，債款收入佔總收入22.32%，最近蘇省財

政廳所公佈的二十四年度概算內，公債收入爲六百萬元，僅次於田賦收入而已，浙省財政，據當局所發表的談話，二十四年度浙省債務支出應由六百萬元增至八百萬元，才夠分配，因爲二十三年度又借進一千八百餘萬元債款了。從這裏可以知道，當局對公債的發行壓根兒就不會考慮到一般人民的負擔能力以及市場的消納能力；一味以平衡赤字爲其發行的標準。湖北省二十三年度公債收入爲六百六十餘萬元，佔收入的第一位。湖南二十四年度概算中，債款收入也佔二百四十餘萬元，其他各省的情形亦無二致。第二我們再來說鴉片稅在各省財政上的重要。我們知道，現在中國正實行着鴉片公賣政策，鴉片稅收，差不多已成爲大多數省份一大財源。所不同的只是對鴉片稅依賴程度的深淺不同罷了。據煙禍年鑑的記載，雲南省全部煙土稅及官營煙土公司的利潤，年達五千餘萬元，超過省預算收入三倍以上。二十二年度廣西省收入中，禁煙罰金爲一千八百餘萬元，與地方合計佔總收入的35%（見5.27益世報）。廣東二十三年度禁煙收入爲九百餘萬元。甘肅特稅收入四百萬元，僅次於田賦，佔收入第二位。湖北省二十三年度特稅協款爲四百三十萬元，數目的鉅大也僅次於債款收入而佔收入的第二位，這就是主要各省的情形。

此外，我們要附帶地指出第三種收入“籌餉”。各省的賭捐收入之類，要以廣東省爲最顯著。二十二年度廣東省庫收入，以

籌餉收入爲最鉅，計毫洋一千五百餘萬元，約佔全收入的30%。

藉公債收入來彌補財政的不足，誠如後文所述，是極不合理的。至於鴉片稅和賭捐等等戕害民族健全的收入，也無異是飲鴆止渴都是病態的現象。但是田賦營業稅等等收入，從現階段中國國民經濟的廢墟上看來，當然也不是良稅。譬如田賦我們僅就中國目前田賦徵收制度的不良和輕重不等，以及目前實行清丈之種種困難再加上附稅的繁重等等而言，已可看出田賦是怎樣一個東西。營業稅在目前工商凋敝人民購買力極度衰弱的時候，還往往會成爲摧殘商業的禍源，何況營業稅本身還是一種容易轉嫁的消費稅呢，所以今日中國各省稅收中營業稅的增加，也並不見得就是可喜的現象。我們再拿契稅來看，契稅在租稅原理上說，它只是一筆當局辦理人民私產轉移的規費，而不能說是一種租稅的，所以契稅的收入增加，也不是良好的現象。

上面我們從收入方面看來，大致已將各省財政狀況及不健全處闡明。不過，收入縱然不健全，要是支出是很健全的話。那末其影響又稍有不同，可是各省的支出方面亦同樣不合理，我們就接着加以分析。

二 從支出方面來看各省財政

民國二十年度與二十一年度各省平均支出，以公安費和

債務費支出爲大宗。二十年度各省平均公安費支出佔 15.19%，二十一年度佔 17.90%。二十年度債務費支出平均是 18.23%，二十一年度佔 11.96%。這種情形，近二年來依然繼續着，並且變本加厲。近年來各省發行公債及借款的繼續增多，對債務的支出自然逐日在激增。這點留在後面再說。

此外，我們看近幾年來各省財政支出極不合理的，還有二種現象。第一有很多的省份，儘被巨額軍費所苦。廣西每年收入合計約爲五千餘萬元毫幣，而軍費支出竟佔支出總額 40%。二十二年度粵省軍費支出爲四千二百萬毫洋，佔國庫歲入的 80% 以上。我們知道二十二年度廣東的國庫歲入，有一千八百餘萬毫洋爲省庫撥款。因此，粵省的省財政很明顯地就給大量軍費所累了。去年下半年閩省因剿赤關係，軍事費佔總支出的 43.38%。甘肅省的財政，歷年在撥款制下，十九都是軍費支出，最近甘財政廳長朱鐸民氏多方設計的結果所擬定的二十四年度收支預算，收入是八百五十餘萬元，而拚命削減的結果，軍費支出依然超過收入的半數，爲四百七十九萬餘元。山西省二十三年度墊支軍費爲八百六十萬餘元。佔全省收入 57%。軍費脅迫省財政的嚴重可以概見，在華北如綏遠察哈爾，甯夏等省，軍費的繁重，使省財政不能合理，大致相同。就是拿浙江來說，前年討閩之役以及去年羅方共軍擾亂，政府幾次在浙境用兵的結果，中央欠下四百餘萬浙省地方墊款，至今成爲

浙省財政上的一個嚴重問題。

除了軍費支出以外，隨着近年剿共討逆等軍事的緊張，各種超經濟性的建設如公路之類，也日益興起。因此，內地的農民固然弄得焦頭爛額，但各省當局也苦於建設經濟籌措的不易。去年浙江一省所需建築公路經費為七百萬元，邊防公路經費為一千萬元；雖說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中央補助，但大部皆須省庫負擔。我們還能記得廢歷年關，浙省築路包商，天天羣聚建設廳門口討債的熱鬧情景。浙江本是富庶的省份，可是因為近年建設公路等過分膨脹的結果，省財也弄得一貧如洗了。浙江是如此，毗鄰的江蘇也沒有兩樣。去年江蘇省建設費的支出是八百四十餘萬元；廣東建設費在二十二年度為八百萬毫洋，佔省庫支出的首席，大部分脫離了生產性而適應軍事要求的建設經費，在這民困日深的時候，總不能貿然使我們贊美吧？二十二年度廣西省交通與建設經費的支出，也達三百餘萬毫洋。湖北省二十四年度新預算又要添一筆三百萬元的建設經費，這種不合理的建設經費的支出，現在還是一天天在增多着啊！

以上我們已把各省財政重要各部門的支出情形加以回顧，我們知道各省支出是極其不合理的，非生產的各種支出佔總支出的絕對多數。並且照這情形看來，今後不僅不會減少，並且還要增大起來。這種不生產的支出，在整個國民經濟上

講，不僅不能幫助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反而更易促進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到來。

現階段的各省財政，除開在收入支出兩方面皆顯現其不合理的病態以外，當前最嚴重的問題，是在各省普通的赤字財政無法彌補，下面開始來看看各省窮困的財政現狀。

三 嚴重萬分的赤字問題

近年來各省財政歲入方面雖然極度增加，人民負擔也益形酷重，這我們只要看佔省地方財政收入最大的田賦一項，稅率與日俱增的形勢就可明白。據去年中央農業實驗所作作全國二十二省六百八十七縣的農民租稅負擔調查，發現1933年各地租稅較二年前增加甚多；平均水田稅率，在1931年是當田價的2.07%，1932年增至2.37%，1933年更增至2.6%。旱田的稅率，1931年當田價的2.36%，1932年增至2.50%，1933年更增至2.80%。不過人民的負擔是增大了，但畢竟還是趕不上連年膨脹的支出，財政難關差不多成爲全國各省當局焦慮的一大問題。

所謂財政難關的暴露，最明顯的就是收支不敷，巨大的赤字煩惱着衮衮要人。譬如湖南最近編製二十四年度預算，發現前四年度預算虧空一百四十萬元，因此使從事編審的當局煞費周章。四月十九日大晚報載江蘇省二十四年度預算不敷一

百四十萬元，(當然二十四年度六百萬債款收入，尙未計算在內。)浙江省二十三年度前十個月省財政實際收入一千四百四十萬七千餘元，連上年度結轉各項收款不及一千四百五十萬元，而實際支出總額在二千一百五十四萬元，相抵不敷凡七百零五萬元；這樣鉅額的赤字，就只有靠借債來換度了，華南的廣東二十二年度因收支不敷一千三百餘萬元，結果預算不能成立；最近因五百萬庫券已經立法院通過准予發行，於二十四年度預算編製上自然給以一大幫助。據粵省統計局調查，二十四年度歲出入概算已編竣，歲入約五千六百萬元，歲出六千餘萬元，相抵不敷依然達四百萬之鉅。此外如：甘肅二十三年度虧三百五十萬，二十四年度虧二百五十萬元；豫省二十三年度虧一百萬；冀省二十三年度收支情形，據財政廳長魯穆庭談，不敷二百萬元，債款虧欠尙不在內；滇二十三年度省庫收入一千二百餘萬滇洋，支出一千五百三十萬滇洋。不敷三百二十九萬元；這幾省的拮据情景，到今年度來依然是繼續下去。魯穆庭曾說：“二十四年度已開始，彌補前虧既無開源辦法，惟有節流”(見七月三日申報)。節流已不是新而動聽的名詞了，這只是令人感到渺茫和空虛！

造成這種嚴重的赤字財政的原因，上面我們已經說過，即非生產的支出過度膨脹。但是到目前，財政當局却深深感到噬臍之痛了！非生產支出的膨脹一天天削弱了大衆的納稅能力，

而且日益深化，這無疑的已變成促進今日各省財政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了。

湖北省田賦徵收，平均只及五成！湖南省最近開徵上忙錢糧，員警不分晝夜四出催徵，但毫無效果。湘省二十三年田賦，能夠徵及五分之一的縣份，已算是很好的了。蘇浙一帶富庶區域，年來因天災人禍交相侵迫的結果，滯納田賦的成數也一年年增加，這確是嚴重的現象！

四 各省平衡赤字的對策

民國成立以來，各省當局爲了應付竭度膨脹的支出，所採的對策真是五花八門，不勝列舉。興辦各種雜稅和提高稅率是普遍全國的現象；像四川等省田賦預徵到民國七十幾年；此外，在昔時很多省份皆以發行地方鈔票來彌補財政上收入的不足。彌補的數目大了。鈔票的濫發遂走到極高度，一朝這種虛偽的信用崩潰下來。人民就大喫其虧。東三省著名的奉票，山西的晉鈔，馮玉祥時代的西北銀行紙幣，湖南省銀行的省鈔以及山東省的軍用票等等，現在皆成爲永雋慘痛紀念的歷史上的陳跡了。

目前的情形，原則上依舊與昔日沒有兩樣。譬如說，今年安徽財政當局，鑑庫幣奇絀，支用浩繁，決定將營業屠宰等稅增徵二成。這還不是同樣的增稅政策嗎？增稅政策現在是採取

各種形式在實行的。廣東積極在進行田賦改爲地價稅，據說改徵地價稅以後每年可以增稅千餘萬元，其它如五月二十九日大公報所載，皖省當塗縣土地陳報後，增田賦二十餘萬元，甯省清丈結果，溢出熟田一百萬畝以上，佔原額三分之二以上。土地稅收的整理是對的，但在現下當局增加稅收的企圖之下，對人民是否有利，還須詳加考慮呢？！

增稅政策的另一種現象，是隨着近來甚囂塵上的省統制經濟而來的外貨入境的保護稅，湖南廣東皆醞釀很久，二月十三日香港工商日報載粵省外省貨物入口保護稅如能實現，每年又可增加一千餘萬元收入。不過這種推進市場割據的惡稅，終以工商業疊次呼籲奔走的結果，至今還未試行。

發行不能兌現的地方紙幣以彌補赤字的方法，近年來因中央權力相當擴大相當制止地方當局無限發鈔以來，在形式上已起了變化。雲南省因爲歷年濫發紙幣（富滇銀行發行額超過九千二百萬元），實際早已喪失代替硬幣的價值。當局近來感到稅收非常短絀，尤其以富滇紙幣收入，相差更大；所以爲了解決財政危機，雖然這種紙幣是政府當局所發出去的東西，可是當局又不准人民以富滇紙幣還糧，改徵滇省半開銀幣。

近來各省當局對歷年舊賦追徵不遺餘力，江南數省尤爲積極，但終因人民元氣大傷，結果還是榨不出油來。

今日各省當局所藉以平衡其赤字財政的主要辦法，已漸

漸進而為公債政策了。民國以來，地方公債庫券的發行，數量極其微細；但是最近二年，地方公債的發行却突然上昇。

各省發行公債激增的情形，大致在民國十八九年間，每年發行額各僅二千餘萬元，二十年約三千餘萬元，二十一二兩年各為五千萬元左右，最近二年發行額較前更巨，去年約七八千萬，今年至今日為止，已發將發已達一萬五六千萬元之譜。估計各省市公債現負總額，除已經清償外，還有三萬萬元，並且各項短期借款尚不在內（見五月十九日申報）。據張鑫君私人的估計，自去年迄今日止，無論已發未發，公債名稱達四十九種，除重複及尚停頓者外，總計公債庫券借款共達三萬四千六百五十萬元之多（見161號政治評論）。據浙財廳長徐青甫說，浙省截至最近止，負債已逾五千萬元了！四川歷年發行公債總計已達八千七百餘萬元，到現在要想舉債，也不容易籌出抵押和擔保品來了！公債的歸結，依然是人民來負擔，這實在等於變相的增稅。在這民窮財盡的時候，人民已供獻出最後一滴血，增稅是困難的事，公債政策何嘗不是一條末路呢？

五 結語

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各省財政危機的基本所在，乃是內外夾攻下，隨着國民經濟破產而形成的一般大衆納稅能力的減弱。

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在飢寒交迫中輟轉流離，老弱的是捲沒在溝壑中去了，壯年的耐不住飢寒挺而走險，整個中國社會在不安中。在這樣一個形勢之下，中國各省的財政會有出路嗎？！高貴而學識豐富的學者們，也會在這問題上費過心血，他們認為，中國現在各省的財政危機，大半是由於徵收制度不良所造成的，所以他們竭力主張改良稅制。又有人說，地方財政的拮据，重要原因是由於中央和地方稅收系統劃分得太不平等。地方收入太少了。所以地方一切事業不能發展。然而問題已經非常明白，困難不在此種技術上的周密與否，而在人民繳不繳出錢來，所以他們這種高明的見解是皮相的，而不是針對着本質。

最後我們指出，各省財政危機的解救，是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危機解救的一環節，因此，各省財政危機的解決，一定要先使整個國民經濟能向前發展！借債增稅固然是圖眼前一時補救的辦法（而現在且已到了增稅舉債都不可能的形勢），就是所謂改良稅制也同樣要在整個國民經濟有辦法以後，才有可能。不從根本推進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問題是無從解決的！

1935, 7, 27。

中國關稅底二重性

徐 雪 寒

中國經濟及政治上半殖民地的特質，在關稅問題上表現得異常明顯。帝國主義（尤以英國站在歷史上主動的地位）全部壟斷及主宰下的中國關稅權，一方面永久保證了商品輸入優越的可能，資本輸入最大的自由；這就是說，在純經濟的作用上，將中國停滯在半封建的飢餓線上，阻礙它向資本主義道路的轉化。另一方面，關稅不僅是償付外債（多半是助長內戰的政治借款）的最有力的保證品，同時通過了關稅而造成對於地方政權的扶翼或是幫助。這兩種作用自然互為因果，但前者又較後者更為主要，更為露骨。

自從1842年江甯條約規定了進口值百抽五的單一稅制以後，進口稅則的修改，到如今已有九次，但是始終不能改變了中國關稅上述的本質。1858年的修改，是爲了當時物價跌落，外商所納關稅，超過了值百抽五的規定。1902年的修改，因爲物價上漲，實際所抽者遠不及值百抽五，因而使關稅不足攤還賠款本息，但修改結果，仍不過值百抽四。1918年第三次的修

改，更以隨從英日兩國參加歐戰爲交換條件。至於1922年的第四次修改，那就是爲了實現華府會議協議辦法的第一步。其後由於1923年廣州國民政府強硬實行二·五附稅，而漸次由北京政府推廣行之，這可以說是第四次修改的繼續，即以華府會議協議精神爲根據。上述五次修改在根本上都是以承認帝國主義繼續控制中國關稅權爲前提，即是不過懇請帝國主義履行其自己的允諾。這也同是中國修改關稅則一貫的特徵。同時，在這個期間，因爲太平洋均勢的維持，各帝國主義對於操縱及決定中國關稅權，也是相當地一致的。

這裏，由於帝國主義對於中國所施行的強壓方法富於彈性，近年來在不根本危及其在華利益下，中國關稅進口稅則便有幾次較大的修改。這種修改在多種企圖底下，便被裝飾成爲關稅業已完全“自主”的樣子。1928年南京政府首先和美國訂立整理兩國關稅關係條約，而獲得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這種條約上的自主，接着也得到了英法德意等七國的承認，可是這種“關稅完全自主”底承認，在實踐上是有條件的。即中國在修改關稅條約中又得允准“各國人民完納關稅及其他各項稅款，應爲無區別待遇”。這個規定，在一方面是重新確立了帝國主義操縱中國關稅的特權，另一方面招徠了一種重大的變化，就是因爲稅率上得有些微的增加，愈益增大了中國政府對於關稅收入的依賴，而更發揮了財政關稅的性能。這

種性能也就限制了中國關稅成爲保護民族經濟的武器。根據這種條約，在同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便宣布七級稅率，將海關進口稅率改爲七級徵收，最低徵百分之七·五，最高徵百分之二七·五，其實這還是以1925年關稅特別會議英美日專門委員會所提七級稅率爲主要基礎的。

關稅稅率的能否相當增減，並非決定一國關稅是否發揮其半殖民地機能的主要條件。問題的核心是在於關稅增減是適應了怎樣的要求，即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自從世界經濟恐慌長期繼續以來，自由貿易便被徹底排除，帝國主義國家愈益增強了關稅壁壘，這就是說，獨佔資本將關稅轉化爲維護個別階級沒落命運的重要工具之一，而造成了增進對外輸出及調節對外輸入的基礎。但在半殖民地國家，在中國，由於各國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一致對抗陣營的破裂，使中國關稅表面上雖已自主，可是關稅稅率的變更，仍不得不充份反映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消長。即關稅的增減，是以適應特定帝國主義國家的要求爲標準的。這是自從上述1928年第六次修改爲七級稅後，最近四次修改進口稅率的主要特點之一。至於193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頒佈的國定稅則，將稅則分十二級征稅，其中最低稅率爲百分之五，最高增至百分之五十。這種稅率的相當提高，其高度遠不及帝國主義爲限制進口而施行的高率關稅；而且就是這次稅則的改定，也以簽訂1930年中日

兩國互惠協定爲交換條件，才能獲得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修改稅率的同意。因而和互惠協定有關的三十餘種日本進口貨，便不能按照這次國定稅則課稅。所謂互惠，只是片面協定的別名罷了。

已被承認爲自主了的中國關稅，其稅率增減主要以適應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消長和要求爲準則，這種精神，在最近兩次的稅率修改中，表現得更爲明顯，也更爲複雜。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英美在進出口貿易上，突飛猛進，英美資本在華的比重也驟見增大，同時在中國方面，仰仗英美以減輕日本威脅這種企圖也特別迫切。所以當1933年五月十六日中日互惠協定滿期後，在同月二十二日便宣佈新稅則（這是第八次修改的），這次稅率的變動增減，非常劇烈。增稅方面是紙，煤，棉貨，人造絲及其製品，魚介海產，煙，酒，等項，主要是日本輸入的；減稅方面是機器，珠寶，汽油，木材，車輛等項，主要是英美兩國輸入的。而且從增減兩者比較起來，增稅貨物還佔着主要部份，因之日本進口貨物，受到特別重大的打擊。從這種增減貨物上看來，在華帝國主義間力的變動之決定影響，是很爲明顯的。這種關稅的變更，新近因爲日本在東北新殖民地勢力的鞏固，對於華北華南武裝威脅的增大，以及美國在當前世界掠奪戰爭準備未完成前態度底軟弱，都需要重新變換。1934年7月頒佈的第九次修改進口稅則，便是適應這種要求的產物。據

中國銀行統計，主要減稅物品貿易額，日本佔13.11，英國佔12.85，美國佔0.54；主要增稅物品貿易額，美國佔60.00，英國佔47.29，日本佔46.28。這裏，日本和美國，顯然恰巧立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到了最近，中政會應在華日商棉紡廠主人的要求，允准將此次新頒稅則所增加的棉花稅，在輸出棉紗時可以將新增部份退回，而助張了在華日紗廠的活動，實際是將關稅自主的真實內容，更露骨地暴露了。實際上，這種修改稅率的“精神”一定會愈加露骨地充實起來，不看見“滿洲國”關稅嗎？

中國關稅始終不能自主，這祇是特徵之一，其另一方面是：中國關稅以財政收入為最主要目標。而在實踐的意義上，這兩者是互相作用而不能分離的。因為不能自主，所以使財政作用特別加強；因為以財政為關稅目的，所以也犯不着要求真正的自主，用來保護民族經濟。上面已經指出，財政關稅底作用，自從1928年七級稅率時代起，便特別加強起來。不用說，以財政收入為關稅增減的標準，它同時又須以適應帝國主義的要求為前提。也正因為關稅的增減，主要是以財政收入為目的，所以不至危及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繼續增漲，所以才能得到帝國主義者的允准。關稅收入佔中央財政總收入的百分比，在1916年是16.76%，1928年增至41.23%，1931年竟達到54.11%。其後因東北失陷，關稅每年損失四千萬元，比重稍低，但19

32年仍達51.75%，1933年再增至52.12%（根據1934年申報年鑑）。這裏，在中央總收入中已經加入了用公債等來彌補不足這種收入，否則，關稅所佔的比重更當重大。1934年關稅收入共計國幣三萬三千四百六十萬元，對於總收入底比例雖尚未知，但是和1933年關稅收入為三萬三千九百五十萬元相去無幾，它在總收入中的比例一定也不至十分低下。關稅收入對於中國財政上佔了這樣重大的比重，不僅構成了半殖民地國家財政的特徵，同時又使關稅政策愈益遠離了國民經濟的要求，而完全轉化為增加財政收入的對象。由於這種作用的日益增強，必然造成了這幾種重要現象：第一，稅率的增減，完全以能否增加稅收為目的，不但不以保護民族工業為動機，反而為增加稅收而採取有害民族工業的稅率。就1934年7月的新進口稅而論，增稅貨物大半是必需品，並不能因之而減少輸入，減稅貨物却因之能大量入口，而威脅民族工業底市場；可是兩者都使關稅收入有增加的可能。不僅關稅如此，國內統稅不合理的稅級，主要原因也在此。第二，中國國外貿易經常的入超，使進口稅佔關稅收入的最主要的部份，1933年進口正附稅為148,932,000金單位，而出口正附稅僅有25,743,000元；1934年進口正附稅為145,900,000金單位，而出口正附稅僅27,100,000元。在財政收入主要仰仗於關稅時，一方面使關稅不能發揮挽回入超，平衡國際收支的主要功能；一方面由於企圖增

加輸入額以增加關稅收入底意念，反而因財政危機而特別促進。第三，這對於助長土產輸出時，也同樣是一個障礙。譬如1934年六月二十一日所頒佈的出口新稅則，其免稅或減輕稅率的部分，都是并非主要出口商品，至於煙葉等甚至反而增稅；這種稅則的改訂，站在保護意義上，遠不若站在增進稅收上的意義為大。第四，關稅的財政性，每每不得以接受帝國主義者的要求為交換條件。1934年9月間盛傳財部將在九龍甚至在香港設關，其主要動機便在避免地方政府壟斷關稅收入，而增加中央稅收。十一月十日上海每日新聞報告，英國以中國答應廣九粵漢兩路接軌為九龍或香港設關的主要交換條件，這不過是透露了真象的一面罷了。

總結起來說，中國關稅的主要特徵，是半殖民地性和財政性。前者不會因為表面上的自主而引起本質上的變化；尤其是最近，列強在華日趨尖銳的鬭爭，在關稅稅率的變動上充分反映出來。後者的傾向，近來特別加強，而以掩護及有利於前者為其存在的真實前提。1934年新稅則是上述兩者統一的產物。這種特徵，必然隨着國民經濟愈形崩潰，外資統治愈形加強，而更加顯明起來。至於在日本武裝勢力直接威脅之下，華北平津一帶，華南福廈諸埠，偷稅漏私無顧忌的盛行，關務人員慘被宰害，祇不過是中國關務淪陷到純粹殖民地化的前奏曲！顯然，關稅問題不是已經消除，而是現階段整個中國經濟問題中急待解決的一個對象。

1935, 1, 5夜。

目下的食鹽問題與新鹽法

應 墨 如

一 食鹽問題底主要癥結

中國食鹽問題（同時也是鹽稅問題）的癥結，第一點是：目下中國大眾的全部或大部是在“淡食”和食用不衛生的劣質食鹽的狀態之下過生活，因而，食鹽的消費量是在日趨減縮的過程中。當前農業恐慌的日益加強，農產物價的狂跌，農村經濟陷於極度的破產，農民購買力的低下，同時，高率正附稅的苛征，以及鹽商故意抬高鹽價的結果，更使農民大眾連少量食鹽都無力講買；他們或者是自晒私鹽，或者竟完全淡食。他們的生活，已至只能顧到所得食物是否能夠充飢，談不上該項物味之美惡的境地了。例如安徽婺源浙江西部各農村，自從去年實行食鹽公賣後，鹽價抬高一倍有餘，因此而大鬧鹽慌。福建鹽商抬價情形，更為別處所少見，計由石碼運鹽至長汀，每擔原價連稅款運費在內，只須十元左右，而賣價竟至四十元；連

城每擔原本不過八九元，而賣價却在二十元以上。同樣，江蘇淮陰，近來因為“鹽商對於鹽斤售價突漲，計每包非有九元左右不賣，一般貧苦農民，只得實行淡食；甚有執帚遍掃斤埕，自行濾晒一種味苦微鹹的小鹽充食者”（新聞報1, 16）。這種小鹽即是所謂含鹹性的硝鹽，其不合衛生是盡人皆知（食鹽以所含氯化鈉之成分而分兩等，食鹽含90%以上的氯化鈉者為一等鹽，含85%以上者為二等鹽，未滿此者，不得作為食鹽）。然而，因為鹽斤的高價，以及農民自身購買力的薄弱，終於驅使他們不得不食用不合理的代用品了。此種情形，尤以在山東和河北二處為甚，因為該地土質宜於晒製硝鹽，而官鹽價格又高於硝鹽三倍。去年災後，農民就更無餘錢買鹽，譬如浙江江山的災民，“因無錢買鹽，淡食蕨根，以致反胃嘔吐，奄奄垂斃”（十月十四日申報）。

其次，中國食鹽問題的第二點是：中國各鹽區的鹽民和鹽工是正在半飢餓和半疾病的牛馬生活當中掙扎，因而在食鹽的生產和運銷兩方面發生了極度的不安。浙江鎮海的挑鹽肩販為欲減輕每擔所負的鹽稅，他們是超越了本身體力的限度，挑着每擔二百斤的重負，但查出後還須受罰，於是他們罷運了。同省餘姚的鹽民，因為浙東公廠經理停發年終預支的款項，使得他們“家無餘糧，妻啼子號”，於是他們“扶老攜幼，聚眾數千”，包圍公廠而環請了。再如去年十二圩的鹽工，因為反

對改帆運爲輪運而一齊爲着自身利益而奮鬥的餘波，到現在還沒有完全休止，這更是衆所周知，印人腦腑而永不能忘去的事實。一般入“只看見他們支持落後的帆運，排斥進步的輪運，只看見他們維持最小單位的生產，排斥前進的鹽廠，只看見他們私煎鹹泥鹹水，破壞鹽場的生產”，但是他們看落了驅使着這些鹽工沉溺於落後因素之中的不合理的現社會底諸條件（請參看中國經濟論文集第一集周文彬君所著動盪中的中國鹽工和鹽民）。中國的鹽工和鹽民是在怎樣的一種不安狀態之下生活，以及各種不安狀態如何影響食鹽的銷數，是可不不言而喻了。

第三，帝國主義的軍事侵佔及其傾銷，成爲近年鹽稅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爲要恢復這原有稅收起見，增稅政策的厲行，遂使食鹽問題的嚴重程度更加深刻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佔東北四省，使鹽稅收入受到怎樣的影響，一看遼甯鹽區的鹽稅對全國各區總額的百分比就可明白。

	民十九年		民二十年	
	稅額	百分比	稅額	百分比
遼甯區	25,020,382元	18%弱	20,925,505元	12%弱
全國總額	139,391,487元	100	176,651,151元	100

（註：根據廿三年份申報年鑑。）

遼甯是中國第一個大鹽產區。它每年的稅收要在長蘆淮北等鹽產區之上，它在全國鹽稅收入的比例是如上述。因爲它

的失陷，中央鹽稅收入總額的減少有如下的情形：

民國廿年	176,651,152元
民國廿一年	153,121,717元
民國廿二年	156,659,427元

其次，東北淪陷後的“滿鹽”侵入華北，奪去長蘆區的大部鹽銷市場，更使此種減少傾向格外加強。同時安南食鹽在廣西的傾銷，也成為粵鹽銷路的死敵。對此，財政當局並不取完全的退却主義，他需要保持原來的稅額；但是他的進攻方向是朝着另一面發展，即是朝着增稅政策而大踏步前進。總計自民國二十年到現在，中央政府對於鹽稅率的增高已有三次：第一次為民國廿一年七月整理各產鹽區的稅率，長蘆，山東，淮北，海州，兩浙和松江六區底各個場岸，其增加稅額自一二角至一元四五角不等，最高總額每擔竟達六元有餘；因此廿二年的鹽稅就較廿一年有略微上升的趨勢。第二次是廿二年十月為劃一各地稅率而製成的整理各區鹽稅的暫行稅率表，計其中因增稅結果稅額最高者更達十三元二角，第三次是廿三年一月起所實行的新衡制，即改每斤十六兩八錢的司馬秤為十三兩一錢的市秤，表面上稅率並未增加，事實上是增重了25%以上，“稅收激增”自是意中事。但是此等稅額之繼長增高，是不能超過某種限度的；假使長此以往，鹽稅收入必以總崩潰的形式或停滯的形式而或急或慢地衰退下去。

第四，地方當局的政治割據形態的存在，截留稅款和增征附稅成爲常事；同時，官僚機關的龐大無當以及他們的舞弊中飽，鹽稅的一部或大部就不會流入南京政府的財庫；因而財政當局愈想從增高稅率這一手段彌補此種缺陷。關於地方當局如何處置這筆稅款的例子，可以湖南湘岸樞運局每年一千四百萬元以上的稅收，完全撥作該省四路軍軍費一事，作爲典型的代表。至於四川廣東自收自支的情形，更非一朝一夕之事。此外河北以及密邇京都的皖贛，他們是如何徵收繁重的附加鹽稅，從最近財政當局通令各該省以後不得再征附捐一點，可以證明無遺，此外，每年鹽務費用的支出，在總稅收中所佔的百分比的重大（廿二年該項費用支出爲18,359,029元，占全收入的12%以上），以及像去年河南鹽務收稅總局長之侵吞百萬餘元的鹽稅，兩浙稅警分隊長之因賄而放走私鹽。所有這些事實，指明鹽稅一項，南京政府實難囊括無遺，因而財政當局之要求解決該項問題，也就迫不及待了。

二 新鹽法底真實意義及其前途

因爲上述種種事實的存在，於是所謂新鹽法就沛然降臨。它雖早被公佈於民國二十年五月，但是直至去年十二月才被五中全會所提起和重視。現在我們要問：它究竟能將問題解決到怎樣的程度呢？

新鹽法共七章三十九條，其中最主要的同時亦是最爲人所稱羨不置的有四點：1. 破除專商引岸；2. 整理產場；3. 劃一稅率；4. 改革鹽務機關。而第二點整理產場又分三大項：裁併不合理的鹽場，建築倉坨。檢查鹽質。

我們先講第一點。新鹽法開宗明義的第一條是：“鹽就場徵稅，任人民自由買賣，無論何人不能壟斷”。可見新鹽法的最主要的企圖，是想在專商引岸制度的廢墟之上建立“自由買賣”的王國，而這“王國”很明白地必須在“就場徵稅”之後才能“自由”，可是，海岸數千里，鹽灶數萬處，要零星的徵收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場徵稅”又必須是以第二點的裁併不合理的鹽場和建築倉坨二項爲前提，建築倉坨的經費是從征收鹽運附捐項下來的，每運一石，帶徵一角，這是在“自由王國”降臨之前加給人民的負擔。以淮北爲例，自從民國二十二年底至民國廿三年止，據說鹽運附捐已有三百萬元了，最近鹽坨也在着手建築了，那末除掉川南，長蘆，江北，晉北以及淮北等區外，“自由王國”的降臨尚須數年之後才能成爲事實。因爲此外各區直到現在還不會徵收作爲這種用途的鹽運附捐，除非他們向銀行家去直接求助。即使倉坨完成了，鹽也“就場徵稅”了，專商引岸制度廢除了，“自由王國”實現了，可是在這金融資本統治一切的世界，銀行庫存中的游資，將很快的侵入。那時候“自由”馬上轉變爲“獨佔”也是一件洞若觀火的事實。年來上

海中國等銀行替代各鹽商預繳場稅一事，可以作為牠的例證。不過現實還不能如我們假定的那樣便利地進行，譬如山東的東網公所以及河北的蘆網公所正以聳聽的危言來阻止政府當局實施新鹽法，同時銀行資本家因為鹽票借款的關係，也祇想藉鹽政改革委員會的職位來盡其從旁幫忙的任務，

其次，新鹽法檢查鹽質，是以一般大衆食用官鹽為前提。可是現在大部份的農民大衆已經無力購買官鹽（即使劣質的攪雜泥水的食鹽也無力購買；因為那種食鹽也已被鹽商們當作上等食鹽而販賣着），至多僅以自晒的硝鹽來代替一般的食鹽，換言之，劣質食鹽問題更普遍了。所以，假使不恢復農民的一般購買力，假使不減輕稅率以壓低鹽價，那末，所謂檢查鹽質一事，是與大衆的福利了無關係。

現在我們再來繼續檢討第三點，即劃一稅率。新鹽法按着鹽的使用，將鹽分為三種：一為食鹽，二為漁鹽，三為工業用鹽及農業用鹽。食鹽每百公斤徵稅一律五元，不得重徵或附加。漁鹽每百公斤徵鹽三角，工業及農業用鹽一律免稅。我們現在姑置漁鹽，工業及農業用鹽於勿論，單以食鹽一項而言，並以民國二十二年所銷之鹽為例，計所銷鹽量在各級稅率中所佔百分比如下：

稅率(每擔)	百分比
一元	17.8%
一元——三元	28.3%

三元——六元	34.7%
六元——九元	6.5%
九元——十二元	12.7%

若按上表計算，假定三元到六元一項有三分之二是在五元以下，那末，所謂劃一稅率也者，就是說所銷鹽量之中，有68%以上須抬高稅率至五元為止，減少稅率的不過32%的意思罷了。我們說：新鹽法是廿二年“整理各區鹽稅暫行稅率表”和廿三年一月一日改用新衡制的繼續，是增稅政策的另一種形式，就不是無稽之談了。可是，問題尚不止此，新鹽法劃一稅率的前途，將遇有與廢除苛雜同樣的困難，試問各省地方當局是否能俯首帖耳不“重徵或附加”？他們倘不這樣，又能有何種抵補方法呢？新鹽法公佈後為什麼到三年後才被重新提起，提起以後又要組織委員會來研究而遲遲其行者，恐怕一半就是爲了這個難題罷！

新鹽法之中最有現實性的是：前述的第四點，即改革鹽務機關。換言之，就是裁斥各種駢技機關，以求鹽務費用的減輕。關於這點，財政當局早已行之有效，譬如將江、浙、皖、魯、閩、豫、鄂、湘、贛九省鹽運使署及緝私兩部裁併於鹽務稽核所以後，鹽務費用就減少如下：

	稽核部份	行政部份
20年度	840餘萬元	650餘萬元
21年度	800萬元	——
22年度	730萬元	360餘萬元

可是遺憾的是財政部所擬定的組織法內：作有如此的規定：“(甲)財政部內設一鹽政司，另設一鹽務總局，以華局長一人，洋會辦一人爲主管官。其下設五處……除總務處外，其餘四處俱有洋幫辦一員。(乙)各產區設鹽務分局，以華局長一員，洋協理一員領之……(丙)各銷鹽區域得暫設鹽務臨時辦事處，以華處長一員，洋協理一員領之。”(天津大公報1935, 1, 27.)從這裏誰都可以看出：上自鹽務局起，下及各產銷全領域爲止，“洋員”是一脈相承地主持其間。此等洋員每月的薪金無疑地是會損及到財政當局所強調的節省鹽務費用的計劃；但這還是小事，最緊要的是：盤據鹽務機關的帝國主義的勢力，新鹽法一點也不會企圖將其撤除：換言之，牠和保存國粹一樣的保持着臣服精神。

總括說來，新鹽法假使不能解決目下中國大衆的全部或大部的“淡食”問題，假使不能解決目下的鹽工和鹽民的生活問題，那末，結果必至促使食鹽的消費量日趨減少，食鹽的生產和運銷本身也要受到不良的影響。同時，帝國主義的軍事佔和食鹽傾銷，以及洋員勢力之把持鹽務機關和各省當局的截留附征，將更加强此種趨勢的進行。假使新鹽法不反對這些，不消滅這些，那末，就是財政當局自己的僅有企圖——增加稅收總額——也難如願以償。因此，我們可知只有站在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勢力的立場上，和徹底反對半封建殘餘勢力的

觀點上，大眾的食鹽問題，才能得到解決；在牛馬式的生活之中掙扎着的鹽民和鹽工，才能走向光明的前途。

1935, 3, 15。

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

莫 喬

一 引言

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是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叫出來的兩大口號，也是南京政府自從“廢除厘金”以來最能迎合民意的工作。財政會議是在今年五月舉行，該會最主要的兩條決議：第一是減輕田賦附加，議定自該會閉幕之日起，對於田賦永不再增附加；至以前附加各種稅捐，概須分期減除。第二是廢除苛雜稅，議定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同年十二月底止，由地方斟酌情形，分別先後，逐一廢除。

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固然是全國民衆一致的要求，同時也是中央政府勢在必行的政策；但是它底實行仍不免有種種阻礙。誠如千家駒先生所說：“減輕田賦附加與苛捐雜稅不是一個中央財政當局有沒有決心的問題，而是地方政府有沒有辦法的問題”。所以在議決之前既會經過反覆爭論，在議決以

後除掉少數區域之外也看不到有怎樣顯著的成效。在這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未能一致的地方已經表現出來。我們知道政治上的統一，必須以經濟的市場的統一為其基礎；因此在中央方面，努力排除這些統一的障礙，尤其是統一財政，防制地方政府離心傾向，自然成為迫切要求之一。同時在這農村破產，羣情鼎沸的現在，這些改良政策底實施，更有其特殊使命。不過減輕田賦和廢除苛雜底損失，全部是由地方政府負擔，這使它們已瀕破產的財政更加無法整理。尤其在這割據的局面還未完全消滅的現在，這種政策的實施無疑地摧毀了地方政權底存在的基礎。所以這一決議能否切實執行，非但與全國民衆底利益會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政治統一能否徹底完成的一大試驗。

二 減輕田賦附捐

田賦附捐名目繁多，且其數額往往超過正供數倍，這已成為周知的事實。此次財政會議決定附加數額不得超過正供；如能實行，田賦附加即不取消，總已有一相當限制。可是這一決議底實施却也大非易事；因為田賦附加在各省早已成為財政上的主要來源。如在浙江，全省七十五縣中間只有昌化崇德兩縣的附加沒有超過正供；其它各省雖未調查，情形大致相同。例如河南蘭封，“地丁附加超過正稅六七倍之多，而蠲時攤派

尚不在內”；該省田賦正稅每兩二元二角，但“在內鄉縣內，田賦附加即達五十元之鉅，據謂其它各縣附加有達八十元者”，超過正稅三四十倍（整理捐稅委員張煥報告）！四川丹陵每兩糧田全年產值約計九十八元，本年一年四征再加兩次勦赤經費，共計四十四元九角五分，計達產值半數；眉山每兩糧田全年產值約計一百三十元，一年四征和兩次勦赤經費共計八十六元二角六分，更達產值的三分之二。江安今年收穫不豐，每兩糧田最多得穀十八石，即以一石八元計算亦僅一百四十四元；而一年四征及兩次勦赤經費竟達一百四十二元，因此全年收穫只夠完糧！在這情形之下，減輕田賦這一口號自然變成不兌現的支票（重慶商務日報）。

四川本是有名的人間地獄；財政會議閉幕以後，各縣田賦非但不曾遵令減輕，且把過去種種劣跡盡情發揮，例如預征田賦，還是照常進行。上述各縣一年四征，事極平常；多的地方竟征十三四次。根據報章記載：巴縣本年八月催繳四十一二兩年糧稅，限十月底止完清；德陽五十三年糧稅已於本年六月開征；八月又征五十四年糧稅；什邡六月十二日起就已開征五十五年糧稅，以供六七兩月軍款之用；樂至於本年八月奉命開征六十七年糧稅，限期兩月掃解，因此四鄉農民投環跳水，時有所聞；新繁田賦預征，竟達八十年，更屬駭人奇事！（重慶商務日報）。至於征收方法，也是愈出愈奇，“廿一軍和廿八軍最為

文明，是由各縣團務人員分派下鄉催收；廿九軍也利用團務人員，有時直接到人民家屋去收取，不足乃至連雞鴨豬牛和一升一碗的糧須都要一併帶走；二十軍和廿三軍更爲厲害；至於廿四軍的方法，是除正式武裝逼納之外，常行化裝綁票以助軍款；最壞的是邊防軍和廿三師，他們把人民弄得乾淨以後還要把團務人員逼得破產，時常派大兵到縣城趕場或市鎮逢集的地方硬拉人民要錢！”(23, 9, 13. 大美晚報)。

在這漆黑一團之中，能夠對財政會議的議決案勉強有所表示的，自然只有寥寥數省。下面是十月十日爲止各省市減輕田賦附加數額；

	已經減輕數額	預定減輕數額
江蘇省	137,987元	
浙江省	1,604,037元	
安徽省	61,891元	
福建省		900,000元
察哈爾		80,000元
甘肅省		300,000元
江西省		2,000,000元
北平市	799,000元	590,000元

(23, 10, 12 中華日報)

上表告訴我們，全國已經實行減輕田賦附加的只有三省一市。除掉北平市外，江蘇全省只減十餘萬元，安徽全省所減不到七萬；這樣渺小的數字，會使我們懷疑到他們是否已經具有遵照財政會議議決實行減輕田賦附加的誠意。真正能夠勉

強實行財政會議底決定方針的，至多只有浙江一省，可是就這一省的情形而論，也難使人怎樣滿意。根據東南日報記載：浙江省府接奉中央命令以後，召集各縣來省，分組舉行財政會議，將各田賦附加，分別核減停征，最高不得超過正稅數額，同時規定六項核減辦法，第一是另籌其它收入抵補，再行減免田賦附捐；凡各縣現征之保衛團畝捐擬改辦住戶捐商舖捐後再行減免。第二是不隨田賦附加，另行改征；凡各縣現征之教育畝穀捐擬令改辦學穀捐，以免與田賦附加相混。第三是本非田賦附加，應行揚除計算；如測繪經費，海塘捐等，均非附稅性質。第四是停征期滿附稅；第五是核減過重捐率；第六是免除雖已呈准尙未開始征收之若干附捐；這樣看來，前面三項僅僅換了一個名目，揚出於田賦範圍以外所謂減輕可以說是有名無實；第四第六免除已滿期及未開征之若干附捐，也屬理所當然，只有捐率過重的附捐畝捐酌量減輕，還能稍得實惠。因此雖然省府會議通過減免全省田賦一百六十萬元；可是究竟能使農民獲得多少利益，終於還是一個疑問。

其它各省，自然更少希望，例如江蘇揚中縣農民推派代表赴省請求減輕田賦附加，據呈該縣附加仍然超過正稅三倍。但奉財廳批復，各縣苛雜，業經分期廢除，該縣仍有呈請減輕田賦之舉，殊不能體諒省廳意旨，所請“應毋庸議”（23, 7, 17 蘇報）。又據財政部整理捐稅委員張煥在豫視察談話，認為豫省

賦稅之繁雜紊亂由來已久，整理誠非易易，欲求減輕田賦附加至正稅定額，頗覺困難。財廳擬將正稅增加三角，計為二元五角，因之附加亦可增至二元五角，合共五元；另徵“公安警察”一元五角及“勦赤協費”五角。果能實行，省庫收入已由六百萬減至三百六十萬元。此項計劃又被財部駁斥，未能實行。其實非但舊捐不易減免，就是新稅增加，也是時有所聞。最妙的是廣東省的辦法：財廳指派評價委員分赴各縣評定地價，改徵地稅，據云經評價完竣的有順德，陽春，紫金，茂名，澄海，鶴山六縣，九月份起已可改徵地稅；按照地價值百抽一計算，年收共約一百七十萬元左右；將來“全省各縣一律開徵地稅後，每年可得地稅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比之前徵錢糧收入，約增一倍有餘。”換句話說，廣東實行新法以後，田賦至少又要增加一倍！

因為徵收制度的腐敗，田賦的中飽和浮收已成普遍現象；這使政府底收入既然減少，人民底負擔反而格外加重。近數月來，田賦舞弊事件時有所聞，例如：松江縣政府利用折田升漕，減成壓徵的機會，共同舞弊侵蝕稅款十數萬元。已由江蘇教育經費管理處委員吳寶璜松江教育局長朱肇昇等呈請省府澈查。蘇州田賦徵收處主任朱鈞鋈六月間被人向縣府呈控侵佔國課至五十餘萬元之鉅；縣府對此置而不理，於是又向省府呈控。財廳派員調查結果，據云“私自推收部分，積弊已深；如

徹底查究，牽涉各圖經漕及漏稅人在內，約有數百之多，恐將形成大獄”。又如沭陽社交機關及民衆團體呈請清查積弊，據稱綜計田賦舞弊，大計有十餘種之多；其犖犖大者如短扣熟額，捏報民欠，顛倒麥則，科加軍發費，額外溢徵秋勘分數，徵多報少，浮收賸繳，每年鯨吞國稅共十萬元以上”。這樣一個地瘠民貧的小縣，每年竟能中飽如此巨款，無怪大家要視徵收主任爲肥缺；往往上下結託，互相掩飾。甚至竟如睢甯縣的合股包辦櫃書，一人被控，另擁他人登台；如此此仆被起，永遠跳不出這一貪污集團。

上述種種，可見中國田賦制度混亂已達極點；這種混亂的現象一日不能消除，農民底負擔也就一日不會減輕。固然，田賦底負擔並不完全放在農民身上；不過超過某一限度，地主往往就向佃農轉嫁，最後負此重任的大多還是貧苦農民。例如四川岳池，今年開徵縣屬下期糧賦之際，佃農因爲不堪重累，紛向業主退佃，甚至逃避他鄉。各地農民因爲欠繳田賦而被捕入獄，甚至賣妻鬻女，以償宿逋，這種事實屢見報端，幾乎書不勝書。最近常熟東鄉因爲積欠田賦，縣府戒令追繳；催徵吏十一人面向縣府請求暫緩追繳，竟被全體收押。自然，催徵吏的勾結土劣，蒙蔽政府，魚肉農民，或竟移挪吞沒。本屬罪不容逭；不過田賦底苛重和徵收制度的混亂，政府至少也要負擔一部份的責任。

三 廢除苛捐雜稅

自從國府下令廢除苛雜以後，全國各省已有半數以上紛紛影響。雖然同預期效果還是相差很遠，但比減輕田賦總算像樣一點。十月十二日中華日報詳載各省廢除賦雜種類數額，摘錄以供參考：

	廢除種數	廢除稅額	預定廢除
江蘇省	130種	195,991元	
浙江省	457種	247,511元	
安徽省	145種	184,979元	283,997元
湖北省	27種	286,000元	1,200,000元
湖南省	54種	1,600,000元	
福建省	125種	293,997元	
廣東省	233種	4,858,206元	1,631,283元
河南省			851,506元
山東省	87種	141,562元	
河北省	90種	555,450元	
山西省			6,450,855元
陝西省			290,000元
寧夏省			770,576元
察哈爾	24種	500,000元	220,000元
甘肅省			290,000元
廣西省		400,000元	
北平市	20種	280,000元	
威海衛	5種	3,640元	

上列各省市所廢除苛雜，計有一千多種，合計已廢除的稅額約近一千萬元。自然，這並不是苛捐雜稅底全部，而是苛

雜中的一小部份。例如浙江所廢除苛雜多至四百五十七種，但此四百五十七種苛雜徵數僅有二十四萬七千五百餘元，最細小之捐稅有年徵二三元者；所以此類苛雜廢除以後，對於政府和人民均無多大影響，至多只是省却許多麻煩而已。江蘇在廢除苛雜以後，財廳派員密查，據報各縣苛捐雜稅至少還有二百多種。天津益世報載平山苛雜還有二十三種，灤縣六十餘種，曲陽三十餘種，日用物品均須徵稅。西北文化日報登載甘肅莊浪苛捐雜稅全年約收四萬元左右；秦安全年共收十一萬四千餘元。此外皖北各縣因為勦赤而向農民徵收的稅捐計有剿匪費，防赤費，招待費，保安隊費，自衛費，保甲費，槍捐，飛機捐，以及間接供給勦赤之用的電話費，築路費等；綏遠的煙苗罰款和烟土印花仍佔收入大宗；貴州省收入十之八九均從黑貨得來；號稱模範省的廣西，禁烟罰款(烟捐)和防務經費(賭捐)也佔全省稅收的十之六七。

以上還是早已聽熟了的苛雜名稱；此外那些離奇古怪的稅捐，也是不勝枚舉，例如北平市底貧民捐和彈壓費，前者雖於十月一日廢除，後者竟未加入苛雜之列。四川李其相防區有所謂“感情捐”者，據說這種稅捐底目的是在融洽李軍與地方人士之感情，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四川彭山還有一個更動聽的名稱，叫做“紅燈捐”專為癩民而設，全年共收一萬九千四百餘元；約佔糧稅半數，其旺盛可想而知。

所可惜的，是舊苛雜雖然漸次廢除，而新增稅捐也並不少。例如北平開征筵席捐和房捐；福州徵收房屋捐一月，店屋捐兩月；甯甯開征商舖捐；江蘇開征奢侈，消耗，娛樂，筵席等捐，並增耕牛過境稅，每頭自一元二角加至二元四角；湖北征收堤工捐；浙江徵收交通附捐，并增屠稅附捐；廣州增收地稅，汕頭加徵花捐。浙江東陽今年的屠宰稅反比去年增加四成；無錫烟酒牌照稅增加一倍；常州捲烟稅加重五成或十成之多；包頭增加營業稅二成至五成；四川改訂稅率，土產出關平均增稅三倍。這些都是隨手拾來的報紙新聞，自然掛一漏萬，祇能說是九牛一毛。有些地方所謂廢除苛雜實際只是改換名目：例如廈門水菓業營業稅，為水菓捐之變相；海味類營業稅，為漁稅之變相，杉木紅料營業稅，為杉木紅料捐之變相。浙江田畝附加的借屍還魂，自然又使苛雜名目格外加多。晉縣因為田賦裁減，無法抵補，甚至呈准財廳按村攤派，為害更甚（23, 9, 9天津大公報）。這樣看來，廢除苛雜運動雖已普遍全國；可是一般民衆所受到的實際恩惠，實在還是微不足道。目下距離廢除苛雜截止日期已經不到兩月；我們希望這一口號能夠不再成為不兌現的支票。

其實稅捐雖然苛雜，到底還有一個限度！至於攤派勒索，更是害民苛政，應當首先廢除。根據稅捐委員張煥報告；‘豫省民衆對負擔最感痛苦者，當不僅田賦附加及苛捐雜稅；臨時攤

派之無限度一項，實爲苛徵。其中有由省令攤派者，有由縣長呈准攤派者。有由縣長擅行攤派者，並有由區長呈准攤派及區長私自攤派者，而每一攤派復層層加重，層層剝削！省方若需款五千，人民所攤者至少在一萬元以上。”又如岳池西附城閭長陳金玉，強迫農民加入穀會，不論願意與否，悉用強迫手段收討會穀。繼對各糧戶擅自加收手續費及剿赤費，完全收歸私囊；近更以抬墊剿赤費尾欠名義，私向閭內各戶借洋三元五元八元十元不等，借後概未歸還，亦不准人民抵扣糧稅。川南雷波縣長雷義榮勒令人民種烟，年內要收烟捐一半，計一萬四千元；又提議預徵糧稅兩年，接着逮捕富戶七人，收監勒索，因此激成民變。(23, 10, 29, 天津大公報)。安徽當塗保安隊長張家義擅收過境米捐，每船至六元八元之多，約計侵蝕萬元以上(23, 11, 1, 天津大公報)。還有陝西省東距城四十里的藍田區，民團團長方子靜任意分村攤派糧餉；夢村一帶，各村人民所養牛馬騾驢，民團不分良劣，每頭派洋十元；半年工夫，已派三次之多。竟有派交之款，已逾頭口價值以上者。因此該地農民，多將所畜牽省售賣(23, 9, 16 陝西民意報)。這些黑暗事實幾乎到處都有，這裡不過偶舉數例而已。

可以稱爲集苛雜之大成者，自然又非四川莫屬。川省連年混戰，財政紊亂已達極點。卽就二十一軍底防區而論，近來防區雖已擴大，可是部隊增多約有三四師人，每月關餉須五六

百萬元。平日全賴借債度日；更因剿赤軍與各軍開拔補充等費，均向劉湘要索，一年以來，此項債額已逾九百萬元；加上該軍本身所欠三千七百餘萬，共計四千六七百萬元。此外公債則有五千餘萬，糧契稅券（廿一軍總金庫所發鈔票）至少也有五千多萬；地方銀行自成立以來，不及一年，而所發鈔票達九千萬元，現廿一軍財政處印刷所仍在日夜加工趕印。在這局面之下要想減輕田賦，廢除苛雜真是無異癡人說夢！這裏再引蔣委員長底一段電文來作佐證：“……二十一軍雖防區擴充，收入增加然軍政各費隨之遞增……結至去年年底止，該軍積欠總額已達一千七百萬元之鉅，而所發公債及兌換券尚未計入。截至本年八月底止，欠債額又增二千萬元，合共三千七百萬元，其數之鉅，實屬駭人聽聞。所以陷於如此地步者，蓋以各項稅收，雖極盡搜刮之能事，全年亦僅四千萬元。此不敷之數，平時全仗指定稅收押借款項。如此移東補西，寅吃卯糧，一年間所負本息，金額即極可觀。加以所發公債，又須接期付息還本，以是平時財政即難維持，所勉賴周轉者，全恃軍部所出期票及財政處長與金庫經理私人墨條在市扣現運用，此項墨條每次達三百萬元之譜，誠為極怪現象。……”四川財政底混亂和田賦稅底苛雜，已非一朝一夕，近幾年來非但不見改善，且有每况愈下之勢。應當由誰負此責任呢？

這樣看來，苛捐雜稅底存在，自有它底社會基礎；要想

廢除苛雜，決非祇是一紙命令所能發生效力。剷除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根本原因，實是廢除苛雜的先決條件。這裏再引一段奇聞來代替結論：

“廈門原為通商大埠，華洋雜處！外籍人民對於各項稅捐，均特強抗不繳納。官廳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結果華商負擔益加重，維持益感困難，倒閉者日有所聞。華商為避免繁重負擔計，相率加入外籍，景象殊為險惡。”（23, 6, 20, 南甯民國日報）

這真是亡國底預兆！

1934, 11, 3.

列強在華的航空爭霸戰

徐 雪 寒

航空業是中國最近代的新興交通組織和軍事設備之一，同時它也是最完全的代表了半殖民地交通業的各種特徵。一般說來，帝國主義者首先是爲了替商品開拓深入腹地的市場，其次是爲了資本輸出的巨大利潤，最後是爲了政治上的統制和軍事上的準備，對於半殖民地（殖民地更是如此）交通事業的開發，始終站在影響，促進乃至主動的地位上。中國一切近代的交通組織如鐵道，航業，都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成立，各自構成帝國主義者統制半殖民地的一個分枝或一個細胞體。

在中國，目下航空業的開發，第一因爲帝國主義愈益走近，（一）瓜分中國，（二）相互戰爭，以及（三）反蘇聯戰爭這種種矛盾的尖端，他們愈益要求將交通組織履行預築陣營的戰爭作用，於是開發市場或利導資本輸出兩種機能所佔比重，就遠較軍事意義爲低；第二因爲近代戰爭由平面而趨於立體，空中戰爭所發揮的威力愈大，誰能獲得在華航空霸權，誰便

能相當地保證未來大戰時勝利的重要條件；第三對華航空飛機及航空用件輸出的激增，利潤的巨大，都成為帝國主義軍需工業爭取市場的對象；最後第四，航空工業技術的高度化，民航事業資本數量相當的巨大，使生產技術落後，資本市場畸形存在的中國，愈加不能在航空業上求取獨立的地位。這種種基本的客觀及主觀的原因，使中國航空業徹底殖民地化：一方面是正常仰賴飛機及航空附件的輸入；另一方面是國內民用航空完全在列強包辦或獨占之下，

但是美國和德國（注意它和東方侵略者在渴求戰爭的同一性）在華航空權的獨占，並不是意味着諸帝國主義互相爭取在華航空權的消滅。反之，這不過是說，美德兩國資本在這裏是競爭的最先勝利者，而不是競爭的終止。尤其是因為太平洋均勢的破裂，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化，使英法日諸國皆羣起而要求插足中國的民用航空，要求打破目下絕對優勢的獨占。美國不僅努力鞏固現有的優勢，且進而積極進行中美直接飛航，以及中菲航路的試行；至於德國則在海陸兩路力求歐亞飛航權的確立，新近容克斯大型飛機循海航路開關的成功，實際決不僅是卅字黨個別的勝利。中國境上一碧無涯的澄空，再也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自然界了！

一 美德兩國在華空權的確立

我們在上節已經指出帝國主義，開拓或爭取在華航空權的真實意義，因時也知道帝國主義徹底操縱或獨占在華航空權，乃是新興的航空業所以不同於其他交通事業的地方。事實上，美國資本的中國航空公司和德國資本的歐亞公司，已經代替了中國民用航空的全部。這就是說，在較為具有歷史的交通組織中，它們毫無傳統的勢力；但是在這新興的交通部門中，它們是最先獲得勝利的主人。自然國內有許多人士是在中美，或中德合辦個名稱之下自告滿足了，但是殖民化的本質，總是無法掩飾。

美國資本是侵入中國航空權的處女勝利者，而中國航空公司是它的獵獲物。公司成立於1929年春間，原為中國自營的航空公司，但這不過是過渡到彼方的一條出賣的橋樑。在成立不久之後，便根據南京政府所頒佈的組織條例第五條的規定，和美國航空發展公司訂結航空運輸和航空郵務合同，將滬漢，京平，滬粵三航線歸發展公司承辦，自營的民航公司，到這裏搖身一變而為中美合資的經營，而且實際上合資還祇是出包的名義而已。過後發展公司將該項合同的權利讓給美國的飛運公司，同時我國輿論也盛起反對該項條約，以為中國損失權利過多，政府遂不得已明令取消該項合同。此後和美國資本經過幾多次的交涉，到了1930年7月，便成立中美航空新合同，規定公司資本為國幣一千萬元，華方負擔55%，美方負擔45%，

所謂航線的經營和規劃等等“技術”工作由美方負責，營業或名之為“業務行政權”的則歸華方負責。到了1933年4月，美國飛運公司又讓權給聯美公司（即太平洋航空公司）。但無論怎樣，美國資本始終攬住這項“合同權利”，使一切活動在合資的美名之下變成更為合法。

中國航空公司依據合同，得以經營滬蓉滬粵滬平三線。第一線直貫長江腹地，第二三兩線貫聯自南至北我國沿海最主要的城市。這等航線，從1929年10月起至1933年10月止，已經全部完成。

歐亞公司的成立，實際是由德國漢沙公司的促動，經外交部介紹，和交通部提議雙方合作開闢歐亞航線。在1930年2月簽訂歐亞航空郵運合同，1931年3月公司正式組織成立。全部資本為5,100,000元，中國負擔三分之二。但合同又規定“此三分之二之半數，由德方按年息七厘墊借”。業務行政為華方主權，規定技術方面“暫由德方負責，但以三年為限”。此種紙上的規定，究能變更事實至何程度，實屬疑問。我們不知三年時間到幾時纔算完結？德國資本藉着合資公司的名義所作的活動，幾時纔會終止？

合同規定這個公司能經營三個外國航線：（一）自上海經南京，天津，北平，滿洲里，俄國，到歐洲；（二）自上海經南京，天津，北平，庫倫，俄國，到歐洲（三）自上海經南京，甘肅，新

疆，俄國，到歐洲。第一線於1931年5月開航，航程長2240公里，九一八以後，被迫停航。第二線因外蒙問題，不能解決，並不會實現。所以現在實際所通航的祇是第三線。這裏又因為新疆政變，蘭州迪化至塔城二段，先後停航，因而實際所通航的祇是滬蘭一段。歐亞航空的目的既不會達到，無怪急急乎另求通路！此外在德國控制之下的尚有國內幹線一條，自北平經鄭州漢口長沙而達廣州。

假使說中國本身有民用航空業的話，那末可以說全部是在美德兩國資本的組織或主持之下。自然我們不會忘記粵桂主持下的西南航空公司；但是它的資本不過官股三十萬，它的航路只局限一隅，和兩大資本集團控制下的情形相比，只是可憐的點綴罷了！下面的表可以看出中國民航事業的情形：

最近全國民航狀況表

線名	經 過	全 長	公司名稱	開辦年月
滬漢	上海,南京,安慶,九江,漢口	914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29, 10.
漢渝	漢口,沙市,萬縣,重慶	891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0, 11.
×渝蓉	成都,重慶	217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3, 11.
滬平	上海,海州;青島,天津,北平	1427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1, 4.
滬粵	上海,溫州,廈門,汕頭,廣州	1620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3, 10.
×亞歐	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滿州里	2240公里	中國航空公司	1931, 5.
滬新		405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上海蘭州段			1932.
	×蘭州迪化段			1933,
	×迪化塔城段			1933, 9.

平粵	北平,鄭州,漢口,長沙,廣州	220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1933, 5.
蘭包	蘭州,寧夏,包頭	820公里	歐亞航空公司	1934, 11.
廣龍	廣州,龍州	640公里	西南民航公司	1934, 6.
廣瓊	廣州,瓊州	900公里	西南民航公司	1934, 9.

×現暫停航之線

這裏很能夠明白看出來，全國主要城市的航路全都握在外資手裏。自然，兩公司在五年之間所以完成這麼飛躍的發展，是和國內政府一定軍事目的或政治要求相關聯，換句話說，外國資本控制中國全部航空權，惟有通過國內政府熱心的扶翼，才能如願以償。中國歐亞兩公司最近是增加資本了，而他們的地位也已一天一天的強固起來，請看下表：

1. 中國航空公司歷年營業發展表

年 份	飛行哩數	乘客哩數	乘客人數	郵件公斤數
1929年	93,167	106,875	354	3,932
1934年	1,341,794	2,365,567	4,570	59,052

2. 歐亞航空公司歷年營業發展表

年 度	飛行哩數	客運人數	貨運公斤數	郵運公斤數
1931—1932	136,200	941	4,131	412
1933—1934	486,902	1,074	43,092	4,679

註 本表根據24年申報年鑑，但其所列數字與1934年歐亞公司營業報告數字，均有出入。1933—1934年郵運公斤數年鑑列4,169,777公斤，疑有誤，表中該項數字，係根據該公司營業報告列入。

上表數字所表現的飛躍的發展，實際祇是美德兩國資本在中國航空上所造下的業績而已。這或許也可以說是合資雙方的成功，但我們在下面便可知道美德資本怎樣各在利用所謂“技術”責任，自在地規劃着航路開拓；而合資公司對於他們抗拒新的爭霸者的侵入這一點，是盡了怎樣的功能。

二 列強爭取航空權的激化

美國資本在這競爭中是最優勢者，同時也是最積極者。在中國航空公司名義下一切的活動怎樣也脫離不了美國航空托辣斯底支配。它一方面在交通部二十五萬元資助之下，積極經營，自重慶到雲南昆明的航線，今年已試飛完竣，據說極有成績。渝昆線的力求實施，一方面固由於中央政府團緊西南諸省交通的要求，對抗着西南民航公司的南甯貴州線，廣州重慶線和南甯昆明線的計劃；但因了美國資本的侵入，同時又引起法國資本的反對或嫉妬，而構成美法在西南航空權的爭鬥：

“法國郵務航空公司擬新闢安南之西貢與雲南昆明及兩廣間定期航空，與中國航空公司發生反目。中國航空公司主張該公司對中國領土上開設航空之優先權，本年春間早已實行西南航空路之試驗飛行，故竭力反對法方奪取西南航空權。安南當局曾扣留中國航空公司試驗飛行

之飛機，由中美向法方交涉，幸得和平解決，而西南航空權鬥爭之根本問題，極難解決也”(1934, 6, 24外論社通訊)。

交通部援助下開發川滇黔三省航線，主要作用在適應南京府政加強統制西南諸省的要求，可是却因之引起法國的反對。這種反對，延遲了西南航空線實現的日期，而替在華航空爭奪戰上，多加一個有力因素。但另一方面，因為構成在華航空權爭鬥的主要關係，是英美兩國，美法間的衝突一時也不致十分尖銳。

中國航空公司曾經企圖以現有的滬蓉線為根據，自成都將航線伸展到西藏拉薩。這條航線的籌關，據說“為中國歐亞兩公司互相籌關之新航線，歐亞公司近向國府交通部交涉新關該線，外部乃向英方探試其態度，英方表示阻止意思”。在名義上的中國境內，航線開關實際是代表了怎樣的勢力關係，再也沒有比這更明白了，這是英美衝突的一點。其實，英美航空的衝突主要不在藏印境上，而是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美國支配了滬平滬粵兩線，實際上便是囊括了太平洋西岸的中國海全部。這個勝利便成為中美直接通航的根據，而惟有中美通航才是太平洋航空公司(即中國航空公司美方資本)最主要的目的。因為中美飛航路線祇有南北兩線，北線自美國阿拉斯加，經俄國西比利亞各地，再經日本而達上海；南線由美國洛杉磯出發，經檀香山至南洋羣島小呂宋爪哇菲律賓而達廣東。在太

平洋矛盾愈形尖銳化的現在，北路航線絕無實現可能。因之在美國方面，“爲便利航行及其他關係，決擇南路飛行”（1934，11，17上海商報）。所謂中美合資的中國航空公司，這時纔充份地發揮“先鋒”的職責。本年3月，中國航空公司在美方副董事長畢斯壁氏主持領導之下，首次從事上海至菲律賓間的試航，經福州，香港，東沙羣島，普愛湖，桑地亞，弋島到馬尼拉，全長2719哩，據說成績異常優良。從舊金山經檀香山抵達菲律賓，這段路亦不成問題。現在中菲航線既已成功，問題祇是怎樣使之使兩條航線聯接爲一，使這種聯接合法化。10月17日中華日報載稱：“據本埠民用航空當局談，關於中美通航事，美國方面確在積極計劃之中。惟該項計劃，須通過英屬之香港，將來英方是否能允其通過，尙屬問題。將來如英方不能同意，美方勢必向我國提出請求，經在廣州等處設站停落，但一國境內之民用航空權，係有絕對自主經營之權利，故我國恐不能輕易允許”。可是中國根本沒有絕對自主的航空經營，自然無從履行“絕對自主經營之權利”。所以一個月之後，同報又報告相反的，然而真實的消息。

“關於華美間太平洋長渡航空線，係由美國華盛頓方面建議，此事現由雙方政府人員，開始討論，積極進行，共商開闢航路辦法。將來決於中美合辦之中國航空公司，由中國方面增加投資五十萬元，予以擴充，主辦航空事宜。

至飛機及技術人員，則由美國供給。試飛工作及航路航站等，均由美方計劃。聞太平洋中飛機場之設置，亦將由美方出資建築”(1944, 11, 8, 中華日報)。

這樣，中美間太平洋飛航交涉，實際可說已完全成功，美國資本祇要愉快地履行其預定目的就是了。這個勝利，實際是有怎樣的意義呢？

“此線完成，其影響所及，不僅交通上發生變革，而軍事之太平洋制空戰，將愈益激化”(1934, 11, 7, 外論社通訊)。

在美國絕對優勝之下，英國在航空爭霸上的成就，就顯得特別落後。英國帝國航空公司本來就計劃開辦英倫到新加坡定期長途航線，但是因為不能直達遠東，不論在營業上或其他重要關係上，都沒有意義。所以早已向中國方面暗示，打算將該線自新加坡伸展到上海。於是馬上遭遇美資的反對：

“中國航空公司方面，以英方開航京滬線，其廣州至上海段，與滬粵線相同，頗有妨礙，故請其由星加坡展至香港為止，再與我方聯運”(1934, 6, 16, 上海大晚報)。

這個打擊，並不曾減弱英國爭奪南太平洋航空權的意念。它一方面拗強地反對中美通航在香港設站，而一面要求以香港設站為允許星滬通航的交換條件。因為上述美國最近的勝利，愈益使英國採取積極的攘奪手段，而發生駐華英公使向南京交通部提出，要求承認帝國航空公司星滬線營業權，在形式

上，實是充分尖銳的了：

“現在列強對華販賣航空機及航空權之競爭，愈趨於劇烈，而英美兩國華南航空權爭奪戰，尤堪注目。汎美航空公司，所計劃之中菲航空權……於本年七月間向交通部陳請許可營業，傳聞交通部已有准許該公司有營業權之意，擬於本年十二月底以前，開始定期航空，但英國帝國航空公司向交通部陳請許可香港上海間航空線之營業權，在汎美公司以前（即在本年三月初），至今尚未予以許可。忖度交通部當局之方針，或將只許汎美公司（中國航空公司的美方股東）有航空營業權，而對於英帝國之陳請則置之不覆，欲完全抹殺英國公司之權利。……此次英公使賈德幹氏在南京向外交部提起交涉，要求認可英帝國航空公司之星滬航空線營業權”（1934，11，3，上海每日新聞）。

從此我們可見英國怎樣野心地要打破美國太平洋航權的獨占，反之亦正可表示出所謂中外合辦的民用航空，在帝國主義諸國看來是怎樣的東西！據十月三十日路透社電，英國航空部次官沙遜曾對星加坡人員談：“深信星加坡帝國航空業務展至中國之困難‘可望消滅’，渠意通至中國之航空事業，終可實現。”這樣看來，英國的積極要求，許會取得美國的讓步，而插足在遠東航空競爭網中。

英美在西南航空權的衝突，已如上述。因為地理的當然也就是軍事的關係，法國對華航空權的攘奪，僅限於西南諸省。遠在六月之前，法國航空公司早已注意該方面的聯絡。自西南民航公司成立之後，法屬安南航空當局，頗擬在廣州設站，開闢西貢廣州線等。法國直接以該省地方當局為交涉對手：“惟聞粵省當局，對此尚無確切表示，以主權關係，尚在酌奪之中”（1934 6, 16, 大晚報）。“主權”到底怎樣“酌奪”，才能保留，現在無從知道。但是法帝國主義的目標，已顯然可見。

此外參加對華空權爭奪的是德國和日本。德國資本支配下的歐亞航空公司，不管所謂三年技術責任早已屆滿，仍在積極努力歐亞兩大洲航空權的實現。九月初，容克斯大型機沿海試飛的成功，替德國打開了歐亞航空的新道；我們只要看到大型機駕駛者的談話，就能知道德國資本是怎樣地躊躇滿志了。現在歐亞航空公司不管營業的損失，開航蘭州到包頭的荒涼的航線，其目的也不過是達到陸路上壟斷歐亞航空權罷了。

日本對華航空權爭奪戰上所表示出的特點，是對美國資本的中國航空公司的發展，表示出異常的不安。因之它每每是最先透洩出美國資本勝利的消息，而對於歐亞公司的活動，多半是不加攻擊。自從中美通航愈加具體化之後，便引起日本極大的不安和極強的對抗。計劃設立和太平洋代管島的航空網，設立和潛艇路線平行到波甯島的航空線，用來和中美航線相

交錯。同時又積極要求實施華日間直接航空的計劃。十月十一日日聯社東京電稱，日本財界正在計劃創設有資本五千萬元的航空運輸公司，建設東京，大阪，福岡，上海，香港，新加坡間航空路線。本月廿四日世界新聞社長崎電訊中也說：“關於中日間航空路之開設，中日兩國共同努力，行將實現。在日本內地之起點——福岡地方，已開始各島飛行場之擴張工程，……福岡長崎上海間中日聯絡飛行，將於明春開始”。這樣，日本的加入競爭，也已劍露鞘外了。

美國資本支配下中國航空公司的擴大和強固，英美對於遠東航路的對立，美法在西南間的衝突，德國積極進行歐亞線的努力，日本要求中日通航的實行，這一聯的事實，一方面表示在華航權的爭取，已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統治或掠奪半殖民地的主要標的；另一方面是特定國家在華航空權的擴大和列強衝突的尖銳，益發將中國民用航業陷於殖民地化的狀況。

三 飛行機輸入競爭的激化

自然帝國主義對華航空權的爭取，構成鬥爭的主要內容。但這種內容更由航空用具以純粹商品的輸入，而得到明白的補充。這並不是說，航空權爭取和航空用具輸入間沒有關係，反之，他們常常是非常密切相關的。譬如中國航空公司實際上完全是美國航空機用具的消費者。但是因為民用航空正像其

他交通組織是一樣的不發達，甚至是在萌芽中，所以對華航空機的輸入，主要是限於軍事之用。外國航空家在上海勇敢的表演或是謙卑的結納，正是爲了誇耀彼等機件的優越，以博得我國政府的銷納。下表是三年來航空機及其附屬品輸入數額(金單位)：

1932年	1,863,414
1933年	6,080,648
1934年	4,455,577

經濟恐慌的深化，並不會阻止住新式軍器輸入的怒潮；它們對於平亂鋤反，自然，有最大的功能。爭取這樣巨額的輸入品，自然是各帝國主義的要求，下表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競爭關係：

	1933年	1934年
美國	4,594,544	3,193,003
法國	36,769	76,138
英國	217,553	376,007
意國	6•	241,774
德國	414,895	64,755

世界最大軍需品供給國——美國，對華航空機輸入上始終佔着首位。在去年，它的數字已相當的減低。這種減抵，和英法的躍進，都在證明他們之間競爭的劇烈，並不下於航空權的爭霸戰。此外，中國各海關航空機輸入量，在兩年內也有巨大變更。華北有巨大的減退，上海和西南三港(廣州，九龍，梧州)

的增大，這都是和一定的地方政權的盛衰相關。帝國主義最合意的顧主，恰恰能在這裏滿足地找到。

總結起來說：從民用航空到航空的軍事工業上，全部都在帝國主義的獨佔操縱中。這種操縱和獨佔。除掉經濟上的壟斷以外，同時更帶來了一定的政治獨佔。外資（特別是美國資本）全部包辦了民用航空，列強在這新興交通部門日趨強化的衝突，對於中國國民經濟體系中交通事業的發展前途，下了最好的註腳。以後的歲月，怕就是這種種勢力繼續作更深刻更猛烈的競爭的時候罷。

1934, 11, 23, 上海。

最近中國鐵道的整理問題

石 西 民

一 鐵道整理底主要內容及其動因

自從民國二十一年顧孟餘氏長鐵道部起，中國現存的國有各鐵道，進入一新的整理的階段。

鐵道部對鐵道的整理是採取着下述三種方式：一，設立負責運輸委員會，辦理貨物負責運輸；二，辦理鐵道聯運，並逐漸推及水空各種聯運；三，飭令各路局建設普通保管和運輸保管兩種倉庫而逐步進行。

各路局奉到鐵道部籌備負責貨運和聯運後，正太，津浦，平漢，平綏，滬杭甬，南潯，北甯，京滬，道清，膠濟，隴海等路，皆分別辦理實行，到最近為止，貨物負責運輸差不多已普及每條鐵路的全線各車站，鐵道聯運也早已實施；平漢，膠濟，津浦與招商局及各華輪所訂立的水陸聯運，去年來也進行甚速，至於鐵道與航空的聯絡目下亦正在進行中。

據去年八月間的報紙記載，鐵道部爲發展貨物負責運輸起見，特擬建築六大聯運站，地點爲：一，豐台站，爲平漢，北甯，平綏的會合處；二，石家莊站，爲平漢路與正太鐵路的連接處；三，新鄉站，爲平漢路與道清鐵路的連接處；四，鄭州站，爲平漢路與隴海鐵路的接連處；五，濟南站，爲津浦與膠濟兩鐵路的接連處；六，徐州站，爲津浦路與隴海路的連接處，築造經費預計一百萬元。同時自去年五月間鐵道部電飭各路添建貨物倉庫以來，京滬滬杭甬兩路當局，曾向中英及中國建設兩銀公司借款一千五百萬元，作擴充沿線倉庫之用（見去年八月一日申報）。

我們現在且不去管牠究竟在事實上，是否有如報章所載的速率在進行，不過我們認爲基於目下國內政局的比較安定，和列強在特種意義之下的大量投資的可能，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牠的發展的前途。

鐵道部除了上述三種整理辦法之外，尚有其它次要的設施，例如：去年六月間鐵部公佈代收貨價章程，以及創設各路營業所，如隴海路有晉南營業所的創設，兩路當局亦有靜安寺營業所的設置，其它正在進行中的還有很多。

現在我們一般地說明鐵路整理的大略實施狀況之後，更應該進一步探討，鐵道當局對鐵道的整理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成績？有什麼效果？不過我們要說明牠的效果和成績之先，首

先就應該來考察一下鐵路整理的原因。

一般說來，這種營業上使鐵道極度商業化的整理，目的是在求營業發展後收入的增加。但是中國目前鐵道的整理，尚具有其特殊的歷史的要求，這可以從鐵道現狀來觀察。我們知道五十餘年來中國鐵道的經營，所得到的成績只有二點：第一是路政的極度敗壞：民國成立以來，年年有內戰發生，鐵道就在這戰神的毀壞與封建勢力腐蝕之下，弄得瘡痍滿目。舉幾條重要的鐵道來說，皆因戰爭之後車輛流入外路及毀壞的甚多，僅存的車輛路軌，亦因年久失修，陳舊不堪：平漢路在民國十二三年時，原有機車二百二十九輛，客車三百六十五輛，貨車三千九百十九輛；北伐統一之後，機車僅存一百零五輛，客車一百十九輛；貨車則僅剩七百零七輛；近年來雖然竭力設法收回，機車已經增至二百零五輛，客車增至三百零三輛，貨車增至二千七百十三輛，但是可用的客貨車不過三分之二，機車也不到五分之三，並且都超過使用年齡。橋樑軌枕也破壞不堪，黃河鐵橋險狀環生。據最近估計木枕有五十萬根，鋼枕一萬餘根必需掉換（見去年六月二十日大公報）。膠濟路在十八年年底計算，因歷年戰役中車輛迭被徵調，現在尚有三百餘輛（六千餘噸）仍未收回，按該路所有車輛總數計，損失佔原有貨車的六分之一。北甯路機車，大部分為毛格爾式，使用年齡均達四十年以上，其它各路情形大致相同。第二個成績就是負債

額的鉅大：截至一九三三年止鐵道負債額達1,306,325,919.42元。其中外債部份竟佔了十分之九，估計每公里鐵道負外債十五萬元以上，而去年的新債尚未計算在內。

上述第一點是根本促成鐵道營業日益衰落的因子，第二點更加重了鐵道的危機，近年來鐵道的整理，就是針對著這二大難題而來的。

當然我們還需要指出整理的另一意義，那就是已故的美夏(譯音)先生，在中英鐵道投資家聯合會上所說的話，他說：“中國政府爲了舊有鐵道的整理與新線的敷設，企圖外資輸入時，非先拿出中國鐵道是大衆商業上的工具而並非供軍隊或政客私用這一事實的證據來不可”(見二月十五日日文每日新聞)。我們曉得中國目下正在特殊意義之下？積極興築鐵道，需要外資的大量援助，而鐵道整理就在提高對外信用以便進行借款，同時這種整理間接亦必促進列強商品得在內地順利地推銷，也是我們所應注意的一點。不論鐵道整理的動機在主觀上是否如此，但是在客觀上牠總會有這種作用。

二 整理以後所得到的成績

鐵道整理的原因既然已經明白，現在可以進而檢討整理的成績。按去年鐵道的營業狀況來說，各路客貨運成績非常美滿，十二月份的營業比一月份的增加三倍之多。據鐵道部業務

司長俞棫所談，去年各路因客貨運發達，盈餘程度，均為正比例的增進。去年各路盈餘較前年增多之數是：津浦路為三百萬元，平綏二百萬，膠濟路一百三十萬，京滬路一百萬，正太路八十四萬元，平漢路路有增加。道清路雖無具體數字統計，但據報章所載，去年營業之盛為僅有的記錄。南潯路去年因軍運關係，虧損八萬九千餘元，可說是例外，聯運的成績：貨物聯運款額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為666,593.46元，去年十月計為1,830,759元，幾增三倍；貨票張數二十二年十月為4,651張，去年則為26,459張，幾增六倍；旅客聯運款額二十二年十一月為471,389.06元，去年十月則為617,210.92元，增加十分之四；聯運進款總額在二十二年十一月為1,406,425.59元，去年十一月則為2,594,123.50元，計增一百餘萬元（見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

對於前述鐵道聯運盈餘的良好成績，鐵道當局往往傳為莫大的奇功。其實所謂整理聲中的聯運和負責運輸。其主要功能還是幫助列強的商品更能圓滑地運銷，而國內農產市場亦更密切地聯繫到列強的控制之下，而且中國的鐵道主要都在外人支配之下，營業收入雖因整理而增加了，但所增加的主要都是以外債本息的形式流入外人之手，很少用來養路，不用說這些關係都是技術整理以外的問題，當然是鐵部當局所難兼顧的了。此外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就是聯運和負

責運輸雖然實行而且略有成績，但是繁重的運費並未減輕，尤其在這一般國民經濟陷入泥淖，農產品價格狂跌的現階段，其威力反愈形增重。平漢鐵道在軍興以前，客運基本價每人每公里不過一分二厘；貨運基本價每噸每公里，亦只收二分零二五。往後歷次遞加，客運增至一分七，貨運增至三分五二八（見去年六月十五日京報）。新任正太鐵道局長朱霽青先生，也認正太路運輸不振原因之一是運費過重，但是他又公開的說，爲了維護正太鐵道的財務方面的艱困，不能把運費減輕。所以站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立場來說，目下鐵道營業的好況，是由大眾的負擔培養起來的。

在這裏我們還需附帶說明目下中國辦理聯運倉庫所遭遇到的困難，此中最主要的難處，在於辦理聯運設置倉庫等等，需要大量的資金以及專門的人材。據最近的報紙所載，各鐵道對於倉庫的興築，還是逗留於規劃和計議之中，距理想尚極遙遠。

三 鐵道整理底真實前途

上面大致已將我們對於鐵道整理和盈餘的意義，加以嚴慎的觀察。現在我們要問：鐵道盈餘的增加是否就是中國鐵道復興的曙光？要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解剖近年來鐵道營業餘利的分配狀態。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二年三年中間，國營鐵道營

業餘利，總共爲98,951,000元；牠的用途是：A 用於擴充改良資產者27,880,000元，佔總額的28%；B 協濟軍政者23,700,000元，佔23%；C 償還債款本息者49,018,000元佔49%；合計淨虧1,670,000元，（見三卷二期中華月報鐵道部材務部最近工作情形）。

⑨ 從上面鐵道盈利支出的百分數看來，我們不難發見：第一，擴充改良資產的支出過於微少，尤其在這車輛缺乏，路軌橋樑枕腐敗不堪，亟待添購與整理的時候。二十三年盈餘雖然增加，可是對於擴充改良鐵道資產方面，毫無建樹；卽如醞釀甚久的平漢整理債款，也因種種複雜原因，成爲泡影。第二，在這奄奄垂斃的狀態之下的鐵道財政，救亡尙且無暇的時候，協濟軍政的非生產的支出竟佔總額四分之一，這是多麼可驚的現象。何況軍政當局從鐵道方面所獲得的利便，實際還不會僅止於此，譬如造成空虛盈餘的“軍事記賬”，在營業進款中也在一年年增漲。第三，償付債款的數額，差不多佔餘利總額的一半；這種情形在二十三年尤其顯著。去年鐵道債券償還本息總額（經理費在內）計389,008鎊；2,400,000日金；1,766,906法郎，折合國幣爲8,294,961元；較二十二年份的7,754,625元，增加540,336元。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倫敦市場中國各鐵道債券價格逐年上漲的情形來看，也可以間接證明。京滬及滬杭甬債券市價，去年京滬路債券，與票面原額極爲接近；滬杭甬

路債券，反而高過票面，其原因就在路債的償還。在整理後收入增多的保障之下，變為更可靠和更可觀了。

從上面三點的分析，我們已能認清鐵道整理的真價值。最後我們重複說一句：從客觀的事實看來，鐵道的整理，在業務上說，它更會促進列強的商品大量地侵入中國的農村；而其營業收入的增加，只不過使外債本息的清償和軍政兩方的挪借，更形方便和確實而已。至於真正的鐵道復興，事實上還是很難談到。

1935, 4, 22。

公路建設與中國農民

萬 巨 淵

近數年來，中國公路建設的日益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的廢墟上，的確是呈現著獨異的姿態。使人們不得不從各方面來加以注意了。有的單從事象的表面來臚列已成未成的公路，以及興築時的大概情形，很少觸及牠所以突飛猛進的原因，以及牠所發生實際影響。有的雖然注意到了這些方面。但是概念的結論又往往超過了具體的分析，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從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領域內，來相當地補充後一缺憾，固然。我們底篇幅不想用來詳舉公路底名稱和起末，不過同時我們也不打算作那全面的論斷，指出公路建設底興起和前途。我們只想從和中國農民有切身之感的幾件事態之中，作一個比較真切的分析，以供國內人士討論各路建設時參考，我們想說的只是下列三點：1，路捐的攤派；2，民工底生活；3，民田的收用。

一 路捐的攤派

據報載閩省築路經費的來源有如下七種：(1)省款，(2)縣款，(3)全國經委會借款，(4)南昌行營撥款，(5)閩北路款配債，(6)閩南鹽稅附加，(7)丁糧附加。這七種經費來源大體上能夠普遍適用於全國各地的公路建設。譬如皖南婺白公路的建築，其經費就是用這樣的方法籌集攏來：(1)殷實捐六千元，(2)商業捐四千元。(3)田畝捐二萬元，(4)茶箱捐一萬元，(5)旅外同鄉助募一萬元，(6)南昌行營撥款六千元，(7)皖建廳撥補歛昱路剩餘公債票洋二萬元。兩者相比，除掉後者的第五項以外，實際上只是名稱相異。譬如閩南和皖南的自然特產不同，因而在前者為鹽稅附加，在後者就變為茶箱捐。我們假使根據前列的材料而將牠一般化起來，那末築路費的來源實際上不過下列兩類：一，政府機關的撥款（內有大量的債券成分）二，臨時增加的稅捐（主要形態為丁糧附加或稱公路捐）。前者是農民的間接負擔，後者則是比較直接的負擔。本節想具體描述的只限於第二種。

驟然看來，殷實捐、商業捐或是鹽稅附加，好像是由富商巨賈擔負的，其實他們總是力圖轉嫁，倒運的總是最後的消費者。我們以鹽稅附加為例吧：‘灶氏的鹽賣給場主，白糖似的，只兩個銅子一斤；至於我們吃到嘴裏的那攪了土和灰的鹽，却要五十幾個銅子一斤’這主要就是因為鹽稅的重重附加以及商人之自衛的轉嫁，以致一般農民大眾只有負擔更多的鹽稅

而吃更壞的“土和灰”的鹽了。至於富商巨賈呢，他們還是可以一毛不拔，逍遙自在。而且事實還不止此，一般富商巨賈以及地主大戶，對於攤派到他們身上的殷實捐或田畝捐，還可乾脆地利用他們底社會地位而抗不繳納。譬如廣東南海各鄉的“殷富大耕戶，則恐牽累繳款，紛紛逃避”（見1934，12，8，七十二行商報）；安徽祁門“旅滬富商許楷賢，抗不繳納路捐，而該段各方所攤認，則都已繳納”（見1934，12，27，安徽日報）；同省婺源旅外鄉紳對於本縣婺白公路的募款，皆置之不顧，以致該路建築毫無結果（見1934，6，16，安徽日報）。這樣的事實真是各地皆有，牠們證明實際擔負築路捐款的只有無力拒絕無力他遷的貧苦農民。

各地雖有請求減免路捐的各種呼籲，但是第一因當局築路要求的迫切，第二呼籲本身又往往是紳士式的乞憐，所以只是一紙具文，毫無實效。譬如皖南楠祁公路所攤派的路捐，因農村破產而“短收尙鉅”的時候，祁淮公路又要開始興築，又要向各鄉各鎮攤派四萬元以上的捐款（見1934，12，10，安徽日報）。各地政府當局爲了要完成在上長官所賜與的職務，對於無力繳納或請求減免路捐的貧苦農民，也只有強行勒索。例如廣東南海建築公路委員會竟“議決各堡欠繳畝款，限於夏歷七月底止。一律繳清。一經逾限，即由該堡委員，來會請兵引拿拘押，並每畝加收一元，即每畝三元”（見1934，8，29，七十二行商

報)。固然，這種“引拿拘押”的命令，也的確具有強制貧苦農民，‘從石子裏榨出油來繳納路捐的一部或全部；但是極度的貧窮也往往引起事態之另一方面的發展。譬如前述南海各鄉的鄉民，就和爲了“引拿拘押”而被請去的部隊發生衝突，浙江溫屬各處也有類似的情形。去年七月十八日東南日報更載有這樣一段事實：

“……瑞平，永樂，溫麗，龍浦等路，均在趕築中，固工程浩大，需款孔急。所有各關係縣長，接奉建廳及工程處催款文電，幾如雪片飛來，雖明白當茲農村經濟破產，征收股款萬難之際，然不得不竭澤而漁，藉顧考成。是以日來溫處各縣長，或親自出鄉催征，或派警隊勒索，間有封產拘人強制執行者，以致應募路款之人，多避遠方，是誠建設聲中之一重大問題云。”

在現有條條件之下，國家財政這樣困難，而公路興築又這樣狂進不已，那末要想解決或避免這一問題實不可能的。因而農民大眾所受的苛捐的擔負，就更要求着我們底注意！

二 民工底生活

民工的徵發，實際上就是路捐的變形，更真確些說，就是全面地來擴大路捐的攤派。因爲攤派路捐的時候，一般說來。是要受土地所有的限制；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土地的人是不會來

直接擔負田畝捐或田賦附加。但是徵工的意義就和這完全不同：牠不受財產的限制，主要只受年齡和性別的規定。譬如贛省公路處所規定的征工制。是“以路線之長短，沿線鄉民每家人口之多寡而定工作時間”，換言之，就是“按戶分派”(1934, 2, 22, 時事新報)。桂貴公路委員會所訂立的徵工簡章第三條規定“壯丁年齡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查照自治調查冊，在附近路線左右十五里內徵之”(1934, 1, 30, 南甯民國日報)。浙江於潛興築天目公路的時候，通令全縣各戶有年齡二十以上四十以下之男丁一名者，即徵工一名，二名者二名，餘類推(見中國經濟情報一卷十六期)。全國經委會西北辦事處所施行的徵工築路章程，大體也是一樣。因此，一般貧農雇農以及其他農村苦力，都因他們具有活的勞動力的資格，而被推薦到公路建設這種事業上來了。

爲了說明便利起見，同時爲了更明確起見，我們先將前引各地的徵工章程底有關部份條舉一下：

1. 全國經委會西北辦事處徵工章程第十八條規定“徵工工資以土方計算，每公方自六分至一角，視工程之難易，由工務所酌定之”；第廿三條規定“工作工具，能以日常農具充用者，應由工人自備，如需由工務所代購者，其費用仍須於應領工資內扣除之”；第十三條規定“炊爨事宜由棚頭輪派本棚工人一名辦理之，如需住棚及炊具，得由本會先行發給，仍須於應

領工資內扣還。

2, 桂貴公路委員會徵工簡章第四條規定『莊丁工作依照工程師規定土方, 按路線遠近難易, 每日給伙食銀二角』; 第五條規定『每壯丁總工作若干尺規定以後, 按日施工, 按工給值, 若逾期不完, 伙食須由自備, 以儆怠惰』; 第六條規定『本公路建築所用工具, 除特別需要由公家設置外, 概由壯丁自備 (如鍬, 鋤, 鋤頭, 擔竿之類)。』

其他各地的徵工辦法, 大體都是一樣, 惟贛省公路處之章程頗有例外, 牠規定『民工不特不給工資, 而且還須自備伙食。』至華北方面, 據實際調查所得, 其條件還更惡劣, 即被徵民工除掉自備伙食工具而無償勞動以外, 還要帶洋三角作為測量員的報酬; 而且以後路面的修理, 也要附近的農民無條件地負擔。現在我們且就前述兩種章程來作一個綜合, 如下: 第一, 民工所能得到的報酬, 不論就土方計算或是按日計算, 最多不過二角左右; 第二, 伙食炊具和大部份的築路工具, 全須民工自己擔負。那末, 民工底生活將是怎樣一種生活呢? 兩個毛子能買幾多油鹽柴米? 一把鋤頭的值價又是多少(註)? 這確是很難配置的問題了!

我們要想深切了解民工底生活究竟是怎樣一種生活, 下列兩點還須加以注意:

第一, 關於工務所方面的: 按照經委會西北辦事處的征工

章程，民工在每一公方的土方上面所能得到的工資究竟是六分還是一角，要由工務所視工程之難易來決定。在貴桂公路方面，其情形亦復相同；而且假使不在預定的時間之內把預定的土方築完，那末其餘補築期內的伙食費就要由民工自負。但是在論定“路線遠近難易”的時候，主權全在工務所方面，工人方面是很難得有確實的保障。我們假使再估計到鄉村長或豪紳地主和“領班”或“棚頭”之間的聯繫，那末，“實質土方”超過“名目土方”這類玩意，定是普通常事。

第二，關於工資的發給情形：各地築路當局因上方經費竭蹶，對於就地民工工資的支付，什九全賴本地的路捐或田畝捐。但是前面說過了，這種路捐的徵收又是萬分困難，因此拖欠民工工資就幾乎成爲普遍各地的現象。譬如湖南的沙鄭公路，安徽的楠祁公路，浙江的開遂公路，江蘇的溧武公路，在路面興築之中或興築完竣之後，都曾發生因拖欠工資而起的糾紛。工資的尅扣差不多也和工資的拖欠一樣普遍，譬如去年九十月間安徽殷屯路路工三四百人，吊打他們底包頭和賬房，就是因爲包頭和賬房相互結托，趁收方之際尅扣他們底工資（1934, 10, 9, 徽州日報），去年十月六日的西北文化日報更明白地告訴我們說：“省府據報，原定以兵工修築之處，仍有徵派民夫情事。且對徵派民夫不按規定發價，以至民衆對於僱夫事項，或多觀望不前，或紛紛請求免徵，或雇用後因伙食無法維

持而中途逃脫。

民工底工資本來已經微薄得難以度日，現在再加上前述種種關係，那末他們底生活之成問題就更可想見了。然而“中途逃脫”不特是經濟上，同時也是法律上所不許的。譬如桂貴公路徵工簡章第八條規定“壯丁如在應徵期間故意規避者，依照應出工數，得科以三元以上三十元以下之罰金”，第九條規定“凡被徵民工，苟有不得已事故，得雇工代替，或每日每工繳工資毫銀三角”（惟所付工資，該簡章却規定為二角。）經委會西北辦事處亦規定“被征民工如有違抗不到者，得由工務所查明函准該管縣府懲罰之”。這樣，一般民工就只有唯命是聽了！

有許多地方因為軍事關係，非在一個短期間內將某段路面趕築完竣不可，那些不得不唯命是聽的貧苦農民，往往因為工作過分緊張而暴死在烈日之下。譬如去年七月間為了進剿閩赤，浙省溫屬各處加緊築路，然而“沿線盡為高約數千尺之山嶺，”同時又“氣候酷熱，”以致“工人患病者甚多”（1934, 7, 23, 東南日報）。安徽殷屯路的路工，在相同制約之下，其結果更為悲慘：

“殷屯公路，奉令限期完成，適逢夏秋，旱魃肆虐，各包工嚴督工人趕築，以致病斃頗多。如利民公司一家，除開炮擊斃三人外，病死者有五十人，棺木無從買處，用板埋葬”（1934. 8, 12, 安徽日報）。

在本節末了，我們還要扼要地提一提徵工制度給與一般農事的影響，固然，各地當局在理想上確是以徵工不礙農事為原則，如經委會西北辦事處所擬訂章程之中，即規定“徵工時期，應於農暇時行之”。但是事實上往往因為軍事關係，這種規定只是紙上的遊戲。譬如浙江金華縣黨部於去年一月曾因農忙等等關係，要求省府緩築金蘭公路；但其結果因“奉上官命令限於本年（即去年）三月前，將金蘭路修築完竣，與衢蘭以達常玉等公路接通，以重省防”，還是抽調壯丁興築（見去年一月廿一日及二月一日杭州民國日報）。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本在日趨破壞之中，而目下的公路建設實有加強的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三 民田的收用

有人或許要說：這是地主富農所需考慮的問題。這話當然不錯，因為地主富農是廣大的土地佔有者，因而他們底土地有更多被收用的可能。然而這話不是全對的，因為：

1. 假使測量中的公路路線真的通過了地主富農底莊地，那末他們往往可以運用他們所特有的社會關係，將路線相當改過，將禍患轉嫁到他人身上，至於中農以下的農民層，其境遇就完全不同：他們既無力變更路線，同時又更經不起一二畝田的被公收用。

2.地主富農十九都有直接的或者間接的官場往來，他們也往往具有“呈爲呈請”的公文知識，因此他們很容易向築路機關或者各地政府領得相當的地價，至少總可很快地赦免掉被收田地所負擔的稅捐。但是中農以下的農民層却難這樣方便。

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公路建設因爲收用民田的關係，縮小了各地的耕田面積，而這，無疑地，促進了地主更可居奇地榨取佃農和貧農。

我們現在就根據這樣的關係來考察收用民田對於農民大眾的影響。

因爲國內從事調查統計工作的機關和團體還沒有注意到公路建設收用民田的這一問題，所以被其收用的民田究竟有多少，我們一時還難知道；但是民田的收用對於各地而言都已形成莫大的威脅，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我們現在舉一個比較完善的例子來推見一斑：

“省府近據留壩縣呈稱，留壩全縣田地僅六千七百餘畝，賴以生存之人民達二萬零六百餘口。此次測量鳳漢路，自縣城起至武關止，計程五十里，共佔民田二三百畝，均係水田，無論旱潦，皆可收成，實爲沿途最肥土壤，民命所繫。再由此經縣屬之南星鎮至縣城止，共計一百里，約佔民田五六百畝，此段多爲旱地。總計本縣轄境。由南星

至武關，共佔人民田地約一千畝之譜’（1934, 8, 12, 西北文化日報）。

現在我們更根據這個例子來作一個概算。五十里要佔民田二三百畝，一百里要佔民田五六百畝（這個數目是不會怎樣誇大的）現在我們姑以一百里收用民田五百畝計算，據全國道路協會去年十月所發表的統計，中國廿五省業已興築完竣的公路（不包含土路）共有十餘萬公里。按新制換算，約合華里二十萬里，那末所佔民田至少也有一萬萬畝了。據劉大鈞先生估計，全國耕田（東三省包括在內）約達十五萬萬畝，那末公路所佔民田大概要達全國耕地面積的5%；其中雖有一部份是荒地或原有的道路，然而公路所佔耕地，也已十分可驚：牠已構成摧毀中國農村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了。

政府當局對於這些大量收用的民田，雖然明令“給價免糧”但是第一因為財政支絀，第二因為呈請“給價免糧”的手續麻煩，實際上並未有效地推行。譬如杭徽公路吧，除掉杭餘和餘臨兩段以外，其餘各段所收用的民田底田價，到現在還不會給付，雖然來往的汽車已經開了好幾年，而且發給的田價亦根本無幾，譬如浦啓公路只給地價二成，番禺農民數百並因每畝耕地以五元收買而與警隊衝突（此種糾紛在十年來的中國是屢見不鮮）。至於賦稅的減免也同樣遙遙無期，我們現在用一段記事來說明這一現象：

“案查本財政廳前以各縣造報修築汽車路，佔用民田，豁除賦稅清冊，填造諸多疏略，礙難核准，曾於廿一年四月間咨會本民政廳建設廳擬具查勘辦法暨冊結各式，呈奉鈞府指令核準備案，通飭各縣遵照在案。惟查原訂冊式內，有新尺度折合舊弓尺數目一欄，在本省人民習慣對於田地畝數，仍按舊弓尺計算，其以新市尺與舊弓尺比較，折算長短之數，徵特人民未諳，各縣政府亦恆發生誤會，因之取更冊表，頗費時間，一案之結，動延數月，且自二十二年份起，實行整理田賦辦法……”(1934, 5, 24, 西北文化日報)

好了，我們且不說“整理”後行將怎樣，但就以往三四年而言，已可明白見到官場公文的往還，以及各種技術上的阻梗，如何苦難了農民，使他們擔負那“無田之賦”！

此外，還有一件事實也同樣值得指出。因為公路興築在原来的田野之上，上下左右的水源往往要被路身隔斷。譬如浙江奉化龍潭堰，江蘇無錫青陽站以及儀徵等地，都有此種事實發生。那兒的農民在去年一月八月曾先後起而紛爭，要求將路身折毀或重新改築，以便引水灌溉。在這兒路身兩旁的民田雖然未被收用，但是要想繼續原来的農作已是萬分困難了。

公路建設給與農民大眾的影響是什麼，從我們所提供的前列三種事實之陳述，已不難得出一個綜合的答復，希望國內

研究中國農村經濟的人們，對於這一新事態的發展，繼續加以深切的注意！

1935, 5, 5, 改作

註：據中國經濟情報一卷十六期所載，興築天目公路的民工，在規定的三日服役期間，總要耗費四五角錢來抵償鋤頭畚箕等等工具的損失，假使畚箕由縣供給，所出代價更需三角。

一九三四年的中國工潮

壽 頤

在飢餓線下掙扎着的中國工人，其生活的悽慘黑暗簡直非筆墨所能盡情描寫。中國的國際地位本來已是不折不扣的半殖民地，任何帝國主義者都在她底國境之內享受着或多或少的宗主權利。在前幾十年國內購買力尙未完全被摧毀的時候，換言之，資本主義世界仍在繁榮的時候，中國不僅提供着一個絕好的市場，而且還是大批原料的輸出地；但是自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普遍加深以來，不待說，除掉受着帝國主義商品傾銷的加倍的榨取之外，中國還要反過來容納帝國主義生產過剩的農產品，這樣不特農村經濟的崩潰過程更增加了速度，就是民族資本也被壓榨得吐不出氣來。然而在華的帝國主義企業因為享受着各種政治經濟的特權，倒更加肆無忌憚地加緊剝削。以上是中國工人大眾陷入人間地獄飽受飢寒苦痛的基本原因。所以頻年的大小工潮繼續不斷在中國此仆彼起，就絕對不是偶然的事情了。本文的目的是想將過去

一年中的大小工潮作一較有系統的整理。材料都是取自各種日報雜誌，遺漏的缺憾是一時無法補充的。有幾種刊物，如上海出版的社會半月刊，截至作者屬稿的時候，還是沒有完整的新的統計報告（尤其是關於去年下半年的罷工停工，以及十一二月的其他各種方式的工潮），可供參考補充，因此本文關於去年下半年的工潮材料，也就最感缺乏，希望以後能有補充的機會。

根據我們所得的材料，去年全年中罷工行動共有一〇五件；其他請願衝突等等行動共三五九件。這些行動在各月中分佈的情形如次（有些行動會繼續至幾月之久，所以各個月行動的總和比全年件數的總和要大些）：

月別	罷工行動 件數	其他行動件數	
		騷擾衝突	請願呈訴
一月	13	21	60
二月	8	7	53
三月	19	14	49
四月	21	13	45
五月	8	9	31
六月	16	8	39
七月	9	6	37
八月	6	4	33
九月	2	4	32
十月	8	3	39
十一月	8	2	12
十二月	5	5	

至於全年參加罷工人數，據我們統計所得，共一一七，九二七人；參加其他行動人數共二四一，二二四人。這些人數分佈於各月的情形如次（許多行動是跨越兩月或數月的，所以各月的總和較全年參加人數的總和為大）：

月別	罷工人數	工日損失	其他行動參加人數
1月	4553	216074	33907
2月	7700	50950	26878
3月	23305	117245	54846
4月	28360	233275	58496
5月	9790	105860	62328
6月	22004	174128	44960
7月	1356	115356	21039
8月	1117	4751	6522
9月	2240	9740	13611
10月	4530	37250	7673
11月	9900	11200	6551
12月	3300	5170	4023

實際的數字自然還要大些，有許多行動是日報沒有記載的；即就日報所曾載及的行動而論，有許多是沒有載明參加的人數。但是一時既然沒有旁的辦法補充，我們也就祇好暫時用了這些不甚完全的數字來作研究的根據：好在由此而生的結論，雖然免不了缺點，但至少決不會有估量過度的地方。

從上列數字可以看到：上半年的工潮最為汹涌。舊歷年節

前後，也有明顯的高漲。年節前後，照例是廠主結賬解雇的時候，所以工潮在這時也就特別的多。至於下半年工潮，何以比較少些呢？這主要是有牠底政治上的原因。一般說來，政府當局對於工潮，無論何地何時都是感到有礙“治安”，而非將牠消除不可。去年四月前後全國南北工潮澎湃蜂起的時候，曾有嚴加制止各地工潮的通令。於是上海方面美亞織綢廠的罷工以及開灤煤礦區的罷工，都由各該處的軍警實行拘捕懲辦而制止了。然而當局的這種處理也祇可收一時一隅之效，不久上海方面又爆發了英美煙廠工人反對關廠等等的罷工風潮。同時華北方面的開灤礦工工潮，還是全年地在隨斷隨續之中。不過當局在這方面的努力與時俱進，使較大的工潮較難爆發，的確也是事實。

全年工潮在各項產業中的分佈情形約略此如。

產部門	紡織	交通	苦力	煙草	橡膠	火柴	礦山	建築	郵電	市政	手業	店員	其他輕工業	其他重工業	合計
罷工事件	16	14	16	8	5	6	8	2	3	2	10	2	12	1	105
其他行動	102	40	32	13	22	11	4	13	1	9	38	22	44	8	359

中國祇有極微弱的輕工業，這是民族資本唯一寄託的所在，所以在整個世界資本的系統中，祇是帝國主義的附庸，而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隨着一九二九年起始的資本主義第三期的危機加深以來，這個脆弱的經濟環節便成了各宗主國進

一步地侵佔略奪，以解救各自所身受的恐慌禍難的主要犧牲品。此中第一個便是日本帝國主義，牠的軍事侵略攫得了滿洲市場的獨霸權，政治的壓力博得了其他的方便，於是日貨就排山倒海地湧進，浸沒了華北華南和全國各地。握着世界金融權威的美帝國主義，也運用白銀政策來吸收中國存銀，搖撼中國的金融基礎，對英日作反撥的示威。其他帝國主義者雖然沒有日美這樣露骨，但是實際上他們都是仗着既得的特權，毫不放鬆牠們對於中國的剝削與侵略。

在這種情勢之下，再加以封建勢力的苛捐雜稅迭出不窮，民族資本的潰敗便加增了速度。號稱我國主要工業部門的紡織業，亦同樣病入膏肓，棉織業尤其受着日美帝國主義者在華企業的高壓。榮宗敬的申新竟宣告交與債權者銀行團整理，其他紡織廠多半都在減薪裁人的時斷時續的掙扎之中。絲織業幾全部停頓，失業者在江浙兩省即近十萬人。因此在工潮中，紡織業便佔着首席。

其次是交通。本來中國的運輸事業底主要作用除了替帝國主義者向內地擴張商品銷路而外，便是提供內戰的工具。年來交通事業呈現畸形的發展，其原因即伏於此。但是水道交通，因有帝國主義者輪船的壓力，土著航業依然不免捉襟露肘，重要的鐵道，因有奇重的外債擔負，所收進益大半都獻給帝國主義者去了。在利潤爲重的條件下，加之勞動過剩，中外

資本家都可以隨時以輕工資工人排去舊工人，所以交通工人，無論海員路工，一般的生活仍是苦痛萬分，在工潮中佔着次多的席次。其中發生於帝國主義者企業方面的有五次罷工，六次其他請願等糾紛。

中國的苦力都是農村破產以後都市產業又不能容納他們的半失業的人羣，爲數之多，簡直無法統計。其中有人力車夫，碼頭工人，有肩挑苦力，運鹽的苦工，徵發的夫役等等，他們終日要受包工的層層剝削和打罵。飯菜也不能吃飽，其他不用再說了。很多的人本身是苦力而家屬是乞丐。雖然他們在團結方面不如產業工人，但是他們的數目最多，生活的痛苦也最深。所以他們在工潮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去年的各項行動中，以十二圩運鹽的苦工反對輪運的工潮爲最大，鹽政當局竟不能不讓步訂出輪運佔半的辦法，雖然餘下的工作實在不夠養活這幾萬的苦力和他們的家屬，以致於直到現在，十二圩運鹽的輪船仍不時被鹽工阻撓。

其他工業如橡膠煙草火柴以及郵電建築市政等部門都有工潮發生。總之，勞資衝突的現象差不多有了彌漫全國的普遍性。大批的店員因爲市場零落，緊縮倒閉的商店到處皆是。都相繼失業或受失業的威脅，所以店員的工潮也很多，不過在組織上及人數上都還是散漫的零碎的罷了。

工潮的原因最多的是反對減薪開除減工等，下列數字略

可示其梗概：

工原	解開	減停	欠薪	增工	減工	要加	要良	反包	要開	同同	同同	工間	要救	醫醫	要工	爭工	契工	其
潮因	雇除	薪工	薪時	工時	工時	求薪	求改	對工	求工	情業	會願	求濟	藥郵	求作	奪作	約他		
罷事 工件	19	30	0	3	2	2	16	17	4	0	3	8	0	0	0	6	3	3
其他 動	19	30	41	27	0	7	12	18	8	14	3	14	12	13	5	12	9	7

解雇與開除差不多佔着工潮原因的首位。這可見失業威脅的嚴重。以女童工代男工。以低工資新工人代老工人，都是普遍實施着。還有許多開除是工潮結束以後施行的，如四月中美亞織綢廠罷工結束以後就有百五十名工人被開除。在經濟的危機下工人工作的無保障由此可見一斑。

次則減薪，差不多沒有一個部門沒有發生減薪的工潮。紡織業方面，如上海寶華裕村紗廠減工資一二成不等，恆豐綢廠減二成，美亞綢廠減一成半，因而都引起糾紛。五千餘名湖州絲織工人，因為反對減低工資二成，屢次示威暴動，但其結果，工資仍以87.5%發給。手工業方面，如徐州造酒工人減薪二成半，台山石工減薪二成，蘇州縫工減薪三四成不等。總之為利潤而生產的資本家，它們的損失必定是要設法轉嫁與工人的。

停工與欠薪所引起的工潮也很多。減工時的工潮也是屬於這一類。這類工潮之多，正又說明了經濟破產的嚴重性。一方面大多數人需要生活消費品，而無處出賣勞力，因而無錢購

買，另一方面有着生產手段的人僅因無利可求而停止生產。這個矛盾現象歸根結底自然是由於經濟結構本身底不合理。

產業衰落，資本家盡力企圖將一切損失轉嫁給工人，其所取的方式不外上述解雇，開除，減薪，停工和減工，統計這類原因，在罷工中佔五十六件，約當全數53%，在衝突請願呈訴等行動中佔二百三十四件，約當全數67%。

如果說開除，解雇，減薪，停工，欠薪和減工等，是資本家取了攻勢；那末要求加薪，改良待遇，反對工頭包工，要求救濟，要求工作，要求開工，反對壓迫等等，就是工人取了攻勢了。去年這類的工潮數量也頗不弱，在罷工中佔四十八件，約當全數45%，在其他衝突請願呈訴中佔九十九件，約當全數82%。就一般的情況說來，中國工人的生活本來連牛馬都不如。如果說工人也應該渡着人的生活的話，那末他們希望生活改善一些，決不是他們的苛求或奢望。譬如無錫慶豐紗廠的工人，雖在六月炎天，還要每日站立工作十七小時，其他可以類推。工人渡着這樣的地獄生活，無怪工潮中要求改善生活的原因要佔很多的成份了。

以同情相應為出發點的工潮去年也有幾起很重要的。決然採取最高的罷工形式的，有四月中天津唐山華新紗廠，啓新水泥廠，響應開灤礦工工潮，上海恆豐等絲織廠援助美亞工人罷工，五六月中上海英美煙公司新廠工人援助老廠工人反對

關廠的大罷工。其他還有上海數萬海員罷運英美煙公司貨品的醞釀，上海報關工人援助津幫同業罷工等的醞釀。這些醞釀所以未曾真正實現，據報紙所載，都是由於當局和工會的勸諭和制止。

有重大反帝意義的工潮，在華北則有開灤的幾萬礦工。他們以不折不撓的精神與英日帝國主義者周旋，在華北始終是居於首位。上海方面也有由反對減薪進而反對法帝國主義者屠殺的美亞大罷工，還有英美新廠反對英帝國主義合理化的關廠的罷工，以及躍躍欲試的上海幾萬海員準備停運英美煙公司貨品的醞釀。

此外因工會問題而引起工潮也有二十多件。有的是由於資本家不許工人組織工會，如二月間的上海申新一廠，有的是由於工會收費而與工人發生衝突，如十二月的上海華成煙廠，有的是由於工人要求改組工會或反對工會，如三月的開灤礦工，和天津北洋火柴廠工人迭次反對工會委員，三月的廣東台山木藝工人反對工會理事強姦公意，九月的上海華電工人要求全體大會改選等，自然，這一類的工潮也是含着政治性的。

工潮結果	勝利	部分勝利	失敗	不明	發救死 生捕傷	被捕人數	死傷人數
罷工事件	21	16	24	44	13	144	13
其他行動	56	112	43	148	16	56	4

至於工潮結果的分析我們根據不甚完全的日報材料得出上面的統計：

這些數字之中，結果不明的數量太大了，所以整個的工潮中工人的勝利百分數究竟是怎樣是難以求得的。自然從這類日報去找求關於工潮的詳確記載，也是難乎其難的。他們對於真相的隱蔽可謂無微不至。譬如去年三月十一日上海美亞罷工工人被法帝國主義者捕探屠殺的慘案，時事新報直到十四日好容易才輕描淡寫地記一筆。

統計工潮經過或結果中，發生被捕槍傷的事件共有三十九起之多。除“死傷多人”“被捕甚多”等項記載之外，有實數可稽的計被捕的二百人，死傷的十七人。此種拘捕槍傷的彈壓手段的採取，在當局自然是爲了“安內”；同時爲了“安內”，他們對於每次工潮也很周密地加以勸導訓誨，或經黨政機關，或經工會委員。這種工作對於制止工潮，也頗有相當的效果。

一九三四年中國的工潮約略如上所述。按着目下國民經濟前途的黯淡，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加緊而論，來日的工潮將要如何發展，就是不言可知的一個問題了。

目下勞工生活會談

駱耕漠

時間：一九三五年四月。

地點：上海工廠區域裏的一家小茶店。

會談人物：

甲、郵務工人；

乙、海員工人；

丙、失業工人；

丁、在業工人。

甲：喂，老乙，你也在這裏喝茶麼？你底船幾時靠岸的？你和老丙在談什麼女人嗎？

乙：我底船今天上半天剛靠岸，我們那裏會那麼開心地來談笑女人！我剛才又和老丙談起他底失業呀！

甲：我是有意窮開心，我何嘗看不出。你看，老丙底眉頭還不是打結似地皺着嗎？他真倒霉，一失業就一年之久，難怪他一碰到我們就要苦訴他底失業。

丙：唉，我真想不到一失業就會這麼長久！自從去年五月英美煙老廠關門，我們三千多工友頓時失業以來，我差不多竟連一些臨時的苦工都找不到做。起初我雖然因為參加罷工活動，被廠方特別仇視，要想在英美煙公司再候空缺是不可能了；但是我總以為自己總還有一點精壯的勞動力可以出賣，那末在別的工廠裏遲早一定能夠找到驅使我的資本家，那裏料得到失業工友充滿街頭，我就一直空蕩到現在！

乙：老丙呀，目前的失業問題真是愈鬧愈厲害，失業工友真像你所說的“充滿街頭”，因為像你那樣老是失業着的倒霉人也是到處皆是，別的且不說，單拿我最知道的海員來作個比方吧：上海黃勝和失業海員的人數一向就以數萬計，失業時間動不動就是一二年。北方的天津，南方的廈門廣州，也都是一樣，那裏的海員公所都是濟滿了失業海員，後來因為人數太多了，太騷擾不安了，公所的主人和涉仔沙竟扳起猙獰的臉孔，將我們的失業海員驅逐出所，或者叫所內的醫生不發藥物給我們失業而又害病的海員。那些失業在海外各地的海員也是結隊成羣，他們回不得家，只好捧着一元幾毛錢的糖菓在船頭船尾叫賣，實際等於乞丐一樣。現在因為這樣叫賣挨命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他們竟連半餓生活也難維持，他們只有做異國的餓鬼！

甲：說起失業生活的慘苦，老丙所受的也和那些異國的餓鬼差

不多。他從前還對我詳細形容(好像形容一番可以減輕自己底創痛一般),現在竟連形容的勇氣也大大消失了……

丙:有什麼講頭呢?講講有什麼用呢?我每天還不是只好買幾個銅板的“槍餅”來驅驅在我肚中餓得發叫的蛔虫嗎?我現在不向朋友訴說我底苦難,我要向人咒詛,暴露那些外國資本家的貪婪殘忍了。我從前不是向你們提過嗎?去年英美老廠關門的原因實在不是像那些洋大人所說的什麼生產過剩,營業虧本,而是因為老廠的工友底工資都在一二元之上,非借關廠的辦法將他們裁汰而改僱工資低廉的新工不可。他們底心是多麼凶狠呀!他們一點也不顧念我們這批老工友在過去替他們賺了多少錢;他們簡直把我們底生命當作兒戲!

乙:那是自然的囉!假使他們底心不黑而和你談起交情來,那末他們也不成爲其資本家了;我們底輪船公司方面又何嘗不是一樣。譬如昌興大來兩家公司吧,一面運用數千萬金去添造日本皇后和柯列芝等新輪,而另一面又藉口營業虧蝕,大裁其海員。他們只曉得自己,只曉得將自己在恐慌中所受的損失轉嫁到我們工人身上!

甲:是呀,說得真不錯!他們爲了保全自己底利益,不論怎樣毒辣殘酷的手段都會想出來而無情地加在我們工人身上。他們除掉像你們所說的藉口營業虧蝕,而將工資較高的老工

友辭退以外，同時還要借同一口法將那些比較老弱的工友解雇，名義上是爲了縮小範圍，實際上是爲了加強勞動強度，以便從精壯的工人身上多榨取一點。譬如今年二月間怡和紗廠的罷工，稍後申新二五兩廠的請願，一部份的原因就是工人方面不服他們這樣自私自利。我送信到工廠區域裏去的時候，總老是聽見工友們這樣訴說。

丙：講起來真氣人！有許多人不知得到什麼好處一樣，還要責罰我們工人這種自衛行動是大逆不道，同時反說資本家的關廠解雇是應該的。其實，就是退一萬步講，就算資本家的確全是爲了營業清淡（實際上只不過一部份而已）而不得已地使我們失業，他們還是難逃罪惡之責，因爲營業清淡這回事，並不是我們造成的，而是由於他們盲目地爭利產生出來的，何況過去營業好時，我們還替他們創造出無數的財富呢！

乙：在目下講理是講不通的，有什麼理好講呢？

丙：是呀，所以我們是應該吃苦的，像我就是應該這樣失業下去以至於餓死——死！死！死！

甲：老丙，你不要這樣憤懣失望吧！我們總有前途的呀！我們有這許多人，有這樣大的力量，只要自己不願意，那裏會餓死呢？在目下，失業工人固然苦痛，在業工人也同樣苦痛，我們都要求着生活的解放……

乙：你底話真說得不錯而且十分重要，我們應該向着我們所身受的苦難奮鬥！我平常聽見有些人說，在業工人應該好好地保住他底工作，不要隨着失業的或剛被裁退的工人胡鬧，這完全是離間我們力量的錯誤說法，何況我們自己也時時刻刻有失業的危險呢！而且就算拋開這點不計，我們目下所身受的生活，因為各種關係的交迫，亦早已不是值得加以死守的東西了。譬如像我所曉得的，長江和沿海一帶的生火和水手的工資，公司方面雖然規定為二三十元，但因伙食，公所費，看差等費的扣除以及目下普遍實行的減資運動，我們實際所多餘的不過七八元，而且這還是最最好的情形。同時在另一方面，工作時間却拉長了，譬如貴生輪生火部的打什吧，他們每天要整整地工作十二小時。聽說珠江內河輪船的工人生活還更悲慘，生火和水手底月薪不過十三四元，伙食還要自己供給，工作時間又常常在十八小時以上。試問這樣的生活和失業的差了多少，我們不是同樣迫切地需要生活上的根本改善嗎？

丙：我剛才不過是一時悲憤之言，我們當然需要努力謀生活的改善，在這一點上，在業的當然也和失業的一樣。在這裏我也可以告訴你們一點消息。前月初頭，我底鄰居裏有一位姓張的女人，她在美豐織綢廠做工，因為工資一再減少，丈夫又失業了一年多，家中時常沒有米燒飯，想想做人太沒

有意思了，於是就背人服毒鴉片而自殺。所以在目下，就是僥倖有一點點工做的人，也的確和我們失業的一樣難以度日呀！

甲：哦，不錯，我也想起一件事來了。不久以前我送信到滬西東京路去，看見母女兩個在一個慘死的小孩底跟前號淘大哭：因為那位四十多歲的母親在外面不能時常找到零星的苦工做，那位大女兒雖然在申新九廠做工，但因每月工資還拿不到十元，同時營養不足，精神不好，對於強度的工作往往要弄出疏忽而罰扣工錢，這樣那個小孩就空喊着“要大餅吃，要大餅吃”而活活地餓死了！你想悽慘不悽慘？我有一位朋友名叫老丁，你們看見大概也認得的，現在怡和紗廠做工，因為他能看看報，曉得許多在業工人如何被廠方榨取，生活如何苦痛的情境——呀，巧極了，那不是他麼？喂，老丁，到這兒來一塊喝茶，我們談談吧！

乙和丙：哦，原來就是這位老丁！——你一向還好嗎？

丁：難得，難得，我們竟不約而會！你們還好嗎？我是不要談起，苦得要命，想到這兒來找個人談談，出出氣！

甲：我剛才和老丙談起：在目下失業的固然痛苦，就是不失業的也同樣過不得日子，你不是知道得很多嗎？好，講點給我們聽聽！

丁：好，我就將最近我們怡和新舊兩廠的罷工經過告訴你們

吧。我們工友一共有一萬多人，在過去不知被那些英國資本家剝削去多少汗血。去年他們因為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賺頭稍許少了一點，就開始大減其工，將日夜班改成常日班，又把常日班改為三日班，這樣我們的生活保障就大大動搖起來了。今年他們更得寸進尺，將我們的工資減少百分之十，使我們底生活更無法維持，於是我們就被迫地於二月間相繼罷工，前後堅持了一個多月。我們反對減低工資。但是，第一因為廠方勾結大批武裝巡捕來強迫我們，第二他們終又用金錢來利誘哄騙那些認識不清的工人和工賊，我們終於不能完全勝利，我們一時沒奈何只得重進那地獄一般的廠門！

丙：唉，弄來弄去，倒霉的總是我們……

甲：我聽了你這番話，使我不禁想起去年震動全滬的美亞工潮了，他們各廠的男女工友是如何地一致，如何地英勇，但結果終給法巡捕及其他武力壓服下去：受傷的受傷，坐牢的坐牢，而他們所要求的終於得不到，他們只有一任資本家減少他們僅有的工資！

丁：談到美亞工人的生活來，我又要告訴你們一件新發生的事實了；這事比減資還更厲害！美亞的經理近來將廠中的綢緞硬塞給男女工人，強迫他們各自去推銷，賣得的銅錢就算付給他們的工錢。假使賣不掉呢，他們也只有自己承受

休想再得半個工錢了。我們且不管廠方所作的綢價和市價有否高低之別，工人們爲什麼要負推銷之責呢？他們底鄰居，他們相熟的人，都是同樣的窮，那末叫他們向誰去推銷呢？何況在這恐慌年頭呢？他們之間，有許多已無錢買米，終日只好買點大豆當飯，因大豆較米便宜。他們不但不知肉味，而且竟至不知米味了！女工們終日捧着無法推銷的綢緞哀哭！太太小姐穿綢著緞，趁着汽車到處逍遙，然而她們只有禁閉在斗樣的角樓裏對着綢緞哭！這是誰作下的孽呢？工人呢還是資本家？

甲乙丙：……………

丁：唉，資本家作下經濟恐慌的孽！而一切禍患和損失，卻命定要我們工人來消受，所謂人權，所請公理，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且剛才所談各種減資壓迫等等情形，又是一年厲害一年，同時也不僅上海爲然，天津，廣州，漢口等地都是一樣。我們剛才所談的固然局限於紡織業方面，其實火柴，樹膠，煤鐵等業亦厲行着相同的剝削，所謂減工減資已經成爲兩根鐵索，將各地各業的工人慢慢地勒死。資本家——尤其是包工頭，對於一減再減的僅有工資，還要想出各種各樣的方法來剋扣。有些工廠一定要工人着廠內做的制服，取價則較原本爲高：至於將飯金提高，將飯菜弄壞，以便剋扣，則更是普遍的情形……

乙：一點也不錯！在我們海員方面所受的剋扣之苦也是非常利害：譬如外洋方面吧，荷郵芝字號生火水手月薪定為廿六七元，然而涉孖沙每月却要扣去館用（即公所費）五六元，再如昌興公司的日本皇后和俄國皇后兩輪，對於生火水手取伙食費十二元（一水船，即五十日左右），其飯菜本規定和大艙客的一樣，但是實際上因為包頭伙頭剋扣的關係，真正吃到嘴裏的簡直和囚糧一樣，他們更將剋扣下來的肉類做成“宵夜飯”，當我們肚餓時，再以二毛一碗的高價賣給我們吃，真是剝削之上的剝削！

丁：說到在業工人的苦難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大大注意，那就是我剛剛提到過的勞動強度的增加——

甲：嗯，不錯，這點在你沒有來時，我和老丙亦略略說到，現在再聽你詳細說吧！

丁：資本家爲了減輕目下恐慌期間所受的損失，或者更多得點好處，就將馬達開得更足，機輪轉得更快，使在同一時間之內可以得到更多的無償勞動。但是工人却倒霉了，我們底精力有限，不能和疾轉不止的機輪比賽，更不能填滿資本家底無窮欲望，因而我們底手指，腿臂甚至腦袋，就時常要遭逢不測之禍，數日前（大概是十三日吧），我在申報上看見工部局底一個報告，牠說三月份工廠雖多停工減工，但是出險事件仍有一九四件之多，而且還有六個人因重傷而

死，至其原因自然是工作過久和過於緊張。據說有一位工友自下午六時一直做到次日上午六時，因而誤將其足絆入機件，以致折骨；還有一位十四歲的小女工亦慘遭同樣的橫禍。現在各地廠主爲了能夠積極地加強勞動強度，都藉口營業不振，將比較老弱的工友淘汰；不過因爲他們底貪得無厭，年少力壯的工友也就大倒其霉。

丙：在目下這種環境之下，像我這類失業的固然要活活地餓死。就是像你們手頭還有一點點工作的，結果也是要被資本家慢慢地磨難而死，我現在是更明白了，但是據你們剛才所說，幾次罷工行動都不能達到目的，那末我們要怎樣才能得救呢，究竟有沒有前途呢？

丁：處在我們這樣的地位，如心如意地做事，原是萬難辦到的，剛才我也提過：不過我們是社會的真正生產者，我們有無限的集體力量，我們總有光明的日子，這是無可懷疑的。至於老丙所問的“我們要怎麼才能得救呢！”的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大家以後時時刻刻注意！

乙：你所說的一點不錯，而且很重要，同時正如你所說的，我們要繼續不斷地按着事實來求出解救我們自己的方法。

丙：好，我們說了的話，不但要永久記牢，而且要切切實實地去做，我們一同努力吧！

甲：今天我們偶而相會，隨便談談，意義實在不少，將來時常碰

碰頭吧！現在時候也差不多了，大家再會吧！

1935, 4, 26。

死亡線上的中國煤礦工人

駱耕漠

在今年開端的一月間，東北方面就給我們送來了一個也不算壞的好消息！當時上海各大報紙都載着這樣的電訊：

“撫順煤礦工人二千三百人，因工頭二人爲日人兇毆，十六日全體罷工，礦警開槍，擊斃工人一。工人八百餘聚衆擁入總理室交涉，日總理明古江召礦警三百，包圍開槍，死八十七名，捕去六百餘名，死傷在礦區內枕藉，無人過問。礦方強迫未罷工者復工，因礦井水滿，迄十七未復。頃日指其中二十八名爲煽惑禍首，將予槍決”。

這事是發生在“我們始終否認”其業已淪亡的遠遠的東北；同時比起“我們始終否認”的東北淪亡來，這事又是“一件不關緊要的小小動作”，因此，被捕的六百餘工人怎樣，被擊斃的八十七名工人怎樣，那些將予槍決的二十八名工人又怎樣，我們就統統不得而知了！我們更這樣想：國內定有不少“賢哲”的人們早已忘去這一事件，同時他們還更希望其他的人羣也

和他們一樣容易忘去這“不快”的記憶！

最近山東淄川方面又發生了動因不同而結果是同樣悲慘的慘劇：

“五月十四日濟南專電：十三早十一時廿五分，淄川魯大公司煤礦第二坑七十五號開煤處發生大水，勢甚急，坑內工人約四百餘名，至晚未能救出，十九號開煤處有二百餘工人亦未救出。六百餘工人證明已全淹死，家屬環井呼號，哭聲震天。現積極打撈死工，約一週可撈出，實空前慘劇”。

魯大公司名義上是中日合辦的，實際上全在日資操縱之下。現在因為“工人家屬五百餘人包圍事務所，怒號“還夫還子，”幾有暴動之勢”，日本領事遂電請魯省府派隊前往彈壓，以保全他們底生命財產。喪夫亡子的婦女們還不能為死者自由哀號呀！

不幸事件的一再出現，實在使我們難以忘去中國的煤礦工人是生活在死亡線上！

資本主義愈到東方愈野蠻，中國的工人原在極殘酷的條件之下生活，而這次相延六七年的世界經濟總恐慌還更加深了他們所受的苦難。失業，減工，減薪和拖長工作時間或增加勞動強度，是普遍地展開於產業底各個部門，煤礦業絲毫也不能例外。不得已爲了生活的掙扎而對資方有所要求的時候，工

人們所得到的亦往往是無理的迫害，這對於煤礦工人也絕無二致，去年開灤礦潮的經過以及前述日警的殺戮和彈壓，就是現實的例證。而煤礦工人或一般礦工，因其所特具的工作條件之異常險惡，比起一般產業工人來是更與死神為隣。譬如河南彰德礦區在今年四月份內曾發生兩次爆炸：

“彰德訊：六河溝煤礦和順井，於七日晚五時突然爆炸，聲大如雷，重傷十四人，皮肉焦爛，截至十一日，陸續死去十一人”（四月十四日新聞報），

“本縣西北小寨煤礦，於廿七日工人正在工作之際，石頭洞內突然透出火星，轟然一聲，濃煙滿佈，火勢甚猛，工人躲避不及，致死李黑只等十餘名。身腸焦爛，骨質為灰，其狀至慘”（五月三日北平晨報），

這種不測的橫禍，據我們從零星各報所已見到的，在去年一年間有如下表所載（遺漏當屬不鮮）：

月	日	遭禍所在地	死傷人數	原因
4	26	安陽馬堂溝	死十九人	失火
4	—	同上	死傷七十餘人	失火
5	28	開灤礦井	死百餘人，傷五十人	電滾走火
6	17	焦作中福公司	死傷三十人	因火爆炸
7	21	開灤馬家溝	死傷數人	煤洞塌毀
7	24	長興煤礦	已知死五人，餘未詳	爆炸
8	5	開灤馬家溝	死一人，傷十餘人	—
9	19	同上	傷八人	—
9	—	陝縣民生煤礦	死傷七十九人	鑿井發水
10	14	安陽新莊村	死傷十一人	出水

各地煤礦工人所以這樣迭遭橫禍，雖說有關他們底特殊工作條件，就是他們要沿着狹隘的地洞，墜身到深深的地殼之下去；但是因井水的突發，煤氣的充塞以及烈火的爆炸等等關係而致他們於死地，主要當然由於礦主或公司之唯利是圖，而不注意於礦內的設備或安全。中國的勞工大眾是生活在極度的貧困之下，相對的人口過剩的現象在中國比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更顯著，這使苟且偷安的民族企業家不願相對地改進技術以增殖其財富，只會無情地從勞動者身上榨取出他們的利潤，按礦業而言，購置安全燈在礦主看來是不屑為的、因為炸死一些礦工和他們無甚影響。現實的利害關係限制着他們，他們只願在極落後的極野蠻的形式之下來進行煤礦的探掘。浙江長興縣的鑛區，其經營方式在中國還算比較完備的，我們就根據從那兒調查所得的作為例證吧：

“鑛區工人大部份是河南省的農民，可以分成兩大類，就是井上作工的和井下作工的；生活最苦的是煤井下面的工人了。他們的生命在在可以毀滅：煤氣，井水，坍塌等等災害是他們不可避免的命運。他們每一次上工，要在井中住上八個小時，八小時的裏邊，一些飯食都不能進口。黑黝黝的地獄裏，祇有一盞暗淡的電石燈，方是他們唯一的侶伴。他們每次拖着沉重的脚步，成羣結隊地走向井口的電梯，十幾個人一次的就給那個怪物吞下肚裏去，及至

出來的時候，祇見到三四人一次的在洞口伸出頭來了！各個人的臉上都帶着沉沉的死氣，一點血色也沒有，混身黑黑的活像書本上見到的黑夜叉”（1934，2，6，杭州民國日報），

前述“在在可以毀滅的生命”一旦毀滅掉以後又怎樣？前引報紙又這樣告訴我們：

“有些工人爲著要多得一些工資，每每做了上午六點鐘至下午二點鐘的工以後，晚上的十一時又在做著第二次工了，但是他們的精力是有限的，所在往往要害病。如果是死在礦外的工人，誰也不會有一點憐恤；萬一在礦內給煤氣井水等等災患害死了，工人的家屬就可向辦事處領取一百八十元的恤金，這就是一條命的定價。”

像河南焦作礦區方面，一條命還只能賣得一百元。那兒礦工們之間有一個流行的歌曲就是用來刻畫這一事實的：

“成神不成神？一兩天登雲；

下去一百塊，上來千三文。”

這就是說礦工們下井的時候，就是有去死的決心，預備他們的家屬去領一百元恤金；萬一井水煤氣沒有把他們葬送，上來也只能得到一千三百文的微薄工資。當礦工們拖聲換氣地哼著“下去一百塊”上來千三文」的時候，其情景是多麼悽慘呀！

因爲礦方並不致力於礦內的安全設備，並不積極設法來控制防範煤氣井水爆炸等等自然力的襲擊，使礦工們在在有“喪命的權利”；因而一般礦工無奈何地只能乞助於神鬼迷信了。在山東博山礦區內，因其“坑道簡陋狹隘，陰濕黑暗，吾人入之，不辨南北，森森然真與地獄無殊，”一般礦工迷信崇拜井下的老鼠，無敢傷害，且飼以糧食；“據謂坑下出水，鼠能先知，礦工每見鼠沿繩而上，是卽水之將至，因知所逃避，尊之者蓋亦有由來也”（見1934.7.26，大公報載山東旅行第九信——博山礦業概況）。目下談“保障勞工”的聖人哲士很多很多；然而像博山的礦工那樣，實際上除掉得到老鼠的一點保障以外，什麼也不曾得到，但是迷信是不可靠的，井水煤氣等等橫禍一旦襲來以後，工人底哀號跪拜是救不了他們，譬如山東淄川的礦工，因平日最怕水灌礦中，全遭滅頂，所以相互斟酒的時候，“滿了”反說“乾了”，以冀禍患之消除；但是最近他們却遭滅頂了，他們淹斃在礦中凡八百餘人！

其實，他們就算僥倖而不遭橫禍，現實的生活也是萬分苦痛難受，我們且不說那地下的八小時或十二小時是如何難以消磨，卽單就工資的微薄而言，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近年來經濟恐慌使礦主力圖禍患的轉嫁；譬如開灤煤礦公司去年五月厲行緊縮，將礦工工資減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淄川鑛工的工資過去是每日兩三元，現在低至五六毛或八九毛；博山

方面的情形也一樣，河南的焦作和安陽亦無二致，據說博山有一個名叫上河灘的市鎮，除集日外很少行人經過；因為有許多鑛工，眼見到工資的收入有限，而生活的壓迫以及奮鬥的追索却一日嚴重一日，所以都在那兒的樹林之中吊死，以致一般人都怕吊死鬼出現，不願輕易前往，和這同樣，開灤鑛務局西牆外有一片無際的曠野，除掉有一些稀疏的刺槐以外，就全是死去的鑛工們底壘壘的青塚，牠十分顯著地反映出那兒的鑛工們底悽慘命運。在浙江長興更有這樣一個顯明的對照，指示出鑛工們的生活是如何不合理：

“煤礦辦事處是中西合璧的建築，佔地很廣，裏面有會客室，辦公室，食堂，職員宿舍，俱樂部，花園等公共處所，內以職員宿舍和俱樂部的設備為最講究。宿舍和一些大學校的宿舍相仿，一間間的有磚牆隔開，有電燈有浴室，職員可以帶着家屬同住。俱樂部是十字形的建築，裏邊有檯球，彈子，無線電，桌上高而富，樂器等等娛樂設備。金黃色的地板，雪樣白的牆壁，完全是一個小形的跳舞廳，置身其間，幾乎忘記了外面的世界。

“辦事處的四週零星地散佈著一些工人的住屋，那些住屋一律用幾根竹稍及稻草架成，都為著年久失修的緣故，傾斜的程度實在駭人，有一些連稻草也給霉去了。竹條編成的牆壁穿了許多孔，根本失去了抵禦風雨的作用。

每間屋子最大的面積不過二十尺見方，一扇矮矮的竹門，進出的時候要低下頭來才能過去。有的在裏邊點綴著幾件簡陋的木器，有的連臥具都舖在地上，爲著不通空氣少見日光的緣故，打從每間屋子門口經過的時候，就可嗅到泥土和污物混合成的臭氣，但是工人及其家屬是在這裏邊起居飲食著的！”（見前引杭州民國日報）。

礦工底汗血變成烏黑的煤，變成在礦主手中閃耀著的金和銀，變成浴室，變成高而富球，變成跳舞廳，供礦主職員消受享樂，而他們自己却生活在惡臭的茅屋裏！不，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炸死或者溺斃在千萬丈深的礦井之下，就連他們底妻室要撈尋他們底屍骨也萬分困難。死亡線上的中國煤礦工人底生活就是這樣!!!

1935年五一節後十九日

日人獨佔東北礦業的邁進

蔡 正 廷

大家知道，東北的寶藏除開農產品外，是以礦產最爲豐富，特別是足爲一般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原料。其中最要重的，例如煤的埋藏量，東北所有約與日本全國相等；鐵的埋藏量，東北所有約合日本十倍之多；石油的埋藏量幾及美國原油量的四分之一，約超過日本台灣的一倍半。這便是日帝國主義所以早就對於東北礦業積極經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它從九一八以來所以力謀獨佔東北礦產的唯一動機。

近來太平洋均勢的破裂，遠東風雲的緊張，日美和日蘇對立尖銳，乃至日英間經濟上衝突的嚴重，和若干政治上矛盾的難於解決，遂使久已在備戰狂中的日本，不得不更進一步的更週密的佈置它未來戰爭期中所需要的一切原料。這就是日本積極施行其獨佔東北礦產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最近「偽滿」所頒佈的煤油專賣制度，無非是這種行動的更具體的表現。

現在我們且就日帝國主義最近獨佔東北礦業的整個行程

來觀察一下。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於整個東北經濟的控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這裏，就礦業方面說，正同其它經濟部門一樣，日本投資額的突飛猛進，也是顯而易見的。滿鐵會社是握有東北經濟命脈的一個歷史最久而最巨大的壟斷組織，它對於各企業部門所定1934年度事業費的預算總額達69,551,000元，比較去年度的37,831,000元幾乎增加了一倍，這裏邊它對於各主要企業部門的分配額約如下表（民23年9月10日東南日報）

企業別	1934年度	1933年度
鐵道	32,139,000元	13,734,000元
港灣	6,767,000	6,239,000
礦業	16,012,000	7,160,000
旅館	3,121,000	375,000
地方設施	5,967,000	4,842,000
其它設施	5,545,000	5,418,000
合計	69,551,000	37,831,000

從上表可知本年度與去年度比較，鐵道方面所占的事業費增加18,405千元，約增134%強，礦業方面增加8,852千元，約增123%強。這就可以證明日本對東北礦業投資額的如何激增了。

除開滿鐵以外，日人起初因過去條約上的關係，尙未與「偽滿」訂定礦山新約，所以尙未大事開採。現在，自從日偽雙方所訂礦山自由採掘條例公布後，單單遼甯一省，日人呈請採掘的已有七百餘起。同時，遼甯省實業廳所原有的礦務科因此便擴大組織。另有所謂礦山監督署的設立。這監督署完全由日人監督指揮，名義上是日方統制東北礦務的機關，實際上確已成為「偽滿」出賣東北所有礦山的賣買機關。（民23年7月29日中華日報）。這樣一來，東北所有礦產勢必全部斷送給日人，這種事實從此可以確定了。

上面所說是日帝國主義侵佔東北全部礦業的一般的情勢。下面我們再進而就各種礦業來分別的觀察。

第一煤礦業：就產量說，東北的煤不但佔東北各種礦產的首位，且已占了全中國煤產量及其它礦產的首位。可是東北所產的煤，大半都是日資煤礦所產的，這在東北事變以前就是如此，到了現在自然更不消說。

九一八事變前後東北煤產比較(單位千噸)

礦名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日資	撫順	6,785	6,684	6,291	5,364	7,107
	本溪湖	521	582	580	503	332
	煙臺	133	178	180	148	195
中蘇	穆稜	314	824	338	120	未詳
	札蘭諾爾	186	6	20	未詳	未詳
中 鶴岡	169	187	230	95	未詳	

（省營及商辦）	復州	210	206	223	187	未詳
	西安	152	206	95	170	未詳
	八道壕	66	77	35	未詳	未詳
	北票	453	510	578	35	未詳
	奶子山	84	75	80	19	未詳
	裕東（及裕吉）	59	81	120	70	未詳

註：此表節錄“中國煤業生產統計”，實業統計，2卷4號。

上表告訴我們：在事變後，日資所營各礦產量一般都在增加，本溪湖所產雖是減少，但撫順去年產量的激增，大可彌補本溪湖的減少額。中蘇合資礦業，事變後所呈激減的傾向殆已毫無疑義。至於中國省營或商辦各礦，則其產量的減少雖在1931年時還不十分齊整，到了1932年却就很顯著了。何況所謂省營的諸礦，即前東北礦務局所轄的西安，八道壕，復州等礦，後來都被日人派員强行接收去了。此外不管中蘇合資的或是中國商辦的各礦也已都在滿洲炭礦會社的支配之下。該會社名義上是“日滿”合辦的，資金定為一千六百萬元，其實“偽滿”方面即以所有煤礦作為應擔任的資金，滿鐵會社則以熱河的新邱煤礦作為其所任資本的一部分而高估其價為五百萬元，另外再出現款三百萬元。於此可見東北所有的煤礦，實際上是確已全被日方侵奪去了。末了，日人對於撫順煤礦那是更在加緊擴張它的生產。上面所說滿鐵本年度事業費預算內，礦業方面比較去年度所增加的八百八十餘萬元，主要的就是作為撫順煤礦增採計劃之用的。按照該項增採計劃，撫順煤產將由去年度已顯示激增的七百十餘萬噸，增至八百五十萬噸。

第二鐵礦礦業：東北的鐵礦業，在事變以前。就好算已完全操在日帝國主義者的手掌之中。當時最大的鞍山製鐵所就是滿鐵會社所辦的。它歷年來所開採的鐵礦或是製成了的銑鐵，增加的速度還比撫順煤礦所產的煤來得大。例如鞍山製鐵所在1819年時所產鐵礦為88,364噸，銑鐵為31,620噸，1928年所產鐵礦和銑鐵已為604,267噸和224,460噸。這就是說，在十年中間它所產的鐵礦和銑鐵都增加到六倍以上。可是撫順煤礦（連烟台所產在內）所產，即就1916年與1928年比較，也只由2040千噸增至7,198千噸，即約增至三倍半強。還有本溪湖煤礦公司名義上是中日合辦的。其實也完全須受大倉組織的支配。這也可以想見，日人對於東北鐵礦業的積極經營比較煤礦業是有過之無不及了。

東北的淪陷，不啻更給與日人以擴展鐵礦業的巨量興奮劑。因為日本所有鐵礦的埋藏量既然只及東北的十分之一，日本近年來軍事工業的龐大擴張更需要大量的鐵，它不斷地收買人家的破船或鐵屑之類，就是爲此。可是這種收買的辦法不但須費去巨大的代價，並且決不是根本能補救它產鐵太少的缺憾，所以唯一的方策，便是不惜工本地去擴大東北的鐵產，這種擴大鐵產的計劃，第一步就是以鞍山製鐵所爲基礎，創立昭和製鋼所，即以一萬萬元的巨額資金，以鞍山爲中心，建設一龐大的生產銑鐵的工廠。其中以八千萬元爲建設費，所

有生產銑鐵的各項建築，早就在積極進行之中，預定於本年底可完成。至於鍊鋼則預定明年三月底可完成。照目前估計，各項設備完成後的鋼鐵產量約計共有四十六萬二千九百噸之多。且據大美晚報 8月6日所載：昭和製鋼所首腦部，目下已在積極準備第二期擴張計劃，即將原定主要設施重行增加；原定每年生產銑鐵十三萬噸，鋼片二十萬噸，軌條及大型七萬噸，小型三萬三千噸，薄片三萬噸——共計四十六萬三千噸的生產計劃擴充成爲每年生產鋼鐵六十餘萬噸的計劃。假如這種計劃完全實現，則昭和製鋼所即可成爲東亞數一數二的製鋼所也。大可作爲日帝國主義者統制東北鋼鐵事業的唯一有力機關了。

第三油母頁岩礦業：在撫順煤礦區掩覆着主要煤層之上的油頁岩層，它的厚度有120公尺至170公尺，它的藏油量有一千九百兆桶（每桶42加倫）。約佔中國藏油量三千六百兆桶的百分之五十二。這樣大量的埋藏量因此便構成了日本所謂燃料國策的對象。

據第四次中國礦業紀要內稱，撫順所產頁岩油1930年爲334,702桶，1931年即激增至427,567桶，約增百分之二十八弱。在這同時期內中國石油產量（連撫順在內）由364,137桶增至459,632桶。如將撫順所產岩油與全中國所產比較，則前者所佔後者的百分數是，由1930年的92%增至1931年的94

%弱。1931年後撫順頁岩油的產量，雖目前尚無統計數字可資參考，但其產量激增速度之大那是可以斷定的。關於這，我們可以間接的從「偽滿」輸往日本的石油額來證明據。日本世界經濟情報1933年9月號所載：

偽滿三年來第一季輸日石油額

年別	單位百斤	單位千元
1931	61,151	207.1
1932	88,833	375.2
1933	334,525	4,562.3

撫順頁岩油輸日數額的激增，因此也就可以推知它的產量的激增。這種撫順頁岩油產量的激增便是「偽滿」最近實行煤油專賣在經濟上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藉以避免外油在東北的傾銷，藉以獨占東北市場，藉以保障撫順頁岩油盡量擴張生產的利益。同時日本方面也頒佈了煤油統制法，其中最主要的，即規定在日外國火油公司須先存儲足夠六個月應用的大批石油，這大量石油的存儲地點也須由日本政府規定。不但這樣，日本政府還保留規定火油價格之權，且隨時有將全部貯油收歸公用之權，而照同時政府所定價格給付代價。日本頒佈此種統制法的用意，一般說來，似在戰時取得海軍燃料。其實，它的根本用意恐怕還不止此。為什麼呢？第一，外商因目前須添建存油棧而所費不貲，且因將來很有遭受巨大損失的可能，

那末就會想到，與其在日銷售所得不償所失，還不如索性放棄日本市場的好。第二，縱使外商都不得已而屈服了，日本所能獲得的利益，也只是將來戰爭時的一大批，不過只有一批的外油。可是實際上日本平時所受外油輸入的損失却不少，假如外商還願意，即還有利的在日銷售的話。因此日本頒佈這火油統制法的真正用意，多半是在企圖於無形中間排斥外油（多半是在漸漸的用撫順頁岩油來完全代替外油。）這一點我們更可以用最近日人積極擴大撫順油產的計劃來說明。據滿鐵本年度的預計，起初將撫順製油工廠由過去每年產量七萬五千噸之數，擴張到十五萬噸。可是到本年度為止，這計劃已經完成，即所產油量已到十五萬噸的預定額。因此現又計劃擴大產油額至三十萬噸。撫順油產這樣迅速的一倍二倍的擴張，難道還不能說是爲了專供日方應用，爲了使它不必再用外油麼？

最後，除開上述主要的幾種礦業而外，日帝國主義企圖獨占的東北礦業自然決不止此。例如金礦：黑龍江沿岸所有金礦產額可達三百五十萬噸，價值四億七千萬元，1930年時所採得的金量爲8,267噸。但是這些金礦，現時却已完全落於日人之手了。同時張學良私產鐵嶺柴河溝金礦，也已被日方沒收，並已由滿鐵設立大滿採金公司於瀋陽，從事大規模採掘，將來並擬採取熱河遼甯二省內所有金礦成爲獨占事業（23年7月13日時事新報）。又如菱苦土礦：這是採取金屬鎂的原料，在軍事工業

上頗爲重要，也已由滿鐵會社理化研究所，三菱，住友及其它方面合計，出資七百萬元，設立日“滿”製鎂會社。又如去年一月所成立的日“滿”製鋁會社，資金定五百萬元，預計第一期產鋁五千噸，第二期一萬二千噸，第三期三萬噸。這樣，日本每年由國外輸入的一萬五千噸鋁，以後也可以不用外貨了。

總起來說，日帝國主義者爲了瘋狂般的準備戰爭起見，爲了儘可能地實現它戰爭期內的自給自足政策起見，爲了挽救它目前原料品輸入過多的危機起見，爲了它已看透了英美這時候還無可奈何它的緣故，它對於東北礦業的獨占，是會不顧一切而邁進的。

1934, 11, 19。

日帝國主義鐵蹄下的東北農村經濟

如 平

東北的農業恐慌，由於國際資本主義的襲擊，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情掠奪，以空前的形態表現出來！農產品——尤其是特產品（大豆，高粱）底價格的狂跌，耕作面積和收穫的量的縮小，農民購買力因收入激減而降低，日本農耕殖民運動的激進，農民鬥爭的普及全滿：就是暴露東北農業恐慌的主要現象。

一 農產品格價的慘落

東北自一九三一年以來，農民所受的致命打擊，是農產品——尤其是特產品價格的慘跌，大連歷年來的大豆高粱公定行市如下：

大連大豆高粱公定行市表（百斤計算）

年 月	大 豆		高 粱	
	最 高	最 低	最 高	最 低

1930	8.46元	5.66元	5.38元	3.32元
1931	6.88元	4.51元	4.12元	2.54元
1932	6.16元	4.45元	3.63元	1.93元
1933 (1月)	6.50元	5.10元	3.00元	2.64元
1933 (6月)	5.36元	4.95元	2.51元	2.17元
1934 (1月)	3.54元	3.12元	1.94元	1.64元
1934 (6月)	3.77元	3.44元	2.02元	1.71元

——見大連商工會議所統計年報——

根據上面的統計，大約四年之間，大豆由1930的最高價8.46元跌至1934年一月的3.12元即跌落5.34元。即以1930年的最低價5.66元與1934年六月的最高價3.77元相較，也呈1.85元之差，高粱價格下跌的情形，較大豆更為顯著。

我們倘從東北內地的價格來觀察，其情勢就更分明，譬如每擔的價格在長春哈爾濱低到1.5元左右；兩年之間，即跌落40%：

長春哈爾濱大豆高粱公定行市表(以擔計算)

年 月	長 春		哈 爾 濱	
	大 豆	高 粱	大 豆	高 粱
1933	16.36元	3.26元	4.01餘	2.34元
1933	66.41元	2.32元	3.24元	2.27元
1934	13.34元	1.55元	1.55元	—
1934	63.52元	1.60元	1.60元	—

我們現在再把它和工業品的價格作一比較來看，就更顯出東北的農業恐慌深刻到了怎樣的程度：

長春批發物價指數

年	月	穀物	紡織品
1832	7	100.0	100.0
1933	1	101.7	107.6
1933	6	92.2	107.7
1934	1	68.6	91.4
1934	6	65.2	94.1

——見同上——

這裏很明顯地指明農產品價格跌落之速，遠過於工業品。在1933年6月穀物價格指數為92.2，而紡織品則為107.7，1934年6月穀物價格跌至65.2，而紡織品尚能保持94.1。我們知道東北的工業早已握在日人掌中，他們自然要竭力維護要，農民及其產物，則狠命地加以剝削和摧殘。

二 耕作面積和收穫量的減縮

日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以後，直接破壞固有的農村經濟的功績，可以從作物收穫量的減少這一過程來看出。據滿鐵經濟調查的統計，各種作物的收穫指數如下：

北滿收穫指數表

年 份	大 豆	高 粱	粟	小 麥
1930	102.6	100.2	98.4	99.0
1931	95.5	93.9	86.1	94.4
1932	69.0	74.6	72.3	74.4
1933	82.9	84.4	88.8	86.7
1934	85.0	85.0	71.0	88.0

南滿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

南滿收穫指數表

年 份	大豆	高粱	粟	小 麥
1927—1932	100	100	100	100
1931	86	81	81	79
1933	92	87	99	60
1934	89	83	65	79

前列兩表 同時自然能夠反映出耕作面積的縮小，
今更舉南滿播種面積數表，以爲實例。

南滿播種面積指數表

年 月	大豆	高粱	粟	小麥	其 他
1927—1931	100	100	100	100	100
1932	100	82	98	104	98
1933	96	88	107	77	96

以上所指明的，除粟的播種面積略有增加而外，一般都在減少。

但是這還是1933年以前的事，1934年的情形更惡化：

滿洲各地之特產收穫量(單位萬噸)

地 別	1933年	1934年	33比34年減少
平齊線	30	20	10
京圖線	56	28	28
奉吉線	40	16	24
拉濱線	21	13	8
南部	26	19	7
東部	21	10	11
濱北	23	16	7
齊北	14	11	3
西部	6	6	——

——見一月廿五日中華日報——

這種現象的形成，主要自然是由於日帝國主義竭度榨取農民大眾，使他們不得不拋棄土地而流亡着。

三 日帝國主義的農耕移民運動

日帝國主義一方面把東省的農民羣衆從土地上驅逐出去，另一方面更竭力獎勵農耕移民，他們自昭和七年(1932年)

實行第一次武裝移民以來，每年即以五十萬日元作為獎勵的經費；最近日本拓殖省更積極地計劃着增加經費五千萬日元，設立大規模的半官半民的“滿日合辦農耕移民會社”，對東北實行集團的農耕移民（中華日報二月二十五日）。他們要在15年間資送契約移民10萬戶50萬人。自由移民6萬戶，30萬人（益世報三月卅一日）。換言之，他們準備在短時間內完全將東北變為朝鮮。

日人因為遼甯河孝子河兩岸的土地肥沃，最近勘定百萬畝為移民區域，三月一日由朝鮮總督遣送日韓農民從事墾殖（見申報三月五日）。

日本為了迅速完成殖民政策，遣送大批韓人為先鋒，到達東北，並令“滿洲國”民政廳奉天省公署擬定開墾水田計劃。該廳並派土木科長日人楠田出發，沿遼河流域附近二十里以內的民田，均被沒收供給韓人墾殖（申報二月十六日）。

這一類的事實愈演愈烈。最近更限制華工自由遷入東省，加緊驅逐東北的農民脫離土地，譬如磐石一縣，在九一八以前有人口28萬至1934年只剩13萬了（申報一月廿七日），其他各地的情形亦完全相同。

四 東北的農民運動

東北的農民大眾在農村破產和民族危機雙重困迫之下，

燃燒起革命的烈火！他們爲了自己的生存和解放，大批地投入義勇軍，到處活動，用沸騰的血和頭顱，向日帝國主義的炮火拚命，據偽滿政府當局的報告，去年一年遼甯一省的義勇軍活動，其出沒次數和人數有如下表：

	出沒次數	人數
一月	306	13,717
二月	496	24,295
三月	305	21,285
四月	414	16,347
五月	446	16,458
六月	451	15,564
七月	559	21,630
八月	940	31,050
九月	764	35,886
總計	4,711	196,537

九月以後，偽滿當局感到自身的不安，實行新聞封鎖。關於義勇軍的襲擊，不許登載，因此我們就不能全部知道。而且就是這九個月的統計，也是殘缺不全的，不過東北農民大眾捲起反日高潮，已是不能掩飾的事實了。

遼甯是日僞警衛力量特別雄厚的地方，然而在前述九個月中義勇軍也出沒了4,711次，人數達20萬，其他地方自然更

要活躍。至於義勇軍的人數，在今年初，有嚴密組織的（無組織的不在內），約有十萬人左右，（據阿牙林氏的調查）其中三分之二、散佈在遼、吉兩省的東境一帶。就省區說來，遼吉兩省約有六萬人，熱省約有一萬四千人，黑省不下一萬四千人。這是多麼偉大的力量呀！

最後我們摘錄世界知識二卷七期的一段作本文的結束：

“東北各地的農民，因為不堪日僞的壓迫，也往往舉行暴動，起而反抗。凡是發現義勇軍的鄉村，日軍以為該處居民有窩藏的嫌疑，即不問黑白，將該地居民用機關槍，大批屠殺，並將全村房屋，縱火焚毀。因之此等地方之居民，走頭無路，也只有加入義軍或羣起反抗。譬如去年遼省錦西縣的二十餘村落，吉省的佳木斯一帶，以及熱省的朝陽等地農民，都因不堪日僞的壓迫，羣起暴動，反抗日軍。”

這是很明顯的，農民為着挽救垂危的生命，為着反抗帝國主義而自動武裝起來，而且已經由保住土地的經濟鬥爭，進而為政治鬥爭了。